

米歇尔·阿尔贝尔 (Michel Albert)，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著

杨祖功 杨 齐 海 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 (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著; 杨祖功等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10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49-216-1

I. 资… II. ①米… ②杨… III. 资本主义-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2455 号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资助，特此致谢！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在此，谨向让－克洛德·纪勒伯、
亚历山大·德儒尼雅克致以诚挚的谢
意。本书也是他们的作品。

M. A.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生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

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毋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 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 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 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

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译本序言

60年代末，我参加了《美国的挑战》^①一书的撰写工作，这本书是由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署名发表的。此书在全球各地曾是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目地是让舆论，特别是欧洲舆论关心正在日益增长的美国经济体制的实力。当时，提出这种看法还是很新颖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自50年代末以来，随着欧洲共同市场的启动，共同市场的创始国像后来的亚洲“龙”和“新兴市场”一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到了90年代初，人们不再谈论《美国的挑战》，而是谈论《美国的衰落》了。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说明，有时连最确定无疑的事情也不能下断语了。当时的《财富》杂志曾发表一篇长文，现在看，连这篇文章的标题都有点使人吃惊：《美国造即将消失》。那时，纽约市中心的象征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收购了。麻省理工学院在它那篇题为《美国造即将消失》^②的著名报告里，痛心地分析了美国工业衰退的原因。这份报告的作者强调指出，美国的工艺技术统治终结了，同美国的手——欧洲和日本相比，它缺乏工人和管理干部的竞争能力。

此后不久，我于1991年写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这本书已被世界五大洲译成20种文字出版，其中包括这个中文译本。我在本书中分析了两大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即新美国

① 《美国的挑战》，德诺埃尔出版社，巴黎。

② 《美国造即将消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国际版，1990。

资本主义（1980年里根总统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之间的深刻分歧。莱茵模式遍布于莱茵河谷的所有国家，从奥地利到荷兰，包括今日属于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的国家，只是各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

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按照共决制，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一半是股东，另一半是雇员代表。当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莱茵模式具有双重优越性：一方面，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从劳动成本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出：1998年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时工资，德国是28.7欧元，法国是25.5欧元，美国只有20欧元；另一方面，莱茵模式在社会领域方面更加平衡，因为它保障了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一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部分地同比美国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我至少预见到了，正如“疲软的货币赶走了坚挺的货币”，“坏的资本主义”也压倒了“好的”资本主义。但是，当时我自己也确实没有想象到近几年出现的这种令人瞩目的转折，美国经济正在遥遥领先于欧洲经济，尤其是莱茵国家经济。这是又一次《美国的挑战》，是2000年的挑战。

德国人对这种转折的反应象征性地表现在一个可能是德国统一以来最重要的日子里——1996年6月15日。这天是星期六，欧洲杯足球赛半决赛的前夕，对手是英国足球队。尽管这场足球赛有很大的吸引力，却有30万人走上波恩街头示威游行，这是1945年以来在德国规模最大的工会游行。更有甚者，中产阶级

也走上了街头，这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他们喊出的口号非同寻常：“反对德国社会美国化！”这个口号本身就象征着“两种资本主义之战”进入了第二个回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American way of life**”曾经使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人走火入魔，现在却被弃之如敝屣！

然而，**1996年6月15日**这个日子也标志着德国的再一次分裂。当然不再是**1990年**以前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地理性分裂，而是一种政治性的，甚至是哲学性的分裂。他们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即围绕能否坚持莱茵模式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诚然，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莱茵模式的衰落是始料未及的。我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来谈论这个问题。我曾设想，这种衰退将是逐步地渐渐地衰退，而事实却是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似乎一切都改变了。此前**5个月**，即**1996年1月23日**，科尔总理、雇主协会和工人工会曾经通过一项关于就业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曾被看做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创新”，显示出莱茵模式应该成为**21世纪**的参照榜样。然而，**6月15日**的示威游行却明白无误地揭示出，这个模式已被动摇到何等地步了。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么快？可能是因为在德国和欧洲联盟的大多数国家中，两种新的现象不期而遇。第一个现象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超过了**10%**。**30年代**危机之后，失业爆炸曾经是导致纳粹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至今对此仍记忆犹新。在这样的国度里，失业特别令人难以接受。对失业现象的这种变态反应，导致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且过分夸大了美国新模式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具有的越来越大的合法性。而且，由于这次危机，导致在是否坚持实施社会共决制和实现创造性妥协方面出现了一次思想分歧，一次深刻的不一致，其混乱程度不亚于**1945年**建立民主德国时的形势。对莱茵模式的这种否定，

在很大程度上对欧元区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产生这种否定的主要原因，是关于企业至上的政府新观念占了上风，这些新观念的特点是强调金融市场和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应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难道因此可以得出莱茵模式已经死亡了的结论吗？进而可以认为，在**21**世纪，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新美国模式吗？难道可以把它强加给整个世界吗？在谈论这样一个如此狭隘的决定主义结论之前，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莱茵模式的一些基本价值观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些价值观是把经济效率、社会互助和团队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既然欧元已经取得成功，未来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欧洲能否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联盟。正如**1982~1998**年期间执政的科尔总理喜欢重复的那样，“对世界化的回答，就是建立大欧洲”。

大欧洲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在我看来，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们能够融会在一起，必会成为**21**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

米歇尔·阿尔贝尔

法国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1999年**4**月**12**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美国回来了	1
美国的“垃圾股”	3
屈辱过多，且信心不足	4
美国的新挑战	7
美国呀，美国	11
美国实力的基础	13
美国回来了！	18
第二章 美国倒退了 (America backwards)	19
一分为二的美国	24
爱慕虚荣者的火坑	27
学校病了、医院病了、民主也病了	31
工业在衰退	35
赤字的梦魇	38
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40
第三章 金融与荣誉	43
“类似一种妄想症”	48
螺旋式上升的虚张声势	51
市场的规律	53

2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对失败者的犒赏	54
没有业主的资本主义	55
要今天的利润还是明天的利润?	56
阻碍发展的利润	57
金钱王国的新威胁	60
第四章 盎格鲁—撒克逊式保险业对峙阿尔卑斯式保险业 ...	64
保险业的两个发源地：山上和海上	65
阿尔卑斯模式实力雄厚，但遭到反对	68
英国的经验（或看不见的手的代价）	71
加利福尼亚州的实验（两个极端在这里汇合）	75
法国的综合经验受到质疑.....	77
第五章 另一种资本主义	80
市场在这两种模式中的地位	82
一种银行资本主义	87
交叉的利益网络	89
管理良好的共同决定制	91
忠诚与培训	95
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	98
强大的和负责任的工会组织	102
共同的价值观	104
第六章 莱茵模式的经济优越性.....	107
战败国的胜利	107
马克的威严	109
货币的“后方基地”	111
强势货币的道德周期	113
这种实力的真正武器	118

经济文化与经济的文化	121
第七章 莱茵模式的社会优越性.....	127
健康是无价的	128
莱茵保护伞	130
美国人的错位	132
平等的逻辑	133
梦想的召唤和历史的重任	137
围绕必要提取的战斗	139
法国变成了贪图眼前享受的蝉	144
第八章 莱茵模式的衰退.....	148
不平等的陷阱	148
“共决制”面临威胁	151
个人主义与人口	153
新的习俗，新的权益要求	154
金融的诱惑	156
几次断裂	161
创新：为金融服务的手段	163
放弃管制与管制	166
第九章 为什么最不完美的却占了上风？	168
一切都是为了讨人喜欢	170
媒体的胜利	172
为了再来几十个亿	175
经济媒介化与媒体危机	177
为了现在的利润	180
维纳斯的女性魅力弓朱诺的德行	182
东方的一个大真空	184

4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跨国公司万岁！	187
第十章 德国的第二条教益	190
欧洲僵化症的替罪羊	190
终于如此，坚挺的货币！	191
统一的雷击	194
赫尔姆特·科尔的惊人魄力	197
意大利南方地区，还是第五条龙？	199
波埃尔先生“可悲的”误解	203
欧洲能够干什么	205
第十一章 法国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	209
与柯贝尔传统决裂的法国	210
法国的两种转型	215
新富人与新穷人	216
法国需要莱茵模式	220
欧洲式的日本财阀	222
欧洲煤钢共同体——莱茵模式的欧洲原型	225
奔向税收天堂的赛跑	227
结束语	231
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	232
为了多得 16400 法郎……	238
附录一 在布鲁日市的两次报告	244
附录二 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	248
附录三 衰落的资本主义	252
译后记	258

引 言

今天，资本主义第一次在历史上赢得了胜利，而且是全线的胜利。一个问题解决了，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胜利体现在 3 条战线上。

第一次战役是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打响的。这是一场内部战争，反对的是侵害了资本主义机体的国家干预主义。由杂货商的女儿和老电影明星在经济政策领域里共同发起了第一次保守主义革命，即国家最小化的革命。其最显而易见的原则是：对富人要少征税；如果富人——从资本家开始——少交点税，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大家都可以从受益。在美国，1981 年联邦政府对一个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最高可达到 75%；1989 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降到 33%。在英国，工党政府对资本收入征税最高达到 98%。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最高税率降到 40%。在世界范围内，财政改革从来没有这样做到家喻户晓。在几十个国家中，这种财政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公民的历史性关系。近两个世纪以来，税收的压力一直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现如今，形势发生了逆转，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竞相减轻税收负担。这确实是一场革命。

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胜利同样十分辉煌，因为这是一次面对面的全面的胜利，而且是不战而胜。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面对着共产主义的抗争。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抗争主要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的，这种抗争制约了一切国际关系。

1989年11月9日，东德青年勇敢地跨过了柏林墙，他们是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中3亿多被剥夺者的先驱。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而且被剥夺了超级市场，即资本主义。

而第三次胜利，由于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仅仅用了100个小时就以1000比1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方式在伊拉克南部边界打赢了一场战争。这首先是实力与权利的联合胜利，是得到了28个国家支持的美国的胜利，其中包括8个穆斯林国家和联合国，甚至包括俄罗斯等国的支持。这也是资本主义对某些人民被骑在他们头上的独裁者剥夺了经济发展希望的胜利。

资本主义的这场胜利揭开了世界经济史的新篇章，它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

从此，现实的光芒扫除了盲目无知带来的恶果，照亮了前苏联体制的“西伯利亚黑夜”。我们的全部历史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了：

——在资本主义以前，在整个历史中，全世界和所有国家——包括各个最灿烂的文明国家——都同我们现在所讲的第三世界十分相似。从生物学角度讲，当时所有的人多少像牲畜一样“自然地”降生，平均活不到30岁就死了。他们是连绵的饥荒、营养不足带来的瘟疫和苍天——即绝对权力——无情压迫的牺牲品。

而法国，正是法国自己，尽管她的农业如此“富庶”，也一直深受饥馑的煎熬，直到1848年革命的前夕！

这简直是短缺的世界，经济的史前期！

——大约3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闻所未闻的历史性职能开始克服短缺、饥馑和各种宗教性折磨压迫了。这场革命肇始于拥有犹太教一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场革命向远东传播、扩大和加快发展，无论何地，都是建立在同样的三位一

体的体制之上，包括：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自由确定市场上的价格和生产资料自由所有制（我无需再列举资本主义的其他定义，我认为，这两条似乎是基本的）；人权，首先是信仰自由；逐步向分权制和民主制演进。

经常性短缺的旧时代过去了，新的、经济发展的时代刚刚开始。通过资本主义的这三重历史性胜利，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地理的两个新内涵正在显现——或者说——正在凸现出来。

首先，20多年以前，石油供应问题（即经济生活的氧气供给问题）一直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长期的解决。如果我们不是过分制造紧张气氛，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石油，而是用什么价格买到石油。新的能源地图将是石油钻井的分布越来越少、替代性能源和反污染设施越来越多的地图。

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定义的内涵本身也“消失”了。当共产主义还敢于在本国就经济效率问题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时候，人们一直自以为是地坚持三分法：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

不要忘记，1960年，当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讲台上宣布到2000年苏联经济将赶上美国经济的时候，并没有使人感到惊讶。直到不久以前，全世界有几百所大学还在传播这一类蠢话。

如今，已经真相大白，任何人都可以实地看到共产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的状况，显然，应该把它们列入同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的行列里，因而，三分法应该让位于简单的两分法了，即，一边是发达国家或迅速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边是不发达国家或贫穷国家。“第三世界”的说法已经毫无意义。

当然，为了把一个国家推向经济发展的道路，仅仅在这个国家中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规则和—

个有效率的，而不是腐败的政府。当然，在某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还有穷人，甚至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穷人，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顺便还要指出这个细节，肥胖症无疑是美国的全国性健康问题。然而，在美国，正是穷人才是大胖子……

下面就是发达的或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名单：

——北美洲，其中包括墨西哥和智利，它们正在奋力崛起；

——所有的西欧国家，包括参加欧洲共同体（CEE）的国家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AELE）的国家；

——日本和亚洲的新工业化国家（NPI），包括泰国、韩国、新加坡和其他“小龙”，以及台湾、香港地区。

到此为止。

可以断言，这个名单肯定会招来不少反对意见，例如：

——为什么不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酋长国列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呢？它们多富有啊！这是因为，它们的财富不是从市场上挣到的，而是从地下抽出来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把它们列入遵守民主规则和分权制的国家行列。

——为什么把墨西哥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区别开来呢？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墨西哥已经对外开放其经济，甚至同美国签定了自由贸易协议，因而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智利也是如此，因为它的经济服从市场规则，经济已经起飞。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有许多财富仍然是在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之外形成的，它们不受竞争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则的支配。这就导致这些国家仍然受制于通货膨胀和不发达的桎梏之中。

——为什么不把南非列入这份名单呢？因为尽管南非的民主制度取代了社会种族歧视，但又出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经济种族歧视。而谈到非洲，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可怜的大陆还包括一个近几年来在北部非洲和南部欧洲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的国家，它就是摩洛哥。

有人会说，把注定要日益复杂化的世界过分简单化了！新的世界经济地图似乎一下子变得最简单、最黑白分明了。这种非恶即善的二分法不是令人难以容忍吗？

加之，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目前所享有的霸权地位，或更准确地说，垄断地位，与它的本质是绝对背道而驰的。我们确实多次强调过，资本主义的首要基础是市场，也就是竞争。可是，目前的资本主义太强大了，它如此咄咄逼人，以至竞争已不复存在。

由于这次胜利是全面的胜利，资本主义失去了可资借鉴的镜子和可供衍生的园地。无论是民主制还是自由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都没有垄断世界的经验。已经没有争议的事，如何进行管理呢？

与其随便提出一些假设，不如看一看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是怎样具体回答这些具体问题的。我仅选择了其中的**10**个问题，也许有些武断，但这些问题特别有趣，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五花八门的，尤其是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中我们将看到，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分为两大模式，它们互相对峙，形成“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1. 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似乎将是**21**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政治辩论的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资本家尤为重要，如果产出相等，移民劳动力的成本一般总是比本国劳动力低廉。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在长期实行一种严格限制移民的配额政策之后，现在成了越来越向移民开放，特别是对来自拉丁美洲移民开放的国家。**1986**年的一项法律准许**300**万非法移民取得了合法地位；**1990**年的另一项法律规定到**1995**年，每年可增加**47~70**万移民。这样，

“大熔炉”式的同化机制便被外来民族的重组政策取代了，这些外来移民越来越不想变成真正的美国人，而是要加强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

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日本却仍然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呢？人口密度显然是个基本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这个国家对朝鲜移民和菲律宾移民的恶劣态度，换到美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同样，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有二分之一的美国人希望，如果乔治·布什 1992 年再次当选总统，应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一个黑人来担任副总统。这在日本又可能是不可思议的。

英国效仿美国，充分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一种近似公民的地位。在德国，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德国由血缘法决定民族的归属问题。1990 年的法律突出了德国文化的单一性，即所有德国人对讲德语的民族应具有互助的义务，但不能设想他们会吸纳本国的土耳其移民。

一边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另一边是德意志—日本模式。

2. 贫困问题

这个问题往往同移民联系在一起，贫困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的问题之一，在它们的代议制和组织机构中都是如此。何谓穷人？在大多数人类社会和有史以来的各个时期，穷人往往被看做穷光蛋、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懒汉、嫌疑人，甚至是罪犯。至今仍然如此。有的国家在优先就业问题上，不是把失业者看成即使不是不可救药的懒汉，至少也是缺乏勇气来适应劳动市场环境的家伙吗？不管怎么说，在两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这种舆论是占主导地位的。

结果是，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建立，也不想建立类似欧洲已经存在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保障体系。而那时候，

我们的人均收入比目前美国的和日本的人均收入要低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在社会的组织结构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根本的差别呢？可能是由于欧洲传统不把穷人看做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包括无知、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我们能够继续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经费吗？当世界各国都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从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省下了钱。在法国，这个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尖锐。

3. 社会保障有利于经济发展吗？

这个问题是贫困问题的先导，但同样值得争论一番。对于里根和撒切尔式的资本家，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社会保障只能制造出一种有利于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济贫思想。但必须指出，尽管撒切尔夫人做了**10**年的努力，她并没有真正触及全国医疗保险制度。至于日本资产阶级，他们认为社会保障不是国家的事，而是企业的事，只要企业有足够的钱向雇员提供就行，可是，一般中小企业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日本，如果企业只是有选择地提供社会保险金，日本资本家也会同意的。

与此相反，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在比荷卢三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保障体系从传统上一直被所有人看做是经济进步的正当结果。许多人甚至认为，社会保障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安排，即，如果低于一定的贫困线，社会排斥现象便不可救治了。因此，欧洲最发达国家（联邦德国、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等）都实行保障最低收入政策。

而且，也必须依靠这个传统才能赢得选举胜利。但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共体，也展开了争论。社会保障制度往往越来越

被看做是国民经济的一般费用支出的沉重负担，从而影响了竞争力。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瑞典，目前，社会民主党政府自己对著名的“瑞典模式”也闭口不提了。

反之，美国人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当然始终占少数）认为，缺乏社会保障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

如今，资本主义思维逻辑在世界各地正遭遇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挑战。

4. 等级工资制问题

首先，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等级工资制是无可取代的效率杠杆。要想让工人工作，就必须根据他们的个人产出支付工资，这就够了，无须其他，招聘和解雇也是如此。美国的一位重要保险商因提出“圣诞节表格”而闻名于世：他把下属员工列出姓名，指出了他认为每个人的耗费和贡献，使其各有所得。顺便指出，这样做，即使非常敏感的人也不会感到不快。而且，自从80年代初的盎格鲁—撒克逊保守主义革命以来，收入差距开始在美国、英国和许多追随盎格鲁—撒克逊榜样的国家中不断扩大。而过去，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保障制度还被看做进步标志的时代，从长期来讲，收入的差距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处在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在法国尤其突出，法国的多数人认为，为了提高经济竞争力，必须扩大收入的等级差别。

然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恰恰相反，企业竭力把工资等级制维持在往往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例如，在日本，那里的一切决策都是集体做出的，包括确定报酬标准。日本的企业爱国主义是比工资更有力的动员因素。在我前面提到的“阿尔卑斯山国家”（瑞士、奥地利、德国）里，也是如此。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传统观念都受到了质疑。在一些行业和企业里，出现了真正的对立，年轻有为的青年人面对拒绝放弃自己特权的上司，急

不可耐地要实现自我价值。

5. 税收应该促进储蓄还是鼓励负债？

在法国，尽管我们的储蓄越来越少，舆论还是赞成储蓄的。

在德国和日本，储蓄被看做是一种国民道德，得到税收制度的广泛支持。它们是杰出的蚂蚁之国。美国则相反，是贪图眼前享受的蝉之国。个人成功的象征通过财富的外露表现出来，“新保守主义革命”之后，尤其明显。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税收制度是鼓励负债：你负债越多，纳税就越少，何乐而不为呢？

80年代这样做的结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家庭储蓄率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在美国，从**13%**降至**5%**，在英国，从**7%**降到**3%**。

在涉及到各个国家未来的这个基本领域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与德意志—日本模式截然对立的。许多年来，美国和英国的资金来源于日本和德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近**10**年来，德国和日本的家庭储蓄率比英国和美国高出约两倍。

显然，这样的差距不可能维持长久。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资本主义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可能是要说服选民，需要像过去的清教徒时代一样，重新学会节约过日子。多难办呀！而仅仅是这个差别本身——我们将看到——也将成为造成两种资本主义之间深刻差别的原因和后果。

6. 应该加强管制并为此而增加政府官员，还是减少管制和为应付诉讼而增加律师呢？

无论何时何地，成功的资本家、赢利的人，必然起来反对国家管制。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根本没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国家干预主义几乎到处泛滥，尤其是工党执政时的英国。结果，在英国引起了撒切尔式的反应，并深得人心。从此，减少管制便成为一

条金科玉律，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头号信条。

现在，这个问题引起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辩论：

在英国，尤其是在美国，鉴于空运机构的瓦解和储蓄银行的破产，减少国家管制的真正赢家是律师。与欧洲大陆传统不一样，这些律师不是自由职业，而是一种商业性职业。律师组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诉讼产业。这个产业发展很快，以至律师的数量已经超过农场主的数量。

对于日本人来讲，提出诉讼就像找心理分析医生一样不光彩……。德国人也是如此，众所周知，他们有纪律性，宁愿要准确的规则。但是，欧洲共同体的共同体法受到放弃管制的意识形态和欧洲议会议员的影响，开始为他们丢掉的特权提出抗议。

在这里，辩论也仅仅是开始。

7. 靠银行，还是靠股市？

自由主义理论提出，只有完全向竞争开放的资本自由运动，才能保证对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不少人进一步推论出，减少银行在分配信贷方面的作用，是提高效率的一个因素。1970年，“中介率”，即银行为美国经济提供资金的大致比重，大约占80%；1990年，这一比重降至20%。这种大幅度下降，是与债券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的急剧膨胀，极而言之，即与股市取代了银行的情况相对应的。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这种价值向之上的，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里昂·布里坦也在为这种价值取向辩护。

而所有阿尔卑斯山国家（我们宁愿承认，富士峰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的资本主义建立在相反的观念上。法国则仍在犹豫不决。少壮派和老股东组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党。围绕在企业研究所——与法国雇主协会（CNPF）关系密切的独立研究机

构——周围的一些企业领导人采取了更加阿尔卑斯式的立场。^①

对于真正的资本家来说，这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事实上，公认的发财方式只有两种：或者在生产方面有竞争力，或者在投机方面有竞争力。突出银行的经济同突出股市的经济相比，发财的速度可能性慢一些。只有那些与此无关的人才会避免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

靠银行还是靠股市，这将是美国的下一场大辩论。由于担心陈旧不堪的、支离破碎的、处于无清偿能力边缘的银行体系破产，布什政府刚刚提出了一个借鉴欧洲样板，主要是阿尔卑斯样板的改革方案。要实施这个改革方案，就必须把银行的数目从**12500**压缩到**1000**个，取消遍布各州的近**2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这要由国会议员来裁决。大胆干吧！

8. 如何在股东与经理及其他雇员之间分配企业的权力？

这个问题同上述问题密切相关，它把许多企业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战场。我对此深有感触。在有些会上，股东只允许董事长身边配备一名秘书；在另一些会上，经理与股东代表人数旗鼓相当；当然，还有一些会议，是由经理来挑选股东代表，而不是与此相反！

在争夺企业权力的战线上，战火正在蔓延并不断激化。这涉及到企业本身的性质问题。企业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商品，由它的所有者，即股东自由支配呢（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抑或恰恰相反，企业像某种复杂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股东的权力受到经理人员的制衡，而经理人员本身又是由银行挑选，或由企业员工通过某种共决方式推选出来的呢（日耳曼—日本模式）？

^① 参见《企业和股东的战略》，1991年1月。

9. 企业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起什么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答案是：这种作用应该尽可能少一些。理由有二：一是长期才能收效，费用却要立即付出，而人们已不再有长期劳动的时间，因此，应该马上争取利润的最大化；二是鉴于劳动力的不稳定性，这是一种过于没有把握的投资，而劳动力的不稳定性本身又表明“劳动市场”运行良好。

来自日耳曼—日本方面的答案则恰恰相反，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尽力在预测性的职业管理政策的框架内，让所有雇员得到职务上的晋升，而职业管理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保证社会和谐与经济效益。但是，在某些人中间还存在争论，一方面，有些人要求对他们在其他企业取得的经验支付最高的报酬；另一方面，又有人在社会传统的羁绊中陷于破产！

从这个具体问题出发，还可以向不同方向引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规定企业只有一项明确而特殊的职能，即赢得利润；欧洲大陆和日本的传统是赋予企业一种更为广泛的使命——从扩大就业到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10. 引起争论的一个典型部门：保险业

既然我是保险商，我这样讲可能反映了一种职业偏见。但我不认为如此。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提高它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需要通过发展各种性质的保险业来带动或促成社会的进步。而且，造成这两种资本主义深刻对立的正是它们对现在和未来赋予的不同的价值。然而，各种原因都促使保险家注重未来，因为他的职业就是把现在的资源转向未来，使它开花生果。

但是，关于保险业也有两种日益对立的观念。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观念，把保险看做一种简单的市场行为，这种观念在布鲁塞尔得到充分的表现。第二种观念强调体制框架对保障企业

安全和个人安全的重要性。如果你认为这场辩论与己无关，除非你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出汽车车祸，也不需要年老后的家庭服务。但能肯定吗？

关于保险业两个根本对立的形态是这样的：第一个形态属于金钱赌博、个人风险、商业风险和长途航运领域的；第二个形态是依靠保险网络来更好地探索未来，植根于寻求共同保险或互助。

这样说，真是把两种资本主义模式过于漫画化了。我不是故做矫情，而是意识到在电视时代，要求你不管问题多么复杂，必须在3分钟之内处理好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敢于漫画化，也就是说，通过最大限度的夸张，做到尽可能的简约。

把这10个具体事例浏览一下，似乎有一种双重含义。

从外部看，目前的资本主义，不管其性质如何，都处于垄断地位，似乎是铁板一块，是继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之后的一种新的决定主义集团。然而，如果一个一个地考察，只要深入到具体事物中就可以看到，恰恰相反，不同国家中存在的真实的各种资本主义，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会提供单一的答案，不会提供“一条最美好的道路”。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像生活一样，是多种多样的。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实践。

但是，第二点教益是，这种多样性正在使旗鼓相当的两大资本主义类型之间，使前途未卜的两个资本主义之间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应该首先观察一下具体事实，因为，目前，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理论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经济研究中，几乎都占主导地位。按照这种理论，我上面提出的看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这种理论来说，只有市场经济的逻辑才是纯粹而有效的。其他任何强调价格理性的同时要考虑到体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的主张，都不过是一种蜕化和变态。

在这种学院派思想看来，原则上美国就是唯一一个可供参照和效仿的模式。美国是“圣地”。

幸亏，事物并非如此简单。本书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指出，除了新美国经济模式以外，其他一些模式可能在经济上更有效，在社会上更公正。

何以见得呢？

1. 首先，人们试图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同“日耳曼—日本”模式对立起来

第一个概念的内涵很广，甚至太泛了，它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同撒切尔主义的英国列为同一类型，这就忽略了工党在英国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加拿大也是如此，它的“美丽的省份”——魁北克近15年来之所以取得了飞快的发展，正是靠了加拿大储备银行或德斯卡尔丹集团等这类的体制，这同10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总体特征恰恰是大异其曲的。

尤其是把美国和英国相提并论，这就忽略了一个根本现象：众所周知，美国没有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反之，即使是撒切尔夫人也不能从英国的社会机体中根除其非常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顺便提醒一下，这个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俾斯麦，而不仅仅是来自《贝夫里奇报告》。

至于第二个概念“日耳曼—日本模式”，这使人回想起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日本人称作“亚洲的德国人”，而目前，一些日本大公司正在和德国公司联合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公司，如：三菱与奔驰、丰田与大众、三菱与西门子的联合。

另一方面，除了财政制度和企业的社会作用接近外，德国和日本经济相近的主要因素是出口的主导作用。但是，在德国找不到大企业与小型加工企业的二元体制，也找不到日本贸易公司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总之，20年来国际景气研究与信息中心

(CEPII)一直在研究产业专门化的进程。它强调指出，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有两点截然不同：德国是强项产业（机械制造、运输和化工）非常稳定；日本的特点是产业专业化变动很快，它撤消了纺织业，改组了造船业，迅速发展了汽车和大众消费电子产品。

总而言之，使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个术语，反过来，对“日耳曼—日本模式”这个术语也一样，只是笼而统之地从远处观看才有用。

2. 美国模式，或者说“新美国模式”

尽管撒切尔夫人倡导了保守主义革命，英国还是不得不更加接近欧洲而远离美国，因而势必要把美国本身看做他们的一个经济模式。

自1981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以来更加如此。而以前，自30年代危机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作用都在日益扩大，因而使大西洋两岸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互相靠拢，以便共同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

与此相反，在大陆欧洲并没有发生美国那样的里根革命。那里建立了另一种经济模式，但使用了一个同样的名称——里根式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在美国国内遇到的困难丝毫没有影响它在国际上的急速扩张。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的心理因素超过实际的经济数据。我称之为“新美国模式”。

3. 按照这种思路，必须提出是否确实存在一个纯粹的欧洲经济模式的问题

首先，现实的一切可以让人们这样推想：共同市场的事业已经开始了30多年了；欧洲联合不是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也不是社会的，而主要是经济的；人们不停地谈论共同市场，好

像共同市场已经完成或差不多完成了。其实不然，欧洲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经济模式。英国模式更加接近美国而不是德国。意大利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家族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国家非常薄弱，公共财政有巨额赤字和中小企业生命力旺盛。可能除了海外华人模式以外，意大利模式不能同任何其他模式相比。

无论怎么说法国与西班牙相似都不为过，它们继承了类似的保护主义、统制主义和不断膨胀的行会主义传统。经历多年困苦以后，法国和西班牙通过加速现代化，摆脱了这些落后传统。目前这两个国家仍在3种倾向中来回摇摆：不断强化的体制传统有可能推动它们向阿尔卑斯山国家靠拢；“美国的风气”加快了企业创业、投机和二元对立社会中的社会紧张；最后，意大利式的“资本回归”带来了个人财富的膨胀和大家族的荣耀。

因此，不能说有什么“欧洲模式”。

4. 然而，在经济欧洲中存在着某种“硬核”。表现在两个方面：

——阿尔卑斯现象：也就是“德国马克区”，包括瑞士和奥地利（不包括荷兰）。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与“新美国模式”相对立的“欧洲模式”的最突出的成分。同样，从这一代人以来，任何货币都没有像德国马克的管理方式那样，与美元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

——或者，如果主要从社会角度来观察，最适当的字眼是“莱茵河式”。

莱茵与得克萨斯互相对应：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的特别象征。同样，莱茵这个词强调的是新德国的特征，新德国不是来自普鲁士，而是来自莱茵河。新德国诞生于波恩，而不是诞生于柏林。

正是在莱茵河畔，在哥得斯堡的温泉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的历史性代表大会上决定接受资本主义，这在当时至少曾使人大吃一惊。然而，毫不含糊，这确实是资本主义，因为代表大会强调了“保护和推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主张“竞争自由和企业自由”。当时这个纲领曾被所有社会党指斥为背叛行为，但渐渐地，面对现实的考验，它即使不在理论上被接受，也在行动上被接受了。

自此，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德国继承了阿登纳、艾哈德甚至勃兰特、施密特的德国，成为所谓“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代表，这种资本主义不仅代表了沿莱茵河两岸的瑞士、荷兰，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经过不可避免的文化改造以后，传到了日本。

现在，演员已经登场，节目就要开演了。

苏联的解体使资本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来。一个是“新美国模式”，建立在个人成功，特别是短期金融利润之上；另一个是“莱茵模式”，以德国为核心，包括许多类似的国家和日本。这种模式促进的是集体成功、共决制和长期利益。近10年来的历史表明，后一种模式，即“莱茵模式”的身份迄今虽然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却是最有效、最公正的。

1990年底，赫尔穆特·科尔在德国取得胜利，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下台，这两个事件不能仅仅从内政的角度来解释。如果退一步从更高的角度看一下，可以看到，即将出现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前奏，这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而是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与莱茵式资本主义的对抗。

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无情的地下战争，但又是静悄悄的、甚至是虚张声势的战争，就像不同教派在同一教会中的战争。这是来自同一体系、具有两种模式的兄弟阋墙之争，它们代表着一种自

由主义内部的资本主义的两种对立逻辑。

甚至我们将看到，这可能是关于在企业中的地位、市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国际经济中的合法秩序等问题上两种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体系之间的斗争。

自从意识形态终结以来，人们常常抱怨缺乏争论。我们不会感到失望了。

第一章 美国回来了

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光芒四射。在白宫的网球场上，乔治·布什绶带缠身，以至有点使人忘却了，“美国回来了”是罗纳德·里根奉行的口号和事业。

然而，里根领导的美国，昨天的美国继续在全世界各地闪闪发光。

在南半球，进攻型的里根式资本主义对于陷入债台高筑和统制主义的决策人（或知识分子）仍然有吸引力。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从巴西利亚到拉格斯，里根的思想越来越成为成功、活力和繁荣的象征。

而在共产主义世界，1989~1990年的大崩溃仿佛通过全民投票——有点神秘地——把罗纳德·里根（还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举捧上了台。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的一些新党——民主论坛或民主联盟——发誓只要纯洁而又强硬模式的市场经济。在波兰，从革坦斯克到克拉克维都建立了“自由俱乐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波兰大胆地——而且不无成效地——推行了“巴尔切洛维奇计划”（以年轻的经济和财政部长的姓氏命名的计划），公开承认是仿效里根模式。更无需列举斯坦尼斯拉夫·图明斯基在1990年11月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取得的惊人记录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洪尼”也不否认：就向我那样去发财吧！对里根主义在民众中取得的这种滑稽的胜利不必大惊小怪。在东欧，大家都坚信，共产主义代表了绝对的邪恶和失败，以致不惜相信资本主义越纯洁、越强硬，资本主义

就越接近绝对的善。英国最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之一蒂莫西·高尔顿·阿斯 (Timothy Garton Ash) 曾为《纽约图书评论》追踪观察“1989年的革命”，他在1990年底发表的一本书^①中指出：“似乎可以说，自由市场是中欧的最后一个乌托邦。”

乌托邦，奇迹……，显然，每天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徘徊的五六百名莫斯科人幻想的正是这个“奇迹”，他们要排3个小时的队，才能进入1990年开张的莫斯科人戏称为“新清真教堂”的麦当劳餐厅。在北京也是如此，在北京，里根的大名已经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受到虔诚地尊敬。

但是，不要嘲笑这种“异国情调的天真”。在我们这里、在西欧，同样是这个思潮——里根思潮——依然占统治地位，尽管它在大西洋彼岸已是明日黄花了。减少管制、减少国家干预、减轻税收负担、鼓吹为利润而利润、“挑战”，等等，还是十分流行的口头禅。至于“时代旋律”，说它过分“自由”已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从1986~1988年，右翼的表现有时比里根还里根主义。然而，左翼也是如此。人们真是在《共同施政纲领》的灰烬中再次发现了利润的美德和企业家的功劳。

是里根，加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2国的欧洲占了上风。当然，撒切尔夫人主要是由于反对欧洲建设才在她自己的党内被打倒了。尽管雅克·德洛尔和欧洲议会也做了不少努力，其实，“1992年的未来大市场”主要是受了她的思想启发，即通过政治和社会减肥，使贸易增肥。一言以蔽之，只要市场就够了。一个超级市场，这就是一切，或差不多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用了这么一点政治权力就实现了如此规模的商品整合。在这一点上，连美国都自叹弗如。

推而广之，而且更为阴险的是，里根式美国的“价值观”

^① 《熔炉》，加里玛出版社，1990。

(真的也罢，假的也罢) 似乎在旧大陆牢牢站稳了脚根。不知不觉，欧洲人把这种价值观囫圇吞枣地接受了。似乎由——有限地——改头换面的自由主义取代了昔日的欧洲悲观主义。对带引号的“社会”赢家的歌功颂德，对社会的被排斥者视而不见，对提高生产力盲目乐观，对竞争推崇倍至，这就是 1991 年的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白宫的老牛仔和“星球大战”战略的胜利。

然而，这主要是一种悖论的胜利。因为，过去，西欧过分地高估了苏联的经济实力，今天同样又认错了美国，一个很难克服在军事实力背后隐藏的经济和社会弱点的美国。昔日，克里姆林宫上空曾笼罩着浓厚的神秘色彩，苏联用枯燥的说教、大言不惭的假话和虚假的统计把自己包了起来；现在，这种悖论再也不能用这些情况来原谅自己了。美国本身是头号民主国家——透明度最大的国家，是在闪光灯照射下进行辩论的。只是，聚光灯太刺眼了……

美国的“垃圾股”

为了使这个如此刺目的《美国之光》——往往是错误地——继续照耀整个世界，难道需要让这个美国特有的垃圾股也闪闪发光吗？从外部观看，80 年代初期里根主义诞生时确实光彩夺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要揭密，最好是了解一下里根主义是从那里来的。

“美国回来了！”1980 年，未来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想用这个大吹大擂的口号唤醒美国人的热情，祛除越南病并重新唤起关于拓荒者的神话，一个对世界头号强国的真正唤起，因为它已经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受到侮辱——特别是霍梅尼的伊朗和人质事件——并且自以为受到苏联军事霸权的威胁和（已经！）被西

欧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新竞争搞得支离破碎了。我们回顾一下吧。

“不可一世的”美国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呢？由于对自己产生某些怀疑和失望，集体意识走了弯路，美国怎么就最终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思想强硬简单、来自西部的墨守成规的、而且意识形态古板的家伙呢？为什么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保守主义革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它）一下子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涤荡了一个如此现代的社会呢？几年以前，美国不是还是一个能够接受麦戈文政府中极端改革派和加利福尼亚州“新时代”实验的社会吗？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显示实力的意志和报复的意志呢？

这些问题并没有过时。如果要了解美国的现状，甚至必须赶快回答这些问题。这也是乔治·布什的问题，是以荣誉为名而债台高筑的问题……然而，要了解美国资本主义，还需要从长期的角度来观察往往被忽略了更深刻的演变。实际上，某些基本事实既是美国强大，也是它虚弱的根源。

屈辱过多，且信心不足

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正好同美国意识极度混乱交织在一起，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屈辱过多，而信心不足。

说到屈辱，里根当选前10年，美国从国际上得到的是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负面回报。仅此而已。例如，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溃败不可逆转地宣告了它的总退却。同一时期，在非洲，苏联和它的古巴盟友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几内亚一比绍和莫桑比克赢得了决定性的几分。在近东和中东，美国丢掉了它最好的盟友——波斯湾宪兵伊朗国王；它在黎巴嫩内战（1975年开始，很大程度上是由叙利亚人操纵的）中无能为力；同一年，基辛格费

了好大力气才使以色列接受撤出西奈的协议。甚至在美国的大门口，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垮台和桑地诺分子取得政权也为门罗主义理论敲了丧钟，门罗主张把拉丁美洲大陆变成美国的一个“禁猎区”，一个不可侵犯的前沿阵地。

屈辱、退却、无能为力……，在整个地球上，美国的影响到处在退却，让位给苏联的扩张主义。星条旗在南半球的道边被焚烧。一个被嘲笑、被藐视、被痛斥的美国，这就是休斯敦、斯普林霍尔或底特律的中产阶级家庭电视观众们每天看到的美国在世界的形象。屈辱、懒散，加一点无奈，无需再多，这就足够一点一点地使舆论产生对伟大、进而对实力的盲目怀旧了。即使罗德·里根和他的明确思想与约翰·韦恩的话语不曾存在，毫无疑问，也会制造出一个里根来。美国回来了！

无疑，比这种扑天盖地的屈辱更为痛苦的是，美国莫名其妙地感到严重地信心不足。在这一点上，70年代也是黑暗的年代。怀疑代替了信心，如果借用一下米歇尔·克罗吉耶的书名，就是《美国病》代替了《美国梦》。什么“病”？克罗吉耶追述到了哈佛大学时代，10年前他曾在那里教书，他在描述他的感受时这样写道：“一切都似是而非，确实是一切都改变了含义。幻想自行消失了，只留下一些话语和空洞的修辞。”^①

但这种“美国病”可不仅仅是某种模糊的民族思潮的一次起伏，它涉及到体制本身。在美国，还涉及到建立在圣经和宪法基础上的法律，体制和法律是每个美国人的真正祖国。水门事件，理查德·尼克松撒谎继而辞职严重动摇了美国人的这种信心。以致吉米·卡特的一届总统任期成了被削弱的一个执法机构，国会不许它做出有威望的选择。这是体制的危机，美国的危机……

那么，当孟德斯鸠的制衡原则彻底瓦解了行政权的时候，这

^① 米歇尔·克罗吉耶：《美国病》，法雅尔出版社，1980。

个世界的头号强国能怎样治理国家呢？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当初为了执行他的外交政策，不得不使用各种巧妙的手段来保守许多基本秘密的情节。

在这样的气候下，美国人从传统上的政治弃权主义（投票弃权率很少低于**50%**）滑向了简单而干脆的厌恶一切。**70**年代末，舆论对政治已不抱多大的希望。但，美国模模糊糊地又期待着一位救星。

不止于此，其他一些潜伏的疾病也开始侵袭美国。从对法律的崇拜转向法律拜物教就是其中之一。一种不折不扣的程序狂征服了美国人。还应该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一种新的法律模式穿越过大西洋。按照这种模式，美国建立在不断变化的诉讼法之上的法律地位一直比欧洲大陆优越。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诉讼程序狂使律师发了财，却使法治国家的司法机器变得缺乏透明度，缺乏灵感和令人恐慌。这样一来，谁都可以提供诉讼材料，办大案子的律师也可以用猎犬来抓小老鼠。有一个例子人所共知，就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单是为了一个案子，即为了起诉国家，在华盛顿租了整栋楼房来安置它的律师。

法律，这个美国立国的基石和“契约社会”的高超调节器，就这样变成了密不透风的丛林，数不胜数的联邦法规、地方法规利用诉讼程序在这里盘根错节。

然而，这时候，美国社会的另一块基石——结社运动——却被危险地削弱了，而这些数不胜数的地方组织、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道义组织等曾得到托克维尔的推崇，激活了整个市民社会。成千上万的结社往往十分精巧，也非常活跃，而且有实力，它们传播了某种建立在公共物品和公民责任之上的观念。幻想破灭的美国无力应对这种完全脱离其传统的思想——改头换面的犬儒主义。至于赫赫有名的“沉默的多数”，他们对社会网络和政治体系的这种解体也深感痛楚。由此，在一个被飞快地变化和来

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头支票”搞得晕头转向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种对回归传统价值观的普遍要求，一种对某种信念，那怕是最基本的、甚至粗糙的信念的渴望。

罗纳德·里根铿锵有力、言简意赅的讲话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期待。他善于利用有利的经济环境——官僚泛滥和联邦政府的干预主义——和一种知识界的氛围。自不待言，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扩大他的宣传——美国回来了——的效果。

美国的新挑战

1980年11月4日，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以超过吉米·卡特900万张选票的优势取得了胜利。51个州中有44个州投票支持里根。他甚至在民主党的传统领地纽约和南方工业州也占了上风。1984年他连选连任的胜利更加辉煌，因为他赢得了多出1700万张选票的优势，在49个州中获得胜利。

确实，几乎没有人预见到里根会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他代表的是共和党内保守的一翼。他的纲领渗透了立国者和拓荒者的伟大神话，他运用了导演和演员的技巧为这个纲领辩护，他的讲演也符合某些大的原则。

里根首先确定，他愿把美国重新拉到国际舞台的前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美国受到的各种屈辱和失败。美国军用直升飞机的坠毁、西贡的大撤退，或1980年4月解救德黑兰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失败后留在伊朗达巴斯沙漠中烧焦的陆战队员的尸体，没有比这些景象更可怕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在“恶的势力”面前，盟国被抛弃，屈膝投降。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它想进一步确认这一点，特别是为了应对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苏联霸权主义。不久，里根向苏联人提出了惊人的挑战：“星球大战”或称“战略防御计划”(IDS)。

“星球大战”是什么意思呢？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一次字斟句酌，但显而易见又十分坚定的电视讲话中向全美国做出了解释。他说，这是要通过建立能够阻截所有苏联导弹的空中盾牌来恰到好处地消除一场核战争的任何可能。利用经过实验的技术（电子侦察、拦截卫星）和今后将进行实验的其他技术（激光、电子火箭炮，电子集束炸弹等），战略防御计划最终将把美国国土置于防御之下。

这个后来引起了专家们没完没了的辩论的计划，实际上是个乌托邦。这个计划的某些部分需要有巨大的“技术跃进”，但它的可靠性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从财政上讲，即使对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来说，风险也是极大的。预计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500亿美元，光科研经费即占10%。这已经很可观了，而要追加的费用更是无法估计。

但“星球大战”带来的媒体效应和政治效应是无可置疑的。它的未来主义式设想，它的目标（不再有战争！）将使国际舆论充满憧憬，最垂头丧气的人也会被吸引。首先，这个盾牌的纯防御观念可以消除核战争的达摩克莱斯剑的威胁，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呢？里根幻想可以取得盾牌对双刃剑的胜利，开始进行无与伦比的游说。当双刃剑是“坏蛋”手中的武器时，“盾牌”不恰好是“正义者”的武器吗？（“沙漠盾牌”后来成为1990年8月反击萨达姆·侯赛因吞并科威特行动的第一个暗号；这个行动后来又命名为“沙漠风暴”。）尽管星球大战的反对者，特别是欧洲反对者揭露了里根“背后的野心”（通过优先保护战略基地使核力量对比有利于美国），“星球大战”的冲击力仍是很大的。它给人的信息也十分干脆而明确：美国又采取了主动，但“星球大战”涉及的仅仅是防御性武器。按照里根的游说，这是一次军事进攻，也是和平主义的进攻。需要指出，1991年1~2月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某些胜利就是使用了星球大战范围内的技

术。

至于对苏联发起的技术的和财政的巨大挑战，其效果比人们想象的更大。**80**年代末，实行了几年透明度政策以后，苏联一些领导人承认，“星球大战”在苏联制度的意识形态投诚中起了作用。在这场军备竞赛的全球扑克牌游戏中，苏联再也不能“跟进”了。而对于美国来说，星球大战包含的技术发展是有益无害的。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实际上将成为**21**世纪的主宰。

同一时期，里根政府还加紧了对美国盟友的政治支持和外交支持。在欧洲布置了针对红军**SS 20**战略导弹的潘兴式导弹；从财政上支持安哥拉、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的反共运动；到处宣示同样一个意志：击退苏联的影响，美国回来了！

除了这种重返国际舞台，美国国内显然也表现出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新的唯意志论，这是一种征服性资本主义。里根的班子赞扬企业家，揭露联邦政府的浪费，特别是联邦政府的税收政策。认为这种灾难性的税收打击了创业精神，束缚了美国的有生力量。美洲是一个充满幻想和风险的大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洛克菲勒，只要让自由竞争的神圣规则通行无阻，只要让每个人念念不忘那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和其他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看不见的手”——美国必将使每个人的发财致富为所有人服务。请您发财吧！让富人变得更富吧！让穷人去干活吧！不要等待国家的各种救助和“社会计划”，这些不过是懒汉的避风港！至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和废物们的基本需求，慈善机构会去照管他们。这不关国家的事。内涵很简单，通过也顺利。

加之，它从**70**年代的衰退所表明的前任失败中和凯恩斯说教的危机中汲取了新的力量。凯恩斯说教的危机实际上敲起了刺激需求和财政赤字理论的丧钟，尽管这一理论过去为取得“辉煌

的三十年”(1945~1975)——特别是在欧洲——做出了贡献。

1980年，埋葬了凯恩斯思想的不止是美国。

对此，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先看看里根是如何通过放弃管制和削弱国家作用来进行改革的。他只在一个领域里加强了联邦政府的实力，为它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真正优先的计划，这就是防务。在这个领域里，正如海湾战争刚刚证明的那样，取得的战绩超过了预想。

我们要强调一下长期这个观念，因为在其他领域里，里根领导的美国把这个观念忘得一干二净；而在德国和日本工业中，这个观念始终具有深刻的意义。

美国不是埋葬了凯恩斯的唯一的国家。在欧洲，通过扩大消费振兴经济的政策，即1975年雅克·希拉克和1978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实施的政策都失败了。从这些失败中得出的教训同过去根深蒂固的看法背道而驰，同所有大学讲授过的内容也大相径庭。实际上，失业与通货膨胀似乎可以并行不悖。可以预测相反趋势的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面对这种新的经济病——名称不雅、却到处占领地盘的“滞涨”——也失去了效用。

人们以为，这确实是一种经济思想遭到了淘汰性的打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刚冒出来的新思潮，这些思潮非常激进，里根主义是它们的急先锋。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衔的供应学派理论家和货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政策，它挖苦凯恩斯主义原则是小儿科。他们使用的关键词语是减轻税收、严格控制货币、放弃管制和实行私有化。在重新找回自我的美国，白手起家的人再次得势，国家丧失了自我。

具体说来，也确实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几次改革。经济重建行动 (**Economic Recovery Act**) 是这项政策的拳头。它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减少对石油、电讯、航空运输、银行业和竞争性部门的干预。实际上，吉米·卡特从1978年起已经开始减

少管制了。但今后将最严格地减少管制。第二个方面涉及到税收体系，通过了一项大规模改革计划。这项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压缩和降低税率、特别最高税率，以收入为基点简化税收。第三个方面是：通过严厉控制货币总量来抑制通货膨胀。由吉米·卡特任命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保罗·沃尔科（**Paul Volcker**）在这场改革中很卖力气。立竿见影的效果是，货币升值了，带薪休假结束了。后来，利率确实达到了惊人的水平，1980~1981年甚至超过了29%。一下子，美元一再彪升，1985年初达到一美元比10法国法郎。里根的顾问们终于使人相信美元坚挺了，因为美国经济是强的。

里根政府为了支持经济重建行动（**ERA**），毫不留情地削减社会经费支出，大量增加军事预算。这种选择并非无可争议，但确实一清二楚和相互协调。减少社会转移，这表明他们对个人创新和市场规律恢复了信心。增加军事预算，这使美国和里根政府的战略家们增强了实现其雄心的手段。

这是休克政策，也是政治休克：如果借用一下盖伊·索罗门的一本书名，可以说《保守主义革命》^①正在启动。这场革命，即使没有征服世界，至少也吸引了世界。

美国呀，美国

美国回来了！几乎到处都是这样。头几个月，对好莱坞的牛仔入主白宫持怀疑态度的人开始变谨慎了，随后又产生了好奇心，最后是赞叹不已。甚至那些昨天还持嘲笑态度的某些欧洲知识分子们也是如此。的确，新总统的实力部分地来源于他的非常职业化的天才。有了这种天才，他就可以利用新闻媒体的巨大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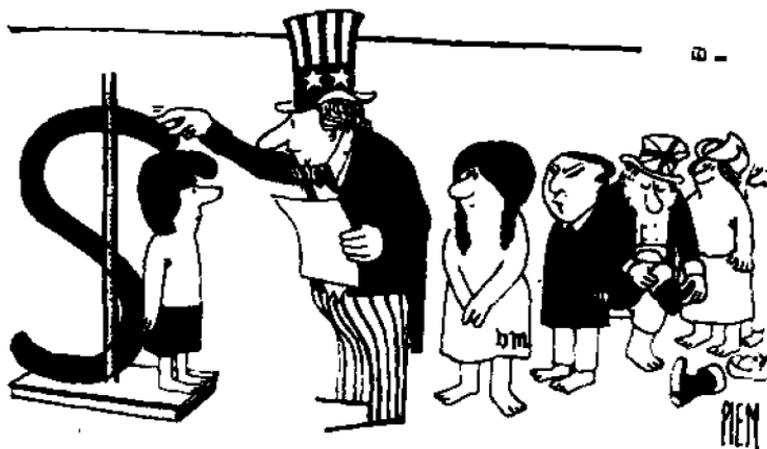
^① 盖伊·索罗门：《保守主义革命》，法雅尔出版社，1983。

击力来传播信息。罗纳德·里根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公关关系专家的帮助，收到了可能令许多国家元首羡慕不已的赠款。他仔细掂量后果，细心维持他的不知疲倦的“老板”形象和他钟爱农场、钟爱妻子和钟爱美国西部的形象，他占据了新闻媒体，但从不给人留下——像卡特那样——为钻研文件而精疲力尽的印象。这是一个悠哉悠哉的总统……，也是一个勇敢的总统。1981年3月30日他成为暗杀目标时，不是还一边开玩笑一边马上起身离开了吗？他不是满不在乎地接受了一次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手术吗？人们随即称之为“伟大的交际家”，不久，美国便可以一帆风顺地推销他的形象了。

而且，罗纳德·里根也是一个凭直觉干事的天才，有本事在80年代的自由派浪潮上做冲浪运动。他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所作为中渔利。他的纲领风靡一时，他了解这一点，也善于利用这一点。如果需要，他可以当魔术师。因为他善于掩饰弱点和阴影，手段比任何人都高。例如，就说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赤字吧，赤字亏空一年比一年深，直至成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渊。再如，对南半球亲美运动的支持，后来受到持对立态度的国会的限制。

这无所谓！尽管存在这些弱点，罗纳德·里根鼓动起来的新美国的影响很快达到了顶峰。新美国甚至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救世主罗马，它的光芒又可以普照全球了。里根的自由主义说教余音缭绕。欧洲人是好学生，首先迈步紧跟，第三世界国家也随后跟上。更有甚者，国际重建与开发银行（BIRD）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还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求助于市场、竞争和私人企业。像欧洲一样，第三世界国家也全力实行私有化。而他们的货币政策更是直接来自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的政策：依靠紧缩政策摘除通货膨胀这个肿瘤，它蚕食遗产，侵蚀收入和扩大了不平等。

总而言之，里根的美国在80年代中期像它的国旗上的群星



资料来源：《现代价值》，第43页，1990年12月3日。

一样，再次闪闪发光。它又得到了尊敬（或惧怕），被人效仿，受到羡慕，终于成了领导者。

美国实力的基础

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某些人的头脑里开始出现了怀疑。这种惹人注目的复兴真有根基吗？抑或仅仅是靠了里根令人目眩的天才？到处张扬的这些成就是靠了里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哲学美德？还是主要由于美国享有某些即使不是特权也是得天独厚的王牌呢？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已经回答了问题。因为，吸引了全球许多决策者的里根式的“复兴”，并不是一个真正像联邦德国、日本、韩国引以为荣的那种值得效仿的经济奇迹。美国的玩意儿有点华而不实，因为它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美国人拥有无以伦比的财富，即经济的、金融的和技术的遗产，他们可以享用。我们来历数一下里根入主白宫可以得

到的。

首先，美国自战争结束以来积累的资本储备是无与伦比的。在边界以内，美国拥有广阔的、往往是十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飞机场、高速公路、大学、工厂、不动产遗产，等等。在国外，美国的跨国公司握有巨额股份，由于往往只按交割费用计算而不计当前的增值，这些股份被大大低估了。例如，1980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额累计已达2150亿美元，1987年增至3090亿美元。^① 这些遗产，这些资本积储，不仅为美国提供了物质收入，而且使美国比别国大大超前了一大步：1988年，美国公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总量是日本直接海外投资的3倍。

其次，美国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的能源储藏量特别是天然气和煤炭的储藏量非常丰富。除了几种战略矿物资源外，它拥有各种金属资源。还有美国的人口，从数量上讲占世界第四，但在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也构成世界上的巨大财富。一言蔽之，美国坐在一座金山上。不能不承认，美国的处境比日本舒适多了，例如，日本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能源，由于人口老化，在其狭窄的国土上，劳动力越来越缺乏。

再次，美国在技术资源方面也拥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最优秀的工程师和最杰出的大学生，无论里根是否在台上，都纷纷来美国工作。他们带来了大家一致公认的最宝贵的著名资本：灰色资源。有一点就足以证明这种比较优势：诺贝尔奖金经常授给美国科学家。“流脑”（brain drain）每年为美国提供了知识食粮。因为美国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保障：收入多少不是看资历，而是靠业绩。人们往往低估了它的意义：众所周知，著名的爱国者导弹里安装了一些日本的零件，但是，

^① 保罗·蒙特雷：《美国与我们》，杜诺出版社，1989。

索尼公司没有摩托罗拉的配件，就不能生产摄像机，却不被人当成一回事。

还有，货币优势显示出它的决定性作用。自1945年（布林顿森林协议）以来，美元确实成了国际交换的参照货币，也成了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储备的主要货币。由于美元有这种极其特殊的地位，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来付款，偿还贷款，为本国开支提供经费。而事实上的特权比大家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努埃尔（John Nueller）做了直截了当的解释。^①

请你不妨马上设想一下，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接受你用你自己的支票来支付。不仅如此，既然使用你们的支票的用户已经遍布全世界，他们没有把支票存入储蓄所，而是当做现金来支付自己的费用，那么，这将对你们的财政本身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如果大家都接受你们的支票，你们就没有必要使用银行发行的钞票了，有一本支票就够了。第二个后果是，你查看你的账单时会惊奇地发现，余款会高于你本人支出的余额。为什么？理由前面已经讲过了，即你开出的支票从来没有被兑换，而是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不停地流通。实践的结果是，这将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消费或投资。用你的支票当钱花的人越多，你能够支配的附加资源也就越多……

根据这个思路，努埃尔认为，美国可以支配的资源，比美国纳税人缴纳的税赋和美国客户及外国客户认购的美国债券加在一起，大约多出**5000**亿美元，这差不多等于**31**年来美国向第三世界提供的公共援助总额了（美国的公共援助每年约**160**亿美元）。

^① 参见《世界报》1990年7月10日。

这种货币特权本身就有巨大意义。它带来的财政特权——本身也很重要——又可以使其特权翻一番。因此，据估计，每天在美国金融网络中流动的资金总量约为**12000**亿美元。这比法国的年国内总产值还多。可见，美国是依靠金钱——包括它自己的钱和别国的钱——进行统治的。美元既是这种实力的象征，也是其手段。

至于文化霸权，它在美国历史上的每次兴衰中都无所不在。而且，这种霸权还在不断强化。如果说，全球的美化依靠其自身运动的惯性，正在克服但并未能削弱各种批评和地区反抗，但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进程。对于世界上几十亿人来说，进入现代化就等于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这种文化霸权至少要依赖三个因素，即语言、大学和媒体。

从语言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英语几乎成了世界通行的世界语。旅游者诚然要使用英语，但科学家和商人更要应用英语。世界上的任何商品的需求都没有像英语这么大，这是美国的语言，帝国的语言……对魁北克人来说，还有更不能容忍的，那就是新移民无论来自拉丁美洲还是来自亚洲，他们都只愿意学英语，不愿学其他任何语言。更准确地说，在商业和技术方面，不仅把英语当做通用语言，而且借用了美国大学中传授的英语观念。目前正在向全球散布的的确是一整套价值观、习俗和思维定式。

传播文化霸权的第二个工具无疑是最有力的，这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普遍性影响有关。盛名卓著的美国高等学府（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美国商业学校、伯克利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确实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分子。国际精英们从这些学校中感受到它们的教学质量和学术繁荣。这不仅满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而且产生了长期的辉煌成效。美国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传播它的价值观、它的文化和方法，从斯坦福大

学或伯克利大学毕业的外国留学生，回国以后自然会变成为其宣传者。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新领导人都是由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影响开始对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墨西哥和智利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至于年轻的欧洲管理人员，他们都梦想靠一纸神奇的“硕士文凭”敲开著名公司的大门。美国几乎垄断了经济学教育。由于这种垄断，以至国际经济文化几乎除了美国就不知其他。因此，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乎不为世界上的经济负责人，特别是广大公众所知晓。

毫无疑问，从全球来讲，这种文化优势比人们想象的更有效，也更有用。它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同19世纪英国的矿产资源相比美的优势。

最后，作为文化霸权的补充工具，新闻媒体代表了最光彩、最出名，从而也最受指摘的美国化的运载工具。在此，我们不想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不只是法国如此，所有受到“美国次文化”威胁的“民族文化”的捍卫者都不断发起这种辩论。我们仅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美国电视或电影直截了当地把它的产业和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有时）是因为它最好，（经常）是因为它最坏。但总而言之，是为了让美国赢得最大的利润。

在这个领域，美国靠职业化和批量生产占领了几乎所有市场。加强文化产业方面的市场规则，特别是电视频道的私有化，自然是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拿手好戏”。在不少国家中，私有的多媒体通讯集团确实比过去的国家垄断集团更关心短期效益的需要。美国的系列节目与本国产品相比，播放时间相同，价格却低七或八倍，前景自然美妙。更不用说本国电视台自己生产的——不是收购的——几十套数不胜数的娱乐、运动、电视游戏和竞赛节目了，它们的构思也是直接来自新美国模式。

美国回来了！

然而，美国是否真的动身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这种疑问说明，为什么对里根主义还存在许多悖论和错误的解释——或幻想。不错，1980年美国确实出现了一阵相对的衰落和退步。但是，它的实力的基础，首先是美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优势，其次是历史形成的特殊地位始终存在。以至，有人仓促地把经济成就归功于里根和里根主义，而实际上这些经济成就更多地是来自美国本身的良好地位，而不是靠其领导人的高明和他们的政策正确。完全是视觉幻影！美国是靠吃老本，而且往往是寅吃卯粮，利用遗传下来的特权和已经过时的文化优势，可以毫无困难地轻轻松松地就“里根年”的转折讨论来讨论去，给人的印象却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恢复了阳刚之气。

而其他国家，看得目瞪口呆，将信将疑或赞叹不已。在它们的想象中，这可能是一个神奇的药方，只剩下点头称是的份了。是奇迹吗？“里根主义”妙不可言吗？而实际上应该问一问，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人是否从他们的遗产中得到了最好东西；他们能否继续让这种遗产开花结果。鉴于出现了衰退，近10年的实践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甚至可以认为，美国人挥霍了一部分遗产。“里根式的复兴”特别像衰落中的帝国发射出来的一些余光。来自外界的观察家对这种余光拍手叫好，但他们是被对实力的幻影和幻影中的实力所嘲弄了。

恢复荣誉以后风光了10年，许多彩灯相继在美国熄灭了。迪斯尼乐园、空间遨游、星球大战和胜利的“现金收购”(OPA)，再也不是某些人仍在幻想的人间乐园了。在电影布景和聚光灯的后面，掩盖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第二章 美国倒退了 (America backwards)^①

今日，旅游者来到一个大城市，在世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之畔，在繁华似锦的商务中心毗邻，他们感到最吃惊的是什么呢？是肮脏、锈迹斑斑、垃圾遍地、满目创痍。行人从街头走过，要从瓦楞铁的手脚手架中穿过。这里不是有什么正在施工的工程，而是防止墙上的石头坠落砸人。这是哪儿？不是在布拉格，那里的人们40年来已习惯如此。这是在纽约，是在“纽约的城市之花”！

说它衰落了，这个词恰如其分。这是指另一个美国、正在衰落的美国。从外貌上，这是给人的第一个视觉冲击。再就近观察一番，还会发现一种社会衰落。为什么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犯罪率和吸毒率名列前茅，而在预防瘟疫和参加投票率方面却名落孙山呢？

对此，应做如何理解？又如何进行解释呢？我和大家一样，急切地需要对这些令人吃惊的问题给予回答。但首先应该进行观察和比较。

美国大城市是怎样衰落的呢？两个首府几乎破产了。

1990年岁末，华盛顿为了平衡市预算亏空2亿美元，而华盛顿市的前任市长马里恩·巴里 (Marion Barry) 在当年8月份因持有毒品和使用毒品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纽约的新市长，这位

① 本章的许多数字和论述引自先贤祠—索邦大学，即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克利斯梯安·莫里松的一篇论文。

可敬的大卫·廷根斯 (David Dinkins) 为了减少市预算的巨额赤字，不得不从 1991 年夏季开始，解雇 30000 名市府雇员，其中包括 4000 名教师，占正式雇员的 10%。他一面诅咒罗马帝国的威斯帕西安皇帝的阴魂，一面关闭所有公共厕所、所有戒毒所（而纽约 700 万居民中就有 50 万吸毒者）和大多数为 80000 无家可归者建立的收留所。而取消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近 30 个公共游泳池，就更不在话下了。更不用说，尽管犯罪率不断增高，城市照明却将减少三分之一，家庭垃圾回收处理暂时停止已将近一年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城市的状况都大致如此。

还有，机场的管理也很差。布朗克斯、南达拉斯和其他地区麻风病居民区，那里的赤贫状况在法国人或德国人的记忆中似乎都不复存在了。旧金山的新游民 (homeless) 尽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由于不动产投机造成的后果，也无力支付房租……只能生活在汽车中了。像休斯顿、华盛顿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城市”已不是一个好名称，H.G. 威尔斯把城市称作“uncities”，已经被“打砸抢”和犯罪活动洗劫一空。这些骚动不安的新黑人区同 70 年代相差无几。（著名电影导演斯彼克·李宣称：“黑人支付里根年代的账单。所有民权运动都被消灭了。”）

而事实上，美国的犯罪率——特别是黑人犯罪率——的确以令人目眩的幅度增长了。纽约的谋杀案每天 5 起，还有十几个城市的谋杀案更多。在华盛顿，新市长夏龙·普拉特·狄克逊夫人上任时发现，1990 年这个城市的谋杀案为 483 起，已连续 3 年打破本市的记录。仅仅是 1989 年一年，全国记录在案的谋杀就有 21000 起，（预计 1990 年为 23000 起）。目前，有 100 万美国公民关在监狱里，有 300 多万人受到司法监管。

10 年间，美国遇到刑事案件纠葛的居民翻了一番，目前已

经超出南非最高记录的 30% (4.26% 比 3.33%)。找个什么词才能形容这种“古拉格群岛”呢？那么，美国怎么了？

另外，我们看到，即使美国的跨国公司继续在全世界投资，但 20 年来，或者自《美国的挑战》时代以来，发生的是什麼变化呀！目前，报刊上每个月都报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办公大厦（洛克菲勒中心！）、一个好莱坞的新“大腕”或一家公司被日本人收购（如 MCA 被三菱财团收购，CBS 被索尼公司收购）；但另一方面，昨天，美国航天局和由接连发射失败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的航天飞机是一种宏伟冒险事业的象征——一个自称的“新边界”。1990 年 4 月 24 日用金价发射的著名的“哈伯尔”（Hubble）航天探测器，由于制造商的疏忽，暴露出探测力不够，而且无法修复。在飞机场，飞机相撞事件、行李遗失——或被盗——事件也层出不穷。

至于里根时代一掷千金的“金童子”，这些金融界的超天才青年，身着 2000 美元一套的西服招摇过市。号称他们 3 个月就能暴富，现在都破产了，或者干脆进监狱了。每时每刻都出现破产，破产规模最大的要数几百个储备银行（如美国储备银行和美国信贷银行），它们曾给疯狂的股市带来兴旺，也造成了可能达到 5000 亿美元的无底洞，至少等于平均每个美国人 10000 法郎。这要由全体纳税人来承担。美国怎么了？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①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正像 17 世纪的哈贝斯堡帝国或 19 世纪末的大英帝国一样进入了历史性的衰退阶段。

历史性的衰退？这种预言可能言过其实了。

不管怎样，辩论开始了。政治学家小约瑟夫·S. 奈伊在《注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美国兰登书屋，1988；法国巴约特出版社，1989。

定领先——变化中的美国权力的性质》^① 对此持相反立场，他认为：

——美国是在所有领域（军事、经济、技术、自然资源……等）中拥有强大地位的唯一国家。

——他们尤其控制了空间、通讯、文化和科技术语，日本人什么时候得过诺贝尔奖？

——在西方，看到这种现象不感到疑惑吗？最有远见卓识的，有时甚至是反共分子，他们是用衰退的论点分析美国甚于分析苏联（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同胞萨特当然可能会感到生不逢地！）。

无论如何，奈伊还是从造成各种衰退的原因中找出一个共同因素，这就是政府无力控制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就是说，无法让人们来承受税收负担。既然在美国公民的思想里他们的国家继承下来的各种特权相当于一种经常性的免税，这一切也就无可非议了。

如果今后有一件事难以让美国人接受，那就是增加征税。不要忘记沃尔特·蒙戴尔的教训，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984年曾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有朝一日应该增加某些税收，结果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中竞选败北。

而对我来说，我则倾向于认为，区分一个正在进步的和正在衰退的国家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建设未来和享受现在方面的取向。通过税收、信贷和利率，我们可以衡量它们的这种取向。

是历史性衰退也罢，不是历史性衰退也罢，美国人存在某种

^① 小约瑟夫·S. 奈伊：《注定领先——变化中的美国权力的性质》，基本读物出版社，1990；或参见J-M. 西郎1991年1月发表在SEDEIS杂志上的分析。

大失所望的情绪是明摆的事。以至正如经济学家贝尔纳·加泽斯 (Bernard Cazès) 所说，对美国的衰退进行走火入魔的、禁欲主义的或安抚性报道的媒体，变成了一个“繁荣的产业”。同样，围绕世界末日预言的书籍在美国也成了畅销书。就像发生在莫斯科一样！专门研究企业破产问题的律师们，也从来没有揽过这么多的业务。时髦的新电影，如《人鬼情未了》、《和平的高度》和《十万火急》等揭示了这一切，表明了受到失去住房威胁的美国人如何胆战心惊，因为他们已不能支付住房贷款的利息。



资料来源：法国《世界报》1990年10月20日，第2页。

由于出现了“可卡可”（可卡因的一种廉价派生物），近来吸毒更加泛滥成灾，令人头昏脑涨。1988年春天进行的一次精心调查表明，在过去的30天内，大约有2300万美国人吸过毒。其中，600万人经常使用可卡因，50万人使用海洛因。在中小學生中，二分之一吸大麻，七分之一吸食可卡因。同年，据全国麻醉剂消费委员会 (NNICC) 估计，只是可卡因一项的零售额，在北美和欧洲（占很小一部分）就达到220亿美元。据位于维也纳

的联合国麻醉品国际监察组织 (OICS) 估计, 美国滥用毒品带来经济的社会损失, 每年达到 600 亿美元 (比 1984 年多 6 倍)。当然, 同一报告又认为, 美国的毒品消费将开始减少。乔治·布什总统也庆幸他采取的严厉措施有了成效。尽管如此, 这一数字仍然很高。此外, 报告指出, 去氧麻黄碱 (méthamphétamines) 的消费仍在继续增长。所有这些研究报告都证明, 美国确实存在失望情绪。

这种失望不仅触及到美国人, 他们陷于不安全、吸毒、失业、负债累累和种族仇恨等各种恐怖之中; 美国似乎也整个地从这个《美国梦》中惊醒了, 对《五月花号》的朝拜, 促使它勇往直前。而同化了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熔炉》(melting pot) 已成为遥远的回忆。90 年代的美国已经步上了所谓“新部落化”的道路。一句话, 不同的群体不仅没有同化, 反而逐步在他们的差异性、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建起了壁垒。

而且, 现在大家都以邻为壑。1960 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 看到那里的房门从不上锁, 甚至出去度假半个月也不锁门, 感到很惊讶。没有必要, 因为确实没有溜门撬锁的, 包括在城市里。而最近一次我在纽约靠近中央公园的一座楼里吃饭, 这座楼只有 75 个套房, 住户竟雇用了 20 个保安人员, 分四班倒, 每班 5 人, 昼夜巡逻。

现在, 这成了每个从大西洋彼岸旅行归来的旅游者带回来的总的印象, 既令人惊异又令人担忧。现在, 我们尝试着了解一下 10 年来的实际情况, 即在里根时代耀眼光芒的背后发生了什么。

一分为二的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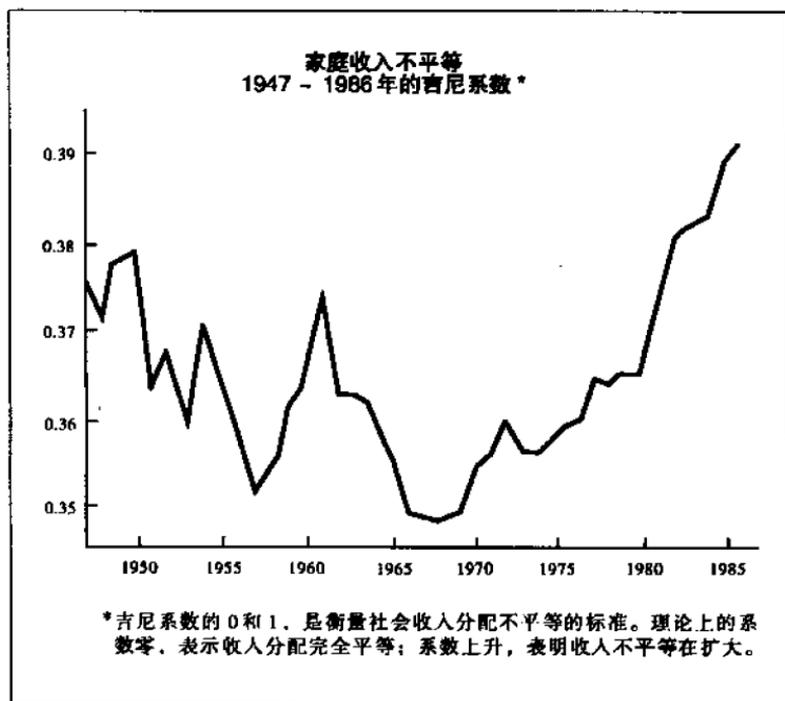
在记者、社会学家或犯罪学专家的笔下, 在这个解体的美国社会, 出现了一个新概念: 二元对立。到目前为止, 这个概念似

乎只是第三世界问题观察家的专用语，主要用来形容诸如巴西或南部非洲的某些社会。二元对立，这是指在一个注定会成为“两个发展速度”的社会里存在的分裂、实际隔离和“经济种族歧视”。在这个社会里，不同阶层的居民就像生活在相互间逐年远离的不同星球上。推行里根的极端自由化政策的后果，使这种二元对立在美普及开来。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二元对立，这是肯定的，但在名牌大学与残缺不全的教育体系之间也存在二元对立；在超现代化的医院或诊疗所与既昂贵又破旧的医疗基础设施之间存在二元对立；最后，还存在产业的二元对立，它把一般同使美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尖端产业——往往与国防预算相关——与其他许多落后的部门分割开来，形成鲜明的对照。

众所周知，里根自由主义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扩大了贫富差别。他们硬说这是为了“强筋壮骨”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这么点经济效果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更重要的是，虽然有所复苏，但同供应学派的理论家们所设想的相反，近10年来穷人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当百万富翁增加3倍的时候，穷人的数字甚至略有增长。至于400万最贫困的美国人的收入，一般估计10年来又减少了10%。如果把收入低于人均收入一半的人都看做“穷人”，那么，美国的全国人口中有17%的穷人，联邦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5%、瑞士有8%、英国有12%的穷人。某些专家不同意这种算法，认为实际上穷人占美国人口的20%，创造了工业化国家的最高记录。这些统计还不包括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移民。

另一篇更深刻的研究论文收集了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官方数字，发表于1989年。它的结论是：“在80年代美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达到如此程度，美国的250万富人在1990年的收入实际上将等于一亿底层美国人收入的总和。”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几乎到处出现了类似南半球某些共和国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

的景象就不足为奇了：在豪华别墅的旁边是矮小的贫民窟、失业者的女儿在靠近豪华商场的人行道上徘徊、无家可归者在垃圾桶和废纸堆旁的门洞里游荡。而另一边，中产阶级，这个令美国引以为荣和构成美国稳定因素的著名的中产阶级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新的社会地缘学是：在越来越富的富人的对面，是越来越穷的穷人。美国到底怎么了？

这种二元对立自然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紧张，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扩散性的“阶级斗争”，但在莫斯科，那些刚刚皈依里根自由主义的苏联青年学子们对此不屑一顾。美国的富人确实抱怨大城

市里越来越不安全，穷人增多自然会造成这种“环境恶化”。保安公司、私人侦探、贴身保镖成为为数很少的一个繁荣部门，枪支销售打破了记录，这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度日艰难而又担惊受怕的美国社会只好武装到牙齿。据纽约《时代周刊》进行的一次调查，60%的被询问者承认，她们每时每刻或经常担忧犯罪现象，很少考虑这个问题的只占26%。据同一项调查，85%的人回答说，现在的生活质量不如5年前。在纽约、新开张的一个商店是卖学生书包和儿童防弹衣的，不安全状况竟达到如此地步。必须指出，在美国城市里，青年犯罪率比孟加拉——这个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高出4倍至73倍……

表面上看，在壁垒森严的别墅中生活的“富人”很难承认他们已经不是生活在类似瑞典或瑞士那样的国家中，但越来越像生活在比其他别国更发达的第三世界中，而且变得同样不平等了。

这是一个富人很多的第三世界，在那里，社会公正的观念似乎被看作一种颠覆性的、近乎下流痞的观念，唯一可以代替的办法是利用慈善手段进行的“反贫困斗争”。在这个国家里，普及社会保障制度似乎被说成是一种对领导阶层的惩罚判决。

爱慕虚荣者的火坑

1987年美国出版了汤姆·沃尔夫 (Tom Wolfe) 的一部小说，书名叫《爱慕虚荣者的火坑》(1988年9月出了法文版)。这部小说充分反映了陷于“二元对立”的新美国如何担心害怕和听天由命。小说讲了什么？小说讲述了一部历史，所有美国人都会告诉你，这段历史完全“贴近”80年代的事实。汤姆·沃尔夫可以说是美国新新闻的发明家。他的小说带有新闻报道的味道。一位年轻的金融家到肯尼迪机场接他的情人玛利亚，她要回纽约。天黑了，汽车在一条岔口上并错了线。由于车辆尾随得太紧，他无

穷人在上面
正在变嘛！



在达拉斯, 只有穷人才在
街上走富人在地下。

富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地下购
物商店网, 与办公楼和停
车场相连。

富人在下面

法变线，只好在他那辆价值 48000 美元的奔驰牌汽车正在飞快地行进中把车拐向布隆克斯方向。他迷了路，只好开车转圈，直到看见一个通向高速公路入口的斜坡。他有点犹疑，因为方向不对。玛利亚对他说，没关系，“至少这是文明社会吧！”但在斜坡上有一堆轮胎，他不得不停车。他下车清除轮胎，这时两个黑人青年向他走来。迈克考尔吓坏了，向第一个人扔过去一个轮胎，这个人又回敬给他，他跳进汽车，汽车里的玛利亚吓得浑身颤抖，汽车飞快启动。为躲避陷阱，汽车在轮胎与垃圾桶之间做之字形，突然听到后保险杠响了一声，第二个黑人已不见踪影，他们上了高速公路。

当迈克考尔觉得玛利亚已经镇静下来时，对她谈到刚才的响声，并建议报告警察。他们回到了经常会面的一套住房，他再次提起刚才发生的事。他说，我们可能把那个家伙撞伤了，应该报告。但玛利亚怒不可遏：“我来告诉你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是从南卡罗来纳州来的，我来用英语同你讲。有两个黑人想在丛林里把我们杀掉，我们逃出了丛林，我们还能呼吸，这就是一切。”迈克考尔生性懦弱，他想向他的妻子掩盖这两者的联系，放弃了向警察报告。他孤注一掷了。他是无辜的，但他是富人，又是白人，他得抵偿反对本阶层人士的各种深仇大恨。

实际情况是，这个黑人青年被奔驰车撞倒了，他名叫亨利·龙波，一年后死去，从未恢复知觉。警察很快找到了这辆车的车主。玛利亚撒了谎，拒绝承认她开了快车，另一个黑人做假证，给迈克考尔栽脏。于是迈克考尔成了一场无情争斗的关键，3 个人都想搞垮他：一个是布隆克斯地区的黑人牧师，另一个是本地区的共和国检察官，还有一位是英国记者。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有理由希望判决这个富有的白人有罪。例如，那位记者把它看做一次掘金的买卖：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大王杀害了一个黑人青年，而且逃逸了。整部小说的背景，讲的就是闻所未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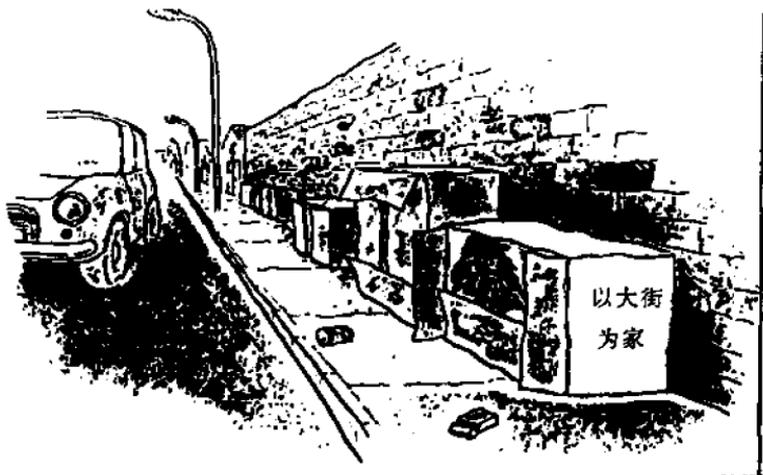
的对立，对立的一方是奢侈和权力，另一方是布隆克斯地区的肮脏贫困和一贫如洗。迈克考尔毕业于耶鲁大学，年薪几万美元，拥有价值 300 万美元的住房。每天早晨，他离开住宅时，在绿荫华盖的大门下，可以眺望到由公园大道沿街居民出资养护的一片金黄色郁金香园地。他上班的那幢 50 层玻璃大厦也同样豪华。似乎所有的金童子，都把自己看做是宇宙的主宰。而另一边是，布隆克斯地区有成千上万的黑人青年吸毒、赌博，蜷缩在高楼大厦的楼道中，在那里什么都干得出，吸毒、卖淫、暴力……在这里，搬家的时候必须把邻居要偷掉的一部分家具计算在内。但是，被迈克考尔的奔驰车碾碎的青年亨利·龙波属于例外。他是一个用功的学生，18 岁的时候就能熟练地阅读了，要考进纽约市立中学足够了。公园大道与布隆克斯地区之间的对比十分悬殊，就像索沃托与约翰内斯堡带游泳池的花园洋房一样。只有布隆克斯地区的教师、警察和法官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法官也不敢离开法庭 200 米以上，他们靠微不足道的薪金艰难地维持生计。

迈克考尔被报纸和政治抓住，成为象征和替罪羊，富有的和有魅力的迈克考尔陷入风险，正如美国许多爱慕虚荣的人已经沉沦一样。

当然，美国的不平等并非自昨日开始，布隆克斯地区的贫困早在里根之前就已存在。但这种贫富之间可怕的二元对立在 80 年代进一步加剧了，似乎已彻底改变了性质。克里文·菲利普在他最后一本题为《富人与穷人的政治》的畅销书中指出，富人可以为所欲为地发财致富而不引起任何反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他来讲，有朝一日，民粹主义的造反将严重动摇美国不是不可想象的。1990 年 5 月 4 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一篇资料丰富的长文中也提出同样的假设。美国到底怎么了？

学校病了、医院病了、民主也病了

这种带有危险后果的二元对立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某些部门的整体特征，其中包括某些昨天还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部门。



资料来源：英国《拙笨》周刊，1990年9月7日，第23页。

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只讲两个字——或两件事实——就够了：美国的民主病。

第一件事实是：美国公民参加选举的比率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中是最低的，无论何类选举，弃权率都达到选民的三分之二，而且几乎毫无例外的是那些景况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他们被压抑、被异化，以至不懂得每次选举多少都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从规模上看，这是一个涉及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新现象，它与新美国模式的下述几个特征相关联：过去，穷则造反；现在，他们被习以为常的贫困鸦片麻醉了，无法缓解，甚至不去投票。

第二个事实是：自远古时代以来，看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是根据它能否统计本国人口（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圣经中叙述的海罗德如何统计人口），鉴于美国人口中估计有**10~15%**具有合法身份的人居然没有被统计进去，似乎可以说出现了某种文明的倒退！

在教育方面，情况也令人难以置信。诚然，如果仅看第三阶段（高等教育），美国的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每年在美国发表的科学论文占全世界发表论文的三分之一以上。从**1976~1986**年，美国的研究人员人数翻了一番。的确，实行严格遴选制的美国名牌大学仍然名副其实，它们拥有的财政手段和人文手段也令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对美国羡慕不已。

但是，与这种对家庭来说十分昂贵的高等教育并存的，还有非常落后的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制度。根据最近对**10岁、13岁和17岁**学生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的调查，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居末尾。大多数美国学生**16岁**以后就不再上任何自然科学课程了。在其他课程方面，调查结果也好不了多少。在地理课方面，**18~24岁**的美国学生在**18个国家**中倒数第一。因此，**45%**的美国成年人不能指出中美洲在地图上的位置，其中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英国、法国或日本在什么地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令人惊异的是，**40%**的美国青年——他们**18岁**进入中学——承认，他们不会正确读出课文。

文盲率最高的是哪个国家？是葡萄牙还是英国？选项答案：是英国、波兰还是美国？答案：是美国。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看起来，像雾里观花。人们接受的新观念是，市场一好百好，无需做其他解释。

对任何国家来说，教育的普遍质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话对不对呢？如果说对，为什么近几年来美国的高等教育下滑如此厉害；如果说不对，这种下滑不正是新美国经济模式的一个方面，并且构成其制度的一部分吗？况且，我们也看到，民众教

育，或更广泛地说，公共教育也开始在欧洲，特别是属于最发达国家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下滑了。更准确地说，它们不属于莱茵模式的国家，而是向新美国模式洞开了大门的国家。

专为极少数人服务的高等教育与破败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把美国和日本、德国等国彻底区分开来。在日本和德国这类国家中，大多数学生接近中等水平，实际上没有特别坏的学习成绩。在大西洋彼岸，实际上，在**3600**个中学和大学中，只有**200**所实行择优录取制。谈到“家庭”作业，在美国每天不超出一个小时，而看电视却达**3**个小时！现代社会的美国原型、好学的美国原型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而且越来越远。美国的教育制度衰落相当严重，以至**1983**年罗纳德·里根决定建立一个全国工作委员会，为他起草一项报告，题目直截了当：《一个陷入危险的民族》。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美国教育水平比**1957**年还低劣，当时苏联人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迫使美国对本国的能力提出疑问。

由艾森豪威尔创建的美国大会 (American Assembly) 于**199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集了十几名专家开会，发表了题为《全球经济——美国的作用在衰退》^①的报告。报告中的结论有**3**点值得进行比照：“美国的教育制度濒于破产”；美国的储蓄率低得惊人；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里根政府“习以为常地把外贸逆差看做实行严厉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

美国社会还像体育广告宣传的那样，好比满面红光、虎背熊腰的小伙子一样的健康社会吗？情况已今非昔比。里根主义加剧的这种二元对立目前已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制度的整体健康。当然，总体来讲，美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仍然是医疗保健开支最多的国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美国许多诊

^① 《全球经济——美国的作用在衰退》，诺尔敦出版社，1990。

疗所或医院仍属世界同行中的佼佼者。同样，在医学、药物和新治疗法的研究上美国也往往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这些单项的改进不应让人忘记，美国医疗制度的总体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在这个问题上，有几个最新的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美国的婴儿死亡率为**10%**（比日本高一倍），已名列世界第**22**位。某些少数民族的高死亡率不足以解释这种落后状况。甚至白人婴儿，实际上也同许多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在注射防疫苗上，美国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低**40%**，甚至比某些发展中国家还低。而未成年人（**15~19**岁）的怀孕率，则比日本高出**10%**。

所有这些数字都反映了在一种支离破碎和度日艰难的社会中，家庭在解体、贫困在扩大。因此，美国离婚家庭的幼儿所占比重上拔了头筹。此外，五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87**年，有**1200**万儿童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险，即比**1981**年增加了**4%**。毫无疑问，美国确实没有普遍性医疗保险制度，公共医疗支出比重（占**41%**）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低的。

里根在这方面的政策到底如何呢？它以重建家庭结构为名，疯狂地反对所有大众性的保险体制。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的一半雇员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险，而他们的平均解雇期限是……两天！

而大削大砍财政预算和社会规划，只能促使本来已经令人不敢恭维的总体形势更加恶化。目前，负债累累的美国面对的是最严重的债务，不是财政赤字，而是一种社会赤字，是一种靠任何慈善机构和个人同情心都克服不了的赤字。里根政府过于设想使赢家的美国“强筋壮骨”了，不顾一切地把“输家”的美国，或直截了当地说，把“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抛入人类历史的深渊。撇开“社会”方面不说，里根主义至少还是重建了经济吧？但可

惜啊……

工业在衰退

美国工业在衰退。只有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生产的比重例外(美国占**20%**，而日本为**5%**)，但即使这一点，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1967**年，让-雅克·塞尔万-施莱贝尔在他那本畅销书《美国的挑战》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继美国、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15**年以后，很可能不是欧洲，而是在欧洲的美国工业。”自此以后，跨越大西洋的投资改变了方向，一年比一年突出。

1990年**9月24**日，《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题目有点耸人听闻的文章：《美国造将走向消失吗？》

在“里根年代”创造的**1800**万新就业机会，大多数不在工业部门，而在第三产业，在服务业，是一些零碎工作，其中最多的往往是在餐馆、商业，特别是保安行业里……同期，工业却丧失了**200**万就业机会，贸易逆差也打破了最高记录。在许多领域里被日本人迎头赶上，甚至被他们碾碎。例如，在汽车制造业，**1990**年第三季度，像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巨头企业宣布损失**20**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取得了“**1982**年以来最坏的结果”，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得分也越来越低，**3**个月内额外损失达**21400**万美元。美国汽车制造业贸易逆差总计达**600**亿美元。诚然，人所共知，美国具有从较量中获利，从失败中崛起的超强能力。但是，期限是不能压缩的，只有向良好的方向崛起才谈的上期限问题。美国并不是这种情况。海湾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由实业界和学术界领袖组成的美国竞争委员会就得出结论，未来几年内在**94**个产业中将有**15**个是关键产业，**1995**年以前，美国的这些关键产业将退出国际舞台。在**94**个产业中，美国在其中**25**个产业

中被认为失去了竞争力。没有日本的某些零部件，大名鼎鼎的爱国者导弹就不可能完成其使命，这不是偶然的……关于未来的一个长期性要害观念也在这里。1991年美国军队在海湾战争中的壮举却依赖于60年代和70年代做出的决策。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越来越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有意思的是，甚至像卡尔·爱肯（Carl Icahn）这样的人，也皈依了这种观点。卡尔·爱肯是阻击手的急先锋，他曾购进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股份，确实也谴责了美国经济寅吃卯粮的赌徒现象。他说：“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人们不再修建，不再维护。”爱肯把美国比做一个农场，第一代种植，第二代收获，第三代碰到执法者来没收农场。美国人也开始碰到日本人来接收了。

生产的质量和技术的质量也开始相对落后了。1990年11月初，几家为丰田汽车公司提供零件的美国公司的200名管理干部聆听日本公司一位领导人训话，这位日本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冷冰冰的信息。例如，美国工厂提供的零件残品率比日本高出100倍。美国制造商将不得不与日本人或欧洲人建立联盟关系以便进口他们的技术。

这样的现象在宇航工业中也可以看到，尽管宇航工业直接或间接地从五角大楼的军事订货中得到巨额援助，美国大公司的份额还是下降了，让欧洲人的“空中客车”公司夺去了世界市场的30%。具有很高战略意义的电子业和信息业也是如此。美国人发明了晶体管和芯片，现在只占有市场的10%，而60年代末还占有60%。通用汽车公司如果要订购100个零部件，至少有80%从国外购进，因为外国零部件更便宜、更现代化和更经久耐用。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尽管美国工业出现了这样严重的衰退，里根以其超凡的天才和勇气得到国会和舆论的支持，避免了美国用保护主义来对付贸易渗透。

日本人回购美国



资料来源：《美国的卡卜》，第246页，瑟伊出版社，1990。

工业下降至少有 5 点原因。这是和同构成战后繁荣基础的 5 点优势消失了相对应的。哈佛大学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报告的起草人《美国造将走向消失吗?》的作者米盖尔·德尔杜索斯、理查德·赖斯特和罗伯特·索罗夫^① 详细列举如下：

1. 美国内部市场相对规模缩小，大西洋彼岸的工业缺乏同日本人、欧洲人争夺外国市场的能力。
2. 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已经不十分明显，技术创新往往是在国外进行的。把技术引进到生产体系中或开发新产品，日本和

^① 米盖尔·德尔杜索斯、理查德·赖斯特、罗伯特·索罗夫：《美国造将走向消失吗?》，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联合出版社，1990。

欧洲明显要比美国快（在汽车工业中是4年对7年）。

3. 美国工人的素质过去是高于竞争的对手，现在大大降低了。

4. 过去美国积累的财富如此之多，可以应付诸如登上月球等最大的挑战。今天已经不可能了。

5. 最后，受到一致公认和令人羡慕的美国管理方式已经不是——远远不是——最好的方式了。在这个方面，日本人和欧洲人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美国人有时还不得不抄袭外国的管理方法，如灵活生产、质量周期，等等。广而言之，80年代突出表现出来的股市、投机经济和暴利的诱惑力起了反对工业的作用。当然，在亿万富翁的金童子时代，在卡西欧（赌博）经济时代，刚刚进入劳动市场的美国青年学子对选择艰苦、劳累和严厉的工业生产之路毫无兴趣。资本主义的股市变形已经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当金融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时，工业自然衰退了。1991年4月，三边委员会（由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工会、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组成）在东京举行全体大会。日本人毫无顾忌地对过去做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说，十几年来，我们对英国的重新工业化做了广泛的贡献。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使美国重新工业化……

赤字的梦魇

里根认为，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既不是工业衰退，也不是社会的二元对立，而是前所未有的令人目眩的赤字。这一点，对于一个许诺要减少国家的重负，并为本国提供维持独立的手段的一位总统来说，是毫不含糊的。今天，还是那些数字搅得许多美国领导人夜不成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还记得，在60年代和70年代，即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当政时，每天早晨各个

电台的新闻都是：在越南倒下了多少小伙子。今天，在纽约第24街的灯光屏幕上不间断地闪烁着另一个数字，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数字。1990年底，债务总额已达到难以想象的31000亿美元，即相当于3年的财政收入，或35年的财政赤字总额，而年度财政赤字本身已经很大了，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至于其他数字，他们自己也在谈论，我们可以把其中最具灾难性的数字排一下队。我们仅举几个例子。例如，经常项目在70年代末还是接近支付平衡的，1987年的逆差达到18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这一逆差于1989年回落到8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但数量仍然很大。这个逆差主要来自工业，而农产品则是出超。这丝毫不能令人感到欣慰。美国成了农产品出口国，工业品进口国，它的贸易结构接近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结构了！

财政预算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罗纳德·里根的许诺不过是一种选举欺骗。实际上，怎么可能一方面增加军费开支又不相应压缩其他开支的时候，还硬要减少税收呢？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劳夫 (Lester Thurow) 提议为罗纳德·里根竖立这样一块墓碑：“这里安葬着一个用空前的速度把一个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债务国的伟人。”

近几年，联邦政府的赤字每年达15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怎样减少赤字呢？美国任何权力机构都不愿靠违背竞选诺言来解决赤字问题。总统不会接受增加税收或减少军事开支；议会不会触及社会支出。恢复收支平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然而，从理论上讲，按照一项法律规定，即格拉姆·鲁德曼·豪凌法案 (Graham Rudman Hollings) 的规定，5年内必须恢复这种平衡，如果需要，可以自动削减信贷。但总统与国会很难为执行这一法案而达成协议。1990年10月底，我们在华盛顿看到了一个令世界头号强国羞愧的景象，一个总统竟然无力实现协

议，威胁要停发联邦政府公务员的工资……

这些财政赤字自然会使政权机构陷于瘫痪，阻碍它继续执行某些生命攸关的计划，特别是教育、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更不用说，1990年夏季末，海湾危机爆发时，大家都有点惊讶，这么强大的美国为了支出军事费用竟然向其盟国伸手要钱。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感到某些人的做法幼稚可笑。令人惊异的不是美国要别国——主要是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做出贡献，而是它为什么不早点，不首先向我们西欧人提出要求，自斯大林时代以来，美国不是无偿地或近乎无偿地为我们承担了防务吗，我们显然更了解捷克人、匈牙利人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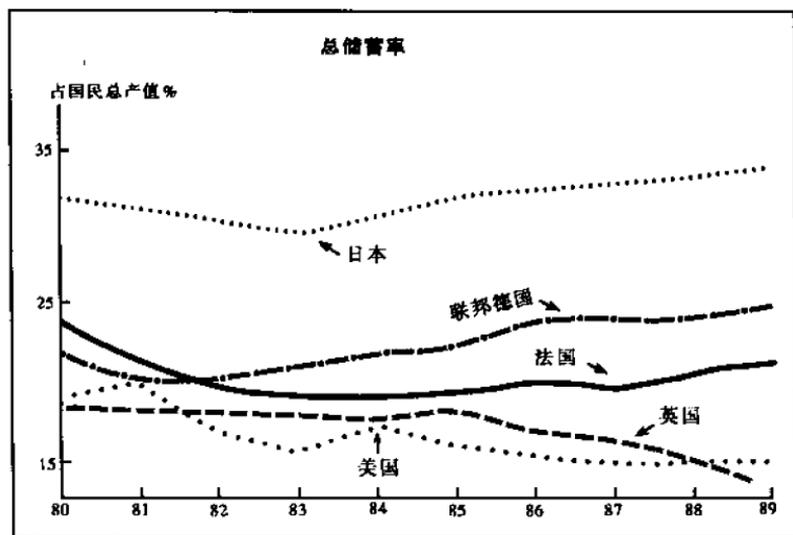
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尽管如此，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富人贷款给穷人，富国贷款给穷国还是可以加快它们的发展的。在这种互补性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自由伦理的原因。因此，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和法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贷款国，70年代以前，美国也是如此。但1980年以后，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从里根主义者大肆鼓吹的自由伦理来看，只有一个理由值得思考：美国居民几乎不再储蓄；不再为崇高的清教主义原则准备未来，而是不顾一切地为消费、为眼前的享受而借债。在美国，居民的或国家的新金融习惯既造成了部分人的贫困，也损害了所有人的未来。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

美国的净外债（即除去本国债权的外债）1989年达到6000亿美元，相当于第三世界外债总额的一半。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15年前，美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第一个后果是：美国对债务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由于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美国不得不每年借外债 1500 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3%），主要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里借钱，他们的金融盈余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债务。真是残酷的历史报应，上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勤劳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反过来救助贪图享受的美国人。屈辱的依赖性：每次新的国家招标，美国财政部都要依赖日本投标人的意愿。不仅如此，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它曾被迫维持高利率，从而影响了国内投资，阻碍了经济的复苏。



资料来源：《预测方向》，1989。

债台高筑，把美国和债权人拴在一起，也削弱了它的企业。尽管美国企业过去的金融信誉很好，因为当时借债很少，现在已经开始大规模举债。自1980年以来，美国企业的借债总额已翻了两番。在同一时期，它们的债务与自有资金的比例也翻了一

番。这是企业脆弱的明显标志。**Brookings** 研究所预计，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将有 **10%** 以上的美国大企业破产。

应该知道，美国经济和金融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弱点已经构成世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危险因素。在这一方面，互相依赖已是规律。大家还记忆犹新，**1982** 年墨西哥宣布它无力按期还债时，世界金融体系差一点爆发大危机。现在轮到美国困难重重了。确实，由于不动产市场的下滑和某些债务人，特别是那些把宝押在濒于破产的臭名昭著的“垃圾股”上的债务人接连失败，美国大银行的地位已十分虚弱。

“船大才能稳”：任何银行超过一定的规模就可能得到公共权力的支持，因为一个大银行破产了，就会很快传播到全世界，产生所谓“蝴蝶翅”效应：东京或芝加哥的蝴蝶一煽动翅膀，巴黎就会刮起龙卷风……这就是为什么，极端自由主义推行 **10** 年以后，美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完全系于联邦政府的支持之上。

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危险的尖锐嘲弄：正如保罗·蒙特雷所精彩地描述的，今天，威胁世界的是，“强者采取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

第三章 金融与荣誉

波音飞机朝肯尼迪机场缓缓降落，我的邻座对我说：“多美的国家！在这里，至少转眼间就可以发一笔大财。”

这是老生常谈了。但，不靠赌博，怎么才能很快发财呢？只有两条出路：第一个是办工业，搞发明和销售；第二个是办贸易，靠买进和售出。当然，商人从来不限于出售成品，始终包括服务，赚附加值。金融家的特长就是从成品的二次出售（金融市场中的有价证券，商品交易所中的商品）中赚取利润。要发财，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找钱来买进。

只有 3 个方法。

1. 靠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是指一个企业提供了经营费用、为股东分过股息和纳税以后所拥有的资产。对企业主来说，靠自有资金有个很大优势：靠这个方法，他心里踏实，万事不求人，他可以用自己赚的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业家热爱自己的行业，不愿陷入许多令人头疼的金融问题。但真正的金融家从来不会如此，因为这个方法赚钱不够快。对他来讲，光靠内部增长是不够的。为了尽可能快地发展自己的业务，他必须到外部去寻找资源。

从传统上讲，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曾经是自有资金率最高的国家，但现在已经被德国超过去了，德国的自有资金率达到 90% 左右。反之，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率列于最低的国家的行列（70% 左右）。其他大陆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总的来讲，介于

这两类国家之间。外来资金，主要是贷款，只是一种补充性资源，除非那些善于克服各种困难，靠“暴富”起家的国家。

2. 借 贷

利用所谓债权名义化的新技术，一个企业一般可以从银行贷款或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由于传统上银行途径是保密的，股市途径便要求企业必须在认购者当中有知名度、有信誉，这就需要刚“上市”的企业有更强的媒介介绍。

贷款有三点不便之处。首先，贷款额度一般受借款人自有资金的限制：“只借给富人。”其次，贷款费用很贵，特别是当前，因为近10年来，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打破了前两个世纪的最高记录。最后，永久性贷款是罕见的，借款人不仅要为贷款付息，原则上也要偿还本金。

这一切都有很大的束缚性，程序复杂，缺乏活力。因此，近10年来，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家们利用放弃管制，发明了一些新技术，只要用很快可以获得丰厚利润来说服债权人，就可以保障债务人能够取得巨额款项。这样，债务人就可以购进多一些，卖得好一些。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到市场上发行“垃圾股”和在“杠杆性”信贷银行(LBO)里开户。

这些新方法对于地处黄金地段的大银行只是小菜一碟。但，如果你不过是个聪明透顶又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怎么办呢？你个人很快地发了财，又如何为寡头经济——大企业麻木不仁造成的恶果——的民主化（这是里根派用来辩解的口头禅）做出贡献呢？1983年，天才的金融家，德累克塞尔·布尔汉姆·朗贝尔公司的总裁弗累德·约瑟夫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答案，这在经济史和金融史上是个划时代事件，答案内容大意如下：

弗累德·约瑟夫向您提出一个三时段的战略。

在第一个时段，靠您的天才发现了一个在股市挂牌不当的企

业，即股票值过分低于股东可以接受的价格。

在第二时段，银行家同你一样聪明透顶又雄心勃勃，他向你提供三重服务。开始，教你通过掌握媒介手段来了解市场运转情况。一切从这里开始，在金融体系里，金融与荣誉结成密不可分的伴侣。你的银行家为你的账户派发了这些臭名昭著的“垃圾股”——法文不恰当地译成了“发霉的债券”。这些股票的风险越大，则价格越高。为什么风险大，因为卖股人和持股人是聪明透顶而又雄心勃勃的青年，但没有多少财产，单枪匹马或差不多单干，为了发财，不得不投身高风险行动。因此，认购者，即股市，要让他付出比国际商业机械公司（IBM）的利率高得多的利率……这个阶段，要说服公众借给你正急需的现金或“信用”，显然是最难跨越的一步。于是，有活力的银行家要向你提供专门为未来富翁设计的第三项服务：直接贷款，利率同样很高，通过这项贷款，银行家向市场表明，他同你站在一起。由于杠杆效应，利用这笔贷款，尽管你自己的实力很弱，也可以购进一家企业。接着，你就可以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满足银行家的需要和你自己的需要了！

应该看看这种创新何在。首先是如何在高风险与高利率之间做出决断。传统银行在进行这种利率区分时十分谨慎，因为银行的行为是一种体制性行为，它们必须首先考虑控制它们的信贷风险，即长期风险优先于短期风险。反之，提供高利率、高风险贷款的人是个人，他优先考虑的是贷款下次到期时有多少利息入账，或如此这般，他能得到多少利润，很少考虑长期后果。未来不是他的事。他要的是立杆见影，是征服，是马上挣钱。

贯穿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资本主义的争斗之所在：这是短期与长期的斗争，眼前与未来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看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未来的“金童子”为建立自己的“战争预算”而负债累累，他的表现只

能是受淘金狂鼓舞，采取狙击行动，扑向猎物。如果他搞得好，能够以高于原来股市的价格，但又低于资产可接受的价格把股票抛售给股民，他就可以分享财富了，这本来是一个中性词语，译成法文时却用了贬义的“瓜分资产”。因为在我们这里，在欧洲，企业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刻，债务人不仅自己赚了钱，而且赚到了可以和银行家平分的短期利润。他的发迹史序幕就结束了。

我们来到好莱坞，遇到了拉萨尔兄弟银行的经理助理费利克斯·罗哈廷，他过去曾挽救了纽约市的金融，当他评论好莱坞的这类活动时，断言华尔街比好莱坞还糟糕。确实，即使不怜悯被瓜分的这些企业及其员工的命运，也应指出这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美国金融制度拖入危机。巴黎荷兰银行董事长米歇尔·弗朗索瓦-彭塞 (Michel François-Poncet) 提供了几个有关的关键数字：1987年股市暴跌之后，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决定命令本国银行采取某些谨慎措施，即著名的“库克额度” (ratio Cooke) 方案，限制银行发放贷款的总量。确实，美国银行在企业资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通称中介率) 从1970年的80%降到1990年的20%。造成的结果之一是，1970年在世界最大的25家银行中，美国有8家，而到了1990年，美国最大的花旗银行成了世界第24位的银行。然而，美国银行越限制它们的信贷，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越采取一些高赢利活动、即高风险活动。因此，到了1990年，美国银行的高风险贷款担保 (LBO) 总额达到1900亿美元，只此一项，即超过风险国家贷款担保——对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信贷 (约640亿美元) ——的3倍。

自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以来，专业报刊就不断报道令人担忧的美国金融机构破产的趋势。美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急剧下降，随后，它们不是从长期考虑而谨慎行事，而是根据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需要，追逐眼前利润，即从事风险最大的

活动。因为归根到底，都是由美国纳税人来支付的。

3. 资本的增量

还是言归正传，谈谈本书的主人公吧。他想成为金融大王，他心里非常清楚，真正的金融大王是那些靠白手起家进入大亨行列的人，他们既不想靠自己的积蓄买进，也不利用别人的积蓄来借贷，仅仅靠他们的名字，靠他们的信誉，从市场上得到资本的增量。也就是说，赚取既永恒又廉价的具有双重性的神秘资本。

与一般贷款不同，这些钱是永恒的，因为这个公司的资本是不必偿还的；与贷款不同，发达国家的贷款利率一般最低也要8~12%，而股票分红很少超过股票价值的3~4%。然而，股东的风险是无限的。那么，没有一个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的具有头等质量的企业，仅凭聪明透顶的金融家灵机一动，股票就上市了，我们把命运交给他，怎么能这样？答案还是看中了他的光辉业绩和他有“推销希望”的能力。

靠自己的储蓄买东西，是等而下之。靠借款买东西，已经强一点了。仅仅靠自己的签名就从市场捞到资金，这才是金融之神的本色。当然，还有其他金融之神，如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他们自己并不投资，也不冒风险，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让别人买、别人卖，显耀自己最充满信心和最善于做金融重组工作。他们从每笔交易中，无论是买还是卖，都要收取佣金。这也证明，为什么他们对淘金者提供一项最宝贵的服务：告诉你那里可以挖出金块。

简而言之，这就是“金融泡沫”、“金融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的来源。这是股市为佼佼者的光辉业绩附加上的心理价值，很有必要，这是为资本主义充氧，是赢家的希望。没有这种希望，就没有企业，甚至在股市上也是如此，应该懂得维护它。

“类似一种妄想症”

80年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经济的最大特点是股票市场占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与阿尔卑斯山国家不同，后者的银行在向企业提供资金方面起着主要作用。

金融市场的这种传统地位，借助80年代特别有利的金融景气，在大西洋彼岸得到相应的加强。在1980~1989年间，道琼—斯指数翻了3番。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也得到大大的发展。目前，芝加哥的交易额比纽约高2倍或3倍。股市飞上天了！金融爆炸了，包括金融惯例、金融气派、金融魔术……金融媒体也以同样速度扩展、充实。昨日公众还一无所知的新金融公司，很快就列入新闻明星的行列，成了众多报道的目标。它们一石双鸟，淘汰了像国际商业机械公司（IBM）、苹果公司或高露洁公司这样大名鼎鼎的公司。这些公司以本人的名字命名，如德来斯勒·伯恩海姆·朗贝尔（Drexel Burnham Lambert）、舍尔森·雷曼·赫通（Shearson Lehman Hutton）或威瑟斯太恩·派勒拉（Wasserstein Parella）等。这些公司编织了一个神话，用广告公司的假宝石和闪光片，把已经“揭密”的戏法和股市投机结合在一起。在美国一向如此，个人的迅速成功标志着、烘托着金融业对工业的胜利。

一些无名小足突然名噪一时，就像是好莱坞冒出来的，对他们瞬间得到的巨额财富，报刊拼命炒作。像迈克尔·米肯（Michael Milken），这个“垃圾股”（众所周知，这些高收益的“烂债券”是用来进行高风险投资的）之王，被判监禁10年。伊万·伯西奇（Ivan Boesky），这个“滚石乐”的天才套汇家，被判了3年监禁和一亿美元的罚款。唐纳德·杜鲁埔（Donald Trump），这个泰·马哈尔地区最狂妄的地产商，完全是靠“垃圾

股”来投资的。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们都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英雄。可这是什么资本主义呀？从这里怎么能不让人看到美国经济的不良预兆呢？

198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莫里斯·阿莱 (Maurice Allais) 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经济“似乎沦为一种投机性金融妄想症，出现了没有实际基础的巨额收入，其令人沮丧的后果确实被人低估了”。

令人沮丧的后果包括：在善恶不分的美国，金融界的“坏家伙”散布和多少曲解了这个新丛林“法则”。这主要是指那些“狙击者”——敌意“现金收购”(OPA)的大投机家——和通过倒卖企业大发横财造成企业的瓦解或分割。有各种各样的“坏家伙”，有些人步卡尔·爱肯的后尘，把现场震荡一番之后，收购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股份，同时使自己声誉大振，摇身一变成了关怀社会利益的模范企业家。另一些人，如欧文·雅克布 (Irwin Jacobs)，他们只遵循纯而又纯的金融逻辑，即收益最大和来钱最快的逻辑。还有些人如吉米·固特史密斯 (Jimmy Goldsmith)，他们的行为介乎经济自由主义与坚持不懈地维护爬行主义的国家干预之间。为了维护这种思想，固特史密斯曾试图收购轮胎大王固特异轮带橡胶公司 (Goodyear)，在“现金收购”之后，终于夺得了皇冠·泽勒帕克集团 (Crown Zellerback)。“吉米”发誓要消除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像恶性肥胖症一样侵害了企业。他发誓要赶走那些懒惰的领导人，因为他们不考虑股东的利益，“走马观花”地过活。但他主要还是想千方百计地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增值。

诚然，“现金收购”(OPA)的做法，回购企业和企业兼并在美国不是什么新鲜事。与流行的看法相反，80年代这类活动(每年2000~3000次)的次数甚至不到1968~1972年的一半。1970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6000次)。但是，如果不考虑其次

数，而是看上述活动的资金总额，“里根年代”确实称得上是一次真正的爆炸。从1968~1972年，这类活动涉及到的资金总额为每年200亿美元，1980~1985年增至900亿美元，而1988年一年就达到2470亿美元。1983~1985年，兼并一收购活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百分比，高出1968~1972年二倍以上。^①

但是，自1982年以来，这类活动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变化，正如爱德华·J. 艾伯逊所指出的：^②

兼并与回购，当然不是新鲜事，至少30年来，美国一直用这种办法来增加它的市场份额，分解风险，改进经营，或在许多情况下，用来享受某些税收优惠。但是，直到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兼并与收购是“两相情愿地”进行的，至少得到了有关双方企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这可能是由于各州的法律不同，要监督极为困难，或这种监督对企业有潜在的危险。例如，伊利诺斯州的监督法（**Illinois Business Take Over Act**）规定，如果被兼并或收购的公司有10%的股东住在本州，行政当局就可以干预。1982年6月，最高法院取消了这些规定，同时宣布其他类似法律也无效，这就彻底改变了形势，大大有利于敌意收购的供应方。

至于常规的企业兼并与收购，尤其是提出方属于一个集团，目标是为了扩大本集团而不惜引起股值暂时下跌的话，近期采取监督措施的目标，是通过出售其不同部门，分解被兼并或收购的公司，以便迅速提升股值。

① 博杜安·普罗特、米歇尔·德罗森主编，《资本的回归》，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1990。

② 爱德中·J. 艾伯逊：《谁占有企业？——企业领导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纽约20世纪基金会出版社，1988，法文版译作《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巴黎，圣西门基金会出版社，1989。

螺旋式上升的虚张声势

金融企业像明星一样冉冉上升，对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来说，是一部发迹史：既然美国金融部门把国家的一大部分知识精英拉过去了，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对工业来说，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工业部门已经难以招聘到它所需要的工程师和财经人员，又面临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青年毕业生纷纷流向银行或证券营业所。那里可以挣非常多的钱，而且不再像在工厂那样，不会弄脏手，甚至不会弄脏鞋。

但是，不要以为这仅仅是 80 年代美国人发疯了！你只要了解一下巴黎证券营业厅中年轻的纯金融业竞技者的收入就够了。他们的收入往往比在同一金融机构、但投机性和专业性差一点的部门中工作的同学高出两倍，有时高出 3 倍。能力一样，才华一样，由于选择的风险不同，工资收入便相差 1~3 倍。这就是两种资本主义之战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美国，由于存在这种人才流动、这种耀眼的成功、如此大量的财富以及令人心颤的企业兼并活动，所有这一切，都通过一个巨大的连绵不断的新闻媒体演义出来。对新闻媒体来讲，金融确实有轰动效应，就像昔日涌向华尔街的金融一样，是个意外收获。很快，金融游戏规则就在报纸上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没有一天，各种日报——不仅是《华尔街日报》——上不提这个西部大城中最令人兴奋的一段插曲：浴血奋战的“现金收购”，赚钱惊人，灵巧的“一击”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关这些股市上新贵的热闹非凡的私生活的个人纠纷更不必提了。例如，唐纳德·杜鲁埔同他的俗不可耐的妻子如何打架斗殴、后者向他提出离婚和分割一半财产，便成了许多杂志的“头条新闻”。金融，也包括一般经济生活，都开始驶入了下坡路，有的转好，更多的

是变坏了。

这种新闻媒介化已经超越了华尔街的范围，改变了企业主和大经理们本人的条件反应。他们越来越注意到，报纸上把他们看做工业界的“大船长”，他们成了卡通画或光碟中战胜了蛟龙和股市中狡猾对手的英雄。80年代流行着一种全新的话语，值得我们仔细地推敲它们的含义。这些话语往往是战争用语，如白人骑士或黑人骑士、毒药丸、手铐或金色保护伞，把经济和金融点化为星球大战。在提高汽车制造业的生产率方面，或信息在国际市场上的机遇方面，还有更精彩的传奇小说值得一读，或传叙。

这些企业领导人成了股市中泰坦尼克号式决斗的主角，对于新闻媒介和社会舆论来说，他们也变成了超越大地约束的半个神，他们控制着亿万财富，操纵着股票和职业，跨越边界和国家，大显身手。这怎能不让其中某些人陷入自大狂呢？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体赋予他们的形象，这怎能不让他们逐步改变自己的管理方式呢？如果以为企业兼并、收购或现金收购始终遵循理性的考虑，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需要一种“高招”来满足董事长的自我需要，需要从报纸上搜集吹捧文章的大标题；或者干点别的，以免企业的领导人被本单位的人看做畏首畏尾，平庸保守。为了装点一个企业，一个好的“现金收购”并非毫无作用……

这种荣誉的螺旋式上升，这种虚张声势和金融实力的螺旋式上升，把“里根年代”的整个美国彻底拉到华尔街的屁股后面，金融业比过去更加颐指气使，一切都要为它牺牲，经济政策也要看华尔街的眼色行事。当股市指数一波动，当银行利率一浮动，美国就要随之发烧。外贸出现了一个坏数字，或失业有增加趋势，市场就会惊恐万状。股市对一个事件的反应，最终变得比事件本身更重要。而出口下降或生产停滞，这个问题本身已不是问题。人们关心的只是市场的反应。

市场的规律

在这种背景下，工业有点像个穷亲戚，像一个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外省老表，穿着逗人发笑的过时的裙子。麻省理工学院(MIT) 1990年发表的报告强调指出，工业与金融业很难成为好邻居。“现金收购”的潮流深刻地动摇了工业本身的信心。至于那些狙击手，那些整天想着眼前利润的捕食者，不可能希冀他们有什么“产业战略”。麻省理工学院曾经写道，这种金融狂“使企业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短期收益之上了”。这还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呢！

金融市场发展到了这一步，至少，对整个经济和各个企业起了一种真正的监护作用。金融市场推动企业接受某些行为和战略，而从严格的经济和产业观点来看，这些行为和战略脱离了市场所需要的理性原则。

首先，股市要求企业立即从自有资金中赚取最大的收益。企业必须满足股东们的要求，他们拿清仓做武器，胃口越来越大。于是，企业只好尽力向他们提供有“竞争力”的红利。此外，股票行情看涨，也是敌意“现金收购”(OPA)者通过这种办法吓唬想满仓的股民来逃避风险的最好手段。人们竭尽全力使短期利润最大化，以便每个季度向华尔街提出令人满意的季度报告。实际上，企业每3个月要向市场提供业绩报告，市场等待这种报告进行分析、解剖、比较，把它们当做进攻的目标。只有3个月！这就是大家说的“季度报告专制”。

任何一位管理人员都知道，要提高短期利润，最有效的办法是削减非最迫切需要的开支。包括：广告、科研、培训、长期预测，等等。然而。一般来讲，正是这些开支才能开发新产品，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人员素质，促进其产品的商品化，从而为企业

开辟前景。如果过分削减这类开支，企业一定会受到威胁。这里，金融逻辑与产业逻辑明显互相对立。

“现金收购”狂给企业带来的后果也不可小视。企业介入“现金收购”（无论是购入者，还是被收购的“目标”），为了采取行动或抵制一种行动，必然要不断借债，早晚要影响其经营成效。企业要承担——有时长期承担——大量金融费用，从而打破经营平衡。举一个例子，**RJR** 纳比斯戈国际集团 (**RJR Nabisco Inc.**) 收购 **KKR** 集团时背上了近 **220** 亿美元的债务。以致，**KKR** 集团领导人为了消化一部分沉重的债务，被迫把本集团的全部子公司出售给 **BSN** 集团。

对失败者的犒赏

压在企业身上的不只是这些金融限制。企业领导人经常面临“现金收购”的威胁或这些阻击手的威胁，迫使他们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制定反击战略，在商业或工业领域里从事完全非生产性的股市大战。试问，如果一个企业家的首要职责是没完没了地与法学家一道去制定应付敌意控制的出奇制胜的时间表、“毒药丸”或“金色保护伞”，而不是用这些时间去从事……生产和销售，又该如何呢？不知有多少时间用在了制造“金保护伞”来保护 **RJR** 纳比斯戈国际集团的前董事长和总经理免遭本集团被 **KKR** 收购带来的后果。但人们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这两位领导人分别从本企业得到 **5300** 万和 **4500** 万美元！更具体一点说，**5000** 万美元至少等于 **25000** 万法郎，即使谨慎估计利润率为 **10%**，也可保证他们的年获利达 **2500** 万法郎，比收入最高的法国总经理的工资多 **5~10** 倍。因此，说这是“对失败者的犒赏”一点也不错吧？

谈到股东们的不忠诚，由于股东追求的是前景最好、业绩最佳、收益最快，这对他们来讲是——不折不扣的——金科玉律。

按照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模式的逻辑，对一个股东来讲，不忠诚是理性的同义词，仅此而已，岂有其哉。

但，正是这种理性构成了企业的巨大障碍，使企业无法依靠稳定的资本。

借用亚历山大·德朱尼亚克和斯狄法纳·马耶的说法（参见《回归资本》，前引书），股东为王，他很少考虑企业，尽管他在这个企业投了资。他需要的是红利和增值。这种倾向——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在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中特别显著。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拥有华尔街资本的40~60%，它们与日本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也不同，这些机构不能起，或不再起一种市场“调节人”或“宪兵”的作用。美国的机构投资者追求的首先是其资本短期收益的最优化。他们唯一考虑的是按期向客户介绍他们管理的基金创造了最高的收益，因为经常要在各种投资基金之间排列名次。

为了获取短期效益——例如在“现金收购”的时候——往往激励他们走向人们通常所说的简单而纯粹的“背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管理大公司雇员的退休金。当这些大公司之一受到攻击时，他们为了实现增值，会不惜一切站在进攻者的一边。

有这样的股东和这样的战略，企业已不可能是靠一种强大的对公司的热爱，把股东、雇员和领导层团结在一起的某种利益共同体。企业不过是一个现金流动器，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不时受到难以预测的股市投机风暴的威胁。

没有业主的资本主义

对于那些往往把自己同他们的企业连接在一起，看做一个家庭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来说，面对这种逻辑，很难不感到极端痛苦。这确实涉及到一种逻辑思维问题。在美国，对于目前控制

了股票市场的新一代理性股东来说，套用凯恩斯的一句老话，企业不过是“一揽子行动”。在美国，甚至对某些日本人来说，一切都可以卖，关键是什么价格。在大西洋彼岸教书的法国哲学教授米歇尔·塞雷说得好：“在美国，金钱是目的，事情是手段。在欧洲，正相反：有了金钱，人们才能干事。”在美国，买一个企业，就像买一座不动产或一件艺术品一样，是家常便饭（并同样轻而易举）。因此，股票大王在他收购的企业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他可以把他不感兴趣的部分分割出售。他对待下属就像对待资本一样，也就是说，下属就像一种商品。

要良好地管理资本主义，是不是必须把工人当做一种商品？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好题目！是不是没有业主，资本主义的企业也能存活下去？同上个题目一样，也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好题目！用幽默的方式可以对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加以区分。最近，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就曾提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还是一种业主资本主义吗？”

“企业寻找业主”、“企业寻找稳定的股东”，如今各种报纸又可以利用这两种寻租启事来填满小型广告栏目了。实际上，正是由于新金融业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资本主义中扶摇之上才催毁了稳定股东的逻辑，造成业主的消失。

要今天的利润还是明天的利润？

现在不妨来看看另一种二律背反，它好像是历史向……卡尔·马克思丢的一个媚眼。世界各地，人们都在重新发现利润的合法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幽灵。在法国，社会党历届政府自从1982~1983年抛弃了乌托邦式的《共同施政纲领》以来，也转向了资本主义。在东方，共产主义的垮台导致全面恢复了——毫无区别地——市场的名誉。大家笼而统之地接受了这种观念，

即追逐利益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最有效的兴奋剂。利益是合法的。进一步说，只有效益、利润和边际效益才是一种有活力的经济的真正发动机。但一个出乎意料的教训来自美国，来自这个资本主义的祖国自身：利润也可以削弱企业、惩罚经济、阻碍发展。正如“税收过多就扼杀了税收”一样，我们也可以说：“今天过分为利润而干，就会损害明天的利润。”

除了某些赶上了时髦或碰上了运气的奇迹以外，产品要靠日积月累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产品取得成功要通过设计生产方法、建立销售网络，要善于说服顾客，此外，还要提供售后服务保证。微电子产品要在开发出来6~7年以后才能赢得广大公众。录像机和摄像机用了十多年才打开市场。

当然，这样坚持要付出财政代价。一个企业在捞回第一批利润之前应该承受这些损失。这不仅是要支付开发费用，为了赢得市场，往往还不得不在利润上吃点亏，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个基本战略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他们大举进攻市场，把力量集中在低档的商品上，从价格上，即从价格的边际效益上捞取巨额利润。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消灭了竞争对手，使价格稳定下来，然后再逐步提高产品的档次。回想一下15年前日本的汽车情况就够了。那时，日本的汽车很小，一点也不精致，容易坏，不讨人喜欢，但价格低廉。现在，日本汽车可以同坚实的德国车和漂亮的意大利车比试高低了。众所周知，现在日本人已经是世界头号汽车制造商。而这种成功是实行坚持不懈战略的结果，他们在启始阶段曾经付出巨大的代价。

阻碍发展的利润

与这种战略相反，美国人为了短期利润有保障，往往喜欢越来越集中发展尖端产业部门。一旦他们的优势在这些部门受

到威胁，或需要太长的时间和太大的费用，他们便迅速撤出。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制定过旨在征服或夺回整个市场的长期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例如，在医疗摄影、扫描仪和超声录像仪部门，最初，是美国公司开发出这些产品的。然后，它们就停留在已经“定位”的尖端产品上，即只供大型研究中心和最现代化的医院使用的产品。这样一来，一般档次的通用产品便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赶忙上前，首先横扫普通医院的市场，站住脚跟以后，他们再改进自己的产品。现在，他们则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直接同美国人竞争了。在电子方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战略差异，为了集中力量搞高科技军工产业，或者彻底转向赢利更多的其他行业（如汽车租赁或金融服务），美国企业放弃了大众产品。

索尼公司总裁石原信太郎在他那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这本书从来没有完整地译成法文，但许多盗版在流行），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美国老板的短视。他写道：“美国人靠兼并企业和收购企业挣钱，但不懂得怎样生产新产品。我们制定计划要考虑10年，他们感兴趣的是在10分钟内就要得到利润。按照这种速度，美国经济就变成了一种幽灵经济。”

有些美国领导人自己也多少赞同这种严厉的批评。例如，美国财政部长理查德·达尔曼（Richard Darman）便揭露了所谓“快，再快点”的主张，认为这意味着“消费者着急，生产者不着急；利己主义者着急，开拓者不着急”。凯恩斯曾经担心这种来自“金融精神”的行为有朝一日会取代“企业精神”。至少，这是同美国实业家正在争论的新的金融专制相一致的。甚至最大的公司，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把近50%的利润当做股东的红利分掉；施乐公司分红更在60%以上。反之，为日本公司提供资金的银行胃口绝对没有这么大。日本银行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属于同一集团，其中大部分银行握有企业相当一部分资本。它

们非常懂得，如果要求的利率或红利过高，就会阻碍企业的发展。总之，日本银行懂得什么叫补偿，它们可以东边损失西边补，大家各得其所。而企业也不会被过重的资本负担压垮，它们可以更好地制定和实施长期计划。

美国公司可不是这样，它们经常被钉在必须履行满足其股东和债权人的义务上，从而被绑在尽快赢利的计划上。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小组的最近一项报告（前引书《美国造……》）所指出的，美国企业家似乎越来越对工业风险持犹疑态度了，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令人惊愕，因为资本主义和企业，就其本意来讲，恰恰是风险的同义词。况且，美国的全部神话都在赞扬这种风险，并且始终把工业风险看做开拓者风险的继续。过分谨慎，追求短期利益，苟守可靠的活动，这同罗纳德里根想要重塑的具体形象大相径庭，例如，他（198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曾宣告：“我们是一个乐观的国家。同你们一样，我们继承了广袤的土地和天空，有高山、有沃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这使我们可以到处发掘可能性，给我们以希望。”

“里根主义”的副作用对80年代的残酷讽刺是：里根主义带来的金融专制似乎损害了企业竞争的精神。这真叫人恼火，也是危险的。近几年的经验表明，工业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往往来源于最大的“冒险”。从一本论述日本企业战略的书中还可以找到许多事例，这就是J. 阿贝格仑（J. Abegglen）和G. 斯太尔克（G. Stalk）所著的：《Kaisha：日本的行会》一书。^①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日本人敢于冒金融风险和工业风险的超凡能力。日本企业甚至在不知产品能否卖出时就敢于迅速投入批量生产，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而且，生产成本很快就确定下来，从而使投入市场

^① J. 阿贝格仑、G. 斯太尔克：《Kaisha：The Japanese Corporation》，基础读物出版社，纽约，1985。

的价格有竞争力。著名的便携式收录机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种“随身听”是森田公司开发出来的，一件样品还没有卖出，就投入批量生产了。

一言以蔽之，利润有点像燃料，是它让资本主义的发动机“转起来的”。但是，如果燃料太浓或定量不对，发动机也可能熄火，甚至爆炸。日本老板如森田，在批评美国同行时，就不忘强调这一点。他说，美国老板无视他们的职工；看不到生产的必要性，被华尔街牢牢绑住。在这些批评的后面，隐藏着更广泛的批评，即对美国老板设计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批评。当然，这种管理方式也受到美国本国分析家的批评。大西洋彼岸发表了不少分析文章，例如，《拉姆塞斯报告》^① 1990年度分册指出：“实际上，美国老板坚持的方向是同优秀公司的经验背道而驰的，也不符合许多大学或咨询公司关于美国一些地区社会障碍对生产力影响的分析。这些分析同多年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3M公司或赫弗莱·帕卡尔公司的分析相吻合，也就是说，持续的稳定的劳动力管理构成了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疯狂地追逐利润导致同这种明智管理方式相悖的行为。总而言之，唯利是图、恬不知耻地发财致富，对整个社会组织构成了威胁。

金钱王国的新威胁

金钱和财富始终是美国社会的基石之一，欧洲公司追求的宁愿是新生、文化和荣誉。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共和制的国家在青年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国家建立在新教文化之上，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这种文化非常适合资本主义。说美国是

^①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拉姆塞斯报告》，杜诺出版社，1990。

金钱王国和美元至上的国家不是老调重弹吗？恰恰相反，人们往往健忘了，美国的这种美元至上，这种个人竞争的残酷性，这种直截了当的物质至上，也受到某些强烈的价值观念和特殊的体制所制衡。诚然，美国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崇拜美元，但它把一只手放在圣经上，另一只手放在宪法上。美国仍然是一个深信宗教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公众精神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宪法的地位比我们更庄重。传统道德要求有一定制约，包含着某些并非表面形式的指导原则。洛克菲勒说过：“对一个富人来说，这样死是可耻的。”至于非常活跃的“结社网罗”，众所周知，它们的社会缓冲作用是很大的。总之，美国社会通过对其根本矛盾的管理来实现平衡。

但是，如今，正是这种平衡被打破了。过去，金钱是国王，但像所有王国一样，国王的权力也受到限制和制约。今天，这种权力试图侵入到所有社会活动领域。阿兰·科达教授在他那本题为《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①的一书中强调指出，新资本主义的三个特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新资本主义是一种金融性的、媒介化的和腐败的资本主义。为了追逐荣誉，从发财到腐败，只是一步之遥。但是，对于某些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腐败不过是一种通常合理的社会管理方式。但是，照这样说，什么叫小偷呢？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权力使自己腐化，或被别人收买，小偷又算什么呢？根据这种资本主义逻辑，这是大胆地拆掉了西方传统道德保留下来的所有护栏。而新的金钱的非道德化，同样使美国社会中业已十分尖锐的矛盾和不平等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例如，迪斯尼乐园的总经理米盖尔·埃斯乃尔 (Michael Eisner) 一个人挣的工资就比 4000 名维护奥兰多 (佛罗里达州) 迪斯尼世界公园的雇员们的工资总额还多 (也就是说，等于某个

^① 阿兰·科达：《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法雅尔出版社，1991。

安东尼·里布的工资的**40**倍，或某个雅克·卡尔维特的工资的**100**倍)，这怎么能证明它是合理的呢？再如，德累克塞尔·布尔汉姆·朗贝尔公司的“垃圾股”部门负责人，那位奇妙的米盖尔·米勒肯宣称，他个人**1998**年一年的收入就达**5亿5000**万美元，这又怎么解释呢？

整个美国都在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包括《商业周刊》。当一项要求限制美国总经理收入的法律草案放到议会两院的办公桌上时，这家周刊用了一个标题是《给老板的是不是太多了？》**M. 格拉夫·克雷斯泰尔 (M. Graef Crystal)** 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向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宣告，美国一家大企业老板的工资比本企业雇员的平均工资高**110**倍。这种差别在日本只有**17**倍，在德国是**23**倍。美国老板的工资比德国老板或日本老板高**5**倍或**6**倍，这有什么用呢？如果市场机制运行正常，这种差别理应反映出企业竞争力的差距。但实际上似乎恰恰相反。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市场规律，而是金钱的专制。

金钱大王可能要扫荡一切伦理道德。在华尔街，伴随着**80**年代的“疯狂年代”，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各种贪污腐败，以致道义原则在这里很难站住脚。当地银行奉为圭臬的名言——“我的诺言就是我的债券”——对于金融界的新贵已经毫无意义了。只要能多赚钱，可以不择手段。收买提供信息的人，雇用私人侦探，收集有关被收购企业领导人的情报。华尔街尽管把全世界的积蓄都要吸引过来——美国需要这些储蓄，但它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这一点正好自相矛盾。道德，至少商业道德不是为了装潢门面，也不是一种高雅文化。从技术上讲，道德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良好运转是不可或缺的。华尔街商界对此一清二楚。在欧洲，对此的反应出乎寻常地严格和严厉。特别是令人生畏的安全与贸易委员会 (**SEC**) ——相当于法国的股市交易委员会 (**COB**) ——

正在清除金融市场中的犯罪行为。法官一再出击严打，不知是为了赶时髦，为了预防，抑或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商业道德”课程突然在不少大学中得到发展，其中包括哈佛大学。“道德投资基金会”也四面开花，它们只向被认为是道德上无可指摘的企业投资。美国有40个州通过了旨在打击滥用股市交易的“现金收购”行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1990年4月甚至决定，凡是“现金收购”企业股票后又在18个月内出售其投资的利润，将被完全没收。一股反对机构投资者进行股市投机的民粹主义潮流正在全国蔓延。

广而言之，似乎有一股强大的伦理浪潮，一种十字军东征的气氛横扫了整个美国，没有点过激是不行的。不少男女政客由于被怀疑有金融贪污——或不慎行为——而毁掉了他们的前程。其中包括：1984年的总统候选人杰拉尔德·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前白宫秘书长迈克尔·迪沃（Michael Deaver）、曾被乔治·布什任命为国防国务秘书的约翰·托尔（John Tower）、众议院“发言人”吉姆·怀特（Jim Wright）等人。美国变得对“金钱问题”过分敏感了。

总之，道德再次成为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即成为一种有回报的投资。美国在什么地方感到受了威胁，便立即做出反应。但是，这种道德的回归实际上不过是刚刚开始的两极资本主义观念大战中的一段插曲。

美国的金融荣耀损害了美国经济，进而损害了美国社会。但是，美国对此进行了反击。因此，目前还不是忘记这个谚语的时刻：“永远不要在美国买空卖空。”

第四章 盎格鲁—撒克逊式保险业 对峙阿尔卑斯式保险业

我们上面看到的确实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一种新模式。近一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美国还是像 1941 年鲍曼 (Burnham) 所描述的，处于“组织者时代”^①，换言之，就是由技术官僚结构取代股东控制的时期。因此，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在《新工业国家》^②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了与此相对立的一个运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资本回归”和股东实力上升，恰恰相反，资本家在企业中的权力下降了。“实际上，权力转向我们所说的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这个要素把个人与群体以及技术创新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能力联合在一起。”

当时，这在美国似乎还是最新颖的观点，但与里根模式的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在里根模式中，金融家取代工程师、新闻媒体取代会掌握了大权。

但这种趋势不是普遍的吗？就像我在开场白中指出的那样，不是确实存在一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吗？是这样，我在本人从事的行业里，即保险业中，便遇到了这种情况。在这个行业中，掩盖在各种争论、各种冲突和各种战略背后的，是阿尔卑斯式保

① 鲍曼：《管理革命》，基督日出版公司；卡尔曼—列维出版社法文版，1967。

② 约翰·肯尼迪·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家》，霍顿·迈凡出版公司，1967；加里玛出版社法文版，1968。

保险业与盎格鲁—撒克逊式保险业两种观念之间的对抗。

保险业的两发源地：山上和海上

几年前，我参观法国保险总公司（AGF）在瑞士的一家子公司时发现了阿尔卑斯式资本主义的特征。

过去，我把瑞士看做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象征的国家，一个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象征的国家。当我请这家子公司的经理向我介绍一下它的汽车保险方面的费率政策时，得知从来没有任何汽车保险费率，也不可能有什么费率，因为在瑞士，汽车实行强制保险，汽车保险费率——必然——对任何公司都是一样的。而我，多年来在法国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的职务，曾经为各种被监管的价格自由化而斗争。我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法国是比瑞士自由得多的国家……

参观完了吃午饭，一位瑞士银行家对我说，美国各家银行从来没有能够在瑞士的私人市场中赢得一定的份额。为什么？答案是：因为美国银行有走马灯式的经常换人的怪癖。“您不妨设想一下，瑞士的储户肯把他们的钱委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吗！”

于是我发现，在瑞士，到银行存款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而且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交换。保险市场的运行，即使在费率自由浮动的领域里，主要也不是通过费率比较，更重要的是比较服务水平。在这种资本主义中，价格虽然代表了一个事物的物质方面，但人们把服务看得比价格更重要，也就是说，更看重围绕这个事物的那些主观上的、情感上的所有非物质因素。真是奇怪！

对这种二律背反，必须提出疑问，分析和认清这种现象，因为它最好地显示了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为此，应该溯本

求源，追溯到保险业的起源，特别是保险业的两个不同源头，即来自阿尔卑斯山还是来自海洋。

保险业最古老的源泉来自阿尔卑斯山谷，16世纪初，那里的村民组织了第一批互助社。各种形式的保险性和预防性社区组织都来源于这种“阿尔卑斯”传统，例如基尔特、行会、职业工会、互助运动，等等。这种“阿尔卑斯”传统是让大家分担风险：每个人都要承担一定的费用，这种费用相对地独立于本人可能遇到的风险。因此，这里边有“互助”，最终是在社区内进行“再分配性”的社会转移。这种传统在周边地区，如瑞士、德国……，以及有类似思想的国家，如日本，保留了它的特征。

保险业的另一个源泉来自海上。这是为了向威尼斯或热那亚满载货物的货船提供大额风险贷款，后来，在伦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采取的典型方式是在伦敦某某人开的酒馆里，讨论为英格兰船只运载的茶叶提供保险。这种保险业分支与“阿尔卑斯”传统是不同的，它不太考虑对风险进行经营性的和经常性的管理。这种保险谈不上再分配和互助，而是要尽可能准确地评估每个人遇到风险的可能性。

由于保险业有这两种渊源，导致今天出现了两种社会选择：在“阿尔卑斯”体系中，保险业是互助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在“海运”模式中，由于合同不可靠，特别是由于费率过于繁杂，保险业反而削弱了互助精神。一方面，保险业肯定了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它又否定了社会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保险业的两个不同渊源明显地从现代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中反映出来。一方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股东和短期利润优先之上，或更广泛地讲，是建立在个人的金融成功之上；另一个是莱茵资本主义，优先考虑长期利益和首先把企业看做一种连接资本与劳动的共同体，是它的首要目标。

由于渊源不同，目前，这两种存在深刻分歧的保险逻辑也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自欧洲共同体成立以来，特别是1985年通过了准备1993年实现欧洲单一市场的《单一文件》以后，成为围绕欧洲保险业前景进行各种争论的根由。这些争论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两种模式问题。

阿尔卑斯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汽车的民事责任保险方面存在一种强制的单一的保险费率。因为在瑞士、奥地利、德国、意大利都实行这种强制的单一的费率。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保险业主要属于一种互助范畴，团结范畴。

反之，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由于保险业来源于海运，保险业主要属于金融范畴和市场交易所的范畴。即使是汽车强制保险，费率也是完全自由的。因此，由于保险市场分散，在承担风险上也减少互助性。

保险体制上存在着两大类型，象征地表明了保险业中阿尔卑斯模式与海运模式的这种对立。

因此，再保险——这种要求最大限度安全和连续性的保险业务选择了阿尔卑斯山的两座城市慕尼黑和苏黎世作为总部所在地，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ünchener Rück**）和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旗帜高高飘扬在那里，决不是偶然的。慕尼黑也是欧洲最大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Allianz**）总部的所在地；苏黎世则是苏黎世保险公司和它的邻居温特杜尔保险公司（**Winterthur**）总部的所在地；而在阿尔卑斯山脚的的里雅斯特市，有保险总公司（**Generali**）和亚德里亚迪联合保险公司（**Riunione Adriatica Sicutita**）的总部，这些公司都是欧洲保险业界的佼佼者。慕尼黑、苏黎世和的里雅斯特是保险业的三个首府，从历史上和地理上以至文字上，也把这三个城市认定为阿尔卑斯模式的首府。但是，尽管它们的基础依然雄厚，却越来越受到支持海洋模式思潮的挑战，而后者又得到新美国思潮的支持。

伦敦的劳埃德船级协会 (Lloyd's) 是海洋式保险模式的象征，它保留着海运渊源和冒险渊源的印记，它所奉行的规则是，25000 个“名义会员”中的每个会员，都要以他的全部财产为可能遇到的风险担保。劳埃德船级协会在国际公众中享有盛誉，但陷入了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新特征的严重危机：这是金融家，即“名义会员”对认购人的信任危机，后者向他们担了保，却不知如何抵御冒巨大风险的诱惑。如此，认购人在短期内使用的是“金融与荣誉”技巧。由于得到佣金，他们曾经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市场，得到了可观的利润。但现在，长期保险到期了，劳埃德船级协会也好，美国也好，该偿费用了。

阿尔卑斯模式实力雄厚，但遭到反对

我们可以假定，一般来讲，阿尔卑斯—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基础，个别来讲，保险业的基础，就是在企业的不同成员之间，在企业与客户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企业研究院在它的一项近期研究中指出：“德国企业之所以有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存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在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围绕领导和维护业务方面的团结一致。”

时企业是好的，对客户也是好的，这就是德国保险监督局 (BAV) 的基本设定。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保险部门摆脱了竞争法的法律监督和联邦卡特尔局 (Bundeskartellamt) 的司法监督。1988 年，卡特尔局局长对此深表不满，他说：“德国保险监督局通过保障保险商能够得到清偿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它主要关心的是竭尽全力使德国保险商不亏本，也就是让他有利可图。因此，德国保险监督局不起维护当事人利益的作用。其他人也不起这种作用，只有我，卡特尔局担负这个作用，这是正常的。”

这种宣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对改变基本事实于事无补。1991年，在实现单一市场的前夕，同瑞士一样，在德国也存在一种由行政控制的保险费率，即汽车负有强制的民事责任。在瑞士，由一个包括投保人代表在内的对等委员会来决定保险费率。在德国，由每个公司来计算出费率，上报德国保险监督局审批。

保险商可得到的最高利润率为3%。顺便指出，这个利润率是可以选择的！由于可以选择，利润便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而是其经营活动的选择性辅助收入！

我们自然很清楚，这就意味着，驾驶技术好与坏，年轻或年老，男的还是女的，都无关紧要，只要是同一牌子的汽车，在任何保险公司交的保险费率都是一样的。

因此，竞争只涉及到服务质量问题（给予赔偿的速度和是否宽宏）。通过保险互助化达到完全团结互助，这就导致让好司机为赖司机付了款。1985年，德国一家大保险公司被这种现象激怒，因为它发现为外籍移民支付的事故赔偿费用大大多于对本国国民的赔款，因此它提出，保险费率对德国人应是100%，对希腊人应是125%，对土耳其人应是150%，对意大利人应是200%。这种区别对待的标准，显然是与欧共同体成员国间不得歧视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因此没有被接受。因此，阿尔卑斯国家像日本一样，保留了单一保险费率制，尽管日本通过一项法律对保险公司的数量加以限制：规定财产损害保险公司为24家，人寿保险公司为31家。开雷素法（keiretsu）即大家庭法，要求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老板与工人、客户与供应商都要互相团结，这项法律保障了日本大型保险公司的繁荣发展。

阿尔卑斯国家中的保险公司非常轻松，构成这种轻松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客户稳定。1988年以前，德国的家庭多种保险规则为期10年，欧共同体委员会迫使它改为5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合同为期1年。同样，人寿保险合同的平均年限，德国是

30年，英国则只有6年。

这种保险制度中存在一些硬性规定，自然会带来违背消费者利益的僵化风险。但不能指责这种僵化风险的载体。阿尔卑斯保险模式属于这样一种总体社会价值观念，按照这种价值观念，相互信任、稳定的严格的契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客户稳定的基础。

在这种模式中，企业优先于客户，经理优先于股东，这并不适合保险部门。经理部门是个集体，因而力量强大，而且得到领导机构的支持。监督委员会只有任命和罢免监督委员会委员的权力，负责监护股东的利益和它所代表的本企业职工的利益。“职工代表”的职责往往由加入工会的公务员承担，而他们与企业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由此形成的稳定性有助于在企业管理中特别注重长期性。

众所周知，无论是日本、瑞士，还是德国，事实上都不存在“现金收购”的现象。在德国，差不多三分之一公司的股份是记名股份，股东的地位往往规定如下：“只有得到公司的同意才能把股份转移给另一位股票持有者。”如果公司的合法代表——监督委员会拒绝这种转移，则可以自行拖延相当一段时间，令人奇怪的是，监督委员会有无需解释这种拒绝的特权。

您完全可以从股市上购进随便那家公司的股票，但是，只要这种股票转移还没有登记，您就既没有股东的投票权、也没有参与增资的权利。在瑞士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日内瓦人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握有其14%的股份，经理部拒绝了联盟保险公司的股份转移登记，它便没有任何投票权。后来，苏黎世银行象征性地购买了日内瓦人保险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可以理解，针对阿尔卑斯模式在保险业中的某些现象，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他们提出：保险商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是不是像预计的那样确定无疑呢？

单一保险费率会不会导致消除一切真正的竞争呢？这样一来，德国保险商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动力来增加管理效益和减少交易费用了，因而这种模式不是必将违背客户的利益吗？正是基于这种批判性分析，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委员会在准备所谓“第三阶段”的指令时，决定在目前受到过分保护的“阿尔卑斯”各国市场上实行名副其实的竞争。这也就意味着，要把保险公司的第二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模式推广到整个欧洲。

在阿尔卑斯模式中，保险业首先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保险业首先是一个市场，要服从普遍的竞争规则，保险公司的特殊性仅限于要执行一些谨慎的规则。

阿尔卑斯模式的特征是公司的资金实力雄厚，世界上几乎只有它们能够依靠自有资金来实施雄心勃勃的外延性增长政策。反之，海洋模式加强了它的意识形态地位，同时却从资金上削弱了保险公司的无限荣光。

在汽车民事责任保险方面尤其明显。因为这种保险在发达国家是强制性的，这些国家中大家都开汽车，这是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使人发现保险业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政治—社会要求也各不相同。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中，未来的一切政治和社会大辩论都会带有保险业词语的印记。这正是加利福尼亚州围绕 103 号提案的辩论所预示的。

英国的经验（或看不见的手的代价）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汽车保险费率是完全放开的。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国的实验。这是保险费率合理化的实验。

既然客户是上帝（股东也是如此！），代表客户利益的保险经

纪人要用最合理的方式，向他提供最好的价格：有关客户、客户的住址、客户的活动方式及其车辆的各种参数决定了他在“划分”模式，即费率分类中的地位。20家左右的保险公司提供的费率不时显现在经纪人的电脑屏幕上。这是总的价格，包括佣金在内，佣金不公开显示出来，一般也是自由定价。

阿尔卑斯模式的保险业比较稳定，靠的是有一个专门为保险公司工作的销售网络。当然，经纪人的沿海散发方式也适合海洋模式。经纪代理业不仅由于在市场中占有份额而起了主要作用，它还有顾问作用，事故管理作用，或产品设计作用。保险公司在阿尔卑斯模式中起着类似摄政王的主导作用，它的主要职责是把市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在遵守谨慎原则的前提下，货真价实，进行推销。通过经纪人销售是有多种费率的，但目前在盎格鲁—撒克逊个人风险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消费者本身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不同的销售网络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法国就是这种情况）。

实际上，当信息确实流动起来，而且产品也货真价实的时候，既然在经纪人的电脑屏幕上是按价位高低显示出来的，有创新也看不出其比较优势了。要使这个价格体系达到尽善尽美，最好是在所有产品之间都能够互相比较，即使是尖端产品也可以被另一个产品超越。也就是说，应该避免创新。实践肯定了这种理论，即在信息可以实际流通的网络中，创新将失去其比较优势。

在纯粹的和完善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经济是一个市场体系，在每个市场上交换单一的物品。除此以外，在每个市场上，由于购买和销售物品的人数很多，以至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左右商品的交易价格。而这个价格或价格机制，作为一个信号介入市场，为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提供必

要的信息。^①

阿尔卑斯国家中的个人保险原则是不同的，正如上面讲过的，它认为：“对企业是好的，对客户也是好的。”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正好相反，“客户相当成熟了，可以判断哪个是好的，也可以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一方是按照一种纯而又纯的逻辑，把保险业看做一种通过中间机构实施的某种公共服务，这些机构要服从严格的规定和进行温和的竞争；另一方是把保险业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市场，与其他市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要谨慎从事。在这个市场上，保险公司要干的只有两件事：供应比较便宜的产品和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

真是最低限度。1970年，英国一家大汽车保险公司——“质量与安全保险公司”(Equality & Security)，由于无力履行对100万客户的许诺而宣布破产。当时，对英国汽车保险公司进行监督的只有5个人。这个事件之后，英国才接受了1974年欧共体关于加强对保险业监督的指令。

如上所述，英国保险商要销售其汽车保险产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价格要比竞争对手低，而且产品要有可比性，即尽可能符合标准。在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确定的条件下，要价格便宜，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分割市场。公司的一切资源开发，就在于定价适当，并不断改善。一个保险公司提出50000种不同的费率，也不罕见。矩阵的规格多种多样，几乎不承认费率之间的细微特点。成功的保险家只有一种天赋，就是分割市场的超级能力，能够找出高增值的价位空隙和别人想也想不到的变量原始交叉点。

这种保险体系的逻辑在于，通过统计数字的精细化，用最准

^① 麦克格雷夫—希尔：《经济学百科全书》，法文版，“资本主义”条目，经济学出版社，1984。

确的价格标明每个风险的价位。其结果是，关于利益共同体和互助的观念本身，似乎已经被剁成肉酱了。按照无限分割下去的逻辑，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这就是保险行为的原始特征——保险人下赌注，投保者储蓄。投保者交纳的保险费恰好够补偿他可能遇到的风险。他不再享有互助，也不再承担更多的费用。

现在我们来看个具体例子：事故保险。在法国，两辆汽车相撞，驾车人交换看法。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故现场记录邮寄给他的保险总代理商或经纪人，由后者按照全体保险公司之间的多边补偿体系，立即付给补偿，这就是损害保险补偿制（IDA）。在英国或美国则根本没有类似的制度。在那里，投保人要向他的经纪人提出，经纪人再试着向有关保险公司索赔，而这家保险公司还要同另一位驾车人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具体协商，达成一致才行。处理结果至少是不规范的。

但，这也算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理性关系的组成部分吧。有的服务质量低劣，客户只好逃之夭夭。投保人之间的互助精神也就被市场的支离破碎摧毁了，由于投保人只同本人的风险及有关风险的规定联系在一起，也就没有必要同这个或那个保险公司保持特殊关系了。按照这种逻辑，就要当机立断，从各种各样的保险费率中挑选合适的。在大多数法国保险公司中，汽车保险客户跳槽的比例约占10~15%。在英国，这一比例为30%。在英国，参照的标准仍然是劳埃德船级协会的海运标准，当时在签定危险区域的租船协议时，往往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讨价还价。

投保人的频繁跳槽，带来保险费率变化加快。保险公司提供按周计算的优惠价，更加快了客户的转移，其结果是所有保险商都一清二楚的：这种转移的管理费用是昂贵的。对客户的赔偿费用越来越高，从而带动了保险费的平均水平上升，后者的周期变化也越来越大。承受不了这种冲击的保险公司相继破产，加速了

这种周期变化。

换个说法，就是存在一种客户不稳造成的总体代价。看不见的手在保险市场中的耗费，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加利福尼亚州的实验（两个极端在这里汇合）

加利福尼亚州是围着罗纳德·里根团团转的一个州。由于里根的放弃管制和私有化的极端自由化政策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到巨大响应，从而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正是在这个基本上属于保守派的州里，电话、电力和公共运输属于私有部门，保险业现在也被列入放弃管制的范围之内，由于强制性地放弃管制，保险业已成为近几年来市场经济衰退最明显的部门。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根据切身经验，对此深有了解。几年以前，法国保险总公司曾经在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前进有限保险公司（**Progressive Corp.**）——中参股，它专门从事被其他保险公司拒绝的驾车人的“汽车严重风险”的保险业务。众所周知，在阿尔卑斯国家，对严重风险和其他风险一样对待，基本费用一致。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则相反，严重风险可以自由定价。因此，在前进有限保险公司里，这种类型风险的年平均保险费同被保险汽车的价格差不多！为了具体说明其含义，我们首先要指出，法国的年平均保险费为**2000** 法郎，汽车的平均价格为**50000** 法郎。如果前进有限保险公司在法国运营，那么，它的年平均保险费就将达到**50000** 法郎，相当于一个挣“可增长最低工资”（**SMIC**）工人的全年工资收入！这个公司只是消费者再也不能承受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加利福尼亚和美国的许多州，重新燃起了反对保险费用水平过高的运动。如果一个黑人青年出了两次事故，而他的工资相当于“可增长最低工资”，他怎么可能

把全部工资收入拿来付汽车保险费呢？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人们理解为什么在民众中出现了不满运动。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无力交纳按不同标准制定的保险费用，越来越多的驾车人无保开车（在美国一些地区达到**15%**），有可能使事故的受害人无法得到任何救助。

为此，**1983**年以来，一个广泛的民众运动在加利福尼亚州蓬勃发展起来。由于这个运动，最终导致对著名的“**103**提案”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表决。执行这项条款以后，加利福尼亚州成了向保险业最荒谬的统制主义倒退的前卫地区：所有保险公司都被迫降低其保险费用的**20%**……除非那些虚弱得无法承受这次冲击的保险公司！现在，保险公司的最大赢利率被固定下来了。被律师们攻击得喘不过气来的法庭，只好把一句老谚语“过分的公正，就是过分的¹不公正”（*summum jus, summa injuria*）作为他们的座右铭，并且得出结论，在贫困的受害人和富有的保险公司双方之间，公正应该压倒法律。法官的使命是，不管谁应分担多大责任，都要掏保险商的深钱包（*deep pocket*）。民众不满运动对阿尔卑斯模式并不了解，但把它变成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匹战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采纳一些坏上加坏的药方。保险费率上的统制主义到处蔓延：从此以后，纽约州保险局规定，保险费变化超过**15%**要经过批准。更有甚者，有些保险公司降低保险费幅度过大还曾受到惩罚！这种向统制主义倒退的方式有点像要求增加督导员的法国公立中学，美国的保险公司现在也要求联邦政府放弃管制了。

更有趣的是，应该承认，在布鲁塞尔，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在巴黎，**1991**年流行的唯一观念还是**1980**年撒切尔模式的放弃管制。这里，在莱茵式资本主义与美国式新资本主义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具体事例，在实际中效率最差的，在精神上却取得了胜利（参见第九章）。

另一个具体事例是，某些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保险公司，特别是美国保险公司在资产管理方面采取了一些新做法。既然英国人寿保险公司平均把一半资产投入证券市场，确实应该谈谈“资产风险”了。首先是美国保险公司，它们毫不犹豫地认购垃圾股，随便就把成千上万亿美元的可疑抵押贷款出手。

在阿尔卑斯模式中，金融市场的范围有限，主要是债券市场；在保险公司的金融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安全需要和保持连续性。这种需要使它们免遭季度报告的专制统制，季度业绩报告就是公布短期结果，这些短期业绩很辉煌，有时能够抵偿更严重的风险。

法国的综合经验受到质疑

人们可以提出疑问，为什么法国的保险商既然早已认识到自己低劣的繁文缛节毛病，今天仍对法国保险业已经取得的经验视而不见呢。法国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阿尔卑斯的传统优势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灵活优势。

五六年前，在欧共体单一文件投票通过的次日，法国保险商承认他们的公司将无法应对国际竞争、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竞争。尽管法国的保险费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人寿保险除外——，今天再看一看，法国保险业不仅没有倒退，反而在各个领域中都有所发展。

在内部，尽管法国市场无论在金融领域还是商业领域，都是全面开放的，外国公司要在这里发展的试图却都失败了，甚至包括在大工业风险领域在内。今天大工业风险在市场中所占份额比10年前已经小多了。

在财产损害保险方面，基本上不是外国保险公司，而是法国

互助协会继续扩大了在市场上的份额。在人寿保险方面，新的内部竞争形式，特别是银行的竞争形式挫败了法国保险公司。但是，保险业内部的衰退却得到了外部投资的补偿，这是近几年来最令人吃惊的事。而受到本公司股东压力越来越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保险公司则日益退回到国内市场。国外保险业务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是瑞士和法国。

人们往往以为英国的汽车保险费是欧洲最便宜的，实际上同法国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差不多。鉴于法国的税率较高和法国保险业的服务质量明显较高，这就意味着，事实上英国保险公司提供的同类保险项目费用比法国保险公司提供的明显高得多。如此形成的生产体系与销售体系之间的平衡有利于各种创新。在保险费用方面，法国吸取了阿尔卑斯模式和海运模式的正面经验：汽车保险费是放开的，但对初学驾驶者和保险公司加收保险费的投保人，事故保险费率的加高限度为 **140%** 和 **25%**。在销售方面，法国保险总公司的情况是个范例：总代理商、销售网络和经纪人各占法国业务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法国保险业的主要弱点在于法国纳税人刚刚开始学会精打细算。他们立即发现，如果说法国是同类国家中社会必要提取最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企业交纳的社会负担的比例太高了。在此，应该强调指出，为了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为了减少失业和促进国家的真正团结，没有比通过资本化使退休金增值更重要的了，条件是退休基金的管理必须重视阿尔卑斯模式在创新方面的小心谨慎（机构投资者的股份具有稳定性）胜过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混乱管理（机构投资者扮演着短期投机者的角色）。

不错，阿尔卑斯式保险业由于实力不强和过于谨慎，有陷于僵化的危险；不错，盎格鲁—撒克逊式保险业陷入了恶性循环，只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也会与纯粹市场经济的

目标背道而驰（效率被不稳定性损害，数字的透明度掩盖了服务的低劣），于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总的趋势讲，包括法国人在内，在保险业方面人们宁愿模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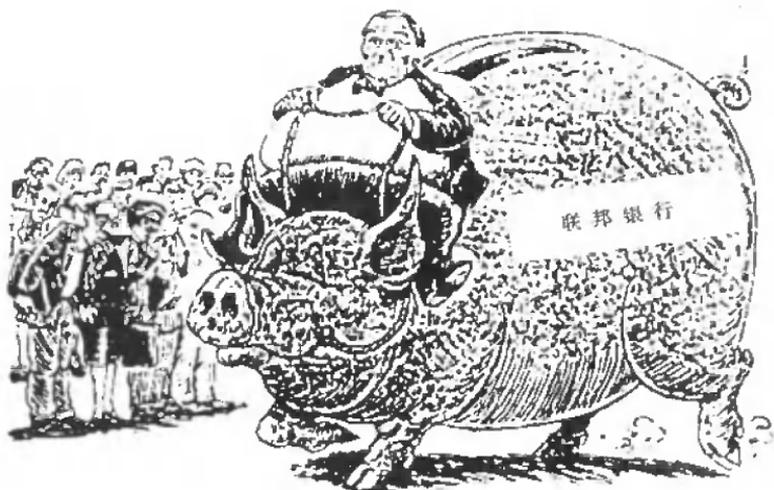
然而，总体来讲，莱茵模式还是表现出更有效、更公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第五章 另一种资本主义

经济和其他一样，用漫画来描绘比工笔画更贴切；夸张比精雕细刻更引人注目。一言以蔽之，卡西诺经济（赌博经济）中的股市流光异彩和白刃战，比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微妙平衡更能名扬天下。地拉那（阿尔巴尼亚）、乌兰巴托（蒙古）或布拉地斯拉瓦（斯洛文尼亚）的一位市民梦想这个神奇的资本主义不久将为他们打开幸福之门时，他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传奇世界，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党政权的欺骗宣传扭曲了美国的形象。尽管旧政权说了它许多坏话……几百个阿尔巴尼亚难民1990年夏逃出斯大林式堡垒后首先被法国收留，随后他们拼死拼活要投奔的正是美国，即达拉斯的美国，芝加哥的美国和华尔街的美国。当1990年初布达佩斯的一家股市“张灯结彩”开幕时，匈牙利人把它看做终于踏入资本主义天堂的无可质疑的象征。

当人们提到资本主义不是“不可分割的和铁板一块的”，有几个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并存而且美国制度也并非最有效制度的时候，会使前共产党国家的多数居民感到惊讶。如果告诉波兰的那位新总统——莱·瓦文萨，他今天梦寐以求的那种可以把美国资本主义的所谓效率与繁荣，同前共产党政权的社会保障结合在一起的理想“模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定会使他感到无比幸福。^① 借用在华沙非常流行的一句笑话，即“像日本人那样生活，但干活不要像波兰人那么多”。

^① 居伊·索罗门：《走出社会主义》，法雅尔出版社，1991。



资料来源：《未来学家》，第29页，1991年1月3～9日。

人们知道，离他们设想的这种情况并不太远吗？至少从劳动时间上讲是如此。在“联邦德国”的加工业部门中，每年的实际劳动时间为1633小时，这完全符合“劳动比法国人少，但效率与日本人相同”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了。^①在德国的铁业中已经实行了每周36个小时工作制，看来不可能像预计的那样，于1995年推广“35小时工作制”，但肯定早晚要实行（还有争论）这种制度。在所有工业化大国中，联邦德国确实是一个工作时间最短而工资又最高的国家。而且，这丝毫也不影响它的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

但，德国只不过是个例子，是“另一种资本主义”——尚未被了解和认识的莱茵模式——的特殊代表，这个模式从北欧到

^① 参见《未来学家》，1989年1月号。

士，日本也部分地属于这种模式。这个模式无可争议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是它的金科玉律。但是，自从10~15年以来，新美国模式在几个方面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正如社会学家让·帕丢罗 (Jean Padiou) 所概括的，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投机家压倒了工业企业家，轻而易举的短期收益破坏了长期投资的集体财富。”

莱茵模式则符合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经济组织观念，适合另一种金融结构和另一种社会调节方式。当然，这种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的特点是具有日益明显的稳定性、活力和实力。就像谈论政治民主一样，也可以说，这种经济制度肯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仅此而已。相当令人奇怪的是，莱茵模式在国际公共舆论中并未享有与新美国模式并驾齐驱的声望，但如果不是问公众而是去问问经济决策者，则完全是另一种反应了。1988年8月索夫来斯 (SOFRES) 民意调查机构对300名企业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尽管德国的工资费用明显比其他国家高，如果要寻找加工定货、或到外国购物，这些企业领导人的首选目标仍然是自发地蜂涌向德国 (法国名列第二，比荷兰名列第三)。

这个莱茵模式的某些基本点，与人们设想的新美国模式是有很大差别的。

市场在这两种模式中的地位

正如不存在什么东西都不要钱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样，也不存在不把任何物品 (和服务) 打上商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有些物品的性质既不能卖、也不能买。有些带有人文性质，如友谊、爱情、宽容和荣誉等；另一些物品从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如民主、公共自由、人权和公正，等等。

这些非商品性的物品，在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中基本上是一致

的。这些我们下面还会看到，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宗教信仰。

但是，这两种模式对商品物品和混合物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下面的两个图表粗略地显示出这些差别。

首先，这两张图表明，商品性物品在新美国模式中的地位明显地比莱茵模式更重要。反之，部分属于市场，部分属于公共行为的混合物品在莱茵模式中更重要。

其次，这两张图表列举了8种物品，两种模式在处理这8种物品与市场的关系时方式不同。

1. 宗教信仰 在莱茵模式中，宗教基本上作为非商品性机制运行的（在德国，神父和牧师像国家公务员一样，由公共预算支付工资）。在美国，似乎可以认为，日益增长的宗教越来越被作为混合性机构，用管理宣传媒介和现代销售方式的办法来管理。

2. 企业 在新美国模式中，企业和其他商品一样，完全是一种商品。反之，在莱茵模式中，企业具有混合性质，既是社团（community），又是商品（commod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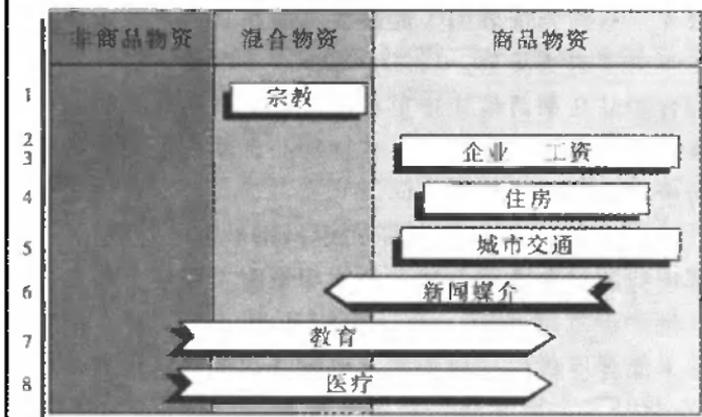
3. 工资 同样，在新美国模式中，越来越取决于市场的临时情况；在莱茵模式中，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职工劳动生产力以外的因素确定的（学历、资历、全国范围的集体协议标准）。对这边来讲是商品物品，对另一边来讲是混合物品。

4. 住房 在美国，住房几乎完全是一种商品。相反，在莱茵国家中，社会住房往往属于公共事物，房租一般得到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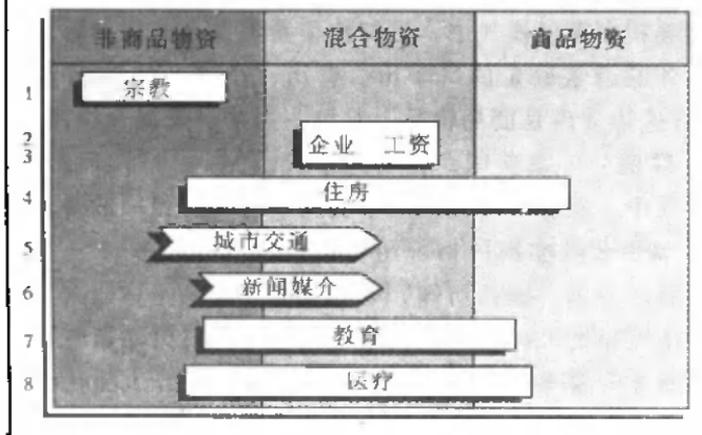
5. 城市公共交通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即使在美国，公共交通也要服从管制。据我所知，有一个罕见的例子，公共交通完全实行自由竞争的城市是智利的圣地亚哥市，皮诺切特将军的“芝加哥小伙子”获准可以随便开辟公共汽车线路，自由定价。因此，公共汽车的密度属世界第一，从而带来严重污染。

但是，莱茵模式国家的公共交通经常出现日益增长的亏空促

市场在新美国模式中的地位



市场在莱茵模式中的地位



使当局倾向于将公共交通私有化，图中是用朝向商品性物品的箭头来显示的。

6. 新闻媒体也一样，特别是电视，传统上电视是属于公共部门的，现在也列入日益扩大的私有化范围了。反之，在美国，传统上所有电视频道都是商业性的，现在也开始按照结社模式，通过自由集资来参与电视开发了。这两种相反的趋势通过交叉的箭头显示在图中。

7. 教育在这两种模式中都是按 3 种物品类型进行分类的。但是，在新美国模式中，由市场规则来调节的教育机构所占比重非常大，而且像图中指向“商品物品”栏所显示的那样，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8. 医疗卫生部门与住房部门一样，分别属于 3 种类型的物品。但是，莱茵模式的特征也具有双重性：一面是与社会保障相连的公立医院和储蓄医疗占的比重很大；另一方面，与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包括拉丁语国家——看到的情况不同，没有削减卫生、教育方面的公共权力和加强市场部门的趋势。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受到公共权力的足够制约，没有受到金钱以外的其他社会价值的竞争，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有可能变成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弗朗索瓦·贝湖表达得最精彩了：

由于存在既不受赢利思想渗透和支配，也不受追求更大赢利思想的渗透和支配的某些社会部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当高级官员、士兵、法官、神父、艺术家、学者也被这种思想控制之时，社会就要垮了，任何形式的经济都会受到威胁。在人类生活中最宝贵和最高雅的东西，如荣誉、愉悦、亲情、尊重他人，不应进入任何市场；否则，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会在这种基础上摇摇欲坠。一种资本主义以前的思想或与

之格格不入的思想在一个多变的时期可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框架。但是，由于这个时期不断扩张甚至取得成功，只要能够得到公众的好评和承认，只要追求舒适和物质福利的爱好得到发展，必然会动摇传统体制和精神结构，否则，就没有任何社会秩序了。资本主义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资本主义吞噬了它无力控制的日益上升的活力。^①

这种思考真是富于预见性。有一个具体事例，它直接或间接地与我们大家有关，这就是美国的律师已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性物品”一边。

在日本，向法院起诉被认为是有点可耻的事，为了避免落到这步田地，尽可能寻求各种各样的妥协。在欧洲，法律界，或更广泛地讲，自由职业的全部传统在于，为了使成员能够自由地和无私地——“不受赢利思想渗透和支配”——为公共利益（对法律职业来说，是法律，对医学职业来说，是医疗）服务，当然也必须保障他们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的“荣誉”所在。正是由于这个“荣誉”（*honneur*）观念，不能说向一个律师或一个医生支付他的服务费用，而是说付“酬金”（*honoraires*）。

这个千年传统可以追溯到医生们必须履行的《医生誓言》，这个基本的职业道德原则，使自由职业者超脱于市场之外。但在美国发生了一项根本的变化：从现在开始，律师职业成了一个产业，即“诉讼产业”。威尔特·克尔松（*Walter Kolson*）在他那本题为《诉讼爆炸》^②的杰出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新征服做了详尽的描述。前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E·伯格（*Warren*

① 弗朗索瓦·贝湖：《资本主义》，《我知道什么？》丛书，1962。

② 威尔特·克尔松：《诉讼爆炸》，杜鲁门·泰利图书中心，纽约，1991。

E. Burger) 在 1991 年 5 月 12 日《纽约时报》的书评栏中对这本书做了评论，他强调，这个变化发生在 1977 年，当时最高法院准许律师在电视上做广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突发事故费 (contingency fee) 的技术得到爆炸性发展，对律师来讲，这意味着可以向可能败诉的人说明他的处境，应该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说服他：“我将尽最大可能帮你得到赔偿。如果我打败了，你没有丝毫损失，如果我打赢了，你得给我所获赔偿的 20% (或 50%)。”在公路事故中，已经经常这样处理：律师就坐在救护车司机的旁边，随时准备签署受伤者的突发事故费协议……

正因为如此，1970 年以来，指控医院和医生的诉讼案件增加了 300 倍，而为了防止成为指控的对象，某些医生每年要交纳 30 万法郎的保险金！

其中某些人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习俗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此，已经达到绝经年龄的妇女不再计入保险之列，妇科医生对她们说：“今后，您的子宫已经毫无用途，我觉得，最好还是替您摘掉……”

资本主义的这种越轨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是：80 年代，因受贿和逃税被判刑的联邦法官数量比美国历史上前 190 年的总和还高……。可以看出，法官的文化越来越难于抵御“净赢利思想”。然而，当你的律师开始理性地工作，“齐心协力”地追求营业额最大化的时候，实际上就把你当做可以合理地开发的诉讼矿藏了；按照同一资本主义逻辑，你的医生也可以把你当做利润中心了，你怎么能信任他呢？一个正在摧毁信心的社会有什么价值呢？

一种银行资本主义

在莱茵模式中，资本主义既不是掌握在轻浮狂妄的金童子的手里，也不是被气喘吁吁的投机气氛所笼罩，而是基本上操在银

行的手里，它的命运不是取决于股市的“圆形交易厅”。银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在这里起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的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作用。法兰克福的或苏黎世的股票市场与它们的英国同行，甚至法国同行比较，似乎规模都相对较小。法兰克福市的资本化程度低于伦敦的三分之一，比纽约和东京的资本化程度低了9倍。同样，直到近期，在莱茵河彼岸的市场上还不曾存在期权贸易和期货贸易。一般来讲，德国的金融市场很小，也不活跃。在联邦德国，企业一般不是到股市上去筹措资金，也不是向公众集资，而是向银行寻求它们所需要的资金。其中有些公司——而且不是小公司，例如，欧洲头号出版和报业集团贝塔斯曼股份公司 (**Bertelsmann**) ——竟然没有在股市中挂牌上市。

从这个角度讲，这种情况同我们在英国或美国看到的截然不同。当人们联想到联邦德国的金融实力及其经济活力时，这种反差更令人大惑不解。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首先是由于德国的银行部门十分强大。众所周知，德意志银行控制了德国经济的一大部分，还有鼎鼎大名的德累斯顿银行，或商业银行。很少有人怀疑其影响的准确范围。这些银行的巨大影响主要来自下述事实：即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没有任何限制其活动的法规。德国银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使命，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做一切事情。德国银行发放贷款，接受储蓄。银行可以干预股票和债券市场，管理企业金库。但是，它们也是商业银行，是企业兼并和清偿的顾问和操作者。最后，德国银行还经营着准备向企业提供的经济、金融、工业和商业信息服务网络。因此，它们与客户维持着持久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富于相互合作精神。德国银行作为市场的代替者，首先要为企业提供资金。大多数企业都有自己的“管家银行”，负责解决本企业的金融问题。似乎一切像银行家对企业主所说的，你们好好生产、多多销售吧，让我们来解决钞票问

题！我们看到，在日本，这种一体化更加发达，因为大财团往往有自己的银行，甚至可以说，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它们自己的财团。

交叉的利益网络

在德国，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工作共同体超出了严格的金融关系。实际上，银行往往是企业的首选股东。银行成为股东的方式有两种不同，或者是掌握部分资本的直接所有权；或者是行使在本银行开户的股东投票表决权。利用这种集中投票手段，银行就可以在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举几个例子，例如，德意志银行便握有庞然大物戴姆勒—奔驰有限公司（**Daimler - Benz**）四分之一的股份（即可以有裁决权的最低比率），这个公司既制造汽车，也制造飞机和发动机，还掌握了头号建筑和公共工程集团——菲利浦·霍尔茨曼股份公司（**Philipp Holzmann**）和批发商的头领——卡爾斯塔集团（**Karstadt**）四分之一的股份。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也控制着十几个大公司的四分之一以上的股份。

但是，反过来，大工业集团也经常是银行监事会的成员，他们往往是这些银行的主要股东，尽管他们的全部参股很少超过5%。戴姆勒—奔驰公司在德意志银行的参股就是这种情况。这种交叉参股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网络，一种牢固而又相对封闭的工业—金融共同体。这就在经济方面带来了3个有利的后果。在介绍世界最大的工业—金融集团——三菱集团——的一本书的《附录一》中可以看到，日本也大致属于这种情况。

首先，银行家本能地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因为它们与企业的过去和未来都长期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与股市投机家不同，股市投机家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每个季度见到经营结果，德国银行

把宝压在时间上。为了支持非常微妙的工业计划，它们冒的是长期的、有时也是很大的风险。我们以五金股份公司（Metallgesellschaft）为例，尽管原料工业危机四伏，它在矿业部门照样不断扩大参股。瑞士银行在本国钟表业注定要失败的时候也照样投入了大量资本。

第二个后果是，主要股东保持稳定对管理层来说，是使他们感到安全和受到安抚的因素。一般来讲，这种稳定性对企业起着有利的作用。企业领导人不能在头上悬着“现金收购”威胁的达摩克累斯剑下生活。他们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企业管理，而不愿被没完没了的为免遭“敌意”控制的法律纠葛而精疲力尽和浪费时间。毋庸置疑，这是构成德国经济竞争力的多种因素之一，不仅是德国经济如此。在日本，我们还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带有其独特的“封建”特征。但是，那里的企业领导人也不愿意在不断来自外部的改组威胁下生活。同样，在瑞士，3家瑞士大银行所起的作用虽然与德国银行有明显区别，但企业的资本同样受到瑞士商法的严格约束，瑞士商法规定的表决权极为有限。荷兰则拥有对付“现金收购”的武器，保证企业领导人有一定的安全感。

莱茵模式中企业领导人享有的这种相对宁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松一口气了，或随便犯管理上的错误而不受任何处罚了。股东中的“硬核”无论是否由银行代表，都起着监督者和制衡的作用。这个核心完全可以惩罚无能的经理，并进而间接地保护小股东。

银行起主导作用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在联邦德国，有一个严密的、从外部很难渗入的利益交叉网络。因此，经济不是受到统制——德国人对“统制主义”一词很恼火，下面还会谈到——，而是由互相了解、经常见面的少数人共同决定来推动的。人际关系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人际关系使德国经济，包括其他莱茵国家的经济，不仅对世界范围的商品交换打开大门，

也从金融上得到广泛的保护，以便应对外来的直接投资。当一个企业遇到困难时，银行会自发地为解决问题寻找一种德国式的解决方案。当克勒克内—威尔克集团 (Klöckner - Werke) 陷入困境的时候，就是这样处理的——德意志银行紧急伸出援手。同样，处于无力偿还债务的尼克斯道尔夫信息公司 (Nixdorf)，也是由电子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收购的，它这样做，得到了银行的支持。企业兼并与清偿 (英文原文是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 + A*) 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因此，可以想象，在有银行监控的背景下，外国人要通过“现金收购”的方式来收购企业，会遇到何等困难。

当然，任何规则都会有某些例外。面对外国收购者，德国企业坚不可摧的名气也不像昔日那么牢靠了。1989年，联邦德国易手的3000家企业中，有459家企业被外国人收购走了，总金额达200亿法郎（比1988年增加了两倍）。在外国收购者中，有63手收购的买主是……法国人（比1966年增加了3倍）。但这些数字不应给人造成假象。被收购的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小型或中等规模的企业。1989年，胜利保险公司收购了高罗尼亚 (Colonia) 公司，仅此一项，就占了法国在联邦德国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在德国立足的法国公司比德国在法国立足的公司要少两倍。这种反差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

莱茵模式，财政上基本保持了平衡，而且是稳固的。德国经济从中找到了保障其长期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所必需的稳定性。尽管这张王牌已经很重要，但还不是德国唯一的王牌。

管理良好的共同决定制

在1986年提交给欧洲共同体主席的题为《联邦德国——它的理想、利益与不足》(W. 海格尔和M. 诺埃克，欧洲研究会)

的报告中，起草者主要分析了德国社会存在的“一种力图避免出现可能的分裂或怀疑共同定制的趋势”。在日本社会中也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或至少同样强烈的趋势。确实，这两个世界经济冠军，上次战争的战败国，都对自己的弱点有十分敏锐的感觉。无论是这两个国家中的那个国家，政治民主和经济福利都是最近才建立起来的，仍很脆弱。因此，容易强制实行一种特殊的社会纪律，这也是莱茵模式的特点之一。



资料来源：《回忆冲击波》，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这种模式中的权力结构与管理层只，与它的资本结构和员工

结构一样，确实也别具特色。责任分配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这当然不是克洛德·倍倍尔所宣称的“民主”，但这是一种形式多种多样的名副其实的共同管理，它把股东、老板、管理干部和工会等有关各方结合起来参与决策。德国1976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强制规定，所有超过2000人的企业都必须实行共同管理制度。用一个专用词就可以给它下定义：共同参与决定制（*Mitbestimmung*），从严格的字面含义来讲，译成共同管理不如“共同负责”更准确。这种共同负责制确实已经完全体现在企业的各个层次中。

在企业的最高层有两个关键性机构：负责单纯管理工作的经理办公室（*directoire*），和由股东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的、负责监督经理办公室工作的监督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保持经常合作，以便维持对企业的协调领导。于是，在股东与领导人之间有了一个制衡机制（*check and balance*），保障了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倾听，而不允许一个人说了算。

除了企业最高层的这种分权外，还要加上著名的全体职工参加的共同管理制度——或共同负责制。在德国，这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产物，可以上溯到1948年。共同管理制度是通过类似法国企业委员会的机构委员会来实施的，但它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所有社会问题（培训、解雇、工作时间、工资支付方式、劳动组织等）都得征询它的意见。老板和机构委员会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有义务达成一项协议。而且，德国的工薪阶层还拥有另一个表达意见和行动的手段：他们选出的代表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1976年颁布了2000人以上企业必须实行这种制度的法律以来，职工代表的数量与股东代表是对等的。当然，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必须从股东代表中遴选，如果选票相同，股东代表优先。但这并不影响职工在企业的任何决策机构中拥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话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否则，企业就无法运转了。

从法国的角度看，这个组织可能有点臃肿或涣散。决策程序似乎不够果断。但仔细看一看，这种组织完全没有扼杀德国企业的活力。恰恰相反，它加强了归属感，从而把企业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或伙伴集体，美国的社会学家们现在把它叫作“利害关系模式”（**stakeholder model**），是与股本模式（**stockholder model**）相对立的，后者只知道股东和股票持有者（**stock**），前者则相反，把每个人都看做伙伴，要承担自己应付的责任（**stake**）。

在日本，在我们看来有些独特和模糊的观念带来了同样的结果：隶属于某个社团的近似家庭的——或封建的——情感。日语中有一个专门词语（**amae**），很难翻译出来，表示一种对团结互助和保护的需求，一种要求企业来满足的爱抚。同样，形容企业主的领导也有一个专名词语（**iemoto**），专家们认为这个词语也有家庭的内涵。依照社会学家马塞尔·波勒德巴勒（**Marcel Bolle de Bal**）的说法，“**amae** 与 **iemoto** 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平衡的：是在不断建立一个持久的组织过程中，把女性的原则（爱情、感情、激情、团队）和男性的原则（权威、等级、生产、个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①

人们经常援引日本企业生活中的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并不只是下述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终身就业、资历工资、企业工会和团队动员体系，等等。

然而，结果是一样的：隶属于企业的集体感或社会归属感，在莱茵模式中或日本模式中同样都很强；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则变得很弱了。

由于对未来越来越没有把握，信任感和归属感显得日益重要。既然大家都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赞同可以达成共同判断和

① 《法国管理杂志》，1988年2月号。

自然动员的思想和观念，这种信任感和归属感对企业来说就具有根本意义了。外部不稳定更显示出内部稳定的重要性，它不仅不会造成应变和变革的障碍，而且会构成竞争力的一个要素。在这个问题上，正如美国不等于纽约、纽约不等于华尔街，同样，应该指出，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不仅在社会管理方面，而且在金融管理方面摆脱了短期利益的新制约，这些制约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向“新美国”方式转化带来的后果。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力公司、麦当劳快餐公司都小心谨慎地避免陷入类似卡西诺式的经济，在卡西诺经济中，靠的是冒险。为了建立跨国公司的参谋部并为其服务，确实不得不把宝押在稳定、职工分红、甚至“共同负责制”上。

忠诚与培训

“共同负责制”是德国著名的“共同参与决定制”一词的译文，它不仅仅是企业的法宝，“共同负责制”对工薪阶层也特别有利。从严格的数字计算来讲，德国工薪阶层的收入是世界最高的：小时工资德国是 33 马克，美国和日本是 25 马克，法国是 22 马克（按 1988 年汇率计算）。同时，工资制度也比较单一。德国的工资差别比其他国家小得多。^① 如此看来，德国社会要比美国社会，甚至比法国社会更加平等。

更加使人吃惊而又鲜为人知的是，尽管如此，工资在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却比欧洲共同体其他国家都低（1977 年占 67%，法国占 71%，意大利占 72%，英国占 73%）。即使考虑到这种现象可能是联邦德国的外贸出超带来的，那么，尽管工资是欧洲最高的，德国企业仍然比其他国家赢得了自筹资金的余

^① B. 萨塞：《德国的诱惑》，奥尔夫出版社，1985。

地，而且，同时避免了社会冲突。

德国工薪阶层的收入较好，而且，我们已经说过，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或法国同行劳动的时间也少。至于莱茵模式中的职业结构和晋升制度，他们同时强调技能和资历。为了能够逐级升迁，最好是忠于职守和提高受教育水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德国或日本企业的领导层中，管理干部的一生都在同一企业中度过，而且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上来的不在少数。这种观念同美国突出人才流动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美国把变动就业和变动企业看做衡量个人活力和才能的一个标准。（把个人流动性看做人才杰出的同义词，通过流动来实现自我价值，前几年在法国也曾风靡一时，现在已经少一点了，尽管在某些大学……里，还在继续进行这些已经是明日黄花的说教。）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共同管理制——或共同负责制——有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1981~1982年危机时，为了不加重企业的困难，雇主和工会达成限制工资增长的协议，员工们甚至同意降低购买力的3~4个百分点。成效非常可观：德国经济从1984年开始恢复增长，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夺回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同样，1984年大罢工之后，由于广泛地动员了所有工薪阶层并得到他们的赞同，落后的部分又都赶上来了。然而，日本企业在第一次石油冲击过后的1974年，就赢得了员工们为此付出的更大奉献。

共同管理制一旦真正付诸实施，就会成为令人生畏的经济武器。最近的一个例子表明，一旦需要，这个经济武器在国际竞争中会变的多么重要，这个例子就是职业培训。大家都了解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一个企业的真正财富不在于其资本，也不在于其建筑物，而是其员工们的素质和知识。莱茵模式在这一方面也是获益匪浅的。培训制度的基石是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密切合作。几年来，德国一直把职业培训看做国家的优先目标，职业培训的3条

基本原则是：

1. 首先，职业培训要普及到最大多数人。在德国，只有**20%**的就业人口没有任何职业培训毕业证书；在法国，这一比重达到**41.7%**。其次，职业培训突出技工培训，德国的技工培训显然比法国发达多了。在莱茵河彼岸，这涉及到**50%**的青年人，他们从**16**岁起就脱离了义务教育制，这部分青年在法国和英国只占**14%**。结果：在**16**岁的德国青年中，只有不到**7%**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或有工作但没有经过补充培训；而这一比重在法国为**19%**，在英国为**44%**。最后，相当于法国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BEP**）和专业技能合格证书（**CAP**）的职业培训也受到优待。这类人在德国就业人口中占**53%**，在法国只占**25%**。

2. 一般来讲，德国的培训制度明显地要比美国（参见本书第二章），甚至比法国更为平等。如果说美国（或法国）的精英受的教育有时比德国精英好一些，受过中等水平教育的人就比德国差多了。德国工会首先承认这一点。因此，德国总工会（**DGB**）认为，在**100**名工人中，最熟练的前**15**名法国比德国好，但其余的人，联邦德国要好多了。可见，德国的工业活力和竞争力是建立在中等水平培训的基础之上的。^①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法国，职业培训不过是一种精英运动，而在莱茵河国家中，这是一种群众性运动。

3. 这种职业培训得到了企业的大量资助，也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补贴。职业培训的内容则是突出强调要掌握准确、守时、安全性的技能。在德国，技工培训真正是晋升的一部分，是走向职业成功的必由之路。**10**个技工中有**9**个经过这种技工培训，其

^① 参见阿兰·布卡耶、倍沃尔·科斯塔·德布雷卡尔 1990 年提交给工业部的报告。

中有 15% 的人继续接受更高的培训。此外，德国的职业至上主义显然比法国更得到公认。“从有关联邦德国的近期研究中可以看出，一般来讲，是根据业绩而不是根据文凭晋升，一般 40 岁才能成为领导干部。在企业与大学之间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①

员工要忠诚于企业的职业培训已经成为两种模式资本主义之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所有企业都参加了这场战斗，所有雇员也与其息息相关。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按照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要使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最大化，必须使这个企业雇佣的每个人的竞争力最大化。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必须招收最优秀的人，而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失出去，必须随时按他们在市场上的价值支付他们工资。于是，工资像就业本身一样，基本上是各自不同，而且是不稳定的。

——在莱茵—日本观念中则与此相反，认为基本问题不在于此。企业无权把它的雇员看做一种简单的生产要素，可以像原材料那样到市场上购进和售出。恰恰相反，企业有提供某种保障安全、要求职工忠诚于企业和进行费用昂贵的职业培训的义务。因此，企业与其按照市场行情向每个职工支付工资，不如为他们安排好职业前景，设置必要的保障和防止破坏性的争斗。

自由主义的金科玉律^②

毫无疑问，联邦德国对自由的信仰和对国家的怀疑，即使不比美国严重，也同它一样根深蒂固。大家公认，经济统制主义是专制制度，更是纳粹主义的历史特征。因此，自 1948 年艾哈德实行货币改革以来，联邦德国明确否定了指令性经济体制，通过

^① 参见米歇尔·哥德的文章，《未来学家》杂志，1989 年 4 月号。

^② 本节论点主要来自热罗姆·维尼翁的论文，谨表深切谢意。

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社会市场经济 (**Sozialmarktwirtschaft**)。这是弗莱堡学派主张的一种信条或世界观 (**Weltanschauung**) 的基石。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 社会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原则:

——经济的活力应该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市场应该享有最大的运转自由, 首先是在物价和工资方面。

——市场运行不能独自支配整个社会生活。它应该首先受到社会需要的平衡和制约, 而国家是这种制衡的保障。因此, 德国的国家定义是社会国家。

社会市场经济是由下述成分组成的一个整体:

——福利国家思潮 (**《贝夫里奇报告》**) 把社会国家 (**Sozial - Staat**) 变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伙伴自由谈判的守护神。

——社会民主思潮 (起源于魏玛共和国) 是职工参与企业生活和其他机构生活的奠基者。以此为基础, 在德国重建的前 **10** 年内, 共同参与决策制的立法不断发展, 直至今天, 仍然是联邦德国激烈争论的目标。

——**1949** 年的基本法——它无疑是最特殊的因素——把货币管理变成了一个维持稳定的自主支柱 (所谓稳定, 换言之, 即反危机政策)。联邦银行的目前地位, 虽然不能说直接属于立宪体制, 但它最好地体现了基本法的精神。

——中央银行的自主地位与商业银行的总体结构联系在一起, 指导商业银行在为企业筹措资金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商业银行不能足够地保障为工业提供长期资金, 德国的货币稳定政策也就不会产生如此的效果。

——国家干预主义和统制主义, 只有在它们使竞争受到扭曲的时候才受到谴责。其核心思想是保证竞争环境的平等。

我研究德国经济并与德国人一道工作 **30** 多年, 现在我仍然奇怪, 为什么他们想让外国人了解他们的经济是不折不扣的自由

经济体制时别人会感到困难。诚然，近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人怀疑整个德国经济是建立在自由贸易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唯一站得住脚的批评是标准化问题。自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工业制定了许多专业标准，他们对此十分钟爱，一方面，这些标准一般来讲质量要求很严格；另一方面，这些标准也被德国产品的进口商，即世界客户接受了。

撇开这一点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仅仅出于两条理由，国家也没有权利干预经济或社会生活，但正是这两条理由使国家有了进行干预的真正义务。

第一条理由是竞争环境平等。设置联邦政府卡特尔局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进行严密监视，避免主导企业之间相互勾结或乱来。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竞争平等，应该帮助中小企业对抗大企业滥用实力，进而对抗它们滥用信贷条件和优惠税制（这又有点类似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观念了）。以此类推，为了保证本国不同地区的竞争环境平等，应该制定一项领土整治政策，这项政策要特别注重最困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德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最后一点，既然其他国家是利用公共基金，特别是在国防预算的项目下，为科研提供资金，联邦德国也这样做是正常的。

国家干预的第二个基础必须是社会性的。据此，对造船业和矿业的景气性补贴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合乎人情”地适应变化节奏。正是这种哲学在欧洲煤钢共同体（CECA）时期（它负有重建大部分欧洲矿业和钢铁业使命）占了上风，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德国的理论是想让劳动者的代表首先在企业的社会管理方面起一种积极的作用；同时，让他们参与上面提到的经济和金融管理。

德国日益介入欧洲共同体（CEE）的共同农业政策（PAC），从某种程度上概括说明了国家干预的种种动机：维持竞争中的平

等、关切社会演变和领土整治。除此以外，由于从布鲁塞尔得到了农业补贴，德国农业在支持改善环境和保护农村风貌方面起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涉及到企业的股东时，显然，德国依然是一个保护主义倾向很强的国家。

这就是人们有时称之为“自由主义金科玉律”的基本内容。可以理解，这种自由主义丝毫不妨碍国家完成其自身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47~48%）大致同法国（51%）一样高和明显高于日本（33%）的原因。德国和法国一样，企业的公共费用转移约占国内总产值的2%。确实，联邦德国的公共权力，即联邦各州的权力非常分散，这就迫使它们必须寻求对话和共识。也可以说，联邦自由主义成了州政府干预主义的屏障”。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不同的是，像由各个州组成联邦的瑞士一样，德国的中央权力来自各个州，城市保留着悠久的独立传统，并拥有相应的权力，因此，正如财政预算分配所表明的那样，各方的职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国家的财政预算为2800亿德国马克，各个州的预算为2700亿马克，各个城市的预算为1800亿马克。国家负责总的行政管理机关、社会预算补贴和国防。各个州负责教育和公共安全。各个市镇负责为社会援助、体育和文化设施等提供经费。

这种分配方式就要求经常进行磋商和对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因而，各个州的资源往往经常受到调配，避免任何一个州的人均收入低于全同平均收入的5%，注意，仅仅是5%！法国地区之间的相应差距竟然是30~40%！这是我难以让法国人明白的又一个德国经验。大多数法国人相信，尽管颁布了德费尔权力下放法令，法国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同国家的中央权力相比，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是很小的，法国的资源分配无论在地

理上还是在社会方面，确实是最平等的国家！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真是奇怪，在社会团结和实施积极的领土整治政策方面，杰出的榜样竟是德国。

最后，为了协调不同地方公共机构的活动，制定了协商性计划，并且通过签定共同方案的合同框架，实施了这项计划。上面列举的这些事例表明，莱茵河彼岸的政府和政界人士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与共决制的机制决裂了。

他们在所有领域里或几乎所有领域里采取了这类措施。在工资方面，政府不直接干预，但它鼓励社会伙伴遵守某些标准，或要求他们不要再扩大经济和货币的巨大失衡。例如，在医疗卫生方面，赫尔姆特·施密特就曾鼓励资方、工会和医疗基金在削减医疗支出上达成快议。但这同法国的情况还相去甚远，长期以来，法国的公共部门对工资制度的发展一直起着指导作用。

强大的和负责任的工会组织

然而，如果没有实力强大的有代表性的负责任的工会组织积极参与，这种经常协商和共同决定的模式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在欧洲，可以看到几乎到处都对工会组织失去兴趣。德国工会组织80年代初稍有减少，现在工会会员的数量又有所增长。德国就业人口中工会会员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现在又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即达到了42%，法国的这一比例仅占10%。莱茵河彼岸的工会拥有900多万会员，德国总工会一家就有770万会员。它们的财政实力同其代表的比例大致相符，所得工会会费则相对较高（直接从工资中提取2%）。由于实力强大，使它们拥有令世界大多数同行羡慕不已的行动手段：在联邦工会机构中就有3000名脱产人员，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尽管它们的保阶公司（Volkfursorge）、它们的银行（BFG），特别是它们

的不动产公司遇到了困难。而且，德国工会还有一些罢工基金，一旦罢工失败，可以向参加罢工的工人和被关闭工厂的工人提供相当于本人工资 60% 的补贴。这是对资方颇有效力的一个威慑工具。

德国工会还拥有对各级当选的工会代表进行遴选和培训的手段。它们有对形势进行追踪研究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因而，对工会脱产人员的培训水平特别高。进行谈判的时候，它们有能力提出内容协调一致的、有根有据的中期解决方案。这还不算另一个进行干预和施加压力的辅助手段：通过当选议员的工会代表出席联邦议会。实际上，有不少重要的议员来自工会界，一般估计，基督教联盟（CDU/CSU）的议员中有 40% 的人隶属于某个工会。这种工会界和政界人士相互交叉，无疑会有助于达成共识和灵活处理问题。

然而，工会的强大实力往往是为相关的地方机构服务的。^①换个说法，即德国工会比它们的外国同行在经济方面更加“负责”。它们与资方一道管理了大部分职业培训体系；它们讨论终身教育及其内容；它们还负责管理失业培训中心的工作，每年要帮助 15 万人实现再就业。

其次，众所周知，德国工会的立场往往是有节制的合乎理性的，它们考虑到经济的需要。对共同决定制采取支持的立场是“有回报的”，因为德国的工资高。莱茵河彼岸社会对话机制的下述两个特点表明，人们经常考虑的是不要损害大的平衡，即不要导致德国如此惧怕的通货膨胀。

1. 谈判程序是正规的，每次谈判涉及的期限为三年或四年。最后一次工资谈判浪潮可以追溯到 1986~1987 年。

^① 参见阿兰·布卡耶、倍沃尔·科斯塔·德布雷卡尔 1990 年提交给工业部的报告，前引书。

2. 在协议规定的期间，工会保证不采取冲突方式来反对有关协议条款。因此，德国因罢工损失的劳动日数量是西方世界中最底的（1988年德国是28000个，法国是568000个，英国是1920000个，意大利是5644000个，美国是12215000个）。

工会实力强大，并且在达成共识和共同管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以外，还应强调德国结社体系的极大活力。例如，各种科协拥有遍布整个德国的80000名科学家。它们负责向其成员发布信息，关怀他们的职业生活和工作条件，从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灵活的、精练的、非正式的科研管理机构。如果再举个例子，那就是环境保护协会，它们在准备相关材料方面多次表现出它们确实实力不凡，严肃认真。

总体来讲，结社运动团结和动员了市民社会的有生力量，在德国，为促进莱茵模式的运行起了关键作用，这是一种中介体制安排和公民表达意愿的场所。

但是，所有这些政治性的或结社性的机制，如果不是把它们的活动建立在一种特殊的集体文化之上，就将一事无成。

共同的价值观

总之，莱茵模式所囊括的各国尤其具有一定数量的共同价值观，举其要者如下：

1. 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些相对平等的社会。这里的收入差别和工资序列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明显小得多。此外，这里的税收制度也明显更具有再分配性质。不仅直接税超过间接税，而且、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比英国（40%）、美国（33%）要高得多。加之，强制征收资本税也得到了舆论的认可。

2. 集体利益通常优先于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利益。在莱茵模式中，个人所在的共同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企业、城市、

社团、工会，都属于保护性的和稳定性的结构。可以表明共同利益至上的例子不胜枚数，有些令我们惊讶。例如，实力强大的钢铁工会（IG Metall）在德国重新统一时自动地放弃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权益要求。而它为达成这项协议而同雇主谈判，已经等待了整整3年。钢铁工会主席宣布，该工会会员认为，应该首先迎接重新统一的挑战。

这种“集体利益”优先，并不意味着莱茵模式的国家信奉集体主义，甚至不是信奉集中化经济。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原则写进了联邦德国的基本法。联邦卡特尔局严格奉行自由竞争的原则。例如，当一个德国企业由于无法保障自由竞争而收购了一个外国竞争对手时，它就曾进行干预。同样，德国、瑞士和日本也没有法国式的——指导性的——计划化。国家从来不可以代替市场，至多只能诱导市场或给市场指出方向。仅此而已。

但是，对德国来讲，正如其社会市场经济的名称所表明，市场经济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意义何在呢？因为长期以来，社会机构传统上十分强大。社会保障制度就是1881年由俾斯麦发明的。德国的医疗保险只要求投保人交纳很少的费用，约占10%，而法国约占20%，美国占35%。退休金也比较宽裕，因为很大一部分养老金是由企业管理的个人储蓄来支付的。

莱茵式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再平衡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表现形式。与大西洋彼岸不同，在这些国家中，公民广泛地积极参与公共生活。选举中的弃权率相对较低。政党实力强大，结构严密。它们可以为自己的党员和当选议员在良好的组织中提供素质教育，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基金会。法律也强制政治家必须积极参加政治体制内的生活。例如，议员缺席国会会议要受到惩罚；国会议员必须亲自投票；议员兼职严格限制在两个职务以内。

因此，莱茵模式是别具一格的。它成功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保持了平衡，同时，效率也丝毫不差。

但令人奇怪的是，所有这一切，尚鲜为人知。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幸福也没有一部成功的历史，这话不假。

第六章 莱茵模式的经济优越性

要正确评价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就需要费一番力气回忆过去。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平衡是怎么回事吧。美国取得了独占的胜利，原子弹——残酷地——奠定了它在全球的帝王之尊。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大国，躲在本国国土上免遭战争之苦，它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超级经济大国。当时，美国不仅没有削减税收，反而拿出一部分财政赢余，在马歇尔计划的框架内，用来援助被摧毁的欧洲。当时的苏联还没有力量——像柏林危机时那样——向美国发动长期的挑战。胜者为王的文化——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美国大兵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的美国生活方式——吸引了整个世界，包括它的夙敌，而且时间很长。

至于两个主要的“轴心列强”德国和日本，众所周知，他们为失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国家一败涂地，城市变成废墟，工业被摧毁，这两个民族由于被他们的领导人拖入悲惨的冒险，本身也遭受了最深重的精神创伤。德累斯顿或广岛，柏林或长崎，都变成了一片凄惨的烧焦的瓦砾堆，这一点足以说明灾难的严重程度简直无法计量。

战败国的胜利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1987年10月19日的一场股市风暴突然袭击了整个金融界。在纽约，华尔街被搞得晕头转向。美

国政府陷于困境，为了避免进一步恶化，决定把流动资金注入财政流通。也就是说，通过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为美元彻底打开了闸门。然而，人们知道不知道它在这样做之前，却不得不征求日本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的意见，甚至要得到它们的认可吗？力量对比发生了耀眼的变化：昔日的战败国——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过去的战胜国发号施令了。稍后不久，联邦德国也如此这般，通过“赎买”几近陷于破产的民主德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重新统一。与此同时，德国也表明它自己就有能力独自肩负起这沉重的经济负担。1989年末，波恩既没有要求援助，也没有要求支持。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人同莫斯科签定了经济援助协议，主要内容是德国要为撤出驻在前民主德国的红军提供经费（竟然包括在苏联领土上重建军营的费用！）总之，财大气粗的德国从此有办法赎买自己的独立了，而且是现金交易。

这样，两个昔日的战败国——莱茵式资本主义的后来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变成了两个世界经济巨人，它们直接同美国的旧霸权展开了竞争。当然，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如此成就，都各有其特殊的原因。换言之，日本经济有日本的特殊性，德国经济有德国的特殊性，两者互不相同，不能放在一个模子里。但尽管如此，要估量一下一种模式的整体优势，这两个得了势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特征还是相当多的。至少有一种优势，我们下面还会看到，也可能是几种优势。

还是先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谈起吧，目前，这是货真价实的实力之母、或实力的标志。在资本主义占上风的这个世界，由于意识形态对手的溃败，权力必将落入特别善于从中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人的手里。从这一点上看，莱茵模式的优越性似乎越来越明显。

如果说自1971年美元本位制终结以来，美元已不再是布林

顿森林会议 (1946 年) 后的货币本位, 但美国利用它的旧优势 (参见第一章), 一直享有一种真正的货币特权。这确实不错, 而且还在继续下去。但是, 它越来越受到德国和日本进入货币强国的威胁。马克和日元逐步在窥视美元的地位。

这两种外币在整个国际外汇储备中约占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 20%。这一比重在 20 年内翻了一番。况且, 德国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还在不断努力限制其货币的国际运用, 以便保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可以设想, 如果德国和日本货币权力机构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 这两种货币将会各自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但是, 除了占有已经很大的实际比重外, 还要加上一种所谓的“心理比重”, 从此以后, 这两种货币就享有了非正式的强势货币地位。在舆论中, 有了以马克记帐的资产, 或较小规模上以日元记帐的资产, 就意味着有了经济上的保值。这两个国家逐步变成货币区域中心, 一些周边国家的货币就要围绕它们运转。

马克的威严

欧洲货币体系 (SME) 实际上把欧洲变成了一个类似的马克区, 欧洲为此提供了一个好例证。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于 1979 年, 是由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倡议建立的, 旨在为共同体——某些国家例外, 如英国——建立一个汇兑体系, 成员国货币之间只能在内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浮动”。同时, 还创建了一个作为欧洲货币“一揽子”的参照单位——埃居 (ECU)。具体地讲, 欧洲货币体系具有双重目标。

1. 控制损害了共同体内部贸易稳定的汇率盲目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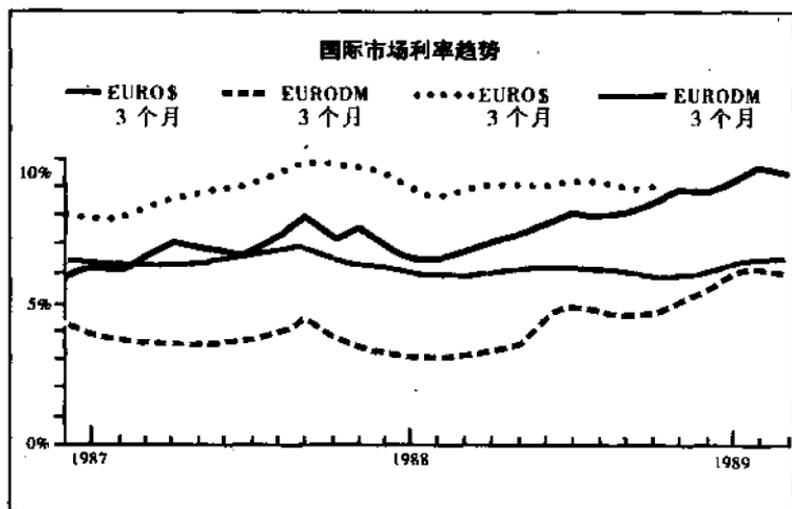
2. 强制每个成员国遵守共同的纪律, 迫使它们实行与汇率保证一致的经济政策。

这两个目标都达到了。从这个角度讲, 欧洲货币体系是成功

的，这一点似无争议。当然，对汇率进行某些调整也是必要的，但货币之间的关系保持了相对稳定。至于每个成员国必须遵守的经济纪律，举个例子就行了，1983年法国社会党政府的“严厉政策转弯”的目的不就主要为了留在欧洲货币体系之内，为了服从其制约并拯救法郎吗？但尽管如此，德国还是从欧洲货币体系中获利最大。用什么方式呢？德国人获利至少是由于他们有两点优势。

1. 近些年来，德国马克越来越成为欧洲的参照货币。正是在马克的基础上加上其他货币组成了欧洲货币体系。因此，不管怎么说，每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伙伴的货币政策。例如，法兰西银行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监视马克与法郎之间的汇率比价。当看到差价过头时，立即采取对应行动。欧洲其他央行也都会这样。因此，每次德国人提高他们的利率，它在共同体内的邻国往往也不得不跟着走。同样，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足走向政治欧洲的关键性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屈从了德国人的良好意愿；如果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法兰克福欧洲联邦银行（Eurofed）——借鉴了德国联邦银行的结构和管理规章就不足为怪了。德国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成为货币联盟的先导。

2. 第二个优势是，由于德国拥有货币实力，它可以选择维持较低的利率。既然马克信誉高，在世界上需求量很大，波恩就没有任何必要利用提高汇率来吸引外国资本。德国的利率之所以比外国低，就是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可以保障马克有稳定购买力的低通货膨胀率。举个例子，我们知道，1990年底，与法国的利率差别是一个半百分点，与英国的差别是6~7个百分点。不难设想，想借款的德国企业和家庭可以从中得到多大的实惠。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

货币的“后方基地”

日本也存在类似现象，尽管程度较低，这个国家也不属于某种固定汇率体系。在东京也一样，日元汇价一直被低估了，利率较低，因而日本在经济舞台上的影响扩大了。至于小小的瑞士，它也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货币。瑞士法郎仍然是世界第四大储备外币。瑞士法郎是与日尔曼法郎同期诞生的，它的汇价可没有像它的法国兄弟那样被贬值 300 倍！应该指出，瑞士的利率也位于世界最低之列。

德国、日本、瑞士… 所有这些国家，货币实力都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打击力量。货币实力为它们的工业家提供了某种坚不可摧的“后方基地”，可以从这里发起勇往直前的经济攻势。

有了一个坚挺的货币，就可以从外国以低价购进。众所周知，日本人就决不放弃这个手段，从美国、欧洲收购了最好的工业或不动产。德国人也拥有同样的收购能力。当人们得知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收购捷克的斯科达汽车制造厂，在布拉格给了比雷诺汽车公司高得多的价格，谁也不会感到惊奇。从雀巢公司或汽巴—盖吉制药公司这些巨头企业算起，瑞士企业也同样实力强大和充满活力，在美国投资高达几十亿美元。

这些对外投资的目标和结果是：使得莱茵国家可以紧密控制它们的出口。日本在汽车工业中的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制造商面对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倾向，采取了“企业外迁”的方式，选择的策略是把他们的工厂设在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上，就地生产。据估计，1992年，他们每年光在美国一国就将生产近200万辆汽车，占美国汽车产量的16%。这是逆反方向的《美国的挑战》。

一般来讲，莱茵模式企业的对外投资政策是尽量避免采取野蛮控制方式和投机控制方式；它们是逐步地有条不紊地到外国设厂；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文化，在他们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分厂。这样一来，有时会出现一些独树一帜的风景区。例如，在诺曼底地区，每天早晨，法国工人和职员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都一丝不苟地做日本体操：这是赤井株式会社的员工。在这个工厂里，自然实行的是日本管理技术。在美国，出现了同样的景象，日本人取得了无可争议的，甚至辉煌的成功。有人估计，他们已经成功地在其美国分厂中创造了一种“微观气候”，从而提高了生产率，比同类美国工厂高出了50%。值得思考的是，这个动人的一幕也说明了另一个道理：这些对外投资完全是为了牢固地扩展企业，而不是为了夺得股份，以便行情好时再出手，把利润揣进腰包。

这种战略非常有效。莱茵模式的逐步渗透战略建立在坚实的

和强大的金融基础之上。这就带来两大好处。

1. 可以持续地占有市场。在当地建厂几年以后，就可以熟悉自己的品牌、产品和企业。反过来，也拥有了已经非常熟悉的员工、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

2. 别人很难设置保护主义措施来对付这些从外国迁来的企业。保护主义措施仅仅是可能性吗？这正是欧洲人与日本人围绕“螺丝工厂”争论的主题，后者试图毫无限制地把这些工厂迁入共同体市场。莱茵国家从它们的货币稳定和金融实力中分得的红利是在国际上扩张和扩大了经济政治影响。这些是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

强势货币的道德周期

这是经济学家熟悉的词语。什么意思呢？它指得是握有一种强势货币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所有积极效应。这些效应有点自相矛盾。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一种强势货币可能构成一个经济障碍，因为这将使本国产品价格更贵、更难出口。那些靠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的国家对此了如执掌。那么，谈论“弱势货币的道德周期”是不是更符合逻辑呢？这种看法有点鼠目寸光，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个问题主导着80年代的大多数国际游戏规则。因此，值得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再“回回锅”。

在货币贬值问题上，经济理论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它会在贸易平衡上立即带来两个大家都知道的后果：从本国货币反映出来的是进口变得更贵了，用外汇支付的出口产品，价格会降低。顺理成章，随后会有两个不同时期的结果。

1. 在很短的近期内，贸易平衡会受到负面影响。必须立即为进口付出更贵的费用，尽管外国购买者尚不了解对他们的出口价格已经下降。相应的期限只对一方有作用，对另一方却没有作

用。贸易平衡因此受损。

2. 在中期，贸易平衡却可以恢复。进口外国产品较少的国家，其产品会变得过于昂贵，其出口则得到改善。一般来讲，这种恢复来得相当快，结果可以补偿初期下降的损失。总的讲，这确实可以使有关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得到加强。

经济学家把这两种效应的自动连带称作“J型曲线”。如果根据时间来标明贸易平衡趋势，可以得出大写的J型曲线。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有许多经济政策就是根据这个曲线制定的。尤其是法国，1958~1959年的儒埃夫计划或1981~1983年莫勒瓦政府的政策改变就是这样。1985年以来，美国的政策同样来自这个“J型曲线”：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医治巨大的贸易逆差，放手让美元下跌。货币贬值成了灵丹妙药，大放异彩。

但这完全错了。因为这个美妙的大写J，过去，它下边的拐弯直指贸易顺差的光辉前景，现在已经不能兑现其许诺。这个模型不仅经不住实践的检验，甚至也经不住理论的剖析了。有什么事实根据？德国（重新统一以前）和日本就是强势货币国家，它们的贸易顺差连年不断。相反，法国和意大利便经常求助于货币贬值，无法持续维持贸易顺差。至于美国，自1985年以来美元定期贬值，并没有振兴他们的对外贸易。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事实可以如此精彩地揭穿了那些在纸上非常有效的机制呢？

经过理论剖析，对“J型曲线”还可以提出几点修正。应该指出3点。

首先，如果货币贬值，无法证明进口价格的上升和出口价格的下降会与货币贬值的幅度完全一致。进口商和出口商可以采取与预期效果背道而驰的“边际”行为。例如，出口商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价格，即他们的边际价格。至于进口商，不能排除他们宁可在价格上做出牺牲，换取保留某个产品在

市场上的份额。**1981~1983**年法国的情况就有些类似：法国出口企业曾利用货币贬值提高价格，以此补偿社会党政府的政策措施给他们造成的附加负担，进口商通过压缩他们的负担以防丢掉顾客

第二个看法是，一种货币的下跌往往会诱发有些理论家所说的“进口的通货膨胀”。进口产品更贵了，价格上涨就会影响到所有产品。石油、原料和装备物资自然属于这种情况。结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从终点又回到起点的小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加剧了通货膨胀。于是，政府别无他法，为了“拯救动产”，只好再次让它的货币流失。贸易逆差不断增加……

第三个看法，要想让货币贬值为真正振兴出口服务，企业也要有能力，尤其是要有争夺新市场的意愿。舍此，企业也不能利用面临的机遇，人们渴望的恢复贸易平衡也不会到来。这不是一种学术性假设。仅举一个例子，自**1985**年以来，美国工业的开工不足阻碍了它从美元汇价下降中得到好处，也无法把日本人和欧洲人夺去的市场再夺回来。

这一切，结论很简单：货币汇价下跌、货币贬值“疗法”，就是人们用惯了的慢性毒品。这种毒品非常危险，因为它使吸食这种毒品的人不能正视他们的真正弱点。这种毒品就像一种可以产生瞬间效果的神奇芳香剂，给人带来廉价的“美好”幻觉。它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头，法国人对其结尾深有痛感：**1970~1983**年他们就曾陷于这种恶性循环之中。

与此相反，乍一看，强势货币战略即使谈不上英勇不屈。似乎也是崎岖不平 and 困难重重的。这种战略对某些企业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它们的出口受到损失，而价格变得更便宜的外国产品很可能进来竞争。对这个国家本身也是个挑战，它的贸易平衡要为这个严厉的货币政策付出代价。但是，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竞争总是个好事。竞争可以调动各种潜力，杜绝放任自

流、带来期望。我们还看到，实行强势货币战略的国家都是最成功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瑞士、荷兰……，这绝非偶然。

如上所述，强势货币可以避免贬值带来的副作用，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一些宝贵的优势。

首先，强势货币迫使企业加紧提高生产力，这是补偿其产品收益相对下降的唯一办法。对于企业管理来讲，强势货币在时间上是比“现金收购”(OPA)威胁更有效的刺激手段。在日本就曾看到这种情况。1986年和1987年，为了应付日元对美元比价升值带来的不利局面，尼桑汽车制造商做到了每隼使其生产力提高10%，这就使其车辆的价格按同样比率下降了。我们知道，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生产力却削弱了。以至，麻省理工学院(MIT)院长保罗·戈林竟然在1990年10月的《扩展》杂志上指出：“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振兴我们的竞争力，而是如何防止它进一步下滑。”

其次，强势企业鼓励企业在高精尖产品上实现专业化，高精尖产品的差别已经不在价格上，而是看质量、创新和售后服务了。这些东西需要不断进行科研，科研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德国机床就是很好的例证。德国机床价格是贵点，但它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在汽车工业中也是如此，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专门生产豪华汽车，进展非常顺利。(自1989年以来，德国人出售给日本人的汽车总值高于日本汽车在德国出售的总值。这个业绩不可忽视!)

有两个国家、1940年以前还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国家，今天则成了质量的双冠军，这就是德国和日本，这难道不令人拍手叫绝吗？过去是好战成性的日尔曼—日本，现在转化为通过货币纪律实现了征服工业的壮举，这难道不是日尔曼—日本模式的新标志吗？

总而言之，强势货币是披荆斩棘开出的道路，要求竭尽全



啊，又是灭顶之灾！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第31卷第90页，1990年7月27日。

力、坚持不懈和有想象力，对经济来讲，是一个出类拔萃而又不削弱自己的最好办法。因此，强势货币的良性循环是要付出代价的。

今天写出这个结论，似乎平淡无奇了。没关系，但不要因此忘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许多经济思想认为——法国尤其如此，为了发展经济，把法国法郎变成弱势货币、每年贬值一次更为有效。直到1975年，他们主张的凯恩斯主义才奇怪地转向了愚蠢的严厉政策，而德国人中的笨蛋由于执行了这种严厉政策，未能利用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来加速经济增长。

在雷蒙·巴尔政府中，我曾为不被人们了解的、或被扭曲的强势货币事业奋战了5年。这项事业1983年以后仅取得了生利，

并陆续得到雅克·德洛尔、爱德华·巴拉迪尔，特别是皮埃尔·贝雷戈瓦诸位财政部长的支持。这肯定是莱茵模式献给法国的最美的礼物。

这种实力的真正武器

近几年来，莱茵模式的经济业绩甚至成了我国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对这种成功一再庆贺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经济遇到的困难形成苦涩的对比，后者被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绑住了手脚。一个问题理所当然地不断出现在报刊上：他们怎么做的？这种实力的真正武器是什么？在这本书中，我要尝试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但这里要补充一点，莱茵经济的实力首先来自无以伦比的工业能力和坚持不懈的贸易攻击力。

莱茵国家的工业是世界最好的工业，这是事实。工业占有很大比重。在德国、日本、或瑞典，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高于经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在前三个国家中，这一比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力的**30%**，在经合组织其他国家中，不到**25%**。在美国，这一比重低于**20%**。不仅是数量，还有质量，大家都这么说。莱茵模式国家在多数工业部门中都占主导地位：它们在传统工业部门中牢固地扎了根，并格外努力发展未来产业。在世界前**10**名的冶金、汽车、化工、纺织、造船、电力和农业—食品工业企业中，莱茵公司都占很大比重，即都是日本公司、德国公司、荷兰公司或瑞士公司（如丰田、尼桑、奔驰、三菱、拜耳、赫司特、巴斯夫、雀巢、霍夫曼—拉霍克、西门子、马自达，等等）。

当然，在新兴部门中，它们的地位较弱，美国人仍占主导地位。但，还能维持多久呢？在宇航业、信息业、电子业、光学业中，日本工业或德国工业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例如，**30**年

来信息业一直是美国独占的真正属地（世界前10名企业中美国占6个），日本公司打进来已令华盛顿感到不安。日本人实际上已经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外部设备（显示器、磁盘、打印机），几乎垄断了储存器和零部件。至少，电脑还是美国货，但内部装置是日本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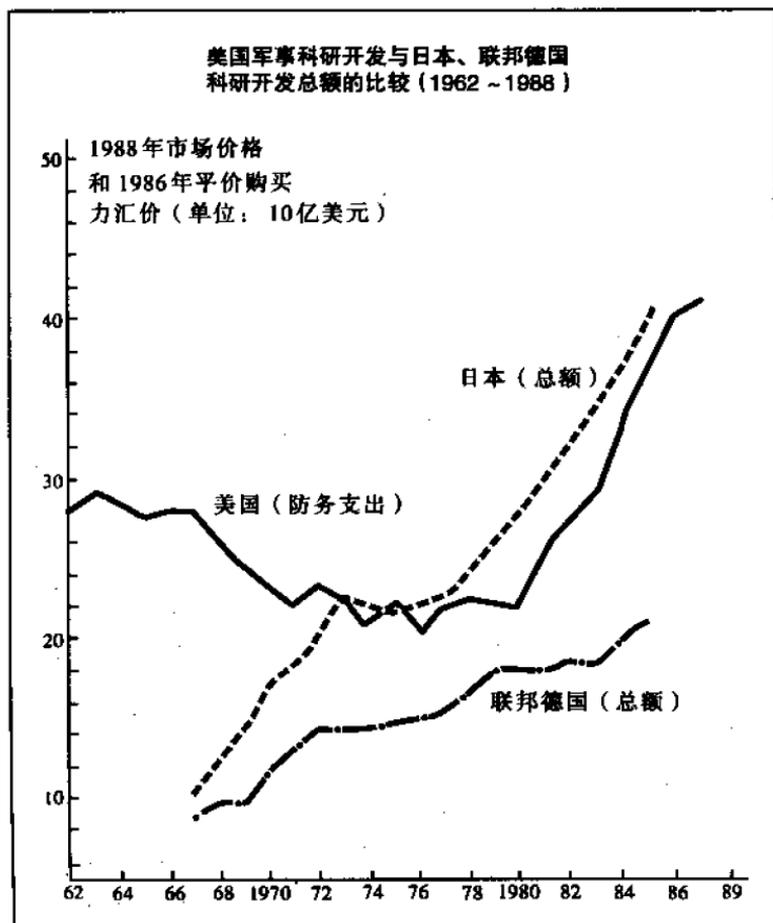
莱茵模式工业的特殊活力来自3个基本因素。

1. 特别重视生产。德国人、日本人、瑞士人或瑞典人经常注意改善其产品的质量，注意通过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这就需要在机器和设备方面不断投资。上述4个国家的投资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属于最高的行列（大家知道，日本经济比美国小一半，但自1989年以后，日本人的投资却超过了美国人）。这种生产政策和经营政策的基础是建立在非常现代的管理方式之上的。目前雪铁龙汽车厂生产XM型汽车，雷诺汽车厂生产R19型汽车，采用的著名“质量周期”和“零库存”方式就是来自日本。但这些方式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要求最低限度的共同决定形成为规则和倾听所有生产人员的意见，并且达成一致。

2. 这些方式同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描绘的滑稽的泰勒制彻底决裂了，在泰勒制中，每个工人不过是机械地重复一些动作，我们已经说过，莱茵模式则需要专门的培训（参见第五章）。在莱茵国家中，把学徒和终身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职业教育体系所需经费比其他国家多一倍。这种努力是有效的，在德国和日本，从来不缺乏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培训是莱茵国家工业活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3. 企业赞同进行这样的科研—开发（R&D）努力。这也是大西洋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反差之一。在莱茵模式中，科研—开发投资额是巨大的，德国、日本、瑞典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且，首先投向民用研究和转向所有工业部门

中都可以使用的基础工艺。在美国，则相反，科研—开发投资占国内总产值的 2.7%，但其中三分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以上用于军火工业。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基金与经合组织。

应该指出，在莱茵国家中，公共权力机构在这方面采取了多种行动：为科研提供援助、实施民用技术开发计划需要巨额费用。著名的日本通产省计划便提出了**10**个优先项目，动员私有企业参加这些项目。最著名的项目之一就是**20**年前提出的机器人项目。今天，日本依靠这个项目已经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世界头领，它生产的机器人比经合组织中其他伙伴生产的总数还要多。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莱茵国家于是拥有了最强的工业。这种生产能力还得到非常有效的贸易“攻击力量”的有力配合。在这些条件下，莱茵国家成为出回冠军也就不足为奇了。德国早就成了冠军的冠军。日本也不甘落后。例如，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出口能力，可以发现，出口额在德国主要工业（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电子工业等）中所占比重接近**45%**。在美国，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超过**13%**，美国工业陷于麻省理工学院报告中所说的“乡土观念”。

于是，在近乎所有世界市场中，人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美国人和若干法国人或英国人的身旁，至少有一个或几个德国人、日本人和瑞士人为他们服务。

经济文化与经济的文化

找个固定用语倒容易，可以信手拈来。“经济的文化”，这个概念是不是有点像莫里哀剧本中的医生乱开的药方那样。语义混乱和同语重复呢？这倒不一定。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个人行为的总体，这种个人行为的基础是所有人承认的体制、规则以及共同的遗产，就只能称其为“文化”。这是一个莱茵模式的纯经济文化，我们可以列举出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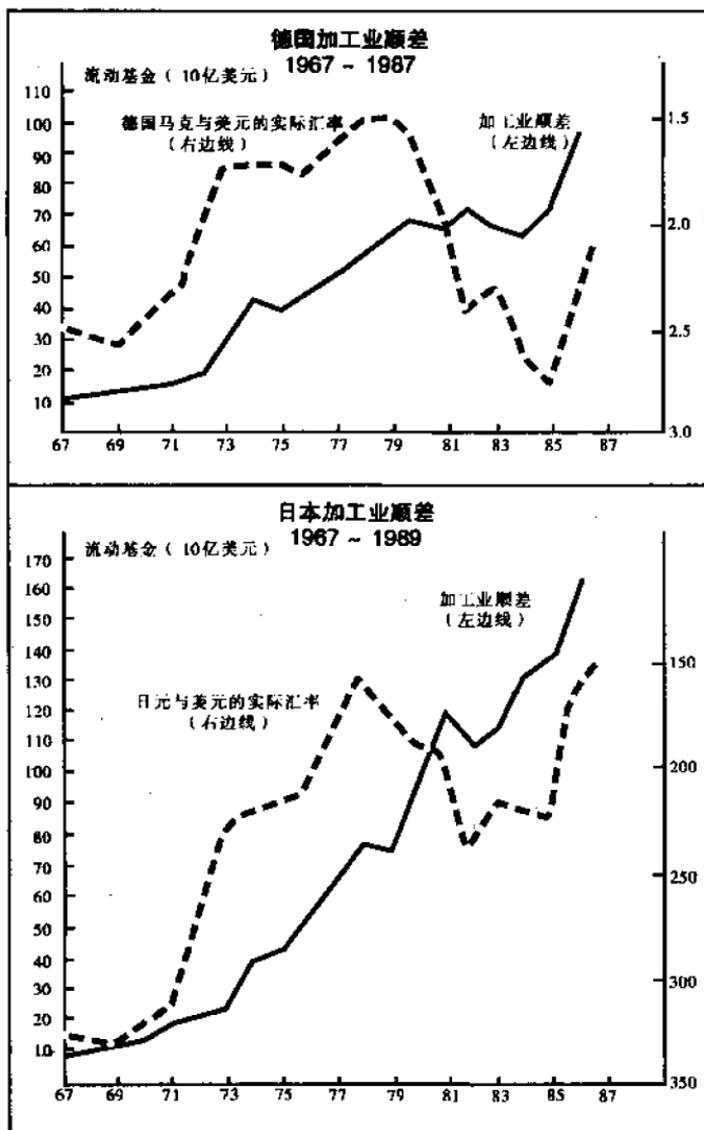
喜好家庭储蓄是其特征之一。日本、德国或瑞士^①的高储蓄率与它们的经合组织伙伴大不相同。从为经济提供资金来讲，这种家庭储蓄是不可或缺的，在不少国家中，出口逆差就反映了它们的家庭储蓄不足。当一个国家本身缺钱时，它就必须到外面去寻找。美国就是这么做的，美国家庭是发达世界只顾眼前享乐的“蝉”，他们买什么都靠揭贴，有时负债过重，不得不用收入的25%来偿还利息。缺乏储蓄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反之，德国人和日本人拥有极丰富的储蓄，足够为本国投资和向国外发放优惠贷款提供资金。它们的巨额外贸赢余也来源于此。

自由派的思想大师们一贯认为，增长速度与储蓄能力连接在一起。利率变化取决于这种储蓄能力，而这种储蓄能力本身又与文化因素、与随着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的集体情感联系在一起。1930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舍（Irving Fisher）曾经列举过这些因素之一，他说：“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储蓄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己孩子的疼爱和企望本人生活舒适。每当这种情感削弱时，例如罗马帝国结束时，浮躁心理和利率就会上升。口号也会变成：‘我们身后就是洪荒时代了，’人们开始挥霍无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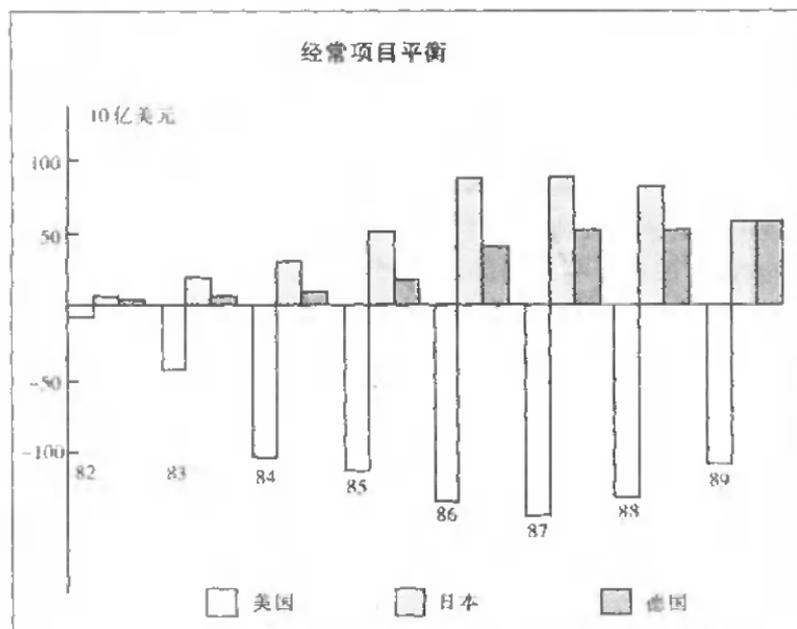
无需从“舐犊之情”中得出过于草率的结论，我们看到，1980~1990年间，在莱茵国家和美国，国民储蓄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莱茵国家中，储蓄率增长了，日本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提高到35%，德国从22%提高到26%；美国则减少了，在同一时期，从19%降到13%（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应当指出，随后就是蝉的资本主义与蚁的资本主义的对立，前者过一天算一天，后者今天要为明天做准备。这可能触到了本

意大利也是如此，但意大利的储蓄主要是用来弥补巨额预算赤字。



资料来源：国际经济景气研究与信息中心 (CEPII) 与经合组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公报》，第41页，1989年。

世纪末最根本的两难问题和当代文明的伦理道德。

人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些莱茵国家中，所有的人认识到了经济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广泛的民间动员的气氛，对其作用不可小视。当日本人到外国旅游时，他们本能地窥测可能对他们的企业有用的任何材料，我们往往嘲笑这种行为。人们把这种做法看做一种“软性”的工业间谍。应该把这种做法看做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一种企业犬儒主义。正是德国人，他们也不是没有这种精神。这种公众对国民经济的关注思想，是通过某些机制的教育、传播和协调而形成的。例如，在德国，银行定期向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系统的经济分析。在日本，通产省和国会，全世界搜集一切对企业可能有用的各种信息。各个企业通常都对“外界”发生



资料来源：德意志银行，《新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130幅插图，第123页，戈雷纳出版社，1974。

的情况进行持续的系统的分析，尤其是研究竞争问题的研究机构。如果不用“经济与文化”这个概念，还能用什么词句来形容这种随时保持警惕的好奇心和对外界开放的情况呢？

毫无疑问，这种得到公认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国家采取什么方式走出了人所共知的以选举和政变为目标的经济。不规则的政变周期需要在大选前夕追加开支，选举过后立即更加严厉地削减这些开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银行对政府享有几乎完全的独立地位。由于有了这种独立性，它们就可以不管风吹浪打，保障其货币的良好地位，这是联邦银行本身必须遵守的基本宪章，也是央行领导人必须履行的义务。这同法国传统上由财政部来监管法兰西银行的做法相去甚远。德国5个最大的经济预测研究机构也享有同样的独立地位，它们的统计资料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社会伙伴，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参考价值。

这种共同的“文化”同样可以说明，公共权力机构为什么制定政策时必须经常考虑要加强其经济地位。这种世界闻名的“日本株式会社”把日本变成了一个投身于争夺世界市场的巨

无霸企业。

就是这种“文化”肯定了企业在莱茵模式中享有的特殊——甚至特权——地位。从来没有人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单纯的共同利益的暂时汇合，抑或是一个简单的“现金流动机器”。恰恰相反，人们把这种文化看做是一种机制，一种应该保护的社团。反过来，它也有保护其成员的职责。

第七章 莱茵模式的社会优越性

首先要指出，这个概念有点含混不清。我们不能像谈论“经济优越性”那种方式来谈论“社会优越性”。原因很简单：这一回，大多数标准不能量化了。一种经济模式的社会完善程度不能用——或不能仅仅用——曲线、统计数字、指数和百分比来估计了。要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社会优越性进行任何判断，必须进行艰苦的主观概括分析。有关的社会类型、居民接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或家庭组织）本身，这一切经济学家们熟知的各种扭曲现象都可能出现。我们就从这一点谈起吧，但要小心谨慎……

尽管如此，怎样才能确定几个有意义的比较标准呢？我提出简单而明确的3条标准：

1. 每种模式为其公民提供的安全保障程度。公民享有疾病、失业、家庭失衡等巨大风险保障的方式；
2. 社会不平等是否缩小了和采取什么方式纠正最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向最贫困的人提供的援助数量和援助方式；
3. 是否为每个人攀登到不同社会—经济等级打开了大门，或提供了较大的选择权利。

问题已经很清楚：莱茵模式在头两个领域中非常明显地超过新美国模式。我讲的可是新美国模式，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英国在社会领域里确实与美国有所不同。而且，仅仅说有所不同还不够，英国长久以来就有一个大西洋彼岸并不存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方面，英国与美国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这几点以外，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比较还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比较表明，莱茵模式的社会优越性并不像有人想当然的那样，必然伴随着经济竞争力的受损。诚然，社会公正需要一定的代价，需要由公共资源提供资金。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只能通过损害经济才能实现这些社会支出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将看到，竞争力与团结互助是并行不悖的。

健康是无价的

行两个故事不言自明。第一个故事是《新观察家》杂志记者让·达尼埃尔·杜伯瓦报道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星期日，在迈阿密（佛罗里达州）的达达医疗中心。一个人病了3天，相当严重，难受、发烧。因为是星期日，所有诊所都休息，他来到位于勒热内大街的医院。他找到急诊室，接待员问了他的姓名，叫他预交200美元，并对他说：“这是押金，如果医生没有留你住院，我们只要挂号费，余下的退给你。”病人解释说，他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钱。她的回答是深表遗憾，只好请他到别处去看病。

第二个故事。在东海岸的一个小城里，一个地方企业的雇员患了牙痛病，考虑要不要去看牙科医生。如果去，他就必须请人把他的病牙拔掉。为什么？难道美国牙医没有能力尽量给他做点更细致的治疗吗？当然不是。但我们这位先生没有加入个人保险，时他的收入来讲，补一个牙比拔牙贵得太多了。于是，他别无选择，或者丢个牙，或者忍受牙痛之苦。

这两个例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是属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参见第二章）美国社会的“进退两难”之列。但这两个例子也表明，美国确实缺乏一种普遍性社会保障制度。按比例讲，美国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比西方大国少一半。在大西洋彼岸，没有强

制医疗保险。每个美国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加入一项私人医疗保险。一般估计，没有享受任何一项这类保险的居民，约有**3500**万人。

失业补贴实际上并不存在，至少从全国来讲是如此，而中小企业的解雇提前通知平均只有两天。家庭补贴也没有。唯一有点规模的社会计划是**60**年代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实施的计划，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计划（**MEDICARE**）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那些人的医疗计划（**MEDICAID**）。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被排斥在这种保险之外。

可见，新美国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存在不足和空白。此外，这种社会保障制度还受到两大缺陷的严重困扰：

1. 美国人的程序狂严重打击了医疗保险（参见第二章）。每大报刊上都连篇累牍地报导医生、麻醉师或牙医受到重罚的消息，病人急于请律师——“拿红包的猎手”——来控告他们。在美国，人们在看医生和到医院去之前要先问问自己的律师，这已成为家常便饭。反过来，人们在医疗机构中碰到的第一个人则往往也是医生的律师和医院的律师。于是，小小的医疗措施都带有法律游击战的味道，其结果不会令人高兴。实际上，医生和诊所不得不投保（当需要寻找保险公司来接受他们投保的时候），以便应付他们的病人可能提出的诉讼，为此要向他们的律师支付大量经费。所有这些费用理所当然要列入医疗价格，医疗费用自然变得十分昂贵。

2. 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这种私人社会保险体系并不比欧洲由集体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省钱。美国恰恰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出乎寻常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在实行普遍的免费社会保障制度的英国，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却最少，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还不到**7%**。

莱茵保护伞

社会保障在德国是由俾斯麦建立的。罗尔·贝夫里奇及其主要追随者把著名的国家医疗体系（NHS）引入了英国。1946年在法国实施了一条类似的普遍性社会保险原则，目前，法国99.9%的劳动人口由医疗保险体系承担。同样，在瑞典、德国、瑞士或日本等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口没有享受社会保险。

德国人非常广泛地受到主要风险（疾病、工伤、失业）的保护，享有非常优惠的基本退休金制度。社会民主党的摇篮——瑞典情况也一样，其公民像德国人一样受到很好的保护，失业者得到包括培训和再就业计划在内的有效制度援助。日本的疾病保险在世界上属于最宽容的保险制度之一，医疗全部免费，而且普及到所有人。

1985年以前，德国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长速度一直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医疗保险体制的平衡受到威胁。造成失控的因素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包括人口老化，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非常昂贵的新设备（断层扫描仪、超声回波录像仪、碎石器……），由于免费医疗，治疗费用和药品消费需求的总体增长自然带动了后两个项目消费的增长。尽管如此，任何一个莱茵国家都不让医疗费用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且，自1985年以来，德国成功地控制了医疗费用增长。

在这个如此根本的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控制问题上，必须注意上面提过的3个数字：英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德国占9%；美国占11%。要看到这些数字反映出来的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实际上，在这3个国家中，健康情况最糟的国家也就是医疗费用支出最多的国家，那就是美国。其实，美国应该是医疗质量相同、花费最少的国家，因为它的医疗制度基本上是私人的，

由类似卫生管理组织的监督体系 (HMO) 运用非常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有效的协调。诚然, 在英国, 住院往往要排队等待; 诚然, 德国的医疗基金制使病人没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利。但这只影响如下事实: 在医疗保险方面, 靠建立在医生个人金钱利益之上的市场体系并不总是最有效的,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的结论是, 医疗肯定不是一个可以不加区别地听任市场规律支配的一个领域。

不管怎么说, 显而易见, 总体上讲, 莱茵模式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社会公正、集体负担费用和管理效率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殊能力是建立在与美国不同的一整套价值观和优先标准之上的。例如, 集体负责观念便深深植根于公众的思想之中, 并得到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认可。其必然结果, 是一种往往比人们的料想更好的自律。当然, 到处存在各种疏漏、滥用品、假失业和医药“超消费”倾向。但是, 总的讲, 每个人都意识到将出现过分向社会保障制度索取的危险。例如, 在日本, 人口老龄化已经到令人担心的程度, 他们已经提出了一项推迟退休年龄的计划。在瑞士, 出于同样原因, 经过公民投票表决 (以 64% 的多数通过), 公民已同意放弃把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前到……62 岁的要求。

除了集体负责制, 还有一种不必公共权力机构费劲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纪律。在德国, 政府可以要求社会伙伴 (工会、资方、医生、投保人、医疗基金组织等) 自动同意限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在瑞典, 不存在由失业基金负担的失业者拒绝接受就业建议的问题。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 在瑞士, 向需求者提供公共援助不是一种义务, 而是一种贷款。享受了这种援助的人一旦景况有所好转, 还要偿还。

现在我们来逐个看一看上述各点, 探讨一下法国在这方面能不能列入莱茵国家的行列。遗憾的是,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

的。在疾病保险方面，我们的保险制度属于最脆弱的制度之一，因为大家几乎都可以自由地使用社会保险卡支付医疗费用，但是，没有谁觉得确实已经付了款：我随便决定到我的医生那里看几次病，得到几次治疗；医生随便决定开多少处方；几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在其他所有国家就不存在这种状况。时间越久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短期来看很有吸引力，但长期来看会有一些负作用的。

美国人的错位

在美国，也是如此，政府竭力限制医疗费用的增长，但多数情况是白费力气。一个失败的例证是，为了改进管理和限制由联邦政府计划报销的医疗费用，在医院里进行了改革。1984年，国会试图限制由养老医疗保险局（MEDICARE）负担的医疗费用支出增长，为此，决定改变医院报销制度，原来的报销制度是以病人看病的次数为基点计算的。跟法国一样，把每次医疗行为分解为不同次数（手术、麻醉、治疗、生物化验，等等），分别定价，成为到保险公司和养老医疗保险局报销时计算的基础。这种计算方法非常仔细，但特别复杂，容易弄虚作假。为了多报销一些，利用这个方法，同一个病人身上实际上可以报销好几次（例如X光透视检查）。由于可以多报次数，付款人就无法区别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没有必要的。除此以外，新技术的定价也未必恰当，因此，付给某些医生的费用可能过多了。例如，半月板手术的价格过去一直是以2小时的手术为基础来计算的，而如果用内窥镜检查技术，10分钟就可以完成这种手术。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国会制定了一个不再根据医疗次数，而是按病理性质来报销的付款制度。现在，每个病人都按照标准价格报销：一次阑尾炎手术1000美元，血友病治疗10万美元，等

等。现在是医院要适应这些价格了。如果因医院管理不好而导致费用增高，那是该医院倒霉。反过来，如果医院的成本费用较低，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当然，这种制度的基础是，必须经过统计证明，95%的疾病可以按465种准确的病理来分组，再按照平均价格为其确定价格。这种办法看起来是比较简单、明了和便于监督了。按照治疗的总费用来计算报销额，似乎是一个鼓励良好管理的顺理成章的办法。

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真正的共同负责制，这种新制度也难以实施。某些管理不善的医院立即就碰到严重的财政困难。其中不少医院便尝试在容易得到报销最多的疾病和它们最有竞争力的疾病方面进行投机。其他医院——幸亏更为少见——尽力检查陷于“危急”的病人，以便把他们排除在外。既然这种环境可以使短期利润合法化，为什么不从医疗保险报销中提取最大的利润呢？在金钱至上的国度里，这是合乎事物的逻辑的。因此，一种看似协调的改革便被扭曲了。结果是：在美国，尽管开始时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效果，住院费用的增长速度却没有降下来。

改革方案很漂亮，但结果等于零。为什么？正如法国人那样，如果他们事先了解到外国是怎么做的，他们绝对不会建立现在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这项改革的制定者无疑也忘记了应该研究一下莱茵国家是怎么做的。美国确实存在某种“孤芳自赏”。对那里的某些人来说，让他们设想一下还有比市场经济，特别是比美国以外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经济，简直是难上加难。

平等的逻辑

我们看到了，莱茵国家相对较为平等，收入差别明显地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小。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莱茵国家的中产阶级认统计数字上现在已经比美国多了，尽管美国号称是中产阶级

的国家。如果把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人总体上定义为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在美国占**50%**，而在德国则占**75%**，在瑞典或瑞士更占**80%**。在日本，根据近**30**年来的调查，有**89%**的日本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样说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也可以说明问题。

莱茵国家对不平等有一定的限制，这就需要它们在反对社会排斥和反对贫困的斗争中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组织得更好、更有效。例如，在瑞典，居民对本世纪初可怕的贫困记忆犹新。在瑞典语中，有一个词“**trygghet**”，其含义是“安全”，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安全始终是全国的迫切需要。社会援助和反对失业（社会排斥的首要形式）的斗争在瑞典开展得特别深入。充分就业是公共权力机构保证必须完成的国家目标。这项任务由国家就业局（**Arbetsmarknadsstyrelsen**）负责，为此，它掌握着一笔巨额财政预算。

在美国，不存在所谓“反贫困斗争”的真正的全国性机构，而是由市镇政府或州政府负责这项任务。但由于用在这方面的公共经费来源太少，它们的意义往往十分有限。私人慈善机构十分强大，实力雄厚，但无论它们多么积极、诚肯和乐善好施，光靠私人慈善机构无法弥补这种社会缺陷。求助于个人和私人慈善观念而不是靠由国家保障的社会权利观念，这正是里根要恢复的纯洁而又强硬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不平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对激烈竞争的一种刺激，集体最终会从中受益。**80**年代初里根入主白宫以后，美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无数次争论。里根讲话的要旨（概括起来）是：贫困不是政治问题，与国家无关；这是伦理问题和慈善事业。

撒切尔夫人的意识形态和用词也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应该称其为“里根—撒切尔模式”，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政策的应景变化。这表明，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这种伦理是由那些发了财

的慈善家制造出来并且为他们服务的。要衡量一下出现的这种变化，只要回忆一下就足够了，1975年以前，美国争论最多的有关社会进步的提议之一是“负所得税”——即保障最低所得。今天，正当法国刚刚建立跨行业医疗保险制（融入社会最低收入线）的时候，这种思想有点莫名其妙，甚至社会进步这种说法本身似乎也表现出在社会与进步这两个词语之间存在矛盾了。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之流的供应学派理论家们从哲学上把不平等合法化了，他们实际上也就同非常陈腐的自由派思想家同流合污了。早在19世纪中叶，杜诺维尔（Dunover）就曾说过，“贫困的地狱”对于总体协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强迫人们“品行端正”和艰苦工作。吉尔德这样写的时候无非是要说明这个意思：“向富人强求越多，就会削弱投资；与此同时，给穷人越多，就会降低对劳动的刺激。这样一些措施只能降低生产率。”^①

这是为社会计划中实行的各种分割进行辩解。这种分割说明，为什么今天又出现了穷人的大“乞食袋”（参见本书第二章）。这也是在为减少对工资收入者的保护、重振企业活力的各种放弃管制的措施进行辩解。为了让人们对改善就业放心，欧洲共同体项目负责人里加尔多·贝特雷拉（Riccardo Petrella）这样评论说：“对工资收入者得到的社会好处提出质疑是合法的，由于本国企业有了较好的竞争力，这就有助于就业的总体改善。”^②

在联邦德国，对待贫困的集体态度是根本不同的。换个调皮的说法，可以说关于社会援助问题的联邦法律几乎禁止提贫困一词。按照这项法律中的提法，集体必须保障向没有相应手段的人提供住房、饮食、医疗和基本消费需要。这类项目的社会援助支

① 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穷》法译本，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1981。

② 参见《外交世界》月刊，1991年1月号。

出达到 280 亿德国马克。此外，还规定了最低收入标准：大约每月 1200 马克。《世界报》驻波恩记者吕克·罗森斯威克在谈到德国的贫困时指出：“目前，有 330 万人，即相当于全国人口 5% 的人从社会援助局领取补贴。然而，根据统计数字确定的这种贫困现象在这个国家中似乎看不出来，人们一眼看到的，不如说是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舒适之中。在德国大城市的街道上，乞丐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现象，只有柏林或汉堡的几个‘蓬客’除外，他们‘赤身裸体’，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在锻炼。”^①

但也要指出，这家报纸强调指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矛盾现象，由于离婚和未婚生育的增加，今天德国的贫困已经变成了女性的贫困，于是，有 65% 抚养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的收入接近贫困线。

在瑞典，工资政策被称作“团结互助”政策。工资政策有双重目标，既要保障某种社会平等，也要限制不同工作部门之间的差距过大

如前所述，由于存在一个保证良好再分配的税收制度，莱茵模式这种不平等较少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举一个指标就够了，它带有指数价值：累进税的最高税率，法国是（57%）、瑞典是（甚至达到 72%）、德国和日本累进税的最高税率（超过 55%），都比英国（40%）或美国（33%）高出许多。更不用说在莱茵国家中（包括瑞士）还要征资本税了。

我先就此打住，因为我发现刚才有一个特别的失礼之处，我是不是让人误解，以为最高起征税率 55% 比最高起征税率 33% 强呀？这是强迫别人接受的一种莱茵老调！

莱茵国家中的不平等不仅差别较小，而且也容易被人接受，因为这种个平等是建立在工资收入者完全接受的标准——即工龄

^① 法国《世界报》、1990年8月7日

和技能——之上的。在日本银行中，一个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尽管在他的部门里只有他一个人会说英语，也要等 15 年才能当上课长，而要当部门经理，还要再等 5 年。在德国或瑞士企业里，资历等级制相当严格地决定了岗位和收入等级。这种收入的相对不平等是合法的，因而得到了很高程度的共识。

梦想的召唤和历史的重任

从某个角度讲，莱茵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加严厉。社会流动性没有那么快，个人成功也没有那么明显。这是一种不足还是一种长处？

美国过去始终是，现在依然是令人神往的社会。来自全世界的移民正是因为对它有幻想（和以带罪之身）来到美国，他们首先在埃利斯岛——这个美洲的埃尔多拉多登陆。对一种新生活的幻想、对自由和财富的幻想、对成功的强烈渴望，这些都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今日美国人，每个人的前辈中都有一位来自爱尔兰、波兰或意大利，他们曾饱经苦难、贫困和劳役。就像常话所说，他们是“死里逃生闯过来的”。

美国不止是梦想的社会，它也是人们自我塑造的社会。从理论上讲，有志者事竟成。就像拿破仑的士兵在他们的皮挎包上都别着元帅手杖一样，每个美国人都可以企望走过一段路后就可以找到他的第一批“百万美元”。有朝一日，甚至可以入主白宫……换句话说，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不仅比其他国家强得多，而且具有一种为神话奠基的性质。

美国社会是由前仆后继的移民构成的，基本上是民主的。欧洲的或日本的贵族价值观念不曾存在（或很少）。而且也没有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世代之间相对固定的社会分层。当然，白种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曾成为某种“种族”的贵族，他

们曾享有某些特权。但是，即使他们的这些特权也逐步消失了，其他类型的移民（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讲西班牙语的人）已经逐步赶上了他们，或者正在追上他们。

当然，“大熔炉”的原则虽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也有它的局限性，而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运行了（参见第二章）。当然，美国社会的吸纳能力和同化能力仍然大大高于莱茵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的能力。

美国特有的这种暴富的可能推动了社会流动性。从这个角度讲，金钱为王是一种优势。作为价值本位，金钱为王是一个粗暴的社会标准，但也简单明了而且有效率。卖汉堡包的小伙计可能变成另一位洛克菲勒……80年代靠投机积聚的巨额财富，往往是同这种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相一致的！

德国和日本的移民政策，尽管那里的人口增长在减弱，却遭到失败。在联邦德国，外国人占了全国人口的7.6%（约460万人），但并未被同化。用词本身也很说明问题，移民劳动者被称作Gastarbeiter，其含义是“被邀请来的劳动者”。但少数土耳其人（150万人）带来的尖锐问题则始终未能解决。至少，通婚现象——同化的标准之一——在德国极为罕见。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埃玛奴埃尔·多德（Emmanuel Todd）强调指出，德国社会对任何同化意识都有一种特殊的反感。他认为：“这一整套司法和社会机制导致在德国领土上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秩序，类似法国旧制度秩序的现代翻版。（……）德国的国籍法和习俗并没有改变，它却恢复了传统的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艰难地实现了的德国社会均质化和阶级混合，坚持了不过几十年。”^①

需要补充指出，在德国的极右派中，排外情绪正在加剧，而

^① 埃玛奴努尔·多德：《欧洲的发明》，瑟伊出版社，1990。

从东欧（特别是波兰）大量涌入的难民更激化了这种紧张局势。

在日本，从亚洲邻国（韩国、菲律宾、中国）来的移民不多。在瑞士，尽管在650万人口中移民就占150万，但对移民活动始终控制非常严格。瑞士严格限制外籍移民定居，毫不犹疑地把他们送回国，但又大量雇用边境打工者。即使在瑞典，尽管那里的移民为数很少，也未能解决移民带来的问题。

英国处于中间状况。英国在国籍问题上非常开放，由于奉行个人主义，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通婚，有大量属于英国籍，但来自非洲、安的列斯群岛、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居民在英国领土上定居。与德国不同，英国愿意让他们加入英国国籍。但是，埃玛奴埃尔多德接着指出：“在英国似乎可以看到比法国建立了更多的种族聚居区，安的列斯人、穆斯林或印度人……的社区自我封闭。英国人的做法似乎与德国式的隔离方式别无二致。”

总而言之，在莱茵国家里，个人大发其财可没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容易。而且，股市提供的机会较少，不动产投机也受到限制，但日本除外。莱茵模式国家的社会流动性不大，得到的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变化较慢。社会不大会受到突变的打击和外界的影响。这是一种弱点，抑或一种力量？或换个说法，这是半封闭社会的稳定性，抑或是开放社会的不稳定性？由于人们在两种资本主义之战的两军对垒中站位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同。

围绕必要提取的战斗

如前所述，医疗费用支出在美国占国内总产值的11%，在英国占7%。但这两个数字是不可比的，实际上，美国的医疗费用支出基本是私人的，在英国则是公共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未能做到把医疗保险私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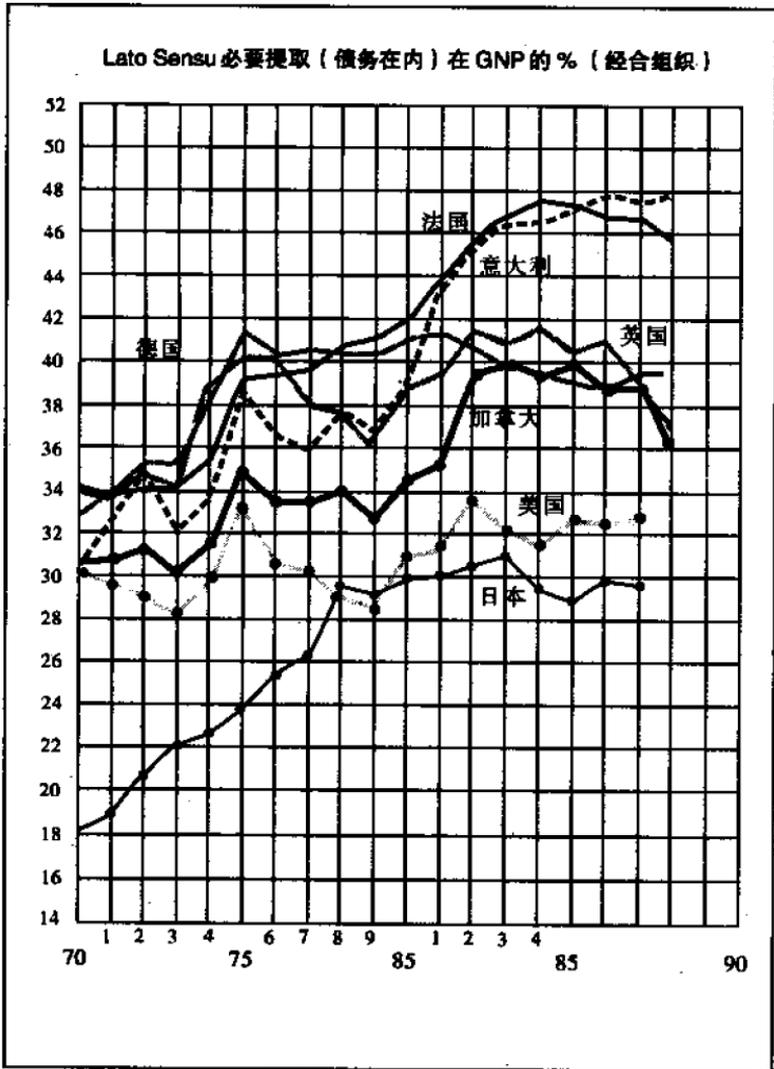
从整个经济角度看，医疗费用支出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制中无关大局，既然由消费者来支付费用，他们花钱购买健康，不如去旅游，或购置衣物或家具。与此相反，英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主要是公共的（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的医疗保险体制也是如此），必须由强制性必要提取来供给资金，这些社会提取是国家总支出的组成部分，会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

80年代以来，围绕必要提取进行的战斗就是根据这种分析展开的。现在，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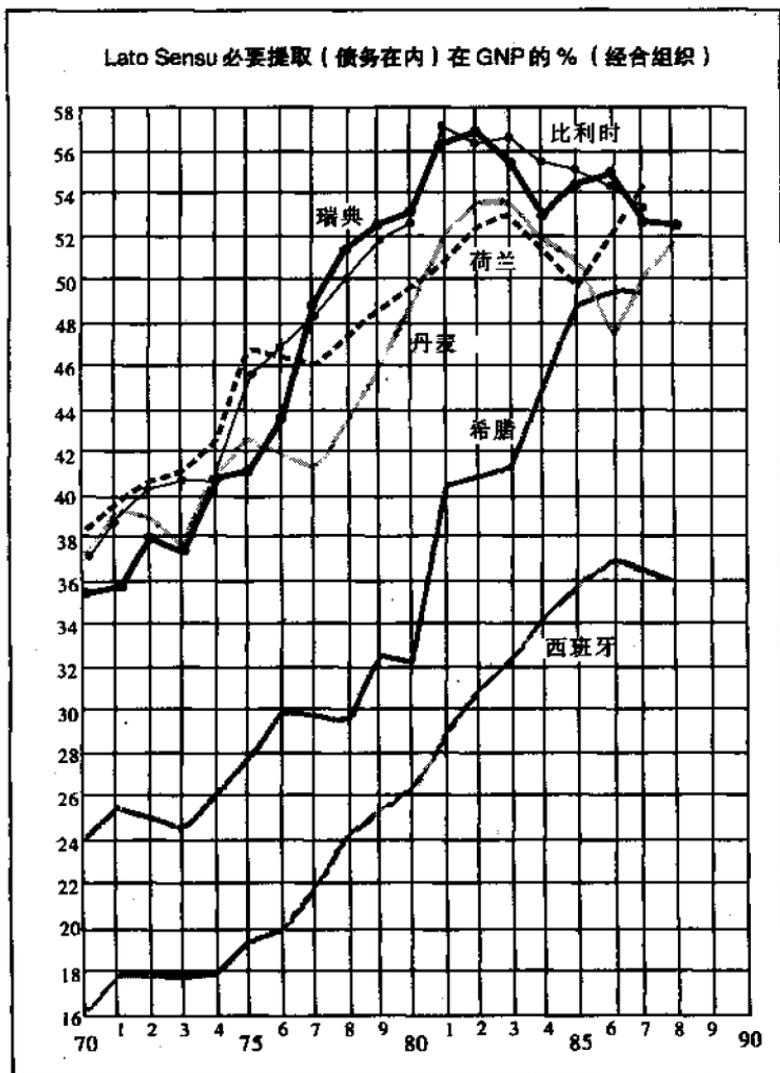
攻势是由里根—撒切尔发起的，必要社会提取被指责为万恶之源。他们指责社会必要提取惩罚了企业，挫伤了个人的努力，压抑了公司的竞争力和经济的竞争力。在欧洲悲观主义时期，欧洲共同体高于美国的必要提取被看做是难以承担的重负，欧洲被压得直不起腰来，无法在国际贸易的斗兽场上无情地进行势均力敌的争斗。目前，尽管必要提取没有明显地降低，欧洲乐观主义却又成为主要倾向。

对必要提取的指控是否有道理呢？莱茵国家的经济优越性加社会优越性不是表明问题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断言一个国家的社会提取越少其经济越繁荣吗？除了社会提取的水平以外，还必须着重考虑社会提取的结构。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大家知道，必要提取的内容包括为集体支出提供资金的税收、经费和社会保险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在欧洲建立起所谓的“福利国家”，社会必要提取增加的幅度就很大。由于要为日益增加的国家干预提供经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宽。由于增加太快和太多，以至像瓦格纳（Wagner）一类的经济学家预言，如果公共支出以这等速度增长下去，有朝一日公共收入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这就明显表明，公共行政机构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注定要无限地增长，直至增加100%。这是一种“匍匐而



资料来源: (EDEIS 报表) 第六期, 1990 年 6 月 15 日。



资料来源:《EDEIS 报表》第六期, 1990年6月15日。

进”的集体化……

为了反对可能滑向哈耶克所称的《奴役之路》，自由派经济学家从未停止指责。他们认为，过分的必要提取将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拉费尔（Laffer）著名的曲线便表明，税收收入超过一定的征税率就会呈递减之势。有人说：“征税过多就扼杀了税收。”其含义就是，如果横征暴敛，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纳税人都不再真正加油干活，因为挣得再多也将被征走。

80年代，立足于这种批评的一股思潮迅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受到这种思潮的启发，进行了不少税制改革。英国和美国强行削减了所得税和公司税的税率。法国也采取控制，并进而削减了本国的必要社会提取。在瑞典、德国和荷兰，自由党政府都投身于类似的改革。

这种反对必要提取的论点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它确实包含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对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欧洲国家。不错，瑞典和英国的必要提取太多了，以至给经济、更广泛来讲给社会带来了危险的负担。大家回想一下，某些曾经是最富活力或创造力的英国人或瑞典人，像英格拉玛尔·伯格曼（Ingmar Bergman）导演一样，宁愿移居国外。必要提取不仅仅是过多了，而且变成一种近乎粗暴的横征暴敛，使国家笼罩在一种沉闷的忐忑不安的气氛之下。不仅如此，税收机构本身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复杂的官僚化的机器，即费用昂贵而又缺乏效率的机器。“税收的重负”太明显了，纳税人的钱被部分地浪费掉了。

另一方面，正当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刻，负担过重显然会损害企业的竞争力。于是，有些纳税人移居国外，有些企业（纺织业，特别是电子业）只好把部分业务迁往国外，以便在国界以外寻找更好接受的税收环境和社会环境。

因此，这些批评虽有部分道理，但太过分了。80年代的信

条把一切经济困难都归咎于必要提取，几乎把必要提取妖魔化了。这些批评武断地针对必要提取的水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源于一种短视的分析。实际上，把必要提取和一种经济业绩武断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只要考虑一下几个数字就可以明白：在美国，必要提取占国内总产值的**30%**，而法国占**44%**，德国占**40%**，瑞典占**52%**。

日本属于例外，占**29%**，更接近美国，自由派引它为例，往往是弄错了。说他们弄错了至少有**3**条理由：**(1)** 如果按可比的人口结构比较，即老年人所占的比重相同的话，必要提取率应该达到**32%**；**(2)** 这个数字没有把大部分退休金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退休金不是由公共组织提供的，而是来自不计入必要提取账目的私人基金；**(3)** 而且，即使在日本，必要提取近**20**年来也不断增加。

法国变成了贪图眼前享受的蝉

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德国的经济成就是与社会必要提取率相适应的。与此相反，美国削减税率、压缩社会经费支出则既未能阻止经济衰退，也没有改善美国对日本的竞争力。从今以后，美国的任何人也不能指责工会、政府或“假失业者”为经济停滞负责了。昔日，美国的劳动者曾经是社会进步的先锋；现在，他们的待遇已不如大多数欧洲同行。如果说美国正在自行“第三世界化”，那么，就应该向超自由主义本身来算账。美国是一个对金钱毫不含糊的国家，甚至不如说是以金钱为荣的国家。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开始为它的竞争力……难为情了。同样，美国是一个粗暴的社会，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丝毫不感到难为情，恰恰是这一点开始让它付出昂贵的代价。

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二律背反现象呢？今天，有一点事实似

乎已经确定无疑：必要提取的总体水平与其结构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不能仅仅看支付多少，而且要看由谁支付和怎样支付？从这个角度观察，令人惊疑地发现，深刻的统一性使莱茵模式的欧洲国家互相接近，但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相互对立。

例如，在莱茵国家中，社会保险费用占必要提取的**35%**以上，而在美国只占**28%**。此外，莱茵国家里的社会保险负担在工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与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相比）约为**40%**，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25%**左右重得多了。因此，莱茵国家的工薪阶层直接得到的工资收入是比较少的。显而易见，这里存在着一个通过从总体工资中的必要提取，由集体来资助弱者的互助支柱、这难道不公平吗？

存在一种负担昂贵的发达社会体系，并不意味着注定要造成经济障碍。如果不愿含糊其词，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经济可以从中得到具体利益。公共收入可以为旨在改善经济效益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计划中当然包括职业培训，但也包括科研投资、改善大型基础设施等，德国就是如此。还有“看不见的”、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企业的大量公共支出（如公路、邮政、铁路、港口……），人们很少把这些计算在内。除非像美国那样，事与愿违，糟糕透顶的公共服务变成了祸害。

正因为如此，可以断定，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必将成为必要提取的战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不可避免要再次增加税收。

还有一个国家也将遇到激烈的争斗，但在另一条相反的战线上，这就是法国。法国在同类可比国家中是必要提取负担较重的一个（占**44.6%**，而德国和英国占**40%**）。不仅如此，如果说法国政府善于控制其财政预算的话，那么医疗保险、特别是必要退休金方面的社会经费支出却失去了控制。法国政府自幸已经完全偿还了外债和严格地限制了内债。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退休基

金储备，法国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以外）积累了近 10 兆法郎的债务，相当于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 20 万法郎。这涉及到对未来退休者的担保，本来应由必要保险费来支付的，这种必要保险费将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法国企业的竞争力。

但是，法国在这一点上构成了不同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中任何一种模式的独特情况。这两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忽视长期利益的新美国模式，都以各自的方式为劳动者建立了退休储备金。法国是一个有储蓄传统和预见性的古老国度，现在也开始发现它的所做所为像一些最没有远见的贪图眼前享受的蝉了。

推而广之，应该强调指出，从中期和长期来讲，我们所说的社会凝聚力及其均质性、和谐性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一个非物质因素，因而也是无法量化的因素。当缺少这个因素时必须重视它。用经济术语来讲，一个社会的僵硬、社会“网络”的断裂和笼罩这个社会的紧张气氛，都会构成一种“成本”，这就是支持“供应学派经济”的极端自由主义者视而不见的不平等的负面效应。在那些较为均质的社会里，居民受到的教育越多，得到的职业培训越好，也就越能适应世界变化和进步的要求。因此，在社会领域方面最协调的社会往往就是经济方面最完善的社会。

美国的保守派难以把这些看法纳入他们的思考范围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这些看法不可能同熊彼得众所周知的旧观点合拍。概言之，他认为这是影响汽车跑得更快的一些制动器。资本主义也是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公共权力在市民社会的促使下施加了限制，由于公共权力对市场运行的机械规律进行了某些调整，市场才变得较为完善。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能遇到两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随着我们的调查逐步深入而发现了好消息，即经济效益并非注定要伴随社会不公而来。认为今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将出现新的矛盾是错误的。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始

终存在着互相协调和配合的作用。我们在所有莱茵模式的国家中，都曾看到这种现象。

第二个悖论是，尽管这种事实不被承认，却不妨碍近几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正当新美国模式显现出效率不如莱茵模式的时候，新美国模式却至少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迫使莱茵模式退却了！

第八章 莱茵模式的衰退

既然莱茵模式的经济和社会优越性已经确定无疑，我们似乎可以期待它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了。莱茵国家成就辉煌，顺理成章应该能够抵御来自外界的影响——病毒了！根本不是这样，至少它们不应该对大西洋彼岸的警报过于敏感，也不应受到卡西诺经济华而不实的喧闹迷惑。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莱茵模式在政治、新闻媒体和文化上受到美国对手的强烈影响。而且，事实上莱茵模式不断在政治上退却。不仅仅是在那些犹疑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国家，而且在莱茵模式自己的国土上。

美国的诱惑力依然很大，以至体现着莱茵模式并享受其成就的国家也为其倾倒并成为其幻想破灭的牺牲品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发生了某些明显的经济、金融或社会演变——甚至蜕变呢？它们将动摇莱茵模式的根基。我仅举几个例子。

不平等的陷阱

我们多次指出，莱茵模式同它的大西洋彼岸的对手相比，是相对平等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凝聚力的所在，并且延续了受益大焉的社会共识。这种相对平等虽然依旧存在，但越来越被打开了缺口。出现了一种瞬间聚敛起来的、大肆炫耀的、畸形的新型财富。特别是在日本，这种现象标志着与历史的重大决裂。

确实，战后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大多数人受益匪浅。不错，原有的大部分财富已经被战争摧毁。在学习民主和效仿美国的庞大运动中，教育实现了民主化。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因而可以说，日本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复活。当然，某些人从经济重建中得到的好处比另一些人多，出现了新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既是匿名的、又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由于经济重建的艰巨性和建立财富时个人的（真正的和可能的）业绩，这种财富被某种程度地合法化了。直到80年代中期，这种财富都丝毫没有侵蚀日本人那种谨慎的简朴的共识。

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一个赤裸裸地追逐消费和奢侈的新贵阶级。主要是那些地产商，他们靠罕见的城市“不动产热”大发其财，还有靠股市填满腰包的承包商和投机商。专家估计，这两个市场——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产生了400兆日元（20兆法郎）的增值。这笔财源当然只对极少数人有利。

在东京、大坂及其他大城市里，地界较好的小地产商都有可能很快变成巨贾，以至日本社会从根本上被一分为二：有产者和其他人。而这些其他人却占了人口的70%，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一分地产，这可不是随便什么希望。为此而勒紧腰带储蓄，但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战后，拥有地产是从《美国的生活方式》中抄袭来的个人宏伟梦想之一，甚至把my home逐字照搬来，成了mai homu。这个梦想已经烟消云灭。这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现象，也是一个充满被剥夺意义的现象。

然而，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新财富并不像过去那样易于接受。因为它们几乎都是瞬间形成的。换言之，它们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在日本，如今一个地产商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数十亿日元，甚至不必出售其地产就可以增值。由于地价飞涨，他可以借低息贷款，从中进行金融投机，没有地产的人是禁止这样做的。因此，一般认为，日本最大的纳税人就是地产商，几年之内，他

们的股份便可以增加几十倍或几百倍。

这就和这个国家的传统背道而驰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始终是和劳动、业绩以及努力分不开的。因而，80年代的新贵是根本不能令人接受的。

由于这种荒诞的暴富同流行的新兴消费习惯汇合在一起，人们就更难接受这些新贵了。在日本也出现了奢华、摆阔、炫耀、拼命赶时髦等现象。在日本开设了联号的香水商、高档时装店、高级美酒进口商和珠宝商自然知道其中的某些奥妙。封建武士和神风飞机驾驶员的子孙变成了化妆品的男子自恋狂，他们每天要干的头件事就是在脸上涂抹美容霜。1987~1988年，钻石出售就增加了58%。豪华轿车（奔驰、宝时捷、美洲豹或法拉利）的销售量以每年100%的速度递增。这些新贵有时把拥有奔驰牌汽车的人干脆叫作“梅塞德斯 奔驰牌汽车族”。

就这样，日本社会也加入了消费竞赛，这种消费竞赛恶毒地打乱了日本社会的习俗，推翻了它的传统，否定了它的价值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这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日本电视上有一个“电视购物”节目，播出时间接近子夜时分，但仍然有大量观众。在这个节目中既可以购买售价达1000万法郎的都兰地区的古堡，也可以购买曾经属于肯特公爵夫人的劳斯莱斯牌老爷车，或60年代教皇坐过的小菲亚特车。今日的日本新贵相当于19世纪末发了财的英国资产阶级或50年代的美国发烧友，他们在蔚蓝海岸的赌场中一掷千金。日元的力量、金钱的诱惑和好出风头的愿望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态。

这种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再也不能被人接受了，相当一大部分日本人被排斥在外。据《朝日新闻》日报的问卷调查，有关“您的生活舒适吗？”的提问，62%的日本人回答是否定的。其中60%的人认为，不平等还会危险地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沉默的多数越来越不能接受以劳动、储蓄和忠于职守为标志的传统生活

方式了，这也是事实。

这种美国化现象主要涉及的是青年，对日本经济可能产生敏感的影响。追逐时髦和本能地首选外国奢华产品，损害了曾经是贸易顺差的最好保障的日本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现象也同样威胁着家庭的储蓄习惯，我们上面说过，家庭储蓄习惯是经济的力量源泉之一。而储蓄下降已经开始了：家庭储蓄在可支配毛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70年的34%下降到1989年的16%。相当多的日本人对储蓄，特别是住房储蓄失去了信心。由于日本人逐渐地发现了享乐主义和规模消费，对企业的忠心耿耿，对劳动的崇拜——尽管外界对此仍感到惊讶——也丧失殆尽了。在东京，已经出现有人嘲笑韩国人……的劳动热情的情况。受日本出口威胁的工业化国家看到日本社会的这些变化又生出了某种希望，从中看到了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显露出不可避免的衰弱征兆。

“共决制”面临威胁

著名的社会共决制在某些莱茵模式国家中也受到质疑。共决制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工会和社社力量强大以及企业管理模式。在瑞典，面对个人主义的高涨，集体感明显地削弱了。在那里，福利国家遭到反对，近几年来写了不少关于《瑞典模式的终结》一类的文章。不少经济学家，尤其是官方经济学家认为，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来说实在太昂贵了。必要提取的沉重负担经常迫使生气勃勃的人外流，促使瑞典企业到国外去投资。瑞典资本大量涌向国外，而且势头有增无减，从1982年的69亿法郎增加到1989年的516亿法郎。此外，税收也根本不能推动储蓄，家庭储蓄率变成了负增长。顺便指出，这对法国也是个前车之鉴：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必

要提取率、特别是它的社会保险费用在工资中的比重比邻国高得太多了，就有可能像瑞典一样大伤元气。

由于公民意识的衰落，工资收入者趋向于滥用社会保险制度的宽容大度。正如瑞典人自己说的，瑞典创造了两项记录：一是身体健康记录；二是病假记录。每人每年的病假达到**26**天。如果你知道不上班工资也全额照发，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监督检查，这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旷工也在企业中打破了记录，旷工率往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0%**。

总而言之，瑞典人开始靠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享受、而不顾他们的行为可能给这种制度的死活带来什么后果。一位瑞典经济学家开玩笑说：“强制保险制度运行得很好，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怎样利用这种制度。”

人们很快对这种偏差做出了反应。**M. 卡尔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1989**年**10**月**26**日宣布削减国家行政经费约**135**亿法郎（**150**亿瑞典克郎）；同时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措施：降低税率，减少对银行部门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减少对农业的补贴，等等。

不错，著名的“瑞典模式”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有些困难可以上溯到**70**年代初期。**1990**年**10**月**29**日的《金融时报》写道：“瑞典经济确实开始显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僵化征兆。它的增长速度，如果不算日本，曾经是**20**世纪末以来西方国家中最快的，现在开始放慢了。生产率的增长削弱了。支付平衡出现逆差……但更有甚者，由于劳动市场狭小，物价和工资的增长破坏了本国的竞争力。”

瑞典事例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里根—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革命的普遍价值。正如工党政府的英国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瑞典现在也懂得了，它朝互助方向走得太远了，始于宽厚大度，最终使人变得不負責任和懶惰，结果受到生活水平相对下

降、通货膨胀和外部经济不平衡的惩罚。在两种资本主义之战中，第一个战败国属于莱茵模式一方，就是瑞典。

个人主义与人口

把人口问题列入莱茵模式的“衰退”一章可能令人感到大惑不解。这有根据吗？如果承认人口下降意味着，并且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发展，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所有莱茵模式国家都遇到令人担忧的人口形势，人口“生育率”（一个妇女生**2.1**个小孩）在这些国家也没有保障了。结果是：在日本和德国，劳动人口下降，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扩大了一倍半，达到近**60%**。

这种发展趋势同所有发达国家一致，但程度更为突出。同样可以说明这些人口现象的是，人口继续下降似乎表明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变小了，愿意过得更舒适些，或明或暗地倾向于个人主义。**1989**年**4月25**日的《世界报》写道：“联邦德国惧怕未来。”在日本，由于受到经济的金融的和社会的制约（住房问题！），也迫使家庭实行节育。

人们往往这样描述人口下降给经济活力带来的必然结果，诸如劳动力短缺，非劳动人口负担加重和随之而来的退休制度危机以及由于交纳保险费的人数减少而造成社会保险费用不断增加，等等。但还应加上科研效率降低（因为这需要大量年轻的科研人员），经济面临普遍疲软的危机，以及老年化社会造成的自我封闭倾向。总而言之，受到人口严重短缺威胁的莱茵国家必须考虑其整体利益，采取有力的促进生育的措施。它们却没有这样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是否采取一些可能不被理解，其效率也得不到保证的措施方面犹豫不决。

然而，由于来自东方国家未来移民的强大压力，现在这种前景已大为改变。

新的习俗，新的权益要求

习俗变化的另一个例子是莱茵国家与劳动的关系。如前所述，德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劳动时间最短的国家，工会的中期目标是每周劳动**35**小时。在日本，由于这是一种新现象，因此更加突出。

在此之前，日本的工薪劳动者把他们的全部心力投入了劳动和企业。现在，日本人一般每年只有一个星期的假期，但年轻的一代要求更多的休假——至少二三个星期。政府支持这个运动，建议每周劳动时间减少到**44**小时至**42**小时，但没有结果。近几年来，日本的娱乐产业增长特别快，这是作息时间变化的一个象征。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过分劳动带来种种弊端的舆论运动。报刊上发表了关于过累劳动后果的各种报道和研究论文，诸如造成紧张压力、过早死亡、家庭生活失去平衡，等等。厚生省完成的一次调查表明，劳累过度的工薪收入者发生“猝死”的现象不断增加。根据这项调查，每年有**10%**的成年男子完全是因“劳动扼杀”而身亡的。

在日本，除了这些纯生理方面的后果以外，人们越来越担心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后果。严酷的工作时间表和经常性的劳累过度导致自杀、离婚和酗酒。日本奇迹也是有其限度的。年轻人越来越公然拒绝这种生活方式。确实，他们已经没有了前辈的那种动力，如像德国人过去那样，关切重建一个被战争屈辱、削弱和战败的国家。现在，繁荣已经到手，日元蒸蒸日上，日本已经被它的贸易顺差和金融赢余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出现了享受现在的欲望。这种欲望与日俱增，对日本“模式”的运行不会毫无影响，对一个正在学会用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方式生活的社会，也不会没有影响。

除了这种集体情感的削弱以外，还要合乎逻辑地加上所有莱茵国家中工会运动和集体谈判程序的某种相对衰落，尽管与法国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衰落。诚然，非工会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波及到美国、法国、英国、瑞典、日本，甚至在较小程度上也波及到德国。但是，工会在莱茵模式中一直是社会共决制的基石之一。这种趋势别有一番含义。

非工会化在瑞典十分突出。例如，由于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强大的中央工会瑞典总工会（LO）受到了惩罚，导致集体谈判程序分散化（从此以后，雇主与雇员就要在企业一级，而不是在全国一级进行谈判了）。一反常态，这种新的弹性就业制度造成工资失控，损害了瑞典的竞争能力。这就意味着，由瑞典总工会保证的工会纪律和工资纪律受到了质疑。由于谈判失去控制和无法协调，由于劳动力短缺，谈判往往变成了一种讨价还价。这是工会削弱带来不良后果的充分体现；也是弹性就业制度与非工会化不是总能与效率并行不悖的佐证。

如果说工会在不少莱茵国家中被削弱了，它们的管理方式也受到了指责。经过法律仔细规定的以年资为基础的等级结构（我在前面指出了它的优势所在），往往被看做过于臃肿和造成涣散。现在，许多年轻的日本大学毕业生再也不能接受必须等待15年才能当上课长、再等15年才能进入领导岗位的规定。更广泛的是，人们振臂高呼，揭露令人莫明其妙的正规主义，在日本，这种正规主义主宰着等级制关系。这些呼声开始得到倾听。例如，丰田汽车公司这个典型企业便取消了带有昔日父爱主义色彩的工长的头衔。在德国，西门子公司也同样取消了几个等级，以便加快信息交换和决策的速度。至于传统的领导机构和监督委员会体制，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对象。人们指责它机构臃肿，办事拖拉。

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同报酬制度方面的情况大同小异。它们反映了新美国模式的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在美国读过大学的年

轻的德国大学毕业生或日本大学毕业生，享受的是外企提供的待遇，他们面对以资历和技能为基础的等级报酬制度，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们要求更快地得到更好的工资待遇，加快职务晋升的速度。在发展最快的企业里，对传统模式的反抗尤为激烈。青年管理干部公开表示，宁要美国式的“发迹史”，不要日尔曼式的或日本式明智的、死气沉沉的“升官图”。

在这一点上，传播的效用也是引人瞩目的。站在本国，从远处眺望，谁也没有预见到美国还能够闪闪发光。这种影响——人们对此可以臧否——在其他方面，或许更加重要的方面，继续在起作用。

金融的诱惑

在前面几章，每当我强调莱茵模式企业能够经常受益于稳定的股份制和可靠的银行贷款从而构成其优势时，我总是联想到读到这本书的小股东会做何感想。

实际上，他们一方面愿意同他们投了资的企业保持紧密联系，但另一方面，“现金收购”对他们来讲，即使不完全是一种“公共采购的供给”，也为他们自己提供了一次按照既定目标终身做生意的机会。

“现金收购”立法的目标本身正是为了给这些小股东提供一些比股市行情更高的供给，从而满足他们的合法利益。而在其他国家，这种供给一般留给享有特权的股东，他们握有“集团股”。

根据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说：没有“现金收购”，也就没有增值。我自己也感到别人可能会问我，我是否根据（莱茵模式的）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和东京的四大股市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两大股市的长期股票指数来计算的。1980年12月31日在这些股市中任何一个股市或巴黎股市投入

100 美元，10 年以后的增值如下：

东京	334.1
阿姆斯特丹	252.4
法兰克福	238.5
巴黎	213.9
伦敦	173.3
纽约	172.2
苏黎世	172.0

这样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尽管 80 年代盎格鲁—撒克逊的金融市场闹得沸沸扬扬，莱茵市场（苏黎世市场除外，它自 1986 年以后处于停滞状态，反映了瑞士面对欧洲单一市场遇到的特殊问题）却远远占了上风。

然而，我提出这个结论是有保留的，因为上面这些数字是根据我个人的简单计算，不是经过科学研究的结果，尤其是应该进行指数拣样比较。此外，这个结论是不全面的，它综合了货币交易运动，却没有考虑股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是非常高的），也没有计入税率。不管怎么说，强调一下这个结果至少不是零比零平局，对小股东来说并非毫无意义。

当然，日本情况例外，那里的股市自 80 年代初以来即开始复苏，有时陷入狂热，打破了著名的日经指数的最高记录。“有利于公司的股票行情报告”（PER）接近了 60 点，这比美国或英国高出 4~6 倍。于是，日本的大商业银行有巨额利润入账。目前，在国际金融这个小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乃村株式会社、第一株式会社、住友株式会社、大和株式会社等等。在日本，开设了与芝加哥、伦敦和巴黎联网的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

在德国，这种情况来得较迟，也不无遗憾，因为大银行介入

国际新市场不符合他们的文化。在这种“美国节”的影响下，德国的金融复活了，有点像“疯狂赌马厅”的流光异彩对一个清教徒住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在法兰克福和东京，股市开始奋起竞争。

然而，最近有两个事件打破了作为莱茵模式特征的金融保护主义传统。

第一个事件是，1991年初，荷兰的头号保险公司（**Nat - Ned**）提出了在它和荷兰第三大银行（**NMB Postbank**）之间进行一次证券“公共供给交易”（**OPE**）的建议，以便实现在荷兰前从未有的一次兼并。小股东结成社团，立即起来反对，他们认为规定的交易期限太短。另一方面，阿容保险集团（**Aegon**）也拥有**Nat - Ned**保险公司17%的股份。但是，尽管提高了最初确定的供给量，他们的联合努力并不足以阻止一次象征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渗入莱茵河两岸的兼并。

第二个，比勒尼—大陆公司的例子更有意义，因为这涉及到一家意大利公司——比勒尼公司介入德国问题。这家轮带制造商在极为集中的世界轮带市场上名列第五，逐步购进了它的德国对手大陆古米—威克有限公司（**Continental Gummi - Werke**）51%的股份。这又怎么样呢？实际上并没有给它带来任何权利，因为大陆公司的章程规定，拥有投票权的股东人数最多限制在5%，在德国一般都是如此。比勒尼公司提出的兼并建议自然遭到大陆公司领导层的拒绝。

这次与以往不同，股东们至少促成召开了一次股东特别大会，会上取消了限制投票权人数为5%的条款。取消这一条款的动议得到有效票的66%。公司领导层败北，股东们胜利了。这是德国资本主义金融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说明股东对管理者的力量对比在上升，这自然会推动股市的发展。

由于金融、特别是股东慢慢地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银

行在企业方面的作用时过境迁了。在德国，观察家们注意到，“管家银行”（Haus - Bank）的传统观念开始销声匿迹了，有点像“家庭医生”的传统在法国苟延残喘一样。由于受到外国银行提供了吊胃口的报价，由于被金融市场的好处所吸引，企业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忠于他们的老银行客户。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在股东全体大会上接受股东委托来管理账目了。现在银行需要有明确的委托书才行。从更广的范围讲，德国有些政党，如社民党和自由党，呼吁减少银行对经济的监督权力。他们提出的目标是把银行在企业资本中的比重限制在 15% 以内。

莱茵国家中金融市场实力的上升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家货币权力机构的独立性、更广泛地说，公共权力机构的独立性相对地丧失了。出现这种现象是合乎逻辑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越国际化、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领导机构就越加依赖国际资本运动和国内市场的反应。它们在税收、利率、货币发行量等真正的大经济变数上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采取行动。

科尔总理试图在联邦德国实行的量入为出的实验，由此引起资本大量外流又不得不放弃了，就是这种新依赖的最好佐证。但是，尽管 1991 年 1 月联邦银行一度特立独行，提高了指导利率，从而与几天前七贤人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发生矛盾，但一般来讲，日本和德国中央银行必须使本国的利率发展趋势适应欧洲美元的利率发展趋势，而后者本身又紧密依赖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日本和德国货币当局的独立性减弱，反映了它们的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被削弱了，这同这两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拥有的实力成反比。

谈到新美国模式的金融传染病，是否还应补充在莱茵国家中出现的与“卡西诺经济”密不可分的令人怀疑的或违法的行为呢？挪用基金、内部犯罪也成了家常便饭。在德国，大众汽

车公司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暴露了一个高级管理干部利用公司的钱在金融市场上投机。反之，美国任何一家大公司似乎都不可能像德国发生的那样，擅自为伊拉克建立“化学”工业帮忙。同样，当瑞士银行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它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职业秘密、冻结了伊拉克存在日内瓦、巴塞尔、苏黎世保险柜中的**200**亿美元存款惹得侯赛因·萨达姆大发雷霆时，谁又会为之辩解呢？

在日本，股市证券交易所的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质疑。实际上许多交易的幕后是黑手党在活动，利率完全被非法地操纵了。至于“行贿受贿”，日本也不能幸免。大家不会忘记，宇宙公司行贿事件已经导致两个首相下台。

概言之，轻而易举地来财的思想正一点一点地渗入到莱茵模式经济的中心。更令人恼火的是，莱茵模式经济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同，它们根本没有对付这种这种传染病的武器，既没有制定必要的规则，也没有应对的手段。然而，这还不过是所谓金融全球化巨浪溅起的一点泡沫。

新美国模式的最大传播载体无疑是金融。我们已经指出它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和它在日本和联邦德国资本主义演变中的影响。为了让资本主义观念渗透进来，特别是要加强市场在经济领域中的实力和加强市场对企业的监护，金融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强有力的杠杆。

15年以来，美国模式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正是金融全球化现象以其无比的力量打击了世界。这种全球化是建立在创新、国际化和放弃管制等深刻的发展趋势之上的，这种趋势使全球化成为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髦，而是真正的海底涌浪。在审视这些现象之前，应该追述一下全球化的历史，以便弄清带来金融领域飞速发展的几次断裂。

几次断裂

要说明金融全球化始于何时是困难的。实际上，资本的国际运动确实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首先，正是伦巴第的银行家资助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例证不胜枚举，例如，“伦巴第利率”至今仍是德国联邦银行的指导利率，再如，伦巴第大街是伦敦银行区的主要街道。其次，在整个 20 世纪，正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向全世界、特别是他们的殖民帝国输出了他们的资本。俄罗斯的借款、土耳其的债务，都是靠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储蓄来偿还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美国的金融实力开始显露，英国的金融实力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很大的。但是，1929 年危机显示出资本流动的影响力，因为通过国际金融渠道，股市危机很快蔓延开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国际金融体系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智了，各国政府都警觉地维持货币稳定和采取长期的措施。

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似乎是稳固的、可靠的和协调的。黄金成了未来的参照本位，美元成了金元，其他货币都要在固定汇率的范围内根据美元汇价来确定自己的汇价。建立了一些保护机制，如负责监视支付平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MI) 和负责为发展计划和经济重建提供资金的世界银行 (BIRD)。所有这些体系都是建立在美元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上的，美元既是其他货币的参照本位，又是国际贸易的工具。这在逻辑上是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优势的，美国生产了世界总产值的一半，握有 50% 的黄金储备，在技术方面遥遥领先。由此产生了货币和金融霸权，任何人都无法反对这种霸权。总而言之，人们还停留在由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的经济逻辑之中。

但是，这样一个美妙的总体结构也未能抗击危及世界经济的金融和货币动荡。出现了 3 次重要的断裂。首先，美国的霸权迅

速衰落，随之而来的是美元的衰落；日本和欧洲赶了上来，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日元等其他货币也在国际化。

其次，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在1971年8月的某一天倾覆了，这一天恰恰是尼克松总统宣布结束黄金与美元汇兑挂钩的15日。根据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最终由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此外，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未能完成其使命，因为它们没有覆盖足够的空间以便迫使各国政府服从一种集体纪律。而且，布雷顿森林协议由于其自身的矛盾也注定要失败。鉴于美元在为世界经济提供资金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它必须满足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方面，为了保障机器运转，它必须为世界提供足够的流动资金，也就是说，为了提供必要的美元，事实上不得不维持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其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性，出于明显的原因，又必须限制其外贸逆差。美国面临的两难局面是：或者因此而窒息世界经济；或者甘冒美国无力完成其担保的风险，让外贸逆差和流通的美元数量无限地扩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194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虚假秩序和集体纪律也随之完结了，从而让货币随着偶然的、多少有点杂乱无章的资本运动而自由浮动。

从这次机构断裂中产生了另一个根本性混乱，它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这涉及到货币的本质问题。货币变成了同其他商品一样的简单商品：按照芝加哥学派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说法，“货币是一种商品”。商品(Commodity)是一个硬性的字眼，它也完全适用于企业，我们已经说过，企业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是一种商品(Commodity)，在日耳曼—日本模式中是一种共同体(community)。货币即使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再是一种固定的本位，更不是启迪了整个19世纪，象征着价值稳定的金钱袋了。货币变成了像小麦、金属和黄牛一样可以随便在市场上买卖的资产。因此，同样可以通过建立期货市场、

期权市场和证券市场等，采用一些在农产品市场、原料市场上发财的技巧。农场主靠这些技术提前3个月在芝加哥的大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猪骨架、橙子汁或他们的大豆。这种根据利率高低“寅吃卯粮”、期权交易和签定马克/美元合同的做法自然在芝加哥发展起来。货币的地位变了，导致在金融创新方面掀起了轩然大波。

促进金融发展的最后一个断裂是世界的失衡。伴随石油冲击而来的，是美元冲击、贸易不平衡和第三世界的债务，自1973年以来，世界就处于动荡之中。这表现在利率、汇率、股市中的股票和债券行情等主要可变金融资本的突然而巨大的波动上。以利率为例，美国1980年前4个月的波动即超过10个百分点。

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所有交易商都试图自我保护，新的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难设想，一个法国投资人如果在美国进行为期5~10年的投资会冒多大风险。如果美元的汇价下降50%（10年内已经出现两次这类情况），投资的全部赢利就会告吹。对一个进口商来说，他的赢利余地不过几个百分点，如果汇价出现类似规模的变化，其结果也是灾难性的。然而，这类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如此，才在完全非物质产品的基础上，建立起在全世界攀缘上升的巨额金融财富，以便抵御人们再也不能预料的、而且无法承受的风险。这使我们联想到导致出现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首要的基本趋势：创新。

创新：为金融服务的手段

如果没有技术和法律手段，金融全球化现象不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技术上，信息和通讯技术为金融提供了武器和力量。由于有了电脑、通讯卫星和光缆，金融数据才能在全世界自由流通并得到及时处理。如此，引进先进技术可以减少98%的

传递费用。面对荧光屏，金童子们可以随时介入全球的各个不同市场。可以在巴黎处理美国的国库券，在伦敦或东京进行埃尔夫—阿吉坦石油公司的股票交易。欧洲埃居 (ECU) 首先是在芝加哥股市挂牌上市的。技术为金融扩张提供了运载工具。

创新的第二个因素是金融家。直到 70 年代以前，令人奇怪的是金融领域确实停留在无所作为的状态中。银行提供贷款，只就传统证券如股票和债券进行谈判。但是，近 15 年来，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和新产品。保证金产品（期货合同、期权）大发展，出现了新的认购证券、期权调换证券等，花样翻新。带有外来语的产品，如“NIF、TRUF、MOFF”等投资公司的衍生产品泛滥成灾。

这样建立起来的新金融领域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在芝加哥的期货市场上，大多数谈判是围绕这些新产品，交易总额比华尔街期货市场高出 2~3 倍。此外，这些金融衍生工具在国际范围内发展很快，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每个国家内地交易的产品自然向外国人开放。公共权力机构甚至推动了新市场向国际化发展。法国的 MATIF 是这类市场中的一种，德国人往往到这个市场中来投保，因为莱茵模式由于其银行机构强大和喜好可靠的稳定价值，迟迟才投入这类非常现代化的创新，反之，这类创新却非常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欢心，因为金融全球化，也就意味着让货币摆脱银行的严格限制，转入股市冒险。一般来讲，正是根据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和技术，金融国际化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因此，这种金融领域的国际化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发展的直接结果。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金融国际化也是，或主要是经济在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化的反映，经济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国际化。

这种全球化现象首先从贸易传播开去。然而，显然这种

现象比资本主义还要久远。新的一点，则是**1945**年以来世界贸易的高涨。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的确比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两倍。这表明，国际范围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伴随而来的必然结果是，各国经济对外开放，进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增加就是证明：从**1970~1990**年，这一比重在美国增加了一倍，达到**14%**，而在法国，从**1960**年的**15%**增加到**1990**年到**23%**。

国际贸易的活力是非常大的。由于双向流动的效应，它带动了工业的世界化。一方面，企业要寻求新的市场，从而要把企业建立在更接近潜在顾客的地方。大型跨国公司就采取这种态度。另一方面，一部分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也要把一部分生产外迁。这就是为什么电子工业的大部分另部件是在东南亚生产的。

经济中的贸易国际化和工业国际化刺激了巨大的国际金融流动。必须为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资金，补偿保险，赚回红利，等等。由于跨国界资本的需求增加，金融越发显示出其活力。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石油出口国组织的石油出口赢余和日本或德国的出口赢余的金融运动，它们都要寻求在资本短缺的地区投资

总而言之，国际资本代表了一支在世界各地动荡不定的巨大力量。在证券市场上，日平均交易量接近**9000**亿美元，相当于法国的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此相比照，中央银行的全部储备也不过**7000**亿美元。资本用千分之几秒，就可以跨过边界，跨过大洋，跨过沙漠。可以不停地、没有间歇地同时在全球各个市场中进行投资。世界金融就是这样连续不断地运转。当东京股市闭市时，资金可以转移到即将开始的伦敦，再转到纽约，过几个小时，又可以回到日本。现在，金融经纪人、特别是银行，必须

建立一个囊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金融中心的世界网络。日本的一家大商业银行——乃村株式会社——为此把它的市场交易指挥中心迁到伦敦。世界上不再是只有一个金钱中心，而是一个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市场不过是听任资本流动摆弄的、颠簸不定的小舟。

放弃管制与管制

全球化的最后一个因素，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因素是放弃管制。管制对资本运动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在60年代，为了逃避惩罚性的干预，美国银行把它们业务大量迁往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应运而生。反过来，放弃管制则为国际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美国，由于取消了限制活期存款的著名的Q条款，银行拼命开发客户，业务猛增了10倍以上。在法国，1978年创建了两种新类型的储蓄——可变资本投资公司和共同投资基金——也是成功之举，这些举措管理着1兆5000亿多法郎。

在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下，普遍放松了管制。为了参与竞争，各个证券交易所都放松规定，取消限额，拨开门闩。在法国，让伦敦股市搅的心烦意乱的财政部大大减少了对法国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不能让巴黎受到惩罚。

因此，金融领域带有双重逻辑。一方面，金融无视边界与国家，不断扩张，这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逻辑。金融已经不能适应过于狭窄和不足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它要打破边界，迫使各个国家屈服。诺贝尔奖金得主莫里斯·阿莱 (Maurice Allais) 曾经写道：“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赌场里边横排竖排，摆满了赌桌。”另一方面，金融领域本身也带有纯粹的市场逻辑。这是一个没有约束、没有宪兵监督、没有限制、充满创新的市场，但同时也会带来股市暴跌和违规交易的风险。

从这两个意义上讲，金融全球化是推广极端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的最强有力的运载工具。极端自由主义模式动摇了结构最严密的经济文化，特别是莱茵国家的经济文化，这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里根的新美国模式除了在宣传媒介上的成功和确实取得一些成就外，也在莱茵模式内部安插了它的特洛伊木马。

第九章 为什么最不完善的却占了上风？

分析到这一步，应该就此打住，思考一下最主要的矛盾现象。在美国模式与莱茵模式这两种资本主义不同类型之间，后者总的讲要比前者更为完善，无论在社会方面、抑或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方面。如前所述，自80年代初以来，美国模式在社会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扩大了地盘。其中包括，与它的竞争对手德国、瑞典、甚至日本……相比，在选举方面也扩大了地盘。当然，在南半球的不少国家中，首先是拉丁美洲，美国的经济政策观念（放弃管制，私有化）和企业管理观念取得了成功。说句公道话，应该承认，美国的这种成功确实成了两个正在上升中的国家——智利和墨西哥——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

但是，还是言归正传吧，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讲两种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中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这样概括可以说既风趣又不歪曲事实：几乎到处都是最坏的赶走最好的，正如按照格雷萨姆（Gresham）的老规矩，就是坏货币赶走好货币。最不完善的一点点地战胜了它的对手，虽然后者更为有效。在一个高度崇拜经济的时代，这种反照令人感到奇怪：新美国模式同时确定了它的社会心理优势和经济倒退。这有点像在汽车市场上，公众都会喜欢这样一种品牌，它的车身光彩夺目，却掩盖了并不强劲有力的发动机。与此相反，莱茵模式在效率上得了分，在魅力上却丢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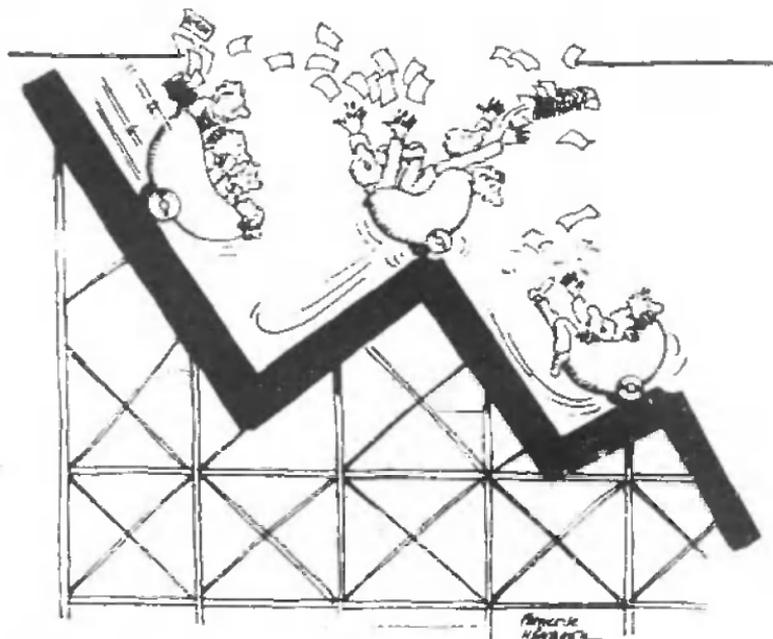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们在欠发达国家中就这个问题做个民意测验：“如果你可以做出选择，你愿意到北美洲还是愿意到

西欧生活?”毫无疑问，一般来讲，（合法）移民在西欧的物质条件要差一些，因为如果你挣的工资同美国相同，不算社会保障，你在西欧，特别是在莱茵国家里，能否真正有权住上一座体面的住房，就没法同美国相比了。至少，绝大多数人肯定会倾向于去美国，特别是青年人。同样，这也可以说明，在拉丁美洲和亚洲，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了解欧洲的生活条件。可以肯定无疑的是，美国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中都没有像在共产党中国那样广为人知。在非洲和东欧国家中也是如此，似乎多数人都会选择北美洲，譬如，他们喜欢加拿大远远胜过斯堪的纳维亚。为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首先提出了经济行为的理性问题，无论是个人的经济行为抑或是集体的经济行为。如果以为经济只服从严格的利益逻辑，那就错了。如果认为经济行为人从来只是在仔细斟酌了同意还是反对一项决策之后才采取行动，以便使他们个人利益的总量能够得到市场这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良好调节，也是错误的。理想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一举一动应该像个数学家，冷静地精心决策，理论家们经过论证提出的这种严格符合逻辑的个人并不存在。换句话说，激情、非理性、花样翻新和走火入魔的模仿，比人们想象的更能控制经济。而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政府则不可能超越其选民的价值取向，包括没有道理的取向。经济和其他方面一样，光是一种想法本身良好、甚至得到了验证，这还不够。这种想法必须能够从政治上兜售出去。

然而，事实上在世界舆论的眼里，莱茵式资本主义虽然合乎道义和平等原则，既严谨又谨慎，但却缺乏吸引力。这还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们宁可说，正如在颇有号召力的“1992年大市场”计划出台以前欧洲观念早已存在一样，这不过表现了一种媒体的平庸无能。一切都是为了成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讨人喜欢！与此相反，它的美国对手则表演得十分卖力，用

羽毛妆饰起来，带有浪漫色彩，充满神话传说，因而得到了公众的青睐。



资料来源：《现代外国》1990年第32页，1990年8月27日~9月2日。

一切都是为了讨人喜欢

美式资本主义几乎代表了西方的全部魅力。人们许诺，在那里可以过上一种充满冒险的、动荡不定的和令人紧张的生活，对于强者来说，真是令人神往。拉斯维诺（赌博）经济可以产生悬念，令每个人胆战心惊，人们可以为胜者喝彩，对败者嗤之以鼻。就像杂技一样，把人们玩得团团转。但这种资本主义却聚

集了一群热热闹闹搏斗的外国野兽：鲨鱼、鹰隼、老虎和蛟龙。还有什么更能引人入胜的呢？在这些奇妙的节目中还有什么更美妙的呢？反之，在莱茵体系中，经济生活中的大多数“动物”是一些没有惊人之举的家庭动物。真可怜！而在莱茵国家这一边，人们的生活同样可以很活跃，但可能显得单调，或令人生厌。莱茵式资本主义使人联想到按我国《民法》中的含义来理解的一种“家父”式的管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则使人联想到巴黎著名的“野马夜总会”的奇光异彩。在强光灯下，这两种模式都会黯然失色。正如你本来要夺取牛仔裤市场，却向青年兜售奥地利西部短裤！

美国式资本主义确实是有好莱坞含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带有娱乐业和侦探小说性质。“里根时代”使用和发展的词汇都带有这种烙印。如今被判了10年监禁，缓期3年执行的“垃圾股”发明人米盖尔·米尔肯（**Michel Milken**），昔日曾被美国银行家们封为国王（**The King**）——世界娱乐界的头号偶像埃利维斯·普雷斯莱（**Elvis Presley**）的绰号也叫国王——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正如海勒什（**P.M.Hirsch**）在《美国社会学报》1986年元月号所指出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表现为大众文化的一些表象：西部片模式（善与恶，设下陷阱）、诈骗模式、情爱关系主题、编造惊奇故事（“木制美女”）的老板和体育竞技的老板。

至于“现金收购”的行话，大多属于一种战争游戏术语，似乎足以编纂一部专用语词典了。金熊、兵团、赢家、金手铐、窥测鲨鱼的人，等等。这种语言，完全是好莱坞生产的惊险影片或卡通片的用语。采取游戏的方式，使控制得以合法化，从而弄假成真。真是个一场大游戏！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马德里克（**John Madrick**）曾经提到，几年前一位华尔街专家对此大加嘲讽，他说：“操纵的动作越来越像一场赌输赢的智力游戏，竞争对手像

小孩玩占山为王一样，远离经济和产业现实。”^①

难道这是一场游戏吗？美国资本主义不仅仅使人联想到丛林法则的野蛮情趣和生存竞争，也是一种幻想来钱很快、容易暴富和出现“发迹史”的资本主义，它比明智的和耐心发展的莱茵模式更具吸引力。“发财”这个说法根本不属于莱茵传统。这个说法却与美国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至少拉斯维加斯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变型。抱有“暴富”梦想的媒体新产业、通过诱惑取胜的劲头和西部大金融家的颤抖不已，不是发生在苏黎世，也不是在法兰克福，而是在芝加哥或纽约！但是并不妨碍，目前甚至在法兰克福和苏黎世，人们也在考虑要不要到新奇的卡西诺经济里走上一遭。这就是说，那些家庭的好父亲受到赌博的诱惑，眼睛也瞄上了野马夜总会。德国和瑞士的小股东们即使不搞大的权力游戏，也至少愿意逐步在跑马场中下大的赌注了。但是，在瑞士、德国和日本，热衷于发财和出人头地的主要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一代家庭。在日本，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人们如此热衷于股市是不是由于不能从事战争冒险而把玩股票当做消遣生活的药方。确实，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每天都会出现各种新奇的事情，股市波动每时每刻令人不寒而栗。但这种波动仅限于股市自身，不过是浮在经济现实上的泡沫，起着一种带有话剧表演、游戏和体育锻炼的作用。

媒体的胜利

美国资本主义尽管遭到种种挫折，负债累累，工业薄弱和存在不平等现象，它仍然是媒介宣传中的一个真正的明星。美国式资本主义被它的对手（对手现在已经不太多了）诅咒为“唯一”

^① 约翰·马德里克：《攻克美国》，纽约矮人书局，1987。

的资本主义，也被它的卫道士们奉为神话，那些电影编剧们不知疲倦地歌颂它的光辉业绩。不管美国资本主义遭到了什么失败，在新闻媒体中仍保持半壁江山。这是正常的，它忠实地反映了观众的看法，新闻媒体喜欢悬念和耀眼的角色，喜欢金融冒险和巨人搏斗，喜欢黑白分明的骑士，喜欢善恶二元论和财富的外在表现。当然，美国资本主义在记者笔下的这种胜利也不是像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不值一提的次要现象。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说明了它的传播力量。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它们同股市的运行保持着密切联系。除非是一个临街的机构，或有可能在国际调查机构的排行榜中名列前茅，一个靠市场为自己筹集资金的企业便不得不纳入与广告、音像、戏剧一样的逻辑。不再看这个企业本来面貌是怎样，它应该自我表现一番。80年代的特征是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广告”爆炸和特殊的经济加速媒介化。

我们看到，经济行为人变成了连载小说中的角色，读者希望他们能够达到剧本中描述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好的企业主，光是一个坚强的管理者还不够，他还必须——大模大样地——表现出是一位成功者、一个不断扩大实力的获胜者，打倒对手，实施成功的“袭击”，善于让摄影师瞄准他的战利品。他自己摆出来的形象，也将是其企业的形象，他那经过媒体包装的“神态”，也将同其经营账目好坏或在市场中占有的份额同样重要。反之，新闻媒体怎么会有一家德国企业管理委员会的某个严厉的、饶舌的委员自然而然地产生兴趣呢？或者说，新闻媒体怎么可能在苏黎世或法兰克福的一位谨小慎微的银行家面前感到兴高采烈呢？

新闻媒体有自己的规律，这就是连续不断地宣传并且有人接受。新闻媒介要求登堂入室的人物也要为这种表演规则做出牺



资料来源：波朗柱，《经济击波》，21页，世界出版社，1990。

物。因此，新美国模式的变相媒介化朝着两个方向运行。媒介化显然是这种资本主义模式取得心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媒介化也扩大了它的许多纒纒。经过媒体包装的个体、狙击手或少派，今后必须像好莱坞的明星一样符合他们在公众中留下的形象，即使有时不免有点滑稽可笑。为了讨好新闻媒体，或出于自我陶醉的目的——尽管他们从不承认——他们作出了多少冒险决策和鲁莽决定呀？新西诺经济依靠的是它自己的表

演；但同时它也成为这种表演的俘虏。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种经济的媒介化伴随美国模式一道跨过了大西洋。不管怎么说，欧洲的老板们发现，他们的“神态”并非毫无意义，电视上的一次失态或麦克风前“说走了一句话”，都可以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必须像歌手或运动员那样，习惯于媒体为他们排定的座位名次；他们不得不同意扮演“演出公司”为他们安排的专职角色。至于企业本身，它们也不得不带着不同的财富与“广告顾问们”结盟，这些广告顾问负责帮助他们维持自己的形象，有时不惜使用莫里哀喜剧中的虚伪语言。1990年，“公关经理”这种简称在法国还近乎无人知晓。今天，企业对他们已不能视而不见，拉斯迪那克的年轻人都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为了再来几十个亿

具体一点说吧。对于新一代的一个资本家——或希望成为一个资本家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发财！

今天这已经很明显，昨天可不是这样。在法国，最大的一些实业家（例如雅克·卡尔威、奥利畏尔·勒塞尔夫、迪迪耶·比诺-瓦朗西安、安东尼·里布等人）简直就“忘记了”发财，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能否成功。在德国，这也是金科玉律。在美国，这就是不可想象的了：一个企业取得成功和它的老板从中得利是相互间密不可分的两个东西。

也就是说，要发财，而且要快快发财。为此，存在一条法则，造船不如买船（*cheaper to buy than to build*），我们发现对这个规则的解释真是五花八门。这个法则可以区分两个可以“得到公认”的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发明一种产品、一种服务或一个观念（例如吉勒贝尔·特罗卡诺和他的地中海俱乐部、大和地电器商店和它的信誉合同），然后把它们出售。但是，为了争取广大客户，发明人总是有兴趣，或往往喜欢宣传自己，或着说，自己“兜售自己”。

第二个方式更先进、更巧妙，我们已经看到，是从金融市场上“提出”钱来。通过已经建立的某些机构悄无声息做交易，而且并非通过为自己干活的个人，因为个人首先要推销自己，然后再把公众储蓄吸引到自己的名下来。能够把希望卖掉的几十亿出售给数千个“小股民”，这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事呀！

按照金融逻辑推下来，现在我们该谈谈证券了。让·卡泽那夫^①强调指出的是，明星们成功不仅靠声望、而且靠财富……。在演艺界，名气带来财富，使他们的行为顺理成章，而不是与此相反，像古典的大学荣誉称号那样。

当然，这种普遍的媒介化、这种“广告”占有过分的地位，反映了一种经济的特性，这种经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信息经济。应该知道，美国在这个方面比它的对手强万倍。这一切都是为了促使在世界范围内保证美国形象能够占上风。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文化霸权越来越昭然若揭了。在雅加达、利马、里约热内卢和拉各斯，美国的连载小说、好莱坞造的电视系列片、广告性体育或大西洋彼岸的卡通书把人搞的疯疯癫癫。马克思主义崩溃之后，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如果向一个埃及的、巴西的或尼日利亚的知识分子指出还有另外一种市场经济，并告诉他有证据表明，莱茵式资本主义遵循的原则是与有字幕解说的达拉斯版式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规则，一定会使他呆若木鸡。而且，总的讲，莱茵式资本主义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① 参见德诺埃尔 巩第埃：《电视人》，载《大众媒介》1994。

经济媒介化与媒体危机

由于莱茵模式暴露出它无力进行沟通、无力把自己推向国外，只好让它的竞争对手占据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绝对的二律背反”的地位。这种二律背反包含几句话。我们前面提到了，卡西诺经济之所以有力量，部分地来源于它能够吸引记者注意。反过来，卡西诺经济本身也处在媒体的影响之下，这当然不会很舒服。但是，如果要进一步分析就必须指出，这种竞争性传染病、这种只顾短期收益和这种金钱专政，现在也扩散到新闻媒体的自身上了。

几年来，记者并不是最后抱怨他们在职业中遇到不快的人。他们不得不努力适应金钱的统治，适应越来越带有强制性的短期赢利的需要，总的来说，这是卡西诺经济在新闻媒体中的翻版。当信息沦为服从严格市场规则的商品时，当媒体宁愿把读者卖给广告商而不是把信息卖给读者时，职业道德很快就会丧失殆尽。应该指出，在这方面位于“新美国模式”前沿的国家不是美国，倒可能是法国。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确实存在一种近乎行会主义的老传统，即记者独立于雇用他们的新闻企业，这种独立性得到了知识界读者群的支持，特别是在经济和财政领域里。这种行会主义老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经济不恰当的媒介化，特别是自从主要电视频道被私有化以来，媒介化已成为法国的特征。

于是，在一些法国新闻媒体专家的笔下，又出现了主旋律，因为他们担心在新闻行业中出现一个真正的职业道德危机。

1990年2月，弗朗索瓦—亨利·德维利厄在一本题为《媒介化》（弗拉马洪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揭露了这种腐败现象。1990年8月，《辩论》杂志发表了题为《新闻媒介的不快》的一大套

资料。《新观察家》杂志社长让·达尼埃尔邀请报刊“摒弃把信息看做一般商品的信息哲学”。1990年12月,《精神》杂志也出版了一期专号,提出《新闻向何处去?》。

经济记者让-弗朗索瓦·卢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面临金钱风险的新闻界》的署名长文,指出在法国报界存在着“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他强调,近来腐化日趋严重。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对新闻自由的威胁似乎主要限于政治领域。应该首先在政治上自卫。金钱一直拥有收买能力,其规模几乎可以同新闻的总体独立地位,特别是同全国性大报的独立地位相比拟。然而,正是这种微妙平衡似乎受到了某些行为的威胁。”

最后,1991年2月,法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兰·科达(Alain Cotta),尽管他在教学中一直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也发表了一部题为《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法雅尔出版社)的专著,这本书读了让人脊梁发冷,作者在全书共5章之中用了3章来谈论资本主义的近期变化,这3章是:

- 媒介化的资本主义;
- 被金融俘虏的资本主义;
- 腐化的资本主义。

腐败现象的上升是同金融活动、媒体活动的推进密不可分的。在各种金融交割活动中,特别是企业兼并、收购和“现金收购”(OPA)活动中,信息可以在几分钟内使人获得用毕生的紧张劳动也无法得到的财富,买入和卖出财富变成无法抗拒的欲望。正如乌云会带来暴风雨一样,佣金会带来腐败。

当所有发达国家中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很高——把收

红包看做欠发达国家的可耻疾病和涉及自身名誉问题时，任何人也不敢对抗这种文化。但在今天，当放弃管制（阿兰·科达指出，腐败是放弃管制的一种表现）已成为经济学正统的时候，把国家压缩到最低程度、把腐败美化为企业精神的某种形式之一……并且取得成功的时候，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这里有两个例子。墨西哥政府秘书长约瑟·科尔多巴在1999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近3年来，墨西哥警察查获的可卡因的总值，在纽约市场上约合15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外债的两倍。我们过去处在腐败的宏观经济之中，现在更加严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像所有中央银行一样可以印发钞票，几年以前，当它发觉银行向它提出用美元交割的要求急剧增长时，感到很惊讶。经过调查，美联储发现在美国印制的90%的美元不是在内部贸易中使用的，而是在国外使用的，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平行经济的需要，特别是走私毒品的需要，这样可以避免通过银行账目转账。

越是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轻而易举不劳而富的时候，他们的成功也就越被看做计高一筹，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自甘堕落，或从事贩毒这种替代性贸易。反过来，当新闻媒体不得不向短期利润规则折腰称臣的时候（莱茵体系国家无疑将是最后保留国有电视不登广告的国家，例如BBC电视台），它们就不得不像大腕儿们主持电视娱乐节目时那样信口开河，胡乱解释经济生活和金融生活，由于他们对这些论点抱有偏执狂，把随心所欲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惜违背法律、背离时代。阿兰·科达又补充写道：“电视娱乐节目要办的好，就应该拒绝浪费时间，聚焦在瞬间上，人的制约，首先是死亡的制约也应该撇开这个瞬间。电视系列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对线性时间发展的刺激，好像一切都在不停地运转，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就是说，现在是永恒的，要为现在争取利润。

为了现在的利润

80年代的知识背景很快就显示出是有利于新美国模式的这一特征的。实际上，80年代首先是思想体系陷入普遍危机的年代，是浮躁的个人主义喧嚣一时的年代，是吉尔·里坡维斯基（Gilles Lipovetsky）所说的“空虚时代”胜利的年代。按照这种“世界观”，“剩下的只有对自我和自我利益的追求，对个人自由的迷恋和对肉体和性爱的走火入魔”，“存在着过分的私人投资，其结果是必将造成公共领域的瓦解”。^①

然而，在这种看破红尘的和扭曲了的利己主义背景下，新美国模式似乎更给人提供一种强大而又简单的观念，提供一种像昔日马克思主义信条那样通俗易懂而又令人信得过的信条。利润的最大化，还要快；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始终把短期利益放在首位；蔑视一切集体计划……至于那些赤裸裸的金钱逻辑、谨小慎微的犬儒主义和玩弄花招的新闻媒体就不用提了。似乎有点反常的是，这些现象至少把新美国模式的这种翻版变成了类似被它战胜了的共产主义模式。

不管怎么说，从新闻媒体的角度讲，新美国模式正处于畅行无阻的阶段。盲目崇拜利润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虽然过于简单但十分明晰的观念。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正笼罩在一片怀疑和失望的迷雾中，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崇拜利润似乎成了唯一新的稳定的参照系，这种观念的优势就越发强劲有力了。

个人成功的合法化对“胜者为侯”的神密化更鼓励了躁动不已的利己主义。短期利益第一、“身后之事与我何干”的人生哲学、借钱和负债无所谓，这些做法都很符合现时的享乐主义：当

^① 参见《空虚的时代》，加里玛出版社，1986。

人人都在更加面向现在而不是面向未来的时候，在伦理的或哲学的幻灭时代，储蓄的必要性和长期利益的重要性显然不能够轻易显现出来。至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既然其他一切“法则”或其他一切集体解决方式都遭到怀疑了，正如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又回到“现实的底座上”一样，不是也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法则吗？

80年代对利润的崇拜之所以取得成功，同对利润歌功颂德的“教堂”不断扩大有关。从来没有建立过这么多的商业管理学校，这些学校中的“经书”，讲授的也是同样一个信条——正如一本书名所象征的——《学年优秀奖》。^①争取优秀干什么？是为了利润，这是天堂！要利润干什么？千万不要提这个问题，如果你对这本“新经书”的头一条——“利润的最终目的就是利润”——提出怀疑，你就会立即被赶出“教堂”。在这一点上，人们并不让步。为了对手段进行“技术性的”研究，关键是要把“哲学性”问题排除在最终目的之外。于是，这个问题又涉及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新命题了：现在为了利润，利润为了现在。

于是，在经济制度（被演化为社会指导原则）的教学中，经常存在一种诡辩：成功的就是有效的，有效的就是真实的，因此，成功的也就是真实的。

但我们必须指出，80年代曾经大行其道的这些“衍生理论”和带点犬儒主义的看法，现在已经出现一种低落的发展趋势。对没有人情味的企业管理和对过分相信效率的自我陶醉，似乎也在烟消云散。在经理群中刮起了一股由新的模式——文化模式——取而代之的新风，表明昔日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这股新风也是从美国刮到我们这里来的。我强调这一点出于两个理由：第一条理由是，《美国造……》一书的全部观念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观念，特

^① 《学年优秀奖》，联合出版社，1983。

别是在法国。当然，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说明，从今以后，资本主义只有隶属于一种文化和一种国际法准则时才能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第二条理由是，美国人也许把文化当成一回事，但一般来讲，在拉丁语国家中根本就不会如此。

出于良好的愿望，我们顺便向一位杰出的法国作者——社会学家菲立普·迪里巴尔纳 (Philippe d'Iribarne)^① 表示敬意。

维纳斯的女性魅力与朱诺的德行

在未来几年内，这种昔日模式的回落可能更加突出。但这没关系，时代的旋律和时间的感受似乎依然对新美国模式十分有利。而对莱茵模式，就不能这么说了。莱茵模式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逆风而行。社会共决制是莱茵模式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与加入工会的人数锐减和集体机制的普遍危机是根本不相容的。它想采取的长期措施，至少在表面上，也是与急不可耐的消费饥饿症不相容的。关于企业是一种有机组织和社团的观念曾经是企业的基石，这种观念与正在占上风的利己主义狂热也是水火不相容的。莱茵模式对股市投机的那种藐视，莱茵模式为它的管理干部提供的那种缓慢的按部就班的职业晋升计划，都散发出一些伦理主义的迂腐味道。至于它自诩可以为工资收入者提供的社会保险和安全，与希望过一种英勇的有冒险精神生活的时髦理想也不合拍。

如果从外表来看，莱茵式资本主义不如说像个“丑陋不堪的过时老太婆”，不值得“一看”。莱茵模式既没有梦幻色彩，不好玩，也不带刺激性。恕我们直言：莱茵模式没有“性感”，而新

① 菲立普·迪里巴尔纳：《荣誉的逻辑，企业的管理与民族传统》，瑟伊出版社，1989

美国模式利用类似维纳斯的女性魅力来诱惑人，莱茵模式则只能使人联想到母后朱诺（*Junon*）那种一般令人尊重的合法地位。有谁知道朱诺呢？有哪个大画家、大雕塑家想到过要为她树碑立传呢？什么地方的经济学教授会在课堂上讲授如何从德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成就中得出有益的教益呢？什么地方的青年政客会把德国当做模式向选民推荐呢？

但是，如果以为莱茵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心理上一事无成，纯粹是或不过是由于宣传媒介不好或与时髦的价值观念——我们宁可说是“非价值观念”——水火不相容，就大错特错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完全是由于莱茵模式的思潮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或遭到了反对。

耶稣教会的社会学说在制定“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中的作用鲜为人知，而“社会市场经济”主要是汇集了天主教在基督教民主党（*CDU*）的影响和新教在社会民主党（*SPD*）中的影响。鉴于从约翰二十三世到让-保罗二世，随着教会的社会学说发现了并提倡企业的创造精神而变得更加深邃以后，天主教的精神权威得到了加强，这种鲜为人知就更加令人惊异了。当然也要指出，在促使莱茵国家向日本靠拢的各种因素中，涉及到企业的社团作用时，儒家的哲学与耶稣教会的社团思想之间存在深刻的一致性。但是，这种情况同样鲜为人知。尽管如此，后共产主义的“一扫而光”还是需要社会基督教主义重新寻找一种活力和一种影响力的。而近一个世代以来，在莱茵国家中，这种活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禁锢。

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潮，尽管至少在欧洲遭到了反对，在莱茵模式和社会市场经济中却不陌生。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甚至可以提出，我在本书中所讲的莱茵模式，实质上同把社会民主理念作为前景、使之现代化并付诸实施差不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好的

表现形式，但社会民主主义在理念方面正在加速后退。近 20 年来，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听任滑向某种官僚主义的懒惰的工团主义，它的活力确实已经丧失了不少。某位参观者向一位瑞典的企业负责人提出“这里有多少人干活？”他曾这样回答：“刚好一半。”正因为如此，瑞典的税率、通货膨胀率和投资率不能适应欧洲竞争的要求。

瑞典人懂得了这一点。从 80 年代末开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恢复了总体上的经济平衡，这有点像此前其他欧洲社会党人，如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特别是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所做过的一样。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能够东山再起吗？由于它们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回落，甚至大崩溃中已经伤了元气，似乎有点难以肯定。

东方的一个大真空

我不想在这里展开论述弗朗索瓦·弗雷 (François Furet) 所讲的“共产主义瓦解之谜”^①，对于这次非同寻常的——也是出乎预料的——意识形态地震，我们还没有收集到它造成的全部后果。但是，正如我在本书一开始就强调的那样，这种瓦解会使资本主义危险地自己反对自己。因此，这种瓦解最终会证明我将努力在下面几页要尽力阐述的思考。共产主义的终结和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一种（自由主义）制度对另一种（国家至上）制度的胜利。这次失败就像一场大旋风把一整套理念、思考、感触和分析都一古脑卷走了，而这些东西不应该一下子全然消失。

^① 参见圣西门基金会 1990 年 10 月的公报。

当然，从长远来讲，历史必将重新分牌。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还没到重新分牌的时候。

恰恰相反，东方突然打开的这个大真空，有点像一条满载的船只连船带人地迅速倒向被“搁浅”的一边。实际上，不只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或官僚主义版本的共产主义都被这种历史性失败严重地损害了，所有那些多少与社会主义理想有联系的，无论是改革派社会主义理想或简单的社会理想，都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损害。

应该很好地权衡这种损害所具有的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损害暂时尚未被其细微变化所累。今后，在东欧国家中，甚至在苏联，某些常用词汇由于被编纂在共产主义的大旗之下也会受到连累，因而无人再使用它们，这些词汇直至显得过时了。“党”、“集体”、“劳动者”等词汇就是如此。出于这种考虑，东欧大多数新建的政党宁愿称作“论坛”（捷克斯洛伐克）、“联盟”（匈牙利）和“同盟”（波兰）。要想从匈牙利或捷克民主派的新报刊找出带有一点昔日含义的字眼，如劳动者、计划、战略目标等，就会白费力气，它们已经随着旧体制本身一道被吞没了。

在西方国家中，在词汇的使用问题上，我们当然没有落到这一步田地。但在观念上就不能肯定共产主义的沉沦造成的后果是否与我们根本不同了。像缩小差别这样一些概念、像工团主义这样一些现实、像集体纪律这样一些要求、像计划总署，甚至像直接税这样一些机制、像社会民主主义这样一些参照系，都被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些观念倒不是真正从根本上信誉扫地了，而是多少受到了怀疑。于是，从所谓理念的辩证关系来讲，这个“大真空”甚至在我们的左翼和中左翼之中也造成了一个大真空。

从这个角度讲，欧洲的政治生活也突然患了半身瘫痪症。（左翼）由于命中注定的衰老而患上了一种半身不遂症。这种半身瘫痪症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

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由于法国一部分右派分子同维希政权的妥协与合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右派在所有政治、文化、甚至文艺上的主张都威信扫地了。在近 30 年期间，左翼事实上垄断了文化和大学。

今天，正是左翼的——甚至中间派的——主张成了孤儿，变得平淡无奇，失去了往日的爱好和信心，总之，被抛向了历史性失败的地狱。法国不是被这种现象侵蚀的唯一一个国家。今天，整个欧洲的政治重心，不管承认与否，正在转向保守主义。

新美国模式被看做是一种纯洁而又坚硬的资本主义，自然要利用这股强大顺风之势。反之，莱茵模式浸透了社会观，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近亲，必然受到新的极端自由思想的狠狠打击。

有人还补充说，新美国模式显得强有力、有透明度、坚定不移，专业能力确实强！相反，莱茵模式则太复杂、有点萎靡不振，不说暗无天日也是透明度不够，总之，像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却又一意孤行的家伙，把社会需要与经济制约、历史遗产与对未来的急切要求搅在一起。可以理解，它是“通不过”的。然而，今日美国社会的特征是在新贵与新穷人之间存在断裂，这种断裂将大规模地，以东方国家中那种极端暴烈的方式反映出来，这样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正如我们开始看到波兰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应该切实开始关注这个“人道面目的资本主义”了，这种资本主义大致像我试图在本书中描述的莱茵模式。

因此，美国式资本主义在社会心理上、新闻媒体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并不像乍看那样自相矛盾。但是，人们对它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也不是始终看得很清楚。当美国式资本主义为了渗入莱茵模式，引诱英国或让法国坠入幻想而“横跨大西洋”的时候，它确实在自我输出，但美国式资本主义没有在他的行李中带上能够医治这些弊病的解毒药。这些解毒药尽管在大西洋彼岸也运用不多，但至少可以纠正“丛林法则”的过分之处，这些解毒

药包括：严格的法制、来自宗教的道德感、公民意识和结社意识，等等。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粗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跨国公司万岁！

但是，在这种最不完善的模式却占了上风的新趋势中也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这涉及到大跨国公司的实质。这看来有点反常，但确实如此。可口可乐、花旗公司、高露洁、福特、IBM 或麦当劳，不是比美国还美国的用语吗？这些用语首先是美国模式的表达方式。但如果靠近一点观察，就会发现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大跨国公司在两个基本点上与新美国模式大相径庭。

一方面，这些企业主要是根据一项技术创新和贸易创新计划，靠内部增长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一直从长期来思考问题。正是这些跨国公司发明了企业计划化，由于它们取得了成就，才在企业管理学校的教学大纲中设立了企业计划化课程。

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为了在各个大陆上发展，不得不在许多国家中进行招聘，并按照一种企业文化、一种协调的管理观念来培训它的员工。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此，跨国公司不得不基本上把它们的人际关系政策放在劳动市场之外，不得不尽力对本企业员工进行终身教育并为他们提供真正的职业保障。

从这两个角度上看，与其说美国的大跨国公司属于新美国模式，不如说属于莱茵模式。

现在我们来看看发轫于欧洲的跨国公司，比如 ABB、拜尔、雀巢公司、欧莱雅化妆品公司、施卢姆贝格尔有限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等等。对于同等规模的企业来讲，无疑它们比美国的跨国公司更有代表性。

在这一点上，壳牌石油公司有 3 条理由值得特别讲一讲：首先，这个企业“理所当然”地属于一种带有先天缺陷的企业，因为它是靠 40~60% 的英国和荷兰的利润建立起来的，因而，这种类型的金融平衡一般会被看做一种缺乏实力的因素。其次，壳牌石油公司的赢利却很快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杰出的经济预测能力。几年以前我就发现，壳牌石油公司的经济学家可能是世界上唯一预测到石油危机，并且说服其领导人根据这种预测制定本公司战略的经济学家。最后，壳牌石油公司虽然属于欧洲公司，但它始终实行一种要求特别严格，并被本公司员工认同的文化法规。

我前面提到的其他公司，总体来讲，至少有两个共同特点为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的优化组合打开了前景。

首先，所有这些公司，不管它们的历史多老、实力多大，全都摆脱了组织生物学的普遍规律。这条规律是：公司越大、越老，就越有可能由于臃肿的决策机构患了官僚主义瘫痪症，由于“大富豪企业”的雇员失去动力而变得头脑迟钝。

为什么大型跨国公司可以逃脱这种规律呢？这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上市以后，不管它们的实力多大，都要依赖金融市场，依赖这个无情的冠军教练，依赖这个奥林匹克竞争方式的杰出守护神。加之，跨国公司的实力越大、发展越快，它们的投资需求就越多，从而也就越需要求助于到股市上融资，而要增加资本就必须让股东感到高兴。

其次，大型跨国公司虽然依赖金融市场，它们并不屈从金融市场的随意支配。因为跨国公司的资本总是很分散的，任何股东都不能拥有足以得到特殊权力的股份。特别是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金融实力强大，足以保障它们能够抵御来自外部的任何冲击和任何不友好的“现金收购”。原则上讲，只要它们的赢利率能够维持，只要红利分配继续增加，这种情况就可以维持下去。

这些大型跨国公司虽然每日受到市场正常需求的如此鞭答，却不会被股市的无端波动而吓倒。它们当中的每个公司都能够实施、而且必须竭尽全力实施其长期的产业战略和独特的跨洲战略，这是它们扶持和团结世界各地精英的共同事业。正是由于它们懂得如何变成真正的多国文化，才能够完成真正的跨国发展。尽管莱茵模式有低估金融市场激活作用的倾向，欧洲的跨国公司却不得不把它们自己的成就归功于金融市场。

从这几个角度讲，大型跨国公司，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代表了一种优化组合的形象，它们既超越了莱茵资本主义中包含的保护主义风险，也摆脱了美国式新资本主义的附加金融危险。

第十章 德国的第二条教益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德国的第一条“教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完善与互助结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二律背反联盟（参见第五、第六章）。但是，应该承认，这个教益根本没有被理解、也没有得到传播。恰恰相反，80年代末，德国的景气政策越来越招致非议，磨灭了德国模式的光芒，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由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于1990年大张旗鼓地实现了重新统一，这类批评被一扫而光。确实，在历史上，经济的完善性从来没有对政治团结和社会团结提出过如此巨大的挑战。莱茵模式的德国大胆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在欧洲范围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实验。

欧洲僵化症的替罪羊

在80年代里，即里根—撒切尔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德国模式确实不是什么济世良方。人们倾向于把德国模式看做一种没有远大前程的旧机制，德国模式谨小慎微并固守传统主义，使联邦德国的欧洲伙伴受到连累。更具体地说，人们对德国模式提出了两条指责。

1. 人们认为德国应该对欧洲经济衰弱，即众所周知的“欧洲僵化症”负责。自1974年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欧洲再也不能恢复1945年以后在整个“辉煌的三十年”间曾经达到的增长

速度。实际上，欧洲一般存在两种增长速度。反之，美国人和日本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增长速度截然不同的划分。他们的经济继续在增长，尽管速度稍微低一些，但至少也是可比的。如果把两次石油冲击以后的几年除外，它们的就业增长速度相当不错，在美国甚至有很大改善。

在似乎陷入滞胀状态的这个欧洲，体质上的欧洲僵化症又转化为社会心理上的僵化症，当时人们经常把这种病症称作“欧洲悲观主义”。

什么老龄化民族的必然命运呀，什么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瘫痪性制约呀，什么缺乏劳动者和精英们的活力呀，所有这些一般性解释都是根据对德国的特殊指责提出的。人们特别指责德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不能再扮演经济火车头的角色。德国人则嘲笑其邻国的命运，满足于完全可以保障其繁荣的2%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

——首先，德国面临人口下降的局面，因而持续增长的必要性也不大了。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的比重，同瑞典一样，是西方世界最高的。人口预测表明。到2030年，这一比重将提高到25%。这种局面意味着，需要创造的就业少了，需要修建的基础设施（托儿所、小学、大学，住房等）少了，需要满足的新需求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必要拼命维持高增长率呢？

——相对而言，法国则面临必须迎接嗷嗷待哺的新生代。因而，法国为了创造就业，为了集资建立必要的设施，总之，为了满足这些嗷嗷待哺的新生代——1968年五月运动的支持者——能够进入消费社会，在把增长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以后还再接再厉。

终于如此，坚挺的货币！

在这种前景下，由于拼命地恪守严格的金融正统，人口衰落

带来的经济放慢似乎越发严重。众所周知，德国人从历史上继承了一种对通货膨胀的极大恐惧，因为这是造成战前一切灾难的源泉，也是产生纳粹主义的部分原因。1948年的货币改革中诞生了德国联邦银行，它奉行的基本宪章规定，金融管理机构有保证马克稳定的义务。加之，70年代末的惨重失败至今仍萦绕在莱茵河彼岸所有人的脑际里。当时，德国人的西方伙伴曾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起火车头的作用，德国人让了步。结果是：在他们面前再一次“亮起了红灯”。

最后，德国人为了从我在本书第六章描述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好处，极力维持一种坚挺的货币。这样一种政策要求在短期内把保持总体的金融平衡放在优先于经济增长的地位，以便巩固中期的经济增长。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德国马克的稳定，首先必须限制财政赤字，如果必要，还要提高利率。这是一种严厉的纪律，但德国人继续从中得到好处。

于是，人们指责他们由于人口减弱而采取一种硬通货政策。当英国躲在撒切尔主义的假货币主义信条后面时，欧洲大陆遗留的一些凯恩斯主义老信徒还有能力使人相信，经济活力需要某种货币宽松主义。在欧洲伙伴中间，这类批评特别激烈，因为它们遇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在就业方面更加突出的人口问题。确实通过欧洲货币体系(SME)，德国的严厉政策在欧洲共同体内得到传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固定汇率体制下，资本流动自由是充分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是独立的。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脱离汇率变化的总趋势。如果一个国家单方面降低汇率，资本就会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结果是，这个国家的汇价必将低于其他国家。握有强势货币、实力最强的国家采取的刺激措施或货币选择，便会传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其他成员国。德国利用利率把它的正统货币理论强加给它的邻国。

当时，德国的某些邻国曾怒斥它的强硬态度，批评它积聚外

贸盈余、利用其货币实力向邻国“发号施令”。

但是，随着欧洲货币体系纪律保障了这些传统上通货膨胀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进展，这类批评也就自动减弱了。在社会党人执政的拉丁语系国家中，诸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经济进步尤其明显。在这些社会党人中，盎格鲁—撒克逊报刊往往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当做坚挺法郎的象征。终于如此！

2. 对德国的第二类批评涉及到德国模式的本身。例如，德国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停滞不前便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遭到这样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被新美国模式、包括美国模式中的“现金收购”狂热、股市癫狂、各种各样的幻想和大刀阔斧的变革吸引住了。

在他们看来，莱茵模式再也不能经得住比较。它的金融市场狭窄而衰弱；它的工业集团资本捉襟见肘。至于要为这种结构固定不变负责的社会市场经济，也被看做是不合时宜的了。有些人甚至预言，德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要衰退，莱茵河彼岸的企业将被削弱。我对这股思潮记忆犹新。当时我正主持国际景气研究与信息中心（CEPII）的工作，由于它有几个优秀的课题组和各级优秀的领导人，往往被看做——特别是在美国——是同类研究机构中最优秀的一个。1981年10月，国际景气研究与信息中心的学术刊物发表一篇现在看来标题有点好笑的文章：《德国模式核心的非工业化》。

总而言之，德国人被人看做坐享其外贸赢余、一心想的是如何利己主义地利用其财富的食利者。1985年德国的人均消费是欧洲最高的，达到每年8000美元。储蓄率也与其他国家不同，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至于贸易平衡，更是不断创造新记录，1988年的顺差达到1300亿马克。

正是这个对成绩和享受心满意足的德国，遇到了雷击一样的统一问题。

统一的雷击

谁也没有想到联邦德国会对柏林墙倒塌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双重挑战做出如此迅速和有力的反应。回想一下统一问题开头引起的疑虑和怀疑，就可以知道这次挑战的规模了。

首先是国内，最初是一种纯粹的爱国激情，西部的德国人担心他们的东部邻居会给他们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最终会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个既宽宏又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变得怎么样呢？面对几个星期之内从东部逃来 **70** 万难民的事实，已经出现了不信任的反应。

人们也担心这种统一带来的政治后果。人们确实对未来德国的政治格局忧心忡忡。赫尔姆特·科尔搞的统一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他的党会产生不利的影晌？基督教民主党对能否在统一后的德国继续执政完全没有把握。而所有民意测验都说明，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将从中渔利。甚至有一段时间，即 **1990** 年夏，德国统一在法国……比在德国还深入人心！

在国际上，疑虑和担忧也不比德国国内少。德国人完全意识到，一个由莱茵河彼岸的新巨人及其 **8000** 万居民控制的欧共体的前景可能在其欧洲伙伴中引起何等混乱不安。

战后欧洲的整体平衡确实是建立在雅尔塔分割和德国——这个被战败的列强——的分裂之上的。两个德国的存在可以维持由两大集团对抗，特别是军事对抗造成的既成事实上。在核领域中，两个大国拥有的大量战略核武器、实际存在的或设想中的“力量对等”，保障了恐怖平衡。在欧洲舞台上，中程巡航导弹（一方是潘兴号导弹；另一方是 **SS 20** 导弹）居然使威慑理论在

欧洲旧大陆的本土上生根。总而言之，欧洲人可以从自身开始，自己毁灭自己。在常规武器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是为在中欧进行一场战争而训练和装备起来的。两个阵营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数量的兵员、装甲车、飞机、战炮零件，可以耀武扬威，可以发出严重打击的威胁，这种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威慑。

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德国人都感到在未来的一场冲突中，他们会首当其冲。首先是因为，这场冲突注定会在他们的领土上进行。其次是因为，两支德国军队，即联邦德国的军队和民主德国的军队，都处在第一线。由此在联邦德国产生的日益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德国“民族和平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在前面提到的经济“利己主义”的军事点缀。

统一有可能打破这种令人感到相对安心的平衡。人们带着某种不安的心情，怀疑这些军事集团、这些军事战略、这些武器和军火储备有朝一日会发生什么突然变化。总之，人们把统一看做一种混乱，或者一种威胁。至于统一后的新德国未来将采取什么立场，倒不令人担忧，它自己也不担忧。统一后的德国将转向哪一边呢？德国不是一方面由于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西方，同时又通过70年代初威廉·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而不可逆转地朝向东方了吗？

但是，德国的伙伴国在经济方面的担忧也很强烈。对德意志这个庞然大物的回忆曾经使布鲁塞尔感到心有余悸，每个欧洲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反应。英国人进一步密切了同其美国老表的联系，幻想可以出现新的协调一致。法国人又唤起了对昔日法俄政策的回忆，以便建立另一种联盟。

在统一的道路上，确实出现了不少的经济障碍。最初H. 谢倍尔(H. Siebert) 预计需要6000亿至1兆2000亿马克，即使对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这个数目似乎也够大的。但是，人们有理

由担心的主要是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后果。为了给统一提供费用，需要大量求助于金融市场。这样一来，在储蓄减少、资本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自然会给利率造成新的压力。德国人在市场上的这种大抽血，有可能使外国资本转向别的、不太惹人注目的国家或不太可靠的投资场所。

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前民主德国公民的需求过度增长导致德国经济过热，有可能再次引起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中是存在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美国的巨额赤字、庞大的资金流动量和生产能力的高利用率。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就深信发达国家的经济已不会再持续地陷于高通货膨胀（10%或10%以上）状态了，因为在当前市场完全信息化的时代，通货膨胀恶果的蔓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太可怕了，以至不得不立即采取严格的对应措施。但有许多不同意这种分析的人把德国统一看做引起“价格火药桶”燃烧的火星。

在社会方面，人们确实对如此消除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巨大差距的方式表示怀疑。民主德国的人均毛工资实际上低3倍。这个差距本身不就带有爆炸性吗？更有甚者，在德国的两个部分之间，物价价位是完全不同的。在前民主德国，日常用品（面包、土豆、房租和交通费用）低5倍。反之，其他东西，例如耐用商品（电视机、电冰箱、微电脑）的价格则高出2~8倍。因此，东部的德国人很难像过去一样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能享受到消费社会的乐趣。所有这一切，无论过去和现在，都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其他方面的困难，虽然较难量化，却谁也不敢无视它们，这就是过去两个德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1990年底进行的各种调查和民意测验表明，分开生活的40年造就了不同的精神、情感和生活方式。例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在联邦德国的成年人中，只有7%的人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而在前民主德国，无神

论者达到**66%**。广而言之，在西部地区使用的某些术语或观念，在东部就根本听不懂。有些广告公司曾出资对此进行过民意测验。

所有这些附加问题表明，德国面临的挑战具有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实际上，敢于这样强有力地迎接挑战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可能会尝试采取更加渐进的、逐步的方式解决问题。许多国家可能由于担心引起抗议浪潮、引起疑虑和过于危险的失望而坐以待毙。统一的基础越是建立在苏联能够接受的基础上，陷入困境的危险就越大。因此，必须在莫斯科发生危险的演变——这种可能是始终存在的——从而重新冻结现状之前，尽快使统一变得不可避免。**1990**年底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遇到的困难说明，这些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德国人有理由走得快点……

赫尔姆特·科尔的惊人魄力

科尔总理不顾大家的反对做出了果敢的抉择。果敢又迅雷不及掩耳的政策使德国政府可以粉碎一切阻碍。属于国际背景的首要障碍立即被扫除掉。实际上，统一后的德国立即让大家知道，它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权成员，给苏联人来个措手不及，无法反对这个抉择，甚至连象征性地反对也做不到。赫尔姆特·科尔一石双鸟——当然在财政许可的条件下——同时争取到驻原民主德国的苏联红军根据明确的日程表和按计划乖乖地撤出这个国家，德国将为此付出**120**亿马克。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军事“解放”，花的钱不算太多。总而言之，是马克战胜了坦克和大炮。

欧洲人的保留态度也旋即消除了。联邦德国的伙伴国也完全被事态的神速发展搞得晕头转向，它们无力控制事态的发展，事

态的真正组织者在波恩。当然，德国外交部通过庄严宣告它忠于欧共体的方式，竭尽全力消除各种疑虑、尤其是法国的疑虑。围绕“大德意志”复活问题曾经费了不少笔墨和口舌，萦绕在人们脑际的这种忧虑也很快消除了。

在德国内部，赫尔姆特·科爾的政治对手们一度把选举希望寄托在德国统一问题之上，结果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他们不仅在西部地区丢失了地盘，在原民主德国举行的第一批选举中也遭到政治惨败。基民党与自由党联盟在两轮选举中大大领先，使执政党得到宽裕的多数席位。

除了赫尔姆特·科爾的魄力，还要加上联邦德国政府前所未有的团结努力。公共财政负担（联邦预算、州预算和社会保障机构预算）确实非常沉重。保守的估计5年内每年也达**1200**亿马克，即总数达**6000**亿马克。其中一部分经费将由一个“德国团结基金”提供，它约有**1150**亿马克的基金，耗资数量差不多等于联邦德国年均对外投资的总量。如果再进行一种比较，那么，这笔费用近乎接近家庭储蓄的一半了。这就需要向纳税人和社会保险投保人做很多工作，否则就要采取普遍发行债券的方式，其后果将是危险的（债务负担增加每年**1000**亿马克、利率提高、国际资本流失，等等）。

现在，这种假设已成为过去。当然，在选举运动中，科爾总理未能使人相信可以在不增加任何税收的条件下实现统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式新资本主义的基本要求，即嬉皮士时代加利福尼亚州的这种反增税狂对世界有多么大的感染力：即使在相反模式的灯塔——联邦德国，即使在正值统一的伟大爱国主义历史冲动的时刻，科爾总理也不得不为这种反增税狂热做出牺牲。但是，自**1991**年初以来，他已不得不向议会提出大幅度增加税收了。

一般估计，**1991**年从西部向东部转移的公共基金增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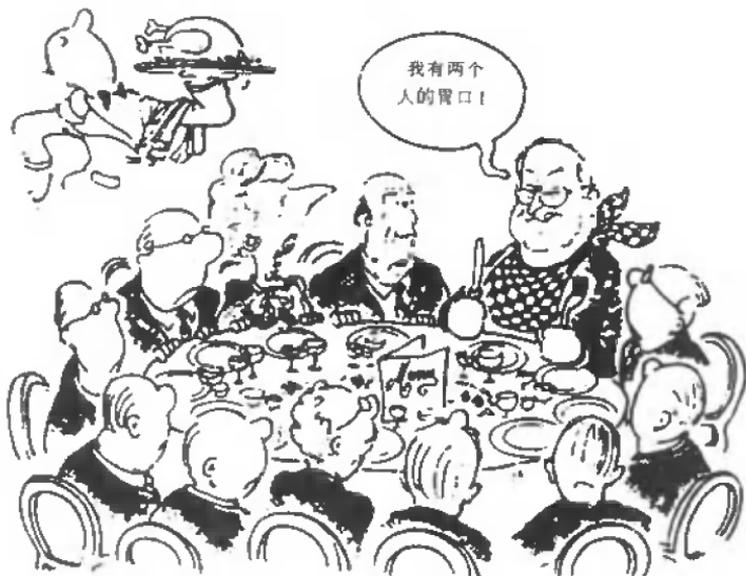
1500 亿马克左右，即相当于 5000 亿法郎，几乎等于法国人把他们的全部医疗费用支出都贡献出来了。或进一步说，比我们的所得税收入高出了 3 倍。这就是说，这种财政努力是巨大的，甚至是空前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不同寻常的：有目共睹，目前，不平等现象同 19 世纪“野蛮”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在增长。世界上只有这个地方，不惜任何代价，仍然把缩小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看做重中之重的任务。

统一的费用不仅仅由公共基金来提供。根据在西德大公司或中小企业与原民主德国企业之间签定的许多合作协议，私营部门也同样全力参与了这项行动。由于东德企业向竞争和“市场真理”的开放，导致其中许多企业陷于破产，这种合作就愈显得必要了。联邦德国政府的托管局（**Treuhandanstalt**）接收了东德的所有企业，以便把这些企业私有化，为此，1990 年向它们提供了总数达 550 亿马克的贷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贷款的一半以上是没有偿还希望的。总体来讲，要把前民主德国的新私有部门提到“平均水平”，必须由西部企业承担巨额投资。

意大利南方地区，还是第五条龙？

为了赎买完全沦于破产的和被“分割开三分之一”的土地，德国付出了这笔空前巨大的财政努力，这显然表明出一种巨大魄力和宏伟胸怀。但德国也明白它将得到回报，把前民主德国消化吸收也意味着一种额外的增长。德国甚至成为世界增长和稳定的主要一极。在这个经济普遍放慢的时期，这是非常难得的收获了。诚然，现在还很难估计统一对德国经济带来的中期和长期影响。但至少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几种大致的前景。国际景气研究



资料来源：波朗杜，《这一届巨户的斗争》，第135页，《发现》杂志—《世界报》合刊，1990。

与信息中心为未来5年提出了两个预设方案。

1. 第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第五条龙”，这是参照了亚洲4条“龙”的叫法。这是一种最乐观的设想，预计前民主德国将有一个飞速的增长。这种方案的基础是建立在3种假设之上的。首先，前民主德国的投资要有适度增长，至1995年，那里的投资将达到联邦德国的75%（1990年为30%，1991年已达到50%）。其次，1995年以前，每年前民主德国的投资总数将达到1100亿马克。最后，外国产品渗入率达到40%，前民主德国公民的外流逐步减少，流动人数从1990年的36万降低到1995年的5万人。

如果这些设想能够实现，统一给整个德国经济带来的成效将是可观的。6年内（1990～199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将达到**3.7%**；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原状不变；1995年，失业率将继续低于劳动人口的**8%**；至于经常项目收支，将始终维持顺差，约占国内总产值的**2.7%**。

此外，这也是最有趣的，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的差距将逐步填平，前民主德国的失业率只有**11.8%**，而经常项目亏空只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

最后还要指出，按照这个方案，德国的活力，无论在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支出平衡方面，都会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整个经济带来好处。1991年第一季度，法国汽车在法国的销售量降低了**20%**，而在德国却增加了**40%**。这是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明智方案。

2. 第二个方案叫作南方地区（*Mezzogiorno*），借用的是意大利南方的叫法。因为尽管意大利政府做了努力，同北方相比，南方仍然相当落后。设想这种方案的依据是：前民主德国的工资增长明显加快了，因为1995年以后，这些地区的工资将达到联邦德国工资的**90%**。这里的主要差别在于：缺乏耐心的和“只能怎样怎样”的方案拒绝倾听理性劝告。带来两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是：这里的投资相对水平较低，6年内每年投入约**900**亿马克；人口外流数量依然可观（同期每年**20**万人）。

这个方案取得的结果显然不太有利。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不过是**3.5%**。失业率达到劳动人口的**9.8%**。通货膨胀缓慢加快，经常项目赢余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但是，同“第五一条龙”的方案相比，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这个方案加深了德国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前民主德国地区，1995年失业率将占劳动人口的**20.8%**，经常项目逆差将达到国内生产总

值的-16.1%。

正如国际景气研究与信息中心的专家们所强调的，我们将看到某种形式的非工业化现象，或前民主德国的某种经济沙漠化现象。

从这两种方案中可以得出什么教益呢？首先，前联邦德国从重申对前民主德国的援助中赢得了一切，尽管从一时来讲这种团结的代价是昂贵的。“第五条龙”的方案需要更多地调动公共基金和要求更注重效率，显示出最终将比意大利南方地区方案对大家更有好处，而第二个方案对援助前民主德国地区采取不够积极的态度。更为重要的第二条教益是，必须指出，按照“第五条龙”方案，前民主德国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明显地不如意大利南方地区方案增长得快。严厉的工资政策是减少失业和加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1981~1984年的法国人对此非常理解。当时的想法是，要同失业做斗争，就必须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收入，慢慢地他们也会痛苦地认识到，只提高名义工资不提高购买力、就可能既加剧失业又打压了购买力。正是由于公众的经济意识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进步，才带来了对企业的重视，带来了法国经济的振兴，甚至带来了我国历史上对资本主义效率的破天荒第一次真正的共识。德国东部和中欧国家今日遇到的正是这种性质相似，但规模已不可同日而语的挑战。赫尔姆特·科尔自大选运动伊始，就不断提醒东部地区说，“走向福利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他的竞选对手则沉醉在一片掌声和颂扬“德意志统一的祖国”的呼声中。而今天，当反对失业的游行示威不断增加和前民主德国的钢铁工人为争取1994年得到与西部的工友相同工资而斗争的时候，应该问一问由于工资增长过快，前民主德国是不是正在滑向“意大利南方地区的方案”了。

波埃尔先生“可悲的”误解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联邦银行行长波埃尔 (Otto Poehl) 先生 1991 年 3 月 26 日在布鲁塞尔宣布，国际货币联盟 (UMA) “是我们不应该在欧洲照搬的榜样”，同时指责德国政府“不做任何准备，特别是根据一种不恰当的汇率，草率地把德国马克引入东部地区。结果是可悲的”。

“可悲的”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形容词出自中央银行的一位负责人之口，特别是出自德国联邦银行 (BUBA) 的负责人之口。诚然，我们懂得他这样做是要尽力告戒波恩政府，不要为了实现统一而不惜债台高筑，这是他的责任。但他这样做同时也是在为德国的一次不幸失败出口怨气，并一箭双雕也指责了欧洲货币联盟。但愿波埃尔先生的历史性宣言能够马上压低德国马克的汇价，无碍大局。更严重的是，他居然那么快就忘记了，如果科尔总理不是毫不犹豫地立即采取行动使形势变得不可逆转，谁也不能肯定铁幕会在柏林市中心降下来。这场愤怒的起因，就是由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实现统一的时候，前民主德国与前联邦德国的生产力对比为一比二，或一比三（等于联邦德国与葡萄牙的比例）。从技术观点看，德国联邦银行提出的兑换率是适当的。科尔总统从相反的角度做了裁决，选择了“一兑一方案”。

如果单看报刊，这项决策的后果确实是“可悲的”：失业上升，工厂倒闭，几个月以前还激动不已的人们垂头丧气了。然而，如果科尔接受了波埃尔的意见会怎么样呢？不错，东部地区德国人的收入可能增加得少一些。有利的一面也许是失业增加得慢一些；但不利的是，无法控制大量的人流入，前民主德国将出现一场名副其实的空壳化。正如总理所说的：“如果马克不能流向莱比锡市，莱比锡市的居民就会到这里来找马克。”1990 年的

几天内，就有 15 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跨过原来的边界来到西部；而到了 1991 年春天，则只有几百人了。波埃尔先生使用“可悲的”这个字眼，是假装看不见这个可怕的两难局面：要么把失业留在原地，要么由于东部 5 州的劳动人口外流而出现沙漠化。失业是暂时的，沙漠化的时间则是无限的。科尔的选择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而德国联邦银行董事长的误解却是可悲的，理由有二。几十年来，法兰克福金融当局提出的原则是，没有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的事前协调，就没有货币联盟。然而，两个德国经济之间的协调是多么少，而差距又多么大呀！因此，国际货币联盟 (UMA) 必然导致可悲的结果，否则，联邦银行不仅看到它奉行的头号信条在德国本身落空，而且有可能在它准备推行同一信条的欧洲机构面前丢脸。这就是为什么波埃尔先生说国际货币联盟 (UMA) “是我们不应该在欧洲照搬的榜样”。然而，真理是可以参照的，近十几年来拉丁语国家的榜样尤其表明，货币联盟加强了各国经济的协调性。大唱反调就意味着，可以把葡萄牙和希腊，当然也包括西班牙、甚至意大利、撇在未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UEM) 之外。

果真如此，那么，中欧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希望何在呢？它们不是希望越来越与欧洲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进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吗？如果欧洲联盟不能向中欧国家扩展，那么，这些国家的居民就会涌到我们这里来。

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最新消息尤其令人担忧。科尔总理在本选区的部分选举中遭到惨败；波埃尔先生辞了职；钢铁工会 (IG Metall) 争取到钢铁行业的工资在东部 5 个州中将从 1991 年相当西部工资的 60% 增加到 1994 年的 100%。这表明正在出现一种危险地、甚至可悲地滑向“意大利南方地区”方案的趋势。

然而，出于一个基本原因，这也正是德国第二条经验，我要

坚持并且强调：只有德国真正联合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只有它结成了联邦，才能向我们指出在欧洲能够干什么。

欧洲能够干什么

人所共知，一个政府向它的议会多数派经常弹的老调是：“你给我好财政，我给你制定好政策。”在这一点上，赫尔姆特·科尔将成为历史，因为40多年来，德国一度成为正统财政的圣殿，它以空前的勇气实现了两个德国之间的暂时货币统一。违背官方专家的建议，不顾限制了国家活动余地的经济国际化，也不管选举的不确定前景和人们竞相求助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民族的、州的和行会的利己主义），这个看起来既缺乏想象力又没有魄力的人，一旦从波恩把他的联邦政治意愿强加给领导着法兰克福中央银行的各州代表，才向人们展示出了他的才智。

有一个经常被遗忘的真理：在政治统帅面前，经济的需要有时会自动退避三舍，但条件是不能把这条原则当做遁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这种政治优先只能建立在经济和金融预先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经济越强大政治越能从经济中解脱出来。如果德国没有赢余积累，如果它的货币不是那样坚挺，如果它的企业不是那么完善，如果它的经济潜力不是那样巨大，德国根本就不可能在东部地区进行如此辉煌的“现金收购”（OPA）。德国在各种机会从这种“现金收购”中得到好处。这是因为德国善于把握和控制那种著名的“经济制约”，而且能够摆脱这些制约。

还必须从德国的这种经验中得出这样一种观念，即果敢与援助可以有效地结合起来。谈到果敢，经济活力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排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而援助也不是注定会带来消极被动、臃肿和官僚主义。

但是，尤其应该清醒地记住莱茵模式特有的两个基本因素，

由于这两个因素，才有可能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统一。我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这些因素，但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它们更凸显出来。

第一个因素是：对国家利益有长期观点。德国人懂得，今天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做出的牺牲会给未来带来好处。当然，初期赤字将增加，顺差将减少，社会保障会受到影响，纳税人负担将加重。不管这些做法在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招来多少怨言，德国人最终还是使所有人都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到了回报。

第二个因素是：共同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德国人约束个人利益而把他们的长期政策当做支柱。这确实需要对公共收入和私人收入采取一种谨慎的、平衡的和节俭的行动。如果科尔总理未曾倾听西部地区纳税人或失业者的意见，他根本不会冒这种风险。

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了，如果那时让金融市场发号施令，把金融市场的逻辑强加给企业和政府，会发生什么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去冒险实现统一了，根本就不可能在一片怀疑声中从长期去考虑押下这个宝了。因为所有的不肯定因素——特别是金融因素——都尚未消除。谁也不真正知道统一需要的大量必要基金所引起的财政紧张能否在不带来过多痛苦的条件下被消化掉，其中包括利率提升、通货膨胀、欧洲货币体系动荡，等等。潜在的风险也依然存在。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样一些风险在一个金融机构实力稳固的体系中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在德国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在新美国模式中也是如此——太浮躁、太敏感和太缺乏预见性了，以至无法经受重新统一的冲击。一个面向企业的稳定而强大的银行体系，有充分准备在不造成过多损失的情况下适应各种新的金融需要。在一种基础牢固的、建立在几十年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体制内强调共同利益，要比在成千上万的金

融操盘手面前说这种话容易得多，这些金融操盘手着迷的是眼前收益，他们是根据稍纵即逝的标准行事的，主要是看舆论……某些操盘手也在对舆论推波助澜。

总之，“德国的教益”应该促使我们对涉及整个东欧的一些挑战性问题进行有益的思考。德国与它自身被历史羁绊住的“三分之一部分”已经完成其使命，整个欧洲不能与它自身的“三分之一部分”——被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所扼杀、毁灭的中部欧洲——共同完成这个使命吗？

在简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对目前所犯的严重错误也应进行一下评估，这些严重错误可能使德国东部陷入比意大利南方方案估计的前景更糟糕的境地。其中两个主要错误是，一方面，工资增长在先，并且大大超过生产力的增长；另一方面，社会援助过于宽宏，使得今天没有工作的人比昨天劳动的人挣得还多。至少，东部地区的舆论对此是不高兴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他们的未来前景还远远不如西部地区令人满意。西部地区做出财政牺牲却把东部地区打入昏昏沉沉或火冒三丈的做法还要继续多久呢？在很大程度上，这要看生产性投资的速度了。

这些投资将主要是德国投资。当然是西部德国人，但他们也是德国人呀。与此相反，在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里，开发本国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靠外国投资才能加快市场经济的启动。外国投资的速度肯定是缓慢的；但是，如果外国投资速度加快，如果外国人开始在这些国家中干起来，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应也有可能更加激烈。

这并不妨碍在德国人的援助过分和邻国的援助不足之间，存在着寻求最优方案的广阔空间。

但是，这种寻求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不能具体提出问题。为什么？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吧。

前民主德国的人口是 **1760** 万，而前联邦德国的人口是

5800 万,前者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多一点。欧洲共同体 12 国的人口为 3 亿 4000 万,而前民主德国加上 3 个中欧邻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人口总数为一亿。这 3 个国家曾经希望,1989 年摆脱共产主义以后即将为它们打开天堂——天府之国——的大门,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刚刚踏上穿越沙漠道路的起点。在这片沙漠上,尽管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BERD)付出了努力,那些虚伪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却大叫大骂,抱怨他们得到的赐品无法同东部地区的德国人相比。这是因为,尽管欧洲共同体自 1985 年取得了进展,但与联邦德国不同,它压根儿不是一个政治联邦,甚至还不是一个已经建成的单一市场,不如说是个自由贸易区,除了农业和欧洲货币体系以外,没有任何共同政策。

如果组成欧共体的 12 个国家像自由世界的所有联盟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的 10% 或 15% 的资源而不只是 1% 或 2% 的资源连同它们的货币放在一起,它们将立即朝莱茵模式的方向跨进一大步,团结互助与发财致富是互相支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它们同时也就拥有了在中欧把经济沙漠变成良田的手段。显然,无须再把德国的第二条教益照搬过来,看看美国人怎样利用马歇尔计划就够了:一个国家同意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也可能间接地对敢于提供宽宏援助的这个国家有好处。

发明这种做法的国家叫做美国。有个美利坚合众国,可没有欧洲合众国。我们认倒霉。欧洲没有这种合众国会使我们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以及它们的邻国更倒霉。由于没有建立欧洲合众国,我们开始在中欧和东欧建立一个瓦尔加·哈韦尔最近称作的“失望的、不稳定的和混乱的地区,它对西欧的威胁不亚于昔日华沙条约坦克部队的威胁”。

第十一章 法国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

在海湾战争期间，欧洲舆论界惊奇地突然发现，他们正面对着一场悲剧，他们在电视屏幕上惊心动魄地看到了一切细节，这场悲剧显然首先与欧洲有关！可欧洲却不存在。2亿**5000**万美国人毫不犹豫地**向海湾派了55万大兵**，而欧洲共同体的**3亿4000万人**只能招募到打着不同国旗的**45000人**去接受美国统帅部的命令。

人们把发现没有欧洲军队看做一个小小的丑闻，因为谈论欧洲那么久了，我国和差不多所有外国居民都朦朦胧胧地在他们的下意识中认为，欧洲联合已经建成了。他们发现，非但没有团结一致，反而看到一个同美国亦步亦趋的英国、一个军事上紧跟却又在外交上有所区别的法国、一个宪法上没有权力派出一兵一卒的德国以及陷于深刻分裂和经常出现反美示威的拉丁语国家，例如西班牙。

这种分裂、这种软弱无力、这种愚昧无知只能强调表明，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当务之急是选好自己的资本主义模式。否则，市场的力量将代替人民进行选择。已经开了个头，是个坏的开头。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在同一性中分裂为两大深刻对立的潮流。欧洲大多数国家接近莱茵模式胜似接近新美国模式。但我们看到，莱茵模式在国际范围内正在退却。

考察一下欧洲建设的进展，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了。从第一次石油冲击到**1992年枫丹白露首脑会议**，欧洲建设被冻结了将近**10年**之后，再次大张旗鼓地走向**1992年**的“单一市场”。然

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人们惊异地发现，尽管法国人强烈支持这项计划，它的内容却来自撒切尔的思想；德国人赞同这个，批准了那个，他们的基本愿望却是不管经济和货币联盟有什么进展，都不要损害德国货币的稳定。

现在，我们被逼到了墙角。两次政府间会议，一个是负责准备经济与货币联盟，另一个是为政治联盟做准备，都不得不在两大对立的观念之间做出抉择。这两种观念反映在 1988 年撒切尔夫夫人和 1989 年雅克·德洛尔分别在布鲁日市的精彩发言中（参见附录一）：或者欧洲不过是个市场，一个大市场；或者欧洲是需要一种真正的联邦权力的社会市场经济？这是根本性的两难抉择，共同体的 3 亿 4000 万居民的命运将取决于这个抉择，中欧国家和地中海南岸国家的命运也间接地取决于这个抉择。

然而，在欧共体 12 个国家中，这种抉择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对法国那样生命攸关。

与柯贝尔传统决裂的法国

很难摆正法国在两种资本主义大战中的位置。这正是熟谙法国商界的外国观察家之一，波罗迪教授所指出的。这位 IRI 组织的前主席不久前在《磨坊》杂志（1991 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两种模式之间》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启迪意义。因为这篇文章涉及到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划分标准同本书中提出的标准非常接近。

至于法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全盘地接受这种或那种模式。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传统上起的作用有限。巴黎股市的规模与伦敦股市无法相比就是最简单的明白无误的证明。另一方面，那里没有创立银行集团，或类似德国的所有制结

构，然而，那里的公共企业，包括工业企业或从事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的企业，却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80年代的事态发展尽管有特殊的含义，但也值得加以特别关注。在希拉克总理的推动下，财政部长巴拉迪尔于1986年确实准备了一项对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计划。这项计划预计要把雇有50万员工的27个集团转为私营部门。但由于随后的内阁变化，这个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

无论如何，有8个大的企业集团从公有部门转为私营部门了，其中大多数属于巨型企业（例如，圣-戈班公司、巴黎荷兰银行、电力总公司、哈瓦斯新闻集团、兴业银行和苏黎世银行等）。

法国实行这种新政策的初衷使人联想到它的一个目标是要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靠拢，目标是通过产生几百万新股民来扩大股市的规模。但是，由于许多新的小股民为了短线获利很快就把他们的股票抛出了，这个扩大股市的目标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话说回来了，这些实现私有化的方式却构成了向日耳曼模式所有制结构靠拢的一个“客观”前提。在所有私有企业中，指挥权力掌握在“硬核”股东的手里，尽管他们只占有25%的股份。通过逐渐理性化的盘根错节的股东关系，在法国正在组成几个大的金融集团和工业集团。从这些集团的产权形式和相互联系的稳定性来看，它们接近日耳曼模式胜过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尽管在德国，这种体制也远远没有那么紧密和严实。

此外，在法国还有许多公有制企业既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性质，也不符合日耳曼体制的性质，虽然近几年来法国公有制企业的战略——特别是涉及到外国企业的收购问题——参照日耳曼逻辑超过参照盎格鲁—撒克逊逻辑。

实际上，这些收购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共同体内

部，都引起了激烈的反应，因为人们不是把这些收购看做一种企业战略的结果，而是看做一种国家战略的工具。

法国在半个世纪中曾经如此向世界推荐它自己的模式，即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现在它的面目还是那么模糊不清和难以分类呢？有两条基本原因：第一条是，我们终于割断了我们的社会—柯尔贝旧传统，充分进入了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第二条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我们至少既借鉴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借鉴了日耳曼—日本模式。

法国的传统是社会—柯尔贝主义，即国家以一种政治雄心 and 一种社会进步意愿的名义统帅经济。然而，社会—柯尔贝主义正面临着失败。证据是，公务员在法国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地位正在加速下滑，昔日公务员是荣光显耀和令人羡慕的，今天别人则对他们往往不屑一顾；而明星/资本家模式却在擢升。关于第一点，人们注意到，在日本，只要学历和年龄相同，公共部门的工资与私营部门的工资就基本相同。不仅如此，教师的工资收入比其他公务员还要好一些，因为在这个有学而时习之儒教传统的国度里，教书是一种高贵的职业。对于日本人来说，教师应该是生活的导师，他们认为，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是使儿童得到良好教育的保障。

至少，中央国家无所不在依然是法国的特征。在我国，国家无所不在。在政治方面，尽管进行了权力下放改革，中央集权的雅各宾主义依然被奉为圭臬。在我国，国家的权力一直是第一位的，同联邦制组织在德国、美国或瑞士占主导地位，并且在地方一级发挥作用的情况毫无共同之处。在德国，对工业企业的很大一部分援助来自各个州政府。联邦银行理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各州的代表，他们对国际金融的巨大波动无动于衷，更不再乎

来自波恩的意见！

在经济方面，如果根据存在一个强大的公有部门而认为1991年法国的国家仍然是统制主义的原型，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应该严格区分，一种是公共垄断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铁路公司和储蓄银行；另一种是服从国际竞争的国有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近15年来，后者基本上是根据平等竞争原则来管理的。

似乎只是从技术角度讲，公共领域才在大多数科研机构中仍占主要地位，例如原子能部门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CEA）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OGEMA）、全方位研究的国家科研中心（CNRS）和医学研究部门的（INSERM），等等。在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中则截然不同，那里的科研基本上属于企业或大学，尽管科研也可以享有公共援助。

总的来看，首先，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属于这样的国家，它的特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机构在社会的地位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强大，这是一个柯尔贝主义的国家，它不停地监管着经济：这个国家一方面实行保护主义和统制主义，另一方面又是投资者、创业者和圣西门主义者。

其次，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对立显然与两种工团主义模式密切相关。第一种工团主义模式，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始终拒绝慈父主义、参与制、尤其是共同管理制。这种工团主义或者满足于参与类似美国那样的纯“企业管理”行为，或者像在英国那样，作为支持工党的政治力量而活动，它是按照一种半统制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方式从外部反对资本主义的。

与此相反，莱茵国家的工会——日本的工会从中借鉴了许多经验——选择的战略是融入企业、并接受竞争性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每个工会会员就像一支足球队队员，他的动力首先是为了本俱乐部的胜利。

法国工会的特点则是过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具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因此难以把它同上述两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类型等量齐观。

国家主义传统、工团主义传统，这是法国资本主义之所以难以分类的两条主要理由。

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受到一种柯尔贝主义的国家 and 颇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雇工体制的羁绊，很长时间内摇摆于权威主义与鼓惑宣传之间。法国资本主义的鼓惑宣传体现在一系列工资膨胀的统计和法郎贬值上。而权威主义特别反映在企业中的绝对君主专制中；董事长（PDG）说了算的原则不是一种德国观念，而是地道的法国观念。莱茵国家每天都在证明集体领导的管理优越性，而法国人却仍停留在拿破仑式的旧行伍习俗。按照这种习俗，为了指挥一支部队，一个拙劣的将军胜过两个优秀的将军。

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法国如此长久、如此强烈地藐视市场、藐视自由竞争了。至于利润，就更不必提了，不久前利润还被看做是一种资本的罪孽。直到今天，人们才勉强相信1967年，即蓬皮杜政府执政5年之后，让-雅克·塞而旺-施莱贝尔在《美国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的：“凡是私有的——私有企业、私人所有制、私人倡议——便注定要与恶为一谈，而凡是公共的，就等同于善。”

应该向社会党政府表示敬意，因为它有意无意地治好了法国的这些痼疾，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正了名。

但这并影响法国近30多年来与上述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仍保持着相当的差距，而这两种资本主义始终把这些根本价值置于一种重要的地位。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对于德国，只要提醒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市场经济就够了。在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弥补市场最严重的不足而已，它既不能直接干预、也不能扭曲竞争。

法国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与金融制度和企业监督模式有关连。在这一方面，法国资本主义确实既不属于美国式资本主义，也不属于莱茵式资本主义。众所周知，股票市场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在法国则完全不是。戴高乐将军说过：“法国的政治不是在证券交易所里形成的。”而实际上，法国确实主要是通过银行、财政部及其下属机构为经济筹措资金的。反映银行在金融流动中所占百分比的“中介率”（*taux d'intermédiation*），在60年代、70年代、直到1985年，一直占90%。尽管如此，法国资本主义与德国资本主义不同，法国不是一种银行资本主义，因为在银行资本主义中，银行与工业的联系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国的任何金融机构都不能自诩可以施加类似德国联邦银行那样的影响。法国虽然不能与意大利的情况相提并论（米兰股市上三分之二的资本属于家族集团），但也存在一个由米其林轮胎公司、标致汽车公司、皮诺尔、北方纺织公司（MDC）、达索尔、建筑和装备公司（CGIP）等大型集团所代表的强大的家族资本主义。

很久以来，非典型的、难以分类的法国资本主义给人的印象是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甚至在欧洲是反潮流的。80年代初左翼上台以后，法国资本主义曾一度是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1983年，它突然来个急刹车，满怀改弦更张的热情，走上了盎格鲁—撒克逊道路，这种热情在左右翼共治时期（1986~1988年）也未减弱。

法国的两种转型

一是，法国到底怎样改弦更张呢？这很难说，因为非常含糊不清，在货币管理上借鉴的是德国，在其他方面学的是英国。

1990年法国的物价上涨率同德国相等。而在10年以前，相距还有10个百分点！这概括地说明了雅克·德洛尔卓有成效的努

力结果，爱德华·巴拉迪尔坚持下来了，皮埃尔·贝雷戈瓦也必然会打下他的印记。在这种维持法郎坚挺的政策背后——今天大家都在向坚挺的法郎致敬——政府做出了不计其数的决策，首先是取消对价格的管制，包括服务价格和商品价格，最后又于1990年7月1日实行了资本自由流动。我还记得，大约比这还要早两年，我向当地一位相当大的银行家宣布，刚刚通过了要在1990年7月1日取消对汇率的管制，他根本不相信，他认为，法国法郎无法对付即将随着取消汇率管制而爆发的资本外流！

正是由于英国的影响——由于伦敦银行的竞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从1984年起，采取了减少金融干预的特别运动，包括减少对银行间拆借市场、股票市场和抵押市场的管制，取消了外汇兑换的垄断，加强了证券市场监管委员会（*Commission des opérations de Bourse*）。比较而言，这个委员会取得了类似宪法委员会的权力。最后，巴黎金融票证期权市场（*Marché à terme des instruments financiers*）已经超过了它的伦敦同业，吸引了大量外国客户，特别是德国客户。

7年内，股市交易突然增加了25倍（1980年为1240亿法郎，1987年达到30900亿法郎），最活跃的债券周转率在同一时期内竟增加了50倍！具体一点说，在我所领导的公司里，债券周转率从1980年的2%增加到1987年的123%。10年前，债券管理的任务还局限于持有票据和等待到期兑换。今天，金融工程学的全部任务，例如对法国保险总公司的银行来说，就是尽力使持有的一种债券的平均时间只有几分钟：几乎是买与卖一举完成。

新富人与新穷人

新富人，靠的是按英国模式运行的金融市场。新穷人，来自社会的另一端，是美国式不平等的派生物。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辉煌的三十年”以后，不平等现象在法国已大大缩小。有两个数字可以证明。第一个数字是衡量最富有的法国人与最贫困的法国人之间的差距，当时为**10%**。这个差距至**1970**年降到了最低水平（为**3.13%**）。第二个数字是计算遗产占有的集中程度，**1960**年**10%**最富有的法国人占有**65%**的遗产，**1985**年为**54%**。在这一方面，不平等的缩小也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自**1984**年以后，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1988**年，收入差距增加到**3.2%**。至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由于不动产和股市的火暴，他们的资本收入增加速度远远快于劳动的收入。

在这一点上，法国只是远远地跟着美国走。据华盛顿的商业部统计，从**1980~1989**年，美国企业领导人的报酬增加了**260%**，而雇员的工资只增加了**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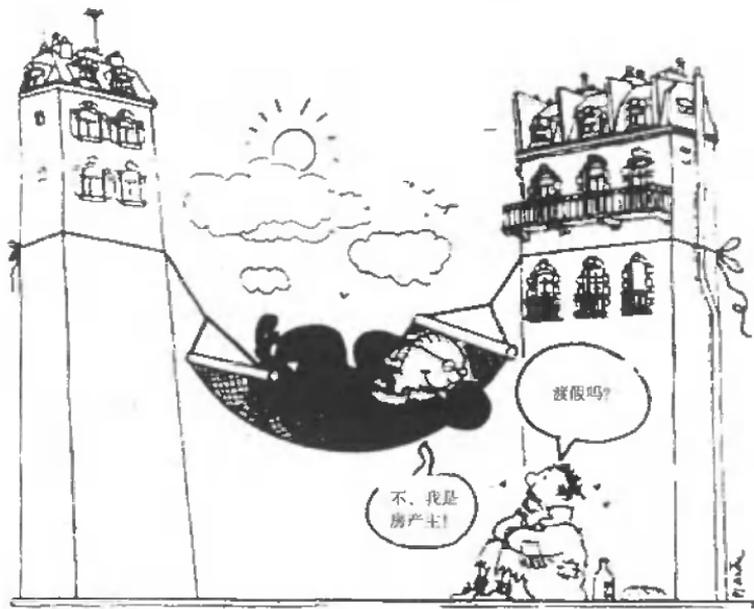
这些数字反映了社会的深刻变化。例如，存在一种工资个人化和更有“弹性”的“美国式”倾向，这种倾向推动企业根据有关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新自由主义原则，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效益（即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边际生产力），逐年、逐季地付给报酬。

这不仅仅是方式的变化，而是反映了一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逻辑现象，这种逻辑现象则是执行了所谓“自然”法则的结果。财富是直截了当的，不再遮遮掩掩，可以采取毫无顾忌的方式摆阔，而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美国人特有的恬不知耻的方式。但是，伴随着这种富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贫困”现象。我们早就指出，这种新贫困现象并不是法国独有的，如停止领取救济金的失业者、寻找第一次就业机会的青年、非法的或不非法的移民、几年内沦为社会排斥地段的郊区居民，等等。像美国那样，在法国也不时可以看到代替日益虚弱的国家机构的私人救济行动

(如“爱心食堂”)。

“爱心食堂”的例子具有象征意义。这种现象和名称与“二元社会”、“新穷人”等说法同时出现于80年代，比建立一个负责改善郊区生活条件的政府新部门、甚至工务部的时间稍早一些，这个部门的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

据说，郊区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脓疮，这是国家贫困化的结果。然而，在法国也是如此，在社会—柯尔贝主义失败的背后，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最能反映新贫困现象的不正是国家吗？



资料来源：波朗柱，《肥发歌》，《友》，1989年10月，第99页，1989。

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色彩脱路的油漆上和锈迹斑斑的电梯中，而更多地表现在法国人对公共服务的厌恶上。过去，公职是

一种高尚的职业，通过统考方式向平民打开了大门。今天，公职受到辱没，不被看好，道德沦丧，报酬也同样很差。出现了新的高贵职业，即卖家的职业、赢家的职业（有人宁愿称之为“杀手”，既然这个字也有褒义）。这种象征性的说法无疑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念正在打入法国疆域。



资料来源：皮埃姆：《一点，这就够了》，B. 阿尔杜出版社，1972。

这样一来，在我们这里，甚至连邮差都不如过去那么好了。在美国就更糟糕，那里的私人邮局成了一个新兴的产业。据说第一家私人邮递公司的老板将出访瑞士，以便在那里购买一栋别墅。他返回时对瑞士却不抱希望，他说，瑞士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国家，因为它是世界上公共邮政运行最好的国家。

连邮递信件这件事，也可以划分为一边的是新美国模式，另

一边是莱茵模式。

法国需要莱茵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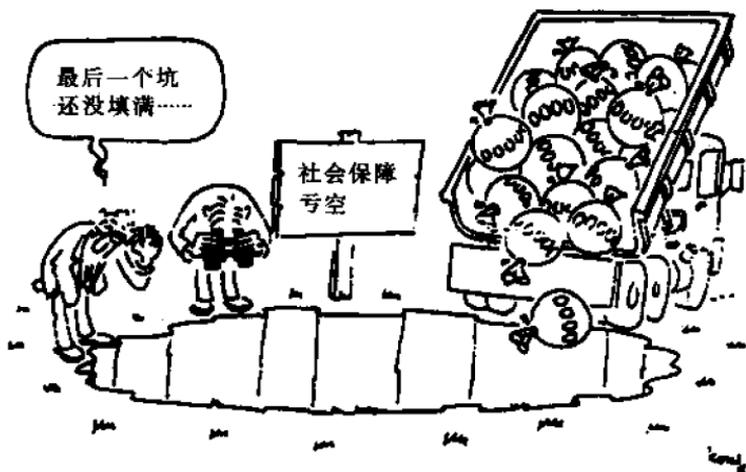
还是言归正传。今天，企业的作用变得如此重要并不时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在法国——以至不得不把《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提交给公众舆论和有关当局了，这个草案是由巴黎荷兰银行集团名誉董事长雅克·德富歇 (Jacques de Fouchier) 先生在亚历山大·朱尼克的协助下为欧洲议会起草的 (参见附件二)。

莱茵模式比较符合这种寻求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要求。莱茵模式一方面蕴涵着带有社会保障制度的资本主义，同时体现了不仅把企业看做一个资本公司，还是一个人文公司的资本主义。法国对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尤为强烈。

这几年来，人们谈论社会保障、医院和退休之所以很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法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仅仅是刚开始对待这些问题。但我们还看到了，法国是在一个对民主政府十分可怕的领域里加强了货币的地位。这也是因为，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新美国模式观念的逐步扩展促使各国的社会保险出现了某种倒退，而法国过去对社会保障并不赞赏。最后，我们将看到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突然决定法国人不必比美国人交纳更多的税了……

而法国为了维持它的社会保障，就需要以莱茵模式为榜样，提高其企业的能力和金融的稳定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榜样的影响下，近一个时期法国加快了产业改组，企业兼并和收购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1986年为610亿法郎，1987年达到1650亿法郎，1988年达到3060亿法郎。

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兼并通过“现金收购”(OPA)完成的。这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常用的收购技术，在日耳曼—日本



资料来源：贡克，《来点钱！来点时间！》，第33页，德诺埃尔出版社，1989。

人中间几乎还不存在。但是，**OPA** 这个代号在法国可能最被看不起。这个代号使人自动联想到“野蛮资本主义”，而调节“现金收购”的目的，毫无疑问正是为了保护小股民的利益，以便对付狙击手夜间袭击的。显然，这种现金收购部分地来自银行的介入，为此展开了几次大战，特别是**1989**年和**1990**年由两大金融公司相继挑起的两次“现金收购”大战：苏黎世银行收购工业公司；巴黎荷兰银行收购混合航运公司。

无论是由法国公司或外国公司在法国发起的现金收购，或者由法国公司在外国发起的现金收购，结果都从来没有造成“股东的分割”。总体来讲，现金收购完全属于产业上的目标，尤其是符合为实现单一市场所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

在这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工业企业可能要算施奈德集团了。**1982**年，它还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订购和公共干预的多种经营集团，在股市上市的资本为**25**万法郎，亏损却达

35 万法郎！

在不到 10 年之内，这个集团大胆地甩掉了它的亏损业务，系统地实施了把经营活动集中在电力上的战略，变成超过西屋电气公司、通用电力公司、西门子公司和三菱集团公司的世界头号电力自动化设备企业。1990 年，施奈德集团的上市资本增加了 60 倍！

正是由于进行了 50 多次收购，其中除了电力机械公司以外，都是友好的收购，才有可能完成这次不同寻常的改组。1988 年，施奈德集团对电机公司进行了一次颇有争议的现金收购，后者是一个由于工人参与管理和参股而闻名的优秀公司。我得承认，我曾为这种仓促从事的做法表示遗憾，如果我们是在德国或瑞士，可能通过银行对这次收购进行细致的准备。当然，出于对电力机械公司本身利益的考虑还是进行了这次产业改组。目前，电力机械公司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了。

1991 年春，另一次有影响的现金收购是针对美国 D 型广场公司 (Square D) 的，这家公司当时享有特拉华州政府批准的特殊保护地位，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维护本公司的独立。除此以外，施奈德集团为了应付反垄断检查，不得不向美国寄去一吨多重的译成英文的材料。但是，在整个现金收购过程中，大多数股东支持收购商。由于在美国什么都有个价格，施奈德集团提高了初始投标，D 型广场公司的董事长洋洋得意地断言，他做了一桩好生意。

欧洲式的日本财阀

如果说法国愿意像莱茵模式一样，走向一种更加完善和更加稳固的体制的话，首先应该看到这种新现象与我们的大多数固有观念是不同的：为了把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金融机构

(银行和保险公司)变成不可或缺的。为此,罗歇·富胡(Roger Fauroux)才宣告:“我支持德国模式,因为那里的金融确实是为工业服务的。”

法国受到一种往往被人忽略的短缺现象的困扰,这就是缺乏忠诚的稳定的股东。要使股民留下来,就要让他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可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因为股东通过可变资本投资公司(SICAV)得到税收优惠,这些公司的经营好坏只能从短期来判断,实际上只能听任现金收购的意志来转移积蓄了。要让依靠家庭储蓄的小股民喜欢良好的长期管理,必须开立传统的长期储蓄户头(CELT)。欧共体公司的股民可以使用这种长期储蓄户头,储户可以使用这个户头买入和售出股票,只要他没有减少这个户头中的储蓄总额,就无须交纳增值税。同样,拥有长期储蓄户头(CELT)的储户,如果按规定储蓄了一定的数额,应该免除按财产征收的财产互助税(ISF)。由于一个拥有公司25%以上股份的企业主没有必要声明其与财产互助税相应的资本数额,这样一种优惠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那些形象类似德国公司的公司,最妥善的办法似乎是对分红前的利润总额征更多的税;对配股分红征收所得税要高于对现金分红所征的所得税,这种做法有利于保住储蓄,却不利于按照市场规则的再分配。

所有这些,都保证了我们的大型金融机构尽量从市场上为投资筹措基金,由自己承担风险,就像日本的或德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采取投资形式或长期信贷形式筹措基金一样。

因此,里昂信贷银行自诩为德国模式的通用银行的卫道士。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惊异的是,在美国目前围绕联邦储备委员会1991年2月提出的银行改革方案进行的大辩论中,人们提出的一个大问题却是探讨这次改革要不要借鉴德国和日本模式的经验。在这个事件中,最妙不可言的是反对这种演变的人提出的论

据：鉴于美国的银行存款是由联邦政府来担保的，通用银行体制有可能增加目前已经处于破产边缘的联邦担保制带来的风险。

法国要加强其特别脆弱的集资网络，需要向莱茵模式靠拢，这是企业研究所1991年1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资本与股东的战略》的论文没有直言却十分明确的结论。尽管自1990年以来，“现金收购”模式已经让位给理性联合的模式和集团内部的升级的方式，法国企业自由资金的薄弱，或进一步说，目前被可变资本投资公司（SICAV）和共同投资基金控制的机构储蓄的流失，确实给法国企业的股东造成同美国一样的不稳定性。参与企业研究所这项研究工作的40余位杰出人士认为：“公布经营月报对股市投资基金机构（OPCVM）的管理者来说同发表业绩季报对美国公司的管理者一样，具有同等的效果：这样做迫使人们短视，急急忙忙地翻阅报表就表明了这一点。股市投资基金机构虽然逐步取代了小股民中的个人散户，然而，过去这些个人小股民终身保留着法国‘蓝筹股’的证券，直到把这些证券遗传给他们的后代。”

从这一点出发，人们提出了采取什么税收刺激办法才能保持股东稳定的问题，企业研究所的建议很漂亮，是照搬莱茵模式，即用提高设有监察委员会和领导委员会的公司的地位来平衡管理人员与股东的权力；利用章程来限制同一股东的投票权利，实施双重投票权利，同时指出，这两个建议是与布鲁塞尔的第五号指令草案（这个草案基本上是吸收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念）有所不同的。

于是，有人要说了，您看还是应该藐视欧洲建设和欧共体委员会的意见吧！可恰恰不要做这样的误解。不错，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委员会在产业和金融方面有许多技术立场借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多于借鉴莱茵模式，这不过是因为，人们要求它准备的不是一个受欧洲公共权力——即一个联邦机构——控制的社会市场

经济，而是一个简单的单一市场。一个商品和服务市场如果不同时加强欧洲金融机构网络，必将扩展成“由企业控制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企业自然会被看做是一种商品……这就是为什么当法国的政治传统、社会呼声和金融结构需要本应推动它走向莱茵模式的时候，它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支派。为什么法国走上事与愿违的道路呢？很简单，因为现在许多巨大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单靠一个国家的效率就能解决的范围。当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迅速世界化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府就被罚出局，不管这些政府的政治取向如何。

要求国家执行一种更加社会化的政策是白费力气。国家对此也无可奈何，或几乎无能为力。如果想既要控制资本主义，又不要伤害资本主义的效率，就不要再找法国式的国家了，而应去找大欧洲。应该由大欧洲同时并举地建立强大的金融机构——欧洲式的日本财阀——和政治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CECA）就是被人过分遗忘的这种模式。

欧洲煤钢共同体——莱茵模式的欧洲原型

让·莫内的生活和榜样，无论是关于新美国模式的近期进展，还是这种进展对欧洲发展计划的主导影响，对我们的启迪都是长期的。

这个干邑白兰地小酒商出身的大银行家，是一位赞同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等人的价值观的人物。他坚决支持市场经济，比任何人都卖力，要让法国走出保护主义，进入国际自由贸易。在个人方面，他够得上是个资本主义者了，当他担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的时候，曾经拒绝接受来自国家的任何报酬，以便能够保持自己的充分独立性。让·莫内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莱茵式市场经济观念。他仅仅从社会市场经济的角度来思考市场经济。

他在计划总署期间为法国完成的事业就是一个证明，特别是1952年他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与“最高权力机构”（这个名称值得大书特书！）一起建立大欧洲的指导思想。

这意味着首先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对曾经为欧洲战争制造武器的两大产品——煤和钢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

这就需要同时恢复欧洲铁矿和煤矿的生产，面对一些第三国的竞争，欧洲铁矿和煤矿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从这里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让·莫内说服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创始国的政府和议会同意必须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现在带有一点民俗色彩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拥有广泛的裁决权力和巨大的税收能力和财政能力，以便一方面支持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为积极的社会政策提供经费。

设立欧洲税，成立一个最高权力机构来照管煤矿和炼钢，这同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哲学是多么南辕北辙呀！

更有兴味的问题是，美国和英国的钢铁工业很久以来就陷于无力偿还债务的状况，而法国温代尔·萨西罗尔钢铁公司（SACILOR）却——谁敢相信呢？——创造了生产力和盈利的世界记录。

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和它的名称本身已经吓坏了这些政府，它们担心自己的部分特权会被欧洲机构夺去。因此，1957年签定的共同市场协议并未把很多权力让位给共同体机构。人们常常指责布鲁塞尔的欧共体委员会滥用权力，而它不过是已经大为削弱的最高权力机构的翻版。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实际上在“产业政策”方面既没有特别的责任、也没有行动手段。产业政策这种表述本身可能就是枯燥无味的。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前联邦德国部长邦格曼（Bangeman）在谈到欧洲电子工业危机的一般性

发言中用了这个提法，还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这个危机是可怕的，因为到了**2000**年，电子工业将成为所有工业中最大的工业，甚至会占到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人们就曾预见到了、宣告过了并肯定会会发生这次危机：**1965**年，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格隆纳先生就向欧洲理事会提出过这个问题。提了也白提，因为共同市场不能管。倒是日本采纳了格隆纳先生的意见，尤其是通产省执行了有名的发展机器人的计划，使日本在这个领域中处于世界首位。美国也采取不同方式这样做了，因为包括五角大楼的军事订购在内的科研支出，同日本的科研开发支出总值相等。

同这些做法相比照，我们是在继续完成单一市场。但是，我们没有相应的体制能力来迎接在主要技术领域里的未来的世界竞争。我们处在要不要建立大欧洲的十字路口上，尽管欧共体委员会多次提出警告，还是有一小部分成员国选择了不进行欧洲建设的道路。于是，欧洲最后**3**家电子零部件企业——菲力浦公司、汤姆逊公司和西门子公司陷入了可悲的境地。有例为证，在大众电子产品领域，英国的**ICL**公司被日本收购了；意大利的奥利威梯公司（**Olivetti**）被美国化了；法国的布尔公司（**Bull**）也逃不出吸纳日本**NEC**公司资本的命运。

由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没有遵循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榜样，这些企业中的任何一家企业，直到它们被美国或日本收购之前，都在沿着非欧洲建设的道路上继续扮演着全国冠军的角色。

奔向税收天堂的赛跑

实际上，成员国一致同意阻止欧共体在技术和产业方面扮演纯欧洲作用，这不过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滑向撒切尔模式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一角。

要预测这种趋势，最好回顾一下**1987**年报告的结论。这份报告是根据欧共体委员会的要求，由一个意大利银行总裁多玛索·巴多阿·西奥巴（**Tomaso Padoa Schiopa**）主持的专家组完成的。这个报告的标题非常明确，只有三个词：效率、稳定、公正。

经济效率——这份报告一再重复强调——来自市场机制。依靠共同市场和单一市场计划，到**2000**年西欧各国将超过——按标准汇率计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货币稳定得到了欧洲货币体系的支撑，必将同样有助于完成向真正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转变，将不强求**12**个成员国必须参加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德国联邦银行将不得不停止滥用借口了，按照这种借口，事先协调经济和货币政策是建立联盟的先决条件。幸亏在两个德国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时候没有等待两种制度的协调一致！

最后是公正，社会公正。公正与货币稳定的关系是有限的，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会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但是，要防止不平等扩大光靠消除通货膨胀是不够的。恰恰相反，从这些不平等中取得效率正是市场机制本身的原则。

要克服这些不平等，除了自发的主动互助行动以外，公共权力应该在资源再分配上起到自己的作用，但这样做越来越困难了，理由有二：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国家被排斥出局，倒不是被欧洲本身的市场，而是被经济的全球化，在短期内，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将取决于它能否减少公共支出，至少是，取决于国家财政的贫困化；另一方面，国家的作用过时了，已经分散到各个省里去了，在欧洲一级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机构来顶替国家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非欧洲建设的表现。正当欧洲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这种体制上的真空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带向了撒切尔模式。

在这方面，最有意义的事例，涉及到全体公民的事例，是欧

洲的税收制度的演变。

什么是欧洲的传统？从 20 世纪初以来，欧洲的传统主要是少向穷人征税，多向富人征税。这就是累进税的原则。这个原则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逐步扩大到拉丁语国家。

撒切尔夫人的观念又怎么样呢？正好相反。撒切尔夫人观念的突出表现是她的“人头税”（poll tax）改革，即按居住人口征税。英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原来的人头税不实行累进税原则，而实行比例税原则，即每个人都根据其住房的地区差价纳税。于是，富人，住的地方最好的人比穷人，住得最差的人纳税要多。撒切尔夫人宣称，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对公共财政来说，穷人比富人花的钱并不少，反而多。因此，应该交纳同样多的税。人头税应该成为一种按“人头”征税的税种，也就是说，按人均征税，一律均等。为公爵赶车的车夫和公爵交同样多的税。居民奋起反抗，约翰·梅杰慌了手脚，他忘记了这样做是对大多数居民的一种过分挑衅。

现在，这段英国历史已经无人不晓。但不足的是，这段历史又在更广的范围内，即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内再现了，涉及到与人口税同样重要问题，这里指的是征收增值税和资本所得税。

如果你是一位法国居民，如果你有法国债券，发行机构就会向税务局报告它给了你多少股息，你得在起征点以上交纳 17% 的所得税。反之，如果你有外国债券，债券发行机构则不向税务局报告你的股息收入。诚然，尽管取消了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你还是要报告这些股息收入，如果你不报告，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欧共体委员会 1989 年 2 月建议建立一种税收减免制度，即对共同体居民的利息收入的 15% 以下，免征所得税。“遵循欧洲精神，联邦德国曾经于 1989 年 1 月同意建立一种减免规定，但由于大量资本外流，主要是流往卢森堡，又于 6 月取消了这项

规定。这次失败给欧共体委员会的计划敲响了丧钟，以至有关材料似乎也被冻结了，悄悄地建立起零点征税制度。”^④

如此建立起来的“建立零点征税制度”对谁有好处呢？对高价证券的持有者有利，也就是说，总体上讲对人口中最富有的人有利。然而，事实是一样的，如果富人纳税少了，穷人就不得不多交一些税（就像撒切尔夫人的人头税那样）。欧洲大多数政府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但多数人持这种意见有什么用呢，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决定实行全体一致通过的决策规则。换句话说，没有卢森堡的同意，欧共体 12 国不能做出任何决定。由于有个卢森堡，其他 11 个国家不得不竞相奔向税收天堂。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已经不在台上，然而，她可以感到自豪的是，由于撒切尔式人头税形式的普及——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即资本本身中占有重要分量——她继续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税收制度施加影响。

这个例子表明，如果单一市场不能很快导致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必将在欧洲建立起某种国家作用大减、市场作用大增的次新美国模式。

这一切使玛格丽特·撒切尔大喜，使雅克·德洛尔大悲。1992 年欧洲处于十字路口，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观念像他们两个人的观念那样水火不容了。而法国的前途基本上依赖于如何解决他们提出的这种两难局面了。

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允诺减税而取得人心的。他们在本国范围内取得了部分成功。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欧洲范围内做得更好，既然它建立了一种竞争法体系，按照这种法律，得到好处的首先是耗费经费最少、需求最低的国家。

^④ 国际景气研究与信息中心：《走向欧洲税收制度》，经济学出版社，1991。

结束语

书写到结尾时，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提出各种好心的建议。真是让人欲罢不能！人们可以开列几付“良方妙药”，可以提出一些令人无法拒绝的泛泛的改革方案，或号召履行公民义务和更好地面向未来。轮到我，我也曾经常指责那些主张“只能怎样怎样”的人（例如在《法国的王牌》一书中的做法）。实际上，我确实过分相信事实的教育意义了。由于我过于相信理性，无法放弃这种理性的虚假的——也是不慎重的——说服力。在我看来，本书收集的全部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有势均力敌的对手，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资本主义又变得很危险了，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两种形式之间的差别与深刻对立似乎也摆得差不多了。而在这两种模式中，在我看来，最有争议的、效率最差的、最粗暴的模式却取得了地盘，这是真正的危险。首先应该具体指出这个问题。

但我不想事实上搞什么花样。例如，如果为了论战而不惜把事实说得一片漆黑是错误的。对近10年来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好消息”视而不见也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共产主义的崩溃……也是民主取得了世界性进展。市场经济的胜利、经济相互依赖和贸易的胜利，也为千百万男人和妇女开辟了新的锦绣前程。对许多人来说，世界经济从来没有这样宽宏大量和乐善好施。官僚作风、冷漠无情和经济统制主义的退却，也是个人积极性和创造力的一种蓬勃高涨的反应。即使在罗纳德里根的美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英国也不例外！“保守主义革命”也并非一无是

处，远非如此。得到释放的利己主义、每个人的能动性、企业家的活力、关心竞争力，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列为当代的消极面吧！如果西方对东方和南方的几千万男女仍有诱惑力，如果“恢复了元气”的美国对许多国家的人民代表着一种希望，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看做一种简单的集体幻觉吧。或者，按照时髦的说法，只是一种纯粹的“媒体现象”吧。匈牙利人、波兰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覬觎芝加哥，或者，瓦文萨走进白金汉宫向玛格丽特撒切尔请教，并没有干什么蠢事。为了悄悄地慢慢地不事声张地从中得到教益，我们甚至不必再仅仅盯住 10 年来我们得到的东西不放。这些看法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但我要说，这还不够。因为，不管资本主义近期取得了多少成就、多少无可争议的收获和进展，现在却受到本书试图揭示的一种迷茫的威胁。这种迷茫是巨大而危险的，因为它不是景气性的暂时的，而是符合世界经济的一种大趋势。这种迷茫甚至表明，工业化世界的历史出现了一个新的裂痕。我不能肯定，人们是否了解了这种危险的真正严重程度。

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了解本书，我有意不惜有点勉强，把某些地方简单化了。从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恰好在整整两个世纪之内，即 1791~1991 年期间，切实度过了 3 个不同的阶段。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1791 年

第一个阶段是反对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法国，1791 年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时期，著名的《制帽工人法》可能是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法令：法令规定取消行会、禁止

工会和确立了——针对君主专制国家的老监管法——贸易自由和实业自由。在一个世纪中，这种发展持续下来并且更加可观：国家被置于法律规章之下，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公职机构，公务员不再是腐败分子。尤其是，国家面对“市场的力量”后退了，国家集中力量于它的首要职能，即宪兵国家的职能，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反对“危险的阶级”，即新兴的产业无产阶级。在同一时期，确实可以看到新的“人对人”的剥削，旧的农民逐步背井离乡，工人阶级受到经济压迫以及产业革命暴露出前所未有的残酷性。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对所有这些现象做了天才的揭露。1891年，新教教会，特别是天主教教会也开始揭露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医治药方：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实行资本与劳动的合作。莱昂十三教皇的《大通谕》（*Rerum novarum*）回荡着先知先觉的声音，呼吁国家对工人要公正，有力地表明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

1891年

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这是由国家规范的资本主义。所有的改革都是朝向同一个目标：纠正市场的偏差，缓和资本主义的暴力。国家似乎成了反对自由市场专制和不公的堡垒，成了穷人的守护神。正是国家，利用法律、法令，在工人斗争的压力下，通过集体协议，努力使严厉的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人道化。劳动法取得进展，税收不断增加，建立了更多的再分配制度，等等。所有立法也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诚然，美国部分地逃脱了《（英国）工人问题》的悲剧，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发展。但是，自1930年大危机起，美国也同欧洲走到了一起：从罗斯福到卡特，其中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在半个世纪内，美国不停地跟着欧洲向更加温和的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只是战后在建立福利国家方面没有走那么远。

在这个以国家的作用急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不要忘记，如果资本主义有进展，那也是在其对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和政治压力下出现的某种“倒退”，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诩有权代表希望和未来。应该抚今追昔，才能回忆起当时的这种巨大压力。30年前，思想最深邃的经济学家之一弗朗索瓦·贝湖（François Perroux）曾经写道：“资本主义遭到严重打击、面目被揭穿、所做所为被唾弃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命运的敌人。多谴责一次资本主义，是扮演了一个既无危险、也无荣耀的角色。而为资本主义事业辩护，就等于在‘兜里揣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讲话。”^①

1991年

但是，近10年来情况发生了逆转……国家越是过分呵护或任意支配经济，越是扼杀了经济。越是过分缓和和市场，最终越是瓦解了市场。于是，那些越来越依赖官僚阶层的人，变得越来越成为卡夫卡式的人物。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79年冬英国救护车司机的罢工事件：这次罢工无以复加地使工党分子威信扫地，并把撒切尔夫人捧上了台。

孰先孰后的次序也发生了变化。国家确实已不被看做一种守护神和一个组织者，而是一个寄生虫、一个制动器、一个自身十分沉重的负担。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取代了国家的资本主义阶段。我们用了近10年的时间才真正了解到这一点。实际上，从198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几乎同时当选的时候，这一切就开始了。当时，许多保守派不是已经明了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选举换届吗？在大西洋此岸和彼岸，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登堂入室了。

^① 弗朗索瓦·贝湖：《资本主义》，《我知道什么》丛书，1962。

我们了解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似乎就是坚持几个字：市场是好的，国家是坏的。过去，曾经被看作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被指责为鼓励懒惰；过去，税收成为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一个主要手段，现在，税收被指责为——并非毫无道理——挫伤了最有活力、最有勇气的人。因此，必须减少税收和社会保障费用，必须放弃管制，即国家必须全线退却，以便让市场解放社会的创造能力。于是，像19世纪那样光是把资本主义与国家对立起来已经不够了，应该把国家的职能缩小到最低限度，尽最大努力用市场的力量来代替国家。19世纪，无论在医疗卫生方面，还是在教育或新闻媒介领域，资本主义都根本不可能取代国家。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当时的学校、医院和报纸都是私人创建的。但现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从电台、电视，到引水、信件邮递，包括清除垃圾，都逐步从公共部门转为私人部门了。

直到1991年人们还可以怀疑这次“保守主义革命”是否只是一段插曲、一个短暂的阶段、一记孤注一掷的“闷棍”。在欧洲，许多人这样认为，他们肆意嘲笑“里根主义”或“撒切尔主义”。如今，我们还可以就“撒切尔主义”在英国的前途提出疑问。在伦敦，约翰·梅杰接替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且立即采取了某些同撒切尔哲学背道而驰的象征性措施，例如取消了“人头税”。但是，在大西洋彼岸，“里根主义”似乎却反而在公众舆论中巩固下来。

海湾战争、施瓦茨科夫上将的胜利、随之而来的“花花公子们”凯旋而归和美元疯狂上涨，所有这一切似乎痛苦地洗刷了美国昔日的耻辱，各种怀疑也一扫而光。美国再一次坚定地向世人表明：它的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仅仅是美国自己这样认为。因为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了保守主义革命的成就，尽力照方吃药。因此，这是一次带有根本意义的历史性决

裂。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确实没有人听说过社会市场经济，也没有听说过莱茵模式。甚至在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银行体系之前，波兰人便在共产党总部的旧址上开设了华沙股票交易所，瓦文萨也跑到西欧来兜售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的理想了。

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在里根之前，经验似乎表明，它们的经济起飞将带动国家作用的上升，就像日本和韩国那样。而最近几年，取得成就最辉煌的是智利、墨西哥或泰国等放松了管制和实行私有化的国家。但是，可以看到，如果说莱茵模式在欧洲是最有效的，但把莱茵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版本搬到第三世界时，往往就成为被指责传播破产的国有企业和导致腐败的政府干预的口实。削减公共支出和公共赤字、减少某些税收、私有化、放弃管制，这样做虽然痛苦，但往往可行。

同样，在欧洲我们也可以看到，“1992年的欧洲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里根的主张：竞争的最大化和国家的最小化。从长期来看，它所带来的根本性社会后果是：只要单一市场还没有受到政治联盟的制约，12个成员国的政府不管它们自己的政治取向如何，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的贫困化来逐步加强其经济竞争力，以里根为榜样，减少富人的税，增加穷人的税。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此外，在大多数大学和企业学校中，人们教育未来的管理干部和企业领导人，说这就是历史的含义和未来的规律。

于是，在近半个世纪中，民主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包装和锻造了资本主义。现在，它们扮演的角色相互调换了，这主要是由于经济世界化造成的。经济世界化藐视相互对立的软弱无力的国家。

显然，至少从1991年起，我们已经进入了取代了国家的资本主义的阶段。

这个历史性决裂，正如本书指出的，往往是活力和繁荣的源泉，但同时也带来了有时是悲剧性的、危险的社会裂痕。除非把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进步的本质看做是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差，否则就不能接受认为这些社会进步可以逐步被否定的观点；或以恢复它们的活力为借口，认为所有的工业化经济都会不可避免地僵化、互相残杀和导致社会退步的观点。并且在所有方面：城市、卫生、学校、法律、互助等等，都会如此。更加似是而非的是，如果人们从外部赞同这种倒退，一切都会过得去。面对妙不可言的里根模式，莱茵资本主义——我在本书强调指出了它的成就，甚至它的优越性——还保留着一个外省老处女的魅力，她囿于自己的传统，固守着人文主义的怀旧情结，充塞了严谨性和预见性。总之一句话，她像法国寓言中贪图享受的蝉面对勤劳的蚂蚁一样，已经“人老珠黄”。这个蚂蚁可以毁坏墙壁，却不敢登堂入室……

用本书中的一个词语来说，如果有一件事，唯一一件事令我烦躁不安，那就是这种二律背反。我觉得这种二律背反真是闻所未闻、不合常情，以至我不得不经常们心自问，为了让每个人真正意识到症结所在，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呢。我不相信求助于大原则就一定非常有益。在这一点上，我也怀疑说教的用途。反之，我到对老子的格言颇感兴趣，据称世界上所有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像“治大国如烹小鲜”一样轻而易举。应该相信教育的功德无量。我们相信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聪明智慧，只要他们能够得到明确的信息，然而，怎样才能“传递信息”呢？

如果资本主义要一滑到底，实际上只要想象一下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将怎样过就够了。如果欧洲和法国完全滑到里根模式中去，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呢？这种假设并不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欧洲的逐步美国化确实不止限于经济，变化是非常深刻的。消费研究与信息中心 (CREDOC) 1990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份调

查报告尽力分析了法国人的行为、生活习惯和思想的主要变化。这份调查报告发表的时间正值海湾战争危机的高潮时期，新闻媒介丝毫未加关注。真是遗憾。消费研究与信息中心看到了4个实质性变化。什么变化呢？

1. 消除了全钱的犯罪感，在我们这样具有天主教传统的老社会中，这标志着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靠拢的一个根本性转折。

2. 利己主义的胜利，也就是消费研究与信息中心所讲的“人人为自己”。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参与形式，如各种工会、协会等，令人触目惊心地衰退了。

3. 社会的“艰难化”，表现在劳工界尤为突出，与竞争、担心失业联系在一起的新负担加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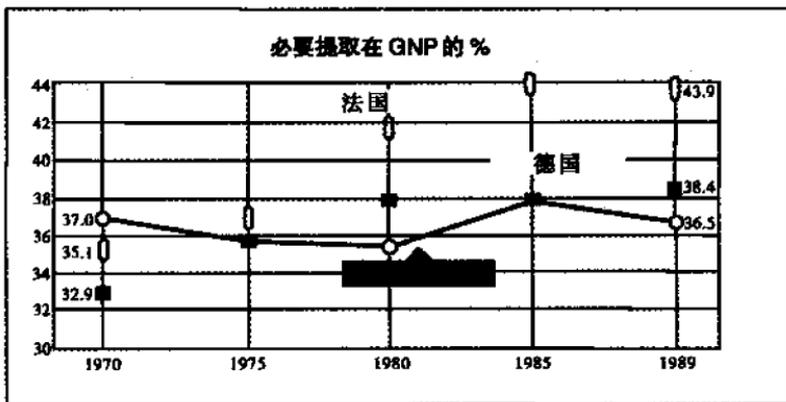
4. 行为的单一化，主要是在巴黎与外省之间，特别是在电视的垄断影响下出现的行为单一化。

当然，上述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值得进一步讨论。我要指出的是，所有这4点显然都使法国社会朝着“美国化”的方向发展了。既然社会的深层正在不知不觉地美国化了，如果认为法国经济也在走同一条路，似乎就大言不惭了。而这种美国化情况，要一直滑到底。

为了多得 16400 法郎……

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万分谨慎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下面这个简单的预测和统计，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观念。为此，我们看一看这个简单的但是带有决定意义的税收体系参数表：

众所周知，实际上税收首先决定了国家的财富，即国家的实力，也决定了国家调节市场力量的能力和保护市场上弱者的能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力。

我们做一次小小的简单计算。在法国，1990 年社会必要提取率（赋税、税捐、社会保险费，等等）占 44.6%。法国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在同一类型的所有国家中，法国不愧称得上是必要提取的冠军。和国家的财政管理一样，这种情况与众不同，特别严峻，究其原因，法国也是同类国家中唯一未能控制其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国家。

因此，一个法国人每生产 100 法郎，就要向国家或其附属机构总共交纳 44.6 法郎。在美国，这一必要提取率如今已稍低于 30%。那么，好吧，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美国的必要提取比率一下子搬到法国来会怎么样！法国的国内总产值大约是 6 兆 3000 亿法郎。如果用 30% 的比率来代替目前的 44.6% 的比率，可以使全体法国人节约差不多 9200 亿法郎。于是，从国家讨回来的这些钱将重新回到我们的腰包里。这就意味着每个法国人可以摊上 16400 法郎，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一个 4 口之家来说，这块点心可够大的：等于增加了 65600 法郎的额外收入。而且是每

一年！所有纳税人，从在最贫困的人开始，每年增加**65600**法郎，这相当于可增长最低工资收入者（SMIC）一年的收入了，还有什么必要皈依里根主义的漂亮言辞呢！能肯定吗？我们再仔细观察一番。

这块点心确实必须退回来。退的钱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我们不能一方面让国家变得越来越贫困，同时又要它承担同样的责任。今天由国家承担的所有负担——广义地讲，其中包括地方行政机构、大区机构和社会保障费用——应该同时由我们每一个人分别承担。都是什么费用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简要说明一下。

社会保障费用 这是理所当然的。最终只能自动返回**80%**的医疗费和药费。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住医院和享受尖端技术、扫描仪、超声扫描器等技术的。每个法国人都要像交住房费、饮食费或旅游费那样交纳医疗费用。如果一个人遇到交通事故，被救护车运到医院，他应该习惯于这种观念，即在接受治疗之前，别人可以要求他或他的家庭交费，不管他个人的收入来源如何，他必须付账。

更可怕的是，大部分附加退休金将被大大削减。我这里讲的是附加退休金，不是基本退休金或“老年保险金”。实际上，法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基本退休金是以全国团结基金的名义由必要社会提取基金来提供经费的；确实，即使是美国，这种基本退休金也是普遍社会保险制的唯一形式。因此，即使——假设是这样——法国把社会必要提取降低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基本退休金原则上也应该像美国那样，由国家支付。

与此相反，法国与其他所有类似国家相比，在附加退休金方面真是别具特色：在我们这里，附加退休金基本上也是由社会必要提取基金来支付的，而在其他国家中，是由家庭的专门储蓄收入来逐年支付的。在这些国家中，减少社会必要提取，即使力度

很大，也不会给附加退休金带来什么影响。在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减少社会保险费用无疑等于减少养老金。在我们这里，我们的体制只受附加税的制约。

学校 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律免费，当然问题更多。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可能为他的孩子选择学校，让他尽其所能。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举例来说，我们知道，美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学费大约是**10**万到**15**万法郎，当然还不包括住宿、大学食堂等费用。名牌学校和学制长的学校更成了——除非有奖学金——富家子弟享有的特权。

公共交通 一切迹象表明，公共交通很快就会变得像美国那样，也就是说，破烂不堪，一点都不舒适，维护很差。私人轿车的优越性最终也会丧失殆尽。停车费飞涨，城市瘫痪，等等。

集体设施装备 很难想象这些设备能够维持现状。由地方行政机构负担的设施、属于国家的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忍受着行政机构贫困化带来的痛苦，包括公园、绿地、公路和铁路、飞机场，等等。发展趋势不会是美化这些设施，甚至是不再维护这些设施。人们将对美国多数大城市的那副面孔……作何感想呢。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个乐趣问题和看着不舒服而已。各种研究表明，对企业来说，集体设施的质量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因素。

各种不平等 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的机制受到削弱。结果是：正在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急剧发展，以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平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陷入被遗弃、文盲和被社会排斥的地位。尤其是被排斥出“融入社会的最低收入线”（RMI）之外，目前尚有数**10**万人能够得到这种收入，今后他们只能依靠私人慈善机构的救济了。“新穷人”将突然变得更多、更穷。这种倒退给“社会混乱”（暴力、抢劫、吸毒等）带来的后果难以估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现象会越来越多。

劳动与失业 新美国模式在这方面赢得了几分。法国作为

在“辉煌的三十年”间获得充分就业的祖国，近20年来却一方面不停地制定了越来越宽厚的反失业计划，另一方面又不断产生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难于融入社会的失业者。现在，这类失业者已经占劳动人口的9%。与此相反，美国把充分就业政策看做一种缺乏理智的弊端。但里根上台以来，他们把失业率压缩了近一半，降到了6%。他们做到这一点，不是靠增加援助，而恰恰相反，靠的是减少援助，这就迫使失业者接受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笨重的低报酬的职业，其中首先是数量不断增长的私人警察和形形色色的保安人员。

怎么做更好呢？是增加接受补助的失业者，还是增加低报酬的劳动者？要说明这“两种资本主义之战”，有两点需要指出：只有莱茵国家证明了它们能够做到较宽厚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较完善的经济体制并行不悖；而法国则不可能做到既冻结它的社会必要提取率，又持续维持它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真的有必要吗？我只想指出，一种资本主义向另一种资本主义演变，必然会给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带来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归根结底，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主要差别，我就会说：新美国模式为了现在的利益可以完全牺牲未来。

然而，在这些形式差别的掩盖下，对未来的投资才是当代真正的“生产性回报”，才是财富的首要来源，甚至可能是产生智慧的新途径。

对欧洲人，对每个欧洲公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必将成为两种资本主义之战的主战场。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欧洲公民到了1992年还不能充分了解他们的命运之所依，他们不能够对本国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促使它们坚决地迈过政治联盟的门坎，那么，除了单一市场开始自我削弱以外，

什么都不会出现；由于缺乏团结起来选择未来的明确观念，我们将失去选择的能力；于是，我们将再次坠入对古老的欧洲中心论的痛苦回忆，不可避免地滑向新美国模式，而里昂、曼彻斯特和那不勒斯郊区已经向我们预示了新美国模式的景象；更有甚者，由于我们软弱无力，我们将越来越被来自东部和南部两个第三世界的人群分割得支离破碎，他们试图越过我们的边界与我们郊区的美国式的新第三世界汇合在一起。

要么，我们开始朝着欧洲合众国的方向迈进。于是，我们可以为我们大家选择一个最好的经济—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已经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部分地区产生了效果，它将变成欧洲模式。

欧洲合众国将会比美利坚合众国更美好。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明天取决于今天。

附录一 在布鲁日市的两次报告

欧洲在两种资本主义观念之间摇摆。1992年的单一市场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一种自由贸易区范畴吗？按照这种设想，欧洲资本主义到了2000年将不过是美国式新资本主义的一种翻版。

欧洲共同体与其局限于一种市场状态，难道不能朝建立一个带有联邦性质的真正的政治联盟方向发展其特性吗？只有在这个条件下，莱茵模式才能成为欧洲式新资本主义的原型。

这种两难抉择将成为1991年底召开的两次政府间会议的核心内容，这两次会议既要讨论经济与货币联盟问题，也要讨论政治联盟问题。

据我所知，有关这个根本性争论，没有比撒切尔夫人和雅克·德洛尔在布鲁日欧洲大学的重要演说更明确无误的了，前者是1988年9月29日讲的，后者是1989年10月17日讲的。

显然，撒切尔讲话的目的是事先对雅克·德洛尔的思想提出诘问，后者是为了回答她。

1. 什么样的欧洲？

玛格丽特·撒切尔：

a. 首先是一个否定的答案：“欧洲并不是罗马条约的产物。”^①

b. 地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表象：“基督教观念在很长时间

① 作者自译。

内是欧洲的同义词”，民主自由也是如此。

c. 欧洲的天职是变成“相互间越来越一致的各民族大家庭。”

雅克·德洛尔：

a. 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只字不提欧洲的历史。在他看来，关键是未来。

2. 什么样的共同体？

玛格丽特·撒切尔：

a. 此处也是这样，第一个反应是否定的：“共同体本身不是目的。”

b. 关于主权：“主权国家之间的自愿合作。”

c. 撒切尔夫人认为，不存在赋予共同体一些辅助性权力的问题。“没有必要为了更紧密地一起工作而把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或者由行政官僚机构做出决策 (appointed)。”

“我们未能在英国促使国家管理的领域后退，这可不是仅仅让布鲁塞尔行使的超国家权力在欧洲范围内强加给我们一种新的统治。”

雅克·德洛尔：

a. “共同体，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我们经历了一个单一的经验……当然，我们建设欧洲参照了历史实验的原则，但是背景十分特殊，以至这种模式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史无前例的。”

b. “共同行使主权”。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似乎面带一丝微笑——引用了撒切尔夫人的外事秘书杰弗里·豪老兄的一句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欧洲共同体的主权国家可以完全自由地分享它们的主权，在行使未来世纪的权力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

c. 对德洛尔来讲，谈不上什么集权化，相反，这涉及到辅助性原则问题。“我经常作为方式援引联邦主义，但要加入辅助性原

则。我从辅助性原则中得到启发,协调在许多人看来不可协调的东西,如统一欧洲的出现与忠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国;解决当代问题所必不可少的欧洲权力与维护我们安身立命之地的国家和地区的生命攸关的需要。”

3. 共同体的演变

玛格丽特·撒切尔:

a. “共同体的某些创始人以为,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可以成为它的样板。然而,美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对此,应该做一点细微的但又很重要的修正:撒切尔夫人一面否认共同体走向一种联邦式组织——尽管是美国式的——的所有进展,而远远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却排除了建立欧洲特有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

b. “罗马条约确实曾被看做是经济自由的宪章,但人们并非一直这样理解,更谈不上这样执行了……(撒切尔夫人提出的)这种批评不值一驳,因为这些条约都在这里,包括北大西洋公约、修订后的布鲁塞尔条约以及罗马条约。”

雅克·德洛尔:

a. “只有那些目光远大的人才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欧洲建设的‘奠基人’的思想和他们移交给我们的遗产至今依然存在。”

b. “一种独特的实验从这个基点上发展起来,它吸收了其他模式的各种类似经验,例如创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经验……难道每个欧洲人有一种属于一个类似他的第二祖国的共同体的情感就是大逆不道了吗?如果拒绝这一切,欧洲建设必将失败,冷战妖魔必将重占上风,因为我们的共同体将不可能争取人心民意,没有人心民意,任何人类的实验都注定要失败。”

4. 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两种观念是这两个演说的基石

玛格丽特·撒切尔：

a. “一个向企业开放的欧洲，它的目标是隐藏在创立 1992 年单一市场后面的动员力量……这就意味着，这是一次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解放市场、扩大选择和争取更大经济兼容性的行动。”

b. 必须压缩共同体的开支，从减少共同农业政策经费开始。近期人们竭力做的是“引进更加严厉的预算纪律”。

雅克·德洛尔：

a. “问题不仅仅是欧洲国家什么时候和如何才能享有大市场的推动作用和它的好处。我们这个时代过分被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所笼罩，欧洲青年对我们的期望很高。”

b. 我们可以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如何迫使雅克·德洛尔严格约束共同体的财政雄心。他只能在市场良好运转的环境下，或者在“市场良好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中才能考虑新的共同政策。所有这些干预不能超出共同体实际公共支出的 5%”。这个数字特别低了，它比一个政治联邦的财政能力的一般水平低 5~10 倍。

5. 社会面貌

玛格丽特·撒切尔：

“在谈完单一市场的主题之前，我能不能说，我们绝对没有进行新的调节的必要，这种调节会增加就业的费用，使欧洲的劳动市场更缺乏弹性，比外国供应商更缺乏竞争力？”

雅克·德洛尔：

“当数百万青年为了寻找他们的职业生活的一席之地而白费力气地拍打社会大门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一个社会排斥的社会？……社会权利宪章的宗旨不过是庄严地提示我们，共同体不愿让劳动的基本权利服从唯一的经济效率。”

附录二 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宣言（草案）

前 言

欧洲和世界的近期事态表明，突出个人创新和市场的社会，比把经济管理委以一种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社会更具优越性，只有企业自由才能保证经济效率，经济效率是大多数人繁荣的保证。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惟有民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最大繁荣。反过来说，任何不能保证尊重所有权和企业自由的制度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要对人人有利，就必须在市民社会的框架内组织起来。因此，公共权力机构的使命是保障经济行为人的根本自由和监督是否遵守竞争规则，并且通过于预和法律，致力于经济繁荣促成的社会进步。

企业作为有组织的具有自身个性和文化的集体，是一种基本实体，企业的繁荣决定了整个经济的繁荣。大多数自然人是通过企业来寻找他们的工作和创新动力的。他们也从企业获得谋生的手段。企业的这种根本性作用赋予了它们一些公共权力必须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与作用和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由每个国家的立法者根据时间的推移和财富的发展情况规定的义务，而用单一的法律文件来统一欧洲企业的义务则为时尚早；还有道义上的义务，即使不能在履行义务的水平上完全一样，在有关义务的原则

上所有企业也应该一致，即可以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来看待这种义务。

企业自由精神是建立在资本持有者、企业领导者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因此，创新成果、风险和共同劳动的分配应该是在尊重企业实体的同时促使每个伙伴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所有人的效率与社会关系的质量是互相依存的。

根据上述考虑，本宣言有关各个条款应做如下解释：

第一条

企业自由得到共和国法律的保证。公共权力机构应该保护企业的自由。

第二条

在尊重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企业之间平等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经济和社会立法。

禁止任何逃避竞争规则和滥用主导地位的协议。只有具有特殊性质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用途的垄断才被允许。

违背这些规则的任何行为将由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负责查证和惩罚。

第三条

企业自由确定它们的价格。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对这个原则规定一些有限度的暂时的例外。

第四条

企业领导可以控制员工的招聘和解雇条件，但必须尊重已签定的协议和雇员的权利。

根据企业领导与雇员的协议谈判结果规定工资的一般条件，由雇员选举产生的代表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参加工资协议谈判。

第五条

企业决定本企业利润的分配、本企业股东的分红和投资选择。

第六条

鉴于企业的法人性质及其作用，应该像对待普通商品一样来对待企业所有权和对企业的监督。

因此，一个企业的资本持有者的所有权是不可侵犯的和绝对的。国家对这种所有权的任何限制都必须带有例外的性质，动因应该是根据大的公共利益的需要。这种限制应该得到事先谈妥的公平的补偿。这种限制只能由立法者根据特定多数通过的决议做出决策。

采取同样方式和基于同样理由组成资本公司的企业，如果它们的股票可以在一个和几个金融市场上交易，应该得到这些金融市场的规章和负责执行这些规章的权力机构的保护，防止操盘手在未经企业的伙伴们——领导人、雇员和股东——认可的情况下，实施他们的计划和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摆脱对他们的监察。

第七条

对现行立法做任何变动，如果对一个企业产生了不正常的特殊损害，都应得到由权威司法机构决定的公正赔偿。

第八条

企业领导要定期地和全面地向股东、雇员报告它的经营情况和企业情况。账目材料和金融文件要忠诚和准确。

第九条

雇员在各级民选代表机构中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得到法律保障。雇员选出的代表有责维护其委托人的合法利益。涉及劳动环境的措施，应该征询他们的意见。企业领导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他们参与研究企业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第十条

企业领导支持采取一切措施，在尊重企业必不可少的各种平衡的条件下，让雇员更好地参与有关企业成果和资本的分配。

第十一条

企业应该努力培训其员工，特别是受到解雇威胁的员工，以便帮助他们再就业。

企业应该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里采取一些行动，改善环境和生活质量。

第十二条

一般来讲，企业的行动自由、它们享有的各种保障和总体上拥有的各种手段，要求企业在推动社会成员企望的进步方面起发动机作用。公共权力机构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尤其是税收计划来鼓励它们这样做。

第十三条

尊重企业的权利与义务受到独立司法机构的保证。被告人可以得到相应程序的保障。

附录三 衰落的资本主义

1990年10月，我在《扩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文章，引起了为数不少的评论和反响。其中最有趣味的和最简洁明了的是雅克·波来萨尔 (Jacques Plassard) 的文章。该文于本书出版后不久发表在《SEDEIS》1991年6月6~15日号的《专栏》上。题目是《衰落的资本主义》。

我很荣幸征得作者同意，将这篇美文转载于此。

在东方（也有可能是在南方），今天正在书写的历史表明了一种追求财富，从而要求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要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18世纪和19世纪末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自由资本主义刚刚战胜了它的假想的苏维埃对手，自己也陷入了退化危机，甚至在美国，即在西方体系的核心出现了衰落现象。

米歇尔·阿尔贝尔在《扩展》杂志发表的文章，从标题上就明确提出了另一场辩论。自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从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之间开始了讨论：莱茵模式能否与美国模式对峙。

既然情况与东方完全不同，要了解这个问题最好单刀直入，也就是直接接触具体事实，无须在一些抽象的、带有部分臆想成分的解释上浪费时间。

一方是日本和莱茵模式，另一方是美国，它们之间分歧的基

点是经纪人，即资本家如何试图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美国的经济管理考虑的前景很短；人们提到季度报告、经常关注这些报告中的业绩和各种夸大其辞。德国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是根据长期目标进行管理的，或简而言之，考虑的基点超出了决策者的寿命年限。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原则相近的制度中有些国家却根据不同的观点来管理自己。权力掌握在企业领导人的手中；为什么美国公司的领导人执行了与德国公司领导极不同的政策？法国人似乎处于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分歧的地位，因为在法国也可以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基础和相互对抗。应该避免下断语，首先要理解。

美国的制度不合理吗？股票所有者——实际上，大多数情况是由金融家为私人账户管理这些股票、私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协议委托金融家来管理股票——竭力使他们的股东得到最大限度地增值。按传统方式，这种增值靠的是普遍利率（或平均资本增值率）和每个公司的利润。人们经常在这两个方面投机。对利润的投机不会是短期的（在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价格定位是不同的），但是，根据手头的信息可以每天修改，最可靠的信息是季度财务报表。

市场机制是“抹了润滑油的”，市场机制灵活地根据到手的的信息运转。有人说这就是金融的统治，这不过意味着利润的需要被接受了，并且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则来自经纪人的信息可能不完善。一旦经纪人知道了股市不是根据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是靠经纪人自己了如指掌的舆论而活跃起来时，这种信息就彻底靠不住了。“这个企业肯定要好起来，但现在不要买它的证券，因为股市对它并不看好”，实际情况却可能正好相反。

从用于土地的、要求持续性和连贯性的所有制观念来讲，可

以认为已经不再有一种业主的资本主义。财产转让的完全自由化、转让成本的降低和使用贷款购买的可能性，削减了所有者与他们拥有的具体财产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时是相当紧密的。人们追逐的目标也不再是所得收入，而是最大的增值。而这种追逐是疯狂的，完全脱离了具体现实。^①

当人们利用信贷、靠流言搅动的股市行情来炒股时，这种负面效应就会发展到极端。然而，在证券市场与公司领导、政策和战略之间不能有、也不应该有空隙。华尔街的这种波动毫无疑问会酿成混乱，但也可以避免停滞怠惰、并促使出人意料的经济切实重振。

深层的困难在于，股票的金融管理周期比公司经济、工业管理和贸易管理的周期短多了。我们可以批评金融业指手画脚，或指出金融管理必须经常提出问题，才能避免公司随着自身变得越来越大、逐年发展和膨胀臃肿而出现僵化现象。值得称道的是，美国公司确实一点也不浪费投资。

米歇尔·阿尔贝尔所说的莱茵模式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但差不多仅此一点而已。所有者还保留着他们的股票，他们当然想方设法要发财，他们是通过自己拥有的企业的发展，而不是靠“股市投机”发财的，也就是说，不是靠放牧金融来生活的。

法国人，尤其是米歇尔·阿尔贝尔极为推崇莱茵模式。在我看来，莱茵模式是与日本模式截然不同的。这种推崇是有道理的，不仅是因为和美国相比，莱茵模式目前确实取得了成就，而且因为，法国长期存在着一种重视土地的文化。有了一块土地，人们可以保留它，把它传给后代。在集体习俗与追求个人成果之

① 参见雅克·波来萨尔：《关于资本物资的思考——会计学与行为》，《SEDEIS 专栏》第2期，1991年2月，第17页及以后各页。

间，在社会共识与金融利润之间没有对立。但是，对于农民的后代、实业家的后代、手工业者的后代和侨民的后代来说，他们的时代感是不同的。与此相关联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欧洲的所有制都引起了具体的共鸣，证券的非物质形态化包含着制度的非人道化含义。所有制始终是核心问题，从起源和根本上讲，所有权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是属于个人的，但所有制有一种社会职能。

众所周知，目前在法国，老板的姓名也就是他们的企业的名称，有时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未能及时把企业托付给别人，这些姓氏成了企业的灵魂。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或者被有一定参股的股东指定为所有者。反之，也有受雇的总经理，他们今天在位，明天可能就走人了。“受雇的人，就不是牧羊人，羊群不归他所有，一旦发现狼来了，就会丢弃羊群，自己逃命。”

雇佣者，就是那个“羊群不归他所有”的人。诚然，有的管理者起着老板的作用，类似好的牧羊人，看见狼来了也不会逃之夭夭。对于一个工业公司或商业公司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不难发现，在那些具有同样头衔和获得同等权力的人中，有些人变成了“所有者”，而另一些人则依然是“雇佣者”。形式上可能没有区别，实质上则大不相同。

但在他们的背后，还有股东，在大公司里，由股东指定公司的负责人。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最简单，只有一个业主，或只有一个大的业主。所有权变化靠的是遗传。继承人并不都是能人，但至少他们是在这种环境中、在实业中长大的。历史上不乏银行王朝的例子。此外，他们、他们的家族和亲信，都很关切周围发生的事，有可能委托给有效率的人。米歇尔·阿尔贝尔提到莱茵模式存在于富有的国家中和至少近40年来那里的遗产税是最低的，这绝非

偶然。^①

第二种情况变成了理论问题，但必须提及这个问题才能很好了解如何向第三种情况演变的。这就是股东民主问题。个人储户有参加股东全体大会的权利，而根据政治民主程序，他们有权选举老板。当然，并不是所有股东的权利都一样大。尤其是有些股东的资格比另一些股东老，他们比刚刚入市的人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实际上是由老板及其董事会来指定接班人的。这是一种匿名国王制度。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因为被指定的接班人不可能是一个雇佣者。企业创始人及其董事会希望他们的事业继续下去，选择接班人是保持了连续性。

变化来自金融家作用的扩大。这就是说，个人储蓄者把他们的“不动产所有权”交给集体管理体制下的专家们管理了。这就涉及到第三种体制了。管理者拥有可观的权力，问题在于他们用什么精神来管理。在依然存在巨大家族财产的莱茵河两岸，集体管理者采取的是一种模仿和参照大家族财产的管理方式。储户的实力有限，只好依赖那些本身拥有相当财富的管理者。金融机构与工业联姻，调情卖俏不被禁止是不可想象的。

大西洋彼岸的集体管理方式已经变得大不相同了。我们可以天天盯住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根据业绩报告改来改去，证券交易所的管理者则要设法留住它们的客户。

没有完美无缺的形式。美国的流动性在陷入混乱之前也是值得称道的。要想使货币管理少出混乱，必须削弱“投机性”浪潮的势头和改变人们对时间的态度。日耳曼式的稳定需要有一个与法国的价值观（指伦理价值观）体系不同，特别是与近10年来的价值观体系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这种稳定性建立在谨慎的国家

① 参见REXECO：《必要提取——数量与结构》，企业研究所，载《SEDEIS专栏》1990年6月号、第217页。

之上，建立在一种与19世纪的货币政策一脉相承的货币政策之上。

法国模式是在特殊条件下演变过来的。当然，我们也在努力解决匿名公司中的民主机制问题。^①但是，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服从大选变化并受其制约的国家。它按照一种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没有的模式，在资本主义集体管理的多元机构中分配实际权力。当然，也没有人为这种模式公开辩解。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利用它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遗产税，把争夺所有权的问题逐出了国门之外。

因而，法国的体制是其他模式的外国资本主义在那里行使权力的场所。关于美国模式与莱茵模式的争论确实存在，争论含义深刻并有一定意义。从这场争论的外部可以看到，正在出现一种要把市场机制，即竞争机制同即使不是集体所有制，至少也是集体管理或公共管理方式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趋势：要市场，但不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国家的和集体的为一方，以跨国的、欧洲的和私人的为另一方的辩论尚未终结。民族主义的危险目前似乎尚未构成威胁，但一直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威胁。

欧洲体系应该努力推广莱茵模式。但莱茵地区可能并不认为有必要出口这样一种体制，因为其他国家无法效仿这种体制，也就不会给它带来相应的威望。

^① 参见米歇尔·贝波鲁：《资本的战略与股份制》，载《SEDEIS 专栏》第2期
1991年2月15日，第52页及以下各页。

译后记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迄今已经**500**多年。资本主义经历了封建主义复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多次自身严重危机的考验，经过不断调整和改革，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革命”和**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凡是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人，无不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予以极大的关注。

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做了最深刻、最本质的分析，这是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普遍公认的。马克思、列宁逝世以后，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从形式到内容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近些年来，国内和国际上有不少学者以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和问题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有的坚持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的发展脉络来分析；有的针对某些现象和变化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和“法人资本主义”等论点；还有人按照历史发展和地域分布不同，把资本主义做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与“莱茵资本主义”的区分；有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理论探讨；有的撇开意识形态因素，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的共同规律角度研究和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经济

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些研究和看法从不同角度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可否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过去和现在，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歧见甚至尖锐的对立，这也是正常的。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逐步确立，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全面和准确了。但是，我们作为“围城”之外的人观察和分析问题，有时不免仍是有有一种“雾里观花”和“隔靴搔痒”的感觉。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是“围城”以内的人士经过多年切身实践和观察的产物，读了给人一种不同的感受。书中列举了许多典型事例，对“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而有趣的比较研究（作者显然对莱茵模式更为赞赏有加）。新美国模式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讲英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美国与英国之间也有不少差别。莱茵模式包括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作者把日本和跨国公司也包括在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却把法国看做介乎两种模式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模式。作者分析了莱茵模式资本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书中对撒切尔—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评价（认为其核心是“竞争的最大化和国家的最小化”）；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和“经济金融化”的来源；分析了两种保险模式的异同；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依靠银行还是依靠股市集资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目前，在国外和国内对这些现象和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见仁见智。我们对书中的观点可以臧否，但这些看法对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和具体运作却有不容忽视的参考意义。

本书作者米歇尔·阿尔贝尔 (Michel Albert) 现任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他先后发表过《瘦牛》(1975)、《法国的王牌》(1982)、《Crise - Krach - Boom (危机, 危机, 危机)》(1988)、《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91) 等专著。

米歇尔·阿尔贝尔早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行政学院。在国内和国际组织中多年从事财政、计划、金融、保险工作, 当过财政督察、财政总监、银行行长、企业经理、公司总裁、研究所所长和经济顾问等。曾任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罗纳·普朗克化工集团、施奈德电子工业集团、卢塞尔—于克拉夫集团、哈瓦斯通信和广告集团经理, 《快报》集团、欧洲投资银行副总裁, 法国计划总署署长、法国最大保险公司——法国保险总公司 (AGF) 的董事长, 同时兼任过法国国际行情研究与信息中心 (隶属中央政府) 主任、欧共体委员会官员和经合组织的专家顾问以及大西洋西部地区工业开发协会主席等职务, 得过法国骑士勋章和联邦德国共和国奖章。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他的学术著作和工作经历是想说明, 他不仅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 也是在金融、财政、保险、证券和大型企业集团管理方面的实践家, 参与过重要的经济决策。他对德国经济、美国经济还进行过多年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他的许多看法既是实践经验之谈, 又不乏学者的真知灼见。他的论著 (特别是这本《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在欧洲、美国和我国 (包括台湾地区) 都曾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 早就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英文译本和对它的大量评论, 但原文一时难以寻觅。当我最近从丁一凡学友处得到《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法文原版并动手翻译时, 作者告我, 他这本书已在全世界五大洲出版了 19 种语言的版本。本书能以中译本形式奉献给广

大的汉语读者，对读者和作者都是一件幸事。

作者于1985年曾应邀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十分关心。他计划近期内再次访华。我们期待他能就国际金融体制管理和改革、金融全球化、欧元问题以及“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等问题进一步现身说法，与我国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

感谢作者为中译本的出版专门赶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对事态的最新发展补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感谢丁一凡、滕青，他们为本书的出版联系原作者、版权，做了不少工作。感谢法国友人西凤女士帮助解决不少技术和语言问题。

法国瑟伊出版社、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为这个中译本提供了版权转让和出版赞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仁进行了耐心的审阅、校订和润色加工。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译者谨识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北京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

©Editions du Seuil 1991 et 1998

本书根据法国瑟伊出版社 1991 年和 1998 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著 者：[法] 米歇尔·阿尔贝尔

译 者：杨祖功 杨 齐 海 鹰

责任编辑：程晓燕

责任校对：飞 音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e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9.375

字 数：235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216-1/D·002

定价：17.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229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 李

● 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 李

● 新民主主义人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李

●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李

●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 李

9 787304 219171



9 787304 219171

9 787304 219171
定价